



ZHONGGUO  
DEDIYIMU  
XI' ANSHIBIANMIWEN

# 中国的第一幕 ——西安事变秘闻

【新西兰】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著

牛玉林 译 卢匡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DEDIYIMU  
XI' ANSHIBIANMIW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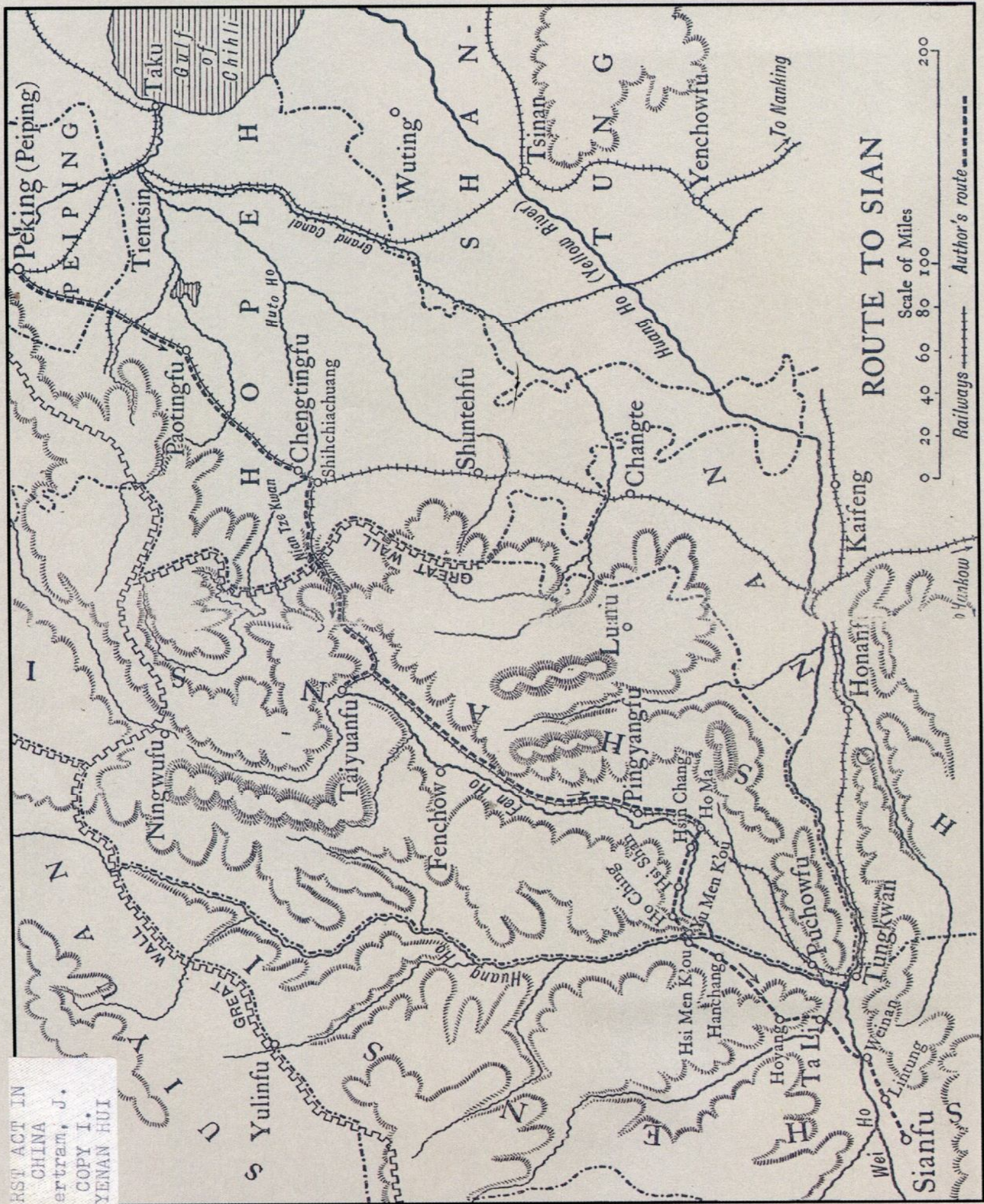
# 中国的第一幕 ——西安事变秘闻

【新西兰】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著

牛玉林 译 卢 匡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FIRST ACT IN  
CHINA  
Bertram, J.  
COPY I.  
YENAN HUI

向东北义勇军致敬



## 致中国读者

本书是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年轻外国观察者，在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处于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为了捕捉当时那种紧张气氛和领略那令人激动万分的情景而作出的一个尝试。时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现在回首往事，我依然认为，在中国为其民族团结而进行的漫长斗争中，“西安事变”是其中最光彩夺目、最富有启示意义的环节之一。在这次事变中所显示出来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之间的冲突，蕴含着《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精心策划的某些战争和政策谋略在内。

1936年12月，我自荣获罗兹奖学金来华从事研究工作以来，在北平已度过了一年中的一段最美好的时光。我住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公寓里，与两位最积极能干的学生领袖同居一室。当时，埃德加·斯诺和他那位总爱幻想的妻子尼姆·威尔士，已从海淀区搬到了古城墙角落的一座公馆，在“狐狸塔”附近。作为斯诺的朋友，我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那年夏天，当斯诺进行那次开拓性旅行，到西北采访红军领袖们时，从燕大召来给他当翻译的，就是我的同舍宿友黄华。我的另一位宿友，是位身材魁梧的东北人，他叫张兆麟，不久便被召到西安，为少帅张学良编一份报纸。

多亏有这么多的关系，所以在蒋介石被俘于西安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时，我比大多数人都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久，我获得机会，遇见了曾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苗剑秋，并与他一道，进行了那次经由陆路到陕西首府西安的艰难备尝的旅行。我的旅行身份，是埃德加·斯诺的代表、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和我们一起同往的，还有美联社的麦克·费希尔(也就是书中被称为“唐”的那位)。但只有我和苗剑秋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因此，我成了突破严密封锁，到达这座叛乱城市的唯一外国旅人。

现在，要说我对西安事变的记述还有某些价值的话，那大概是因

为，我的记述完全是以见证人的身份，用第一手材料写出来的。兵变的发生经过，我是直接听之于少帅的那三位忠心不贰的助手——苗剑秋、应德田和孙铭久，他们三个协助少帅制定了行动计划，并使其得以实施执行。在本书中，我把他们称为“西安的三个火枪手”。关于杨虎城和他那支陕西军队的情况，我是从王炳南和他那位德国妻子——王安娜那里听到的，进而又通过他们的那位热情似火、个性坚强的朋友——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得到了更深刻的直接个人印象。不久，艾格尼丝、王安娜和我都卷入了西安无线电台的外语广播，因为我们发现，这是打破新闻封锁的唯一途径。后来我们得知，我们的广播受到了外国驻华使馆的密切关注，对当时国际政策的制定，也许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后来的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对有关细节已经有了详尽的论述，也都特别强调共产党派往西安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即便如此，如果要我再次讲述这段经历的话，我还要说，在协助解决这次危机中，周恩来作为核心人物，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在西安舞台上的四个主要人物中，只有蒋介石和周恩来，在中国具有最广泛和持久的影响。而具有骑士般侠肝义胆的理想主义者少帅张学良和勇猛无畏的陕西战士杨虎城，则是主要的不幸者：俩人不仅都失去了他们的指挥权和军队，而且在那位至死不忘曾蒙受过其耻辱的委员长的无情报复下，一个被终生监禁，另一个在南京政府行将垮台之际合家被害。

1986年12月，为了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我和我的妻子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邀，访问了北京和西安。于盛夏之际离开新西兰，在冰封雪冻的华北古城度过了极度紧张的两周多时间，实在令人感到既兴奋，又突然。

许多老朋友业已过世，而一些新的面孔则唤起我对他们的追思之情。在机场，杨虎城的大儿子杨拯民看上去酷似他的爸爸。张学良的表弟，温文尔雅的张学文，穿了件皮领毛呢外套，又很像我那位不安份的旅扮——爱把自己装扮成资产者的苗剑秋。但对我来说最有意义

的，还是我在西安回忆起来的面容。

身材开阔的陕西人王炳南已是满头银发，他曾是深受杨虎城和周恩来信任的联络人。王炳南的前妻、金发碧眼的王安娜(现在的安娜莉丝·马顿丝)那突出来的侧影，使我想起她与我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共同主持西安电台外语广播时的情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少说也有一千人参加的盛大宴会上，有位身着长衫，留着几缕胡须的老先生，在用他那似曾相识的透彻双目凝视着我，我记起来了，他就是前东北军特务团团长——孙铭久。应德田早已故去，苗剑秋据说在日本，而眼下的这位就是“西安的三个火枪手”中的最后一人。

重返古都西安，一切就像 50 年前一样，在晴朗的冬日里，我们从蒋介石在华清池的寐处出发，缓缓登上位于山腰的那座冰雪覆盖的“兵谏亭”。在这片历经沧桑的地方，地下掩埋的一支军队依然在庆贺那位完成了修筑万里长城的帝王的伟绩，而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西安事变也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它是不会被忘记的——我所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个外国旁观者，一个激浪堤边的守望人，我有幸获得了这样一个涉足其中的机会，从而感到自己也是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詹姆斯·贝特兰

1988 年 10 月 12 日于新西兰惠灵顿

## 再版前言

《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是由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唯一突破重重封锁，从北平赶赴西安进行了长时间调查专访的英国记者、新西兰青年学者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于 1937 年出版的一部专著。自 1989 年 3 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一

直被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是研究和客观评价西安事变的一部最具权威性和历史价值的著作。由于该书出版后适逢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因此它对唤起西方民众了解中国艰难困苦的社会现状，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本书中，作者以第一见证人的身份，通过自己的深入调查采访，向世人全面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因后果，揭示了其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这就是这次事变令“当今中国最严重的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一对不共戴天的死对头——走向和解”。“这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前提”。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对西安事变发生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现状的客观记录，是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份活档案，具有鲜明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感谢已故的新西兰友人贝特兰先生，相信每位读完本书的朋友，都会对作者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公正、客观和对中国人民的浓情厚意，有所感触的。

完成此书初版的翻译后，笔者改行当了记者，也想能够像贝特兰先生那样，用手中的笔更多记录当代历史变革中的人和事。但因种种原因，无甚大作为。此次再版，笔者重操旧业，将初版译得不够准确的地方，对照原著进行了一些校正。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张海潮、许晓光等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从发稿到出版，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且无论版式还是出书质量，较初版均好了许多。在此，亦向他们表示感谢。

牛玉林

2007年11月22日

## 目录

序 言 中国在危机中

第一章 老北平的旗帜

第二章 蒋介石死了吗？

第三章 我们去西安

第四章 东北人

第五章 黄河

第六章 禹王庙

第七章 西安的城墙

第八章 西北的“剿匪者”

第九章 仲冬兵变

第十章 西安的阶下囚

第十一章 调解人

第十二章 西安内幕

第十三章 宣传

第十四章 新年好

第十五章 群众大会和传教士

第十六章 诸神各奔东西

第十七章 武装起来的西北

第十八章 红军的挺进

第十九章 直接行动

第二十章 国民阵线

附录：社团及人物表

译后记

## 序言

# 中国在危机中

1937 年 7 月，世人将铭记在心。它标志着西班牙历时一年的一场生死之战的结束。这是一场人类自由力量和法西斯主义的公然侵略之间的战争，而法西斯主义者的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现已成为压在欧洲人心头上的梦魇。在上月那令人窒息的最后几天里，战争突然公开化了，并且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在膨胀和蔓延。

与威胁到欧洲那脆弱和平的同样一股肆意妄为的侵略势力，在另一个半球被释放了出来。远东开始爆发战争。

欧洲的困境历来是日本人的天赐良机。日本军国主义者与其欧洲盟友再次紧密配合，趁西班牙战乱，不失时机地向中国那活生生的躯体扑了上去。随着最近的这次无端进攻，日本参谋总部的统治东亚，以及蓄谋已久的侵苏战争计划，已经向前跨了一大步而更接近于完成。

面对最近的这次挑衅，中国处于危机之中。尽管她孤零零地处在一个似乎只有反对和平的敌人能够成功联合的世界上，但她还是聚集起来了本国所有的零散部队，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但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和美国——能够坐视远东当前的事态发展而无动于衷。

日本所要求的，决不仅仅是彻底征服中国。即使那些在远东拥有根本利益的西方列强——比之于他们在中国所能够得到的资本输出，或他们可能希望的，在一切市场上防范日本的竞争，他们的战略利益远为重大，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也从不曾正视这种结局会带来的结果。

几乎只有苏联人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真正危险，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而受到威胁的却并非只有苏联。大英帝国的东方前线，从悉

尼一直到香港，如同现今已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威胁的地中海航线之现状所证实的，同样经不起日本的恫吓。而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西印度群岛，则对为配合其军事上的“大陆政策”④而南征的日本海军敞开了门户。至于美国，无论其多么崇信“孤立主义”的利己政策，也无法逃脱他在西太平洋应负的责任。他在太平洋的生命线(借用日本人喜爱的一句话)是：追逐在中国快艇之后的尾迹。

今天，日本的眼前目标可能是华北，明天就是华南、香港和菲律宾。任何希望都比这种可怜的希望好，这就是通过不断的妥协让步来贿赂侵略者(英国外交界所死抱住不放的就是这种失败主义的无所作为立场)。西班牙是在阿比尼西亚②采用这一政策结出的恶果，而阿比尼西亚则同样也是在满洲施行这一政策的遗患。在如今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的最大不幸就在于，人们不得不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来弄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今天的远东事态再度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要警惕这一政策所造成的危险。对中国独立的威胁就是对所有太平洋有关的国家的挑战。不仅如此，它作为法西斯主义侵略攻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公然挑衅。

中国并非仅仅在为自己而战——虽然她的战斗也是为了维护几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一个民族的独立。无论是从她所卷入的这场斗争的本质分析，还是从其对手的特点上看，中国都是站在反对无端侵略和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和平阵营前线。

如果中国不得不孤军作战，她也能够这么打下去，虽然那些对其沿海地区防卫力量之薄弱有所了解的人，对于她要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感到惶恐不安。但至少(我们从她目前所处的困境中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抗击侵略者，保卫领土方面，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日本的侵略促成了中国内部争斗和剿杀都未能办到的事，使这个幅员辽阔而又陷于无组织状态的国家，溶化成一个理智的整体，这就是国难当头全体国民组织上的统一。

本书所涉及的，是现代史上的一段往事——中国在向民族团结方面艰难迈进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最新和最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我认为，这一事件是远东现代史上的一个决不可少的环节，唯有了解这一事件，才能够弄明白中国对日本最新挑战所做出的反应。此外，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其他国家，本书所涉及的事件尚鲜为人知。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在中国西部陕西省的一个冰封雪冻的山腰间，蒋介石将军为起来造反的“少帅”张学良的部队所俘获。这是一个引起轰动的头号政治事件，一下子使中国进入了世界舆论中心，从而使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为之逊色，一直持续到次年七月的中日战争爆发。

但这位将军并未被立即处死，尽管当时有人唯恐(也有人希望)出现这种结局。即使在欧洲，即使是已逐渐习惯了“晨报”带来耸人听闻消息的欧洲人，仅只看关于它的报道，便会觉得凶多吉少。在远东，人们的初步反应是一片惊骇。

由此而引起的轰动，比之于前十个月在东京发生的那场军事政变③，以及在政变中死去的著名人物所引起的轰动来说，它来势更猛，更使人为之震惊。日本国有其独特的暴力和政治谋杀传统，且崇尚剖腹自杀，这几乎成了年轻爱国者的神圣使命。一般而言，中国人在这类事情上的做法就不那么残忍。

此外，对于西安事变中的主要人物，人们忽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近来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很容易为一种假相所迷惑，这就是要把某个人的名字和一个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或者由于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一下子被大多数人毫不费力地记起来)，蒋介石的名字已经树立起来，流传于国外，他即使不代表中国，也至少是南京政府的象征。他的命运——几乎可以这么认为——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命运。

然而这一次，持有这种流行观点却不能算是什么错误。这位“委员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亦即“政府”。在蒋介石身上所发生

的任何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所有与远东有关的国家来说，都可能是重要的。正如蒋夫人用一种可以原谅的夸张口吻描述的那样：西安，这个中华民族的摇篮，看来“完全有可能成为他的棺材”④。

在西安，通过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态转化——这种转化逃不过史学家的双眼，中国的“英雄”一下子成了中国的“小捣蛋鬼”张学良的阶下囚。在西方人的眼里，张学良一直被看成是个不负责任的鸦片鬼，他曾是公众谈论很多的人物。满洲失陷后，他一度非常体面地销声匿迹了，世道的冷酷使他成了这一事件的替罪羊。但随着西安兵变的发动，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重振旗鼓，卷土重来。

这次委员长为其富有浪漫色彩的部属“绑架”，具有国际上这类戏剧性事件的所有成分。假如要想象一下同类事件如果发生在西方会引起的轰动，你可以设想如果墨索里尼被利比亚总督扣留在某个沙漠旅馆，或“第三帝国”元首于6月30号的国庆日为格林将军诱禁于他的猎屋中，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在这个令人茫然无措的12月，全世界意识到了中国的存在，并为其前景担忧。传出来的消息几乎完全缺乏真实性，从而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兵变的局势异同寻常，它的后果更难预料。“专家们”闭门苦苦思索，报纸发挥了超常的想像力，编造出许多自相矛盾的评论。诚实的编辑们则把这一切说成是“又一道中国难题”。到此为止，不复深究。

但事态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圣诞节那天，“少帅”以一种堪与古代英雄相媲美的认错姿态(也可能是真的认错)，驾着他的私人飞机，把他的“俘虏”送回到洛阳。稍后不久，他便出现在南京，“请求惩罚”。至于蒋介石本人，除了受了点惊吓和背部受了点轻伤外，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被完好无损地送交给谢天谢地的国家。中国的又一次危机结束了。

本书旨在描述12月那场危机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向读者揭示这一事件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意义。我想，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不

管人们对他的做法怎样考虑，“张学良终归还是正确的”。而且我还相信，在本书的若干章节里，一个新的、更符合他本人的那种受到严重歪曲、诋毁的形象将首次出现。

但这只是附带提出来的，并非本书的全部宗旨。对于一个非专业人员来说，为一个人恢复名誉，这是件危险的事。更何况还是在远东，在亚洲这个社会激荡风起云涌的地方，这种声势浩大的社会动荡所激起的群众运动，较之为某个人恢复名誉，不知要重要多少倍。所以我在本书中所乐于选定的主题是——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迫在眉睫的挑衅，中国的民族意识在增长，民族决心在高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在崛起——尽管我知道自己无力对此做出公正的评价。

中国人的政治观念是遥远的，含混的，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生动地表现出来。正是由于他们平时政治观念的淡漠和遥远，才容易解释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他们偶尔萌发出来的生动表现。大多数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完全用好莱坞制片商的眼光看待中国——一个对于构思电影脚本素材异常丰富的世界。

面对这个国家那神秘的背景和无数的芸芸众生，像这种确实引人注目的周期性“偶然事件”，与其说能为人们所理解，倒不如说只会令人闻而生畏。造成这种后果，这是远东报纸主编们的责任。他们知道他们的众多读者只能一点一滴地接受关于中国的报道，适量地接受一点离奇古怪的东西。马可·波罗所创立的那种文学传统，已证明具有非凡的生命力。

既然日本人和善的“神风”四天内便可把这个帝国的大使吹到伦敦，既然定期的“中国快艇”要不了一周便可跨越太平洋，于是我们开始认识到，东西方的距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在和平时期，这种认识可使那些超然化外的游客惬意非常，而一旦整个东方战火腾起，他们的信心则开始丧失。

任何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对于中国或日本所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理所当然要深思熟虑，这

无须别人提醒。但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决不应限于少数人。这是因为，远东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现在蒙受的苦难，是今日世界所面临问题的一部分，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中国总是危机四伏。这是一个已经感受到社会革命总爆发前夕的痛苦，而且又不幸在地理上与最年轻、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强国为邻的一个幅员辽阔的亚洲型社会的持续危机。

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的历史最明显地受着两个因素的制约：这就是革命和日本的侵略。

这两种现象同样重要，在世界舞台上，它们将要持续下去。

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在 1925—1927 年的“大革命”时期达到了它的顶点，然后便被上海金融家和外国列强支持的国民党“右翼”反动势力镇压了下去。在此之后，这场革命所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便转向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如此声势浩大的社会动荡所激发的能量是不容小视的)。1927 年后的近十年里，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面对不断的围剿征杀，始终使革命的旗帜飘扬在中国上空。这是当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奇迹。

自 1931 年以来，远东地区众目所瞩的唯一事件，就是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以及这个海岛帝国的持续对外扩张。它的手法虽然变化多端，时软时硬，但其目的则是始终如一的。面对这种残酷的征服大进军，中国为抵抗侵略所做出的努力，迄今为止仍是半心半意的，而且收效甚微。

在此情况下，认真考虑蒋介石和他在 1927 年取得巨大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中央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在这个问题上具备一定的洞察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中国对日本态度的根本变化，而在 1937 年，这种变化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从 1931—1936 年，南京政府一直令人震惊地顽固执行着一种被批评者们称之为“投降政策”的方针路线，即以牺牲华北和内蒙古为代价，来换取首都及其相邻省份在某种程度上的完整。某些对此持同情态度的外国观察家也一再坚持说，南京除此再无他法。但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与政府的这种看法截然不同。

对日本要求的每一次让步，都要激起一些人公开抗议国民党的这种妥协政策。1933 年 5 月的“塘沽协定”<sup>⑤</sup>划掉了中国的五个省，直接导致了同年 11 月的“福建起义”，并在十九路军——当时绝无仅有的一支和日本打过仗的中国军队的协助下，建立了“人民政府”<sup>⑥</sup>。而那个在处理对日交涉时显得如此软弱的南京政府，在处置国内反对派时却异常坚定。英勇的十九路军，这支 1932 年中日之战时大上海的英雄保卫者，迅速便为炸弹所征服。1935 年，当日本对华北提出进一步要求时，南京政府批准了由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占领军司令梅津签署的秘密“何梅协定”<sup>⑦</sup>，对日本做出了新的让步。这次“投降”激起了极其广泛的愤怒，导致北平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从而使日本原计划于 1935 年冬季在华北另外五个省实施的“自治运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第二年夏天，中国南部的广东、广西两省再度联合了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尽管这次运动的潜在动机有点令人怀疑，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之所以能够赢得群众的支持，仅仅是由于它对日本的侵略提出了一个更为积极的抵抗方针。

对侵略者毫不迟疑地采用投降政策的五年，也是对全中国的民众团体进行镇压的五年，这就是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另一个方面。在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所有要求中，有一个要求不曾改变过——它具体地归结在 1936 年初广田先生的那个著名的“三点声明”<sup>⑧</sup>的第三点上，就是要求完全取缔一切形式的抗日活动，同时用武力镇压共产党。直到他在西安被俘，蒋介石可能都在作这样的辩解：他非常忠实地遵从了这项命令。

西安事变的真正政治意义就在于：它的降临对许许多多的观察家来说犹如晴空霹雳，而它的结束也同样地令人不可思议。在经过长期

抗议镇压爱国运动，以及继续打耗费了数百万中国人民生命的内战之后，当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而面临威胁的时候，西安事变是一系列抗议活动中最后也是最有力的一次。

在西安事变的结局上，它又与过去的一切抗议活动截然不同：当今中国最严重的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走向了和解。

西安事变前数个月，中国的广大民众就在呼吁支持成立一个民族防御阵线。而早在 1935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就做出保证：如果这个联合阵线能够建立，它将把自己的土地革命纲领，改为社会改革计划，并与国民党合作，支持建立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民族救亡国会”。这显然是一个切合时宜的策略性转变，是从一直被视为“国民政府”的死敌那里伸出的一个象征和平的橄榄枝。

次年六月，“中国各阶层救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一个由许多知名人士倡导发起的社会团体，其中也包括孙中山的夫人。这次在国难当头情况下所掀起的运动，公开赞同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党派的联合阵线，因而在无党派人士中获得了支持，并以某种不偏不倚的姿态，声称它赞同实施由“中国革命之父”提出的那些政治主张。

孙中山被长期安放在紫金山上的一处豪华的灵墓中。对于这位死于贫病，然而却在中国取得了绝无仅有的成功的政治领袖来说，此处也绝非是他理想的安眠之所，虽然他的继承者把他塑造成为国民党的一个神秘莫测、令人肃然起敬的圣像，但对于执行他的政策，他们似乎却还没有腾出时间。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个把月，“全国救亡委员会”遭到镇压。它的七个最知名的领导人，被荒谬绝伦地冠以“宣传有悖于三民主义政策”的罪名被捕入狱。

就西安事变而言，虽然正是由于蒋介石图谋继续进行对红军的战役，才激发了它的产生，但上海的这次大逮捕，却是促使西安事变发生的导火线。西安事变所提出的，是这样一个关于国家政策的根本问题：国家的“统一”，是沿着过去的老路，驾轻就熟，通过强行镇压

所有反对派，并对日本采取无所作为的投降“外交”政策来谋取，还是紧密团结中国所有党派和爱国力量，努力实行积极有效的抵抗措施。

张学良带着义无反顾，蔑视二切的神情所高擎的造反旗帜，就是一面民族防御、民主团结阵线的大旗。蒋介石所面临的选择，也就是要内战，还是要国内和平；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还是继续进行民族革命的斗争。

这种选择对中国人民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要立即采取行动，时间紧迫已毫无回旋余地了——从 1936 年 12 月到 1937 年 7 月，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时期。即便是事变爆发的那个仲冬，在西安看来，中国要建立起民族团结阵线，若非不可能，也是十分遥远的。然而，现在它已成为中国能够存在的基本条件。从这一点来看，西安事变也必定作为远东关系史上一个真正的历史性转折点而出现。

在整个西安事变这场危机中，扮演了一个非常勇敢而又富于献身精神角色的蒋介石夫人，把她这段出人意料的独特经历，非常坦率地倾吐在一系列文章中，首次发表在纽约的《时代》周刊上。她的这些文章和委员长记述的整个被扣押时期活动的日记(这些日记之所以被写出来，似乎更多是出于官方目的)，是关于他们在西安的这段插曲的唯一重要的出版物。特别是蒋夫人的描述充满人情味，而且包含了——其可靠程度是无可指责的——关于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反应的某些细节内容。尽管如此，如果要对这一极富于戏剧性的事件的整个过程加以充实，对当时那种似乎令人茫然不知所措，无法做出决定的实际情况加以更为详尽的叙述，还应该有很大的说话余地。

在以下章节里，本人采用直接讲述法，把西安事变的故事讲述给大家。我之所以采用个人传记的形式，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因为用这种方法比较好写。在两个多月的封锁期内，本人有幸成为唯一抵达西安的外国记者，因此，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我在本书的若干章节里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讲述亲眼看到的这一革命运动的部分事实。

在如此简略的篇幅里，我们只能谈到中国人民在其艰难深重的历史上，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然，这一切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人那种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而我也的确认为，这个问题是最不容忽视的。但是，如我所见，西安当时集中了中国社会中的某些最有影响的人物，而其时的紧张气氛则使各派人物的特征更加鲜明。如果本书能使人们对中国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紧要关头有个粗略的了解，就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希望，本书作为了解今日之中国的一份草图，能够使一些人对此感兴趣。

在此，我要向洛德·洛西斯和罗兹·特拉斯提二位先生表达我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了我机会，在中国和日本学习一年时间。我还要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感谢他们的仁慈和耐心。正是由于这些，我才得以了解中国。我尤其要感谢我在中国的学生中的朋友们，正是由于他们，才使我对创造了历史的青年运动有了深刻的认识。

我希望，这本简短的《中国的第一幕》能够有助于对今日中国之困境的了解和同情。这是因为，从来也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当接二连三的同个危机所造成的悲惨局面早已使她陷入深渊的时候——中国真正需要那些“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同情和支持。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1937年8月于北平

译注：

①“大陆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鲸吞亚洲大陆，建立大陆帝国进而征服世界的侵略政策。这个政策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1927年7月25日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中提出来的，内有“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纵观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全部活动，莫不按此政策行事。

②现译埃塞俄比亚。

③1936年2月26日，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策划和指挥下，少数“少壮派”军官纠集1400多名士兵，在东京发动武装叛乱。他们占领重要政府机关，袭击首相官邸和高级官吏住宅，杀死内务大臣，大荒相和教育总监等，并向大陆军臣提出“兵谏”，要求建立“军人政府”，实行军人独裁。2月29日在政府军队的镇压下，政变未遂。3月8日冈田内阁辞职，成立了由一贯主张侵华的广田弘毅为首相的内阁。日本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獗。

④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此处原文为：“余今又来西安矣。西安本为我中华民族产生之摇篮，今岂将变成其棺木欤！”

⑤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在占领热河省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国民党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及驻守长城沿线的其他军队自动奋起抵抗。蒋介石却加紧镇压抗日运动，阻挠前往抵抗日军，使日军得以经过冷口、滦东地区直逼平津。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今通县，上述各地今皆属北京市)、香河(今属河北)、宝坻、宁河、芦台(今皆属天津市)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日方可以用飞机等方法核查。这样，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东三省及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使华北门户敞开，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⑥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进行反共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影响和广大官兵的推动下，蒋廷锴等人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为了镇压这次事变，蒋介石亲任“讨逆军”总司令，动用一切能动用的陆、海、空力量，并秘密乞求得日本海军的援助。福建政府在敌人优势兵力四面围击下，于1934年1月终于

失败了。

⑦1935 年 5 月，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汉奸报《振声》社长白逾恒等被杀，是“排日行为”，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于 5 月 29 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从东北调遣大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5 月 9 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三天答复。经何与日方秘密会谈后，于 7 月 6 日复函梅津，承诺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出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通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有：(一)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日本指定的其他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⑧广田三原则。1935 年 5 月，日本帝国主义派兵进一步侵犯华北，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实行“自治”。1935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和日本进行谈判。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 10 月 7 日对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对华政策三原则”：(一)中国应放弃以夷制夷的政策，不得依赖英美牵制日本，所有排斥日货及排日教育，均须一律停止；(二)中国应尊重“满洲国”之存在，并设法促进华北与“满洲”之文化、经济联络；(三)中国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10 月 26 日，蒋作宾向广田弘毅转达中国政府对其“三原则”的意见：(一)中国无“以夷制夷”意，在与各国关系中决不排除或妨害日本；(二)在“满洲国”问题上，政府之间虽不能进行交涉，但对该地方的现状决不用和平以外的方法引起争端，对于关内外人民的经济联系，当设法保持；(三)如日本能完全实行中国方面所提供之三原则，则中国在不妨碍主权独立的情况下，拟就北方边境防赤问题与日本协商有效办法。

## 第一章

## 老北平的旗帜

不闻格斗之声，雄伟壮丽的皇城真的会不战而降吗？

——尼姆·威尔斯。引自 1935 年《亚细亚》杂志

有些城市就战胜了自己的命运：在肮脏的城郊里，雅典依然存在着；罗马永远是七个小丘之上的罗马<sup>①</sup>。但北平不再是中国的了。

经过史无前例的短暂围困之后，这座皇城的总崩溃几乎发生于一夜之间。这一天——1937 年仲夏的 7 月 28 日——宋哲元将军一反常态，显得信心十足，滔滔不绝地大谈起对日本的蔑视，而外国人则兔子般地向使馆区的避难所窜去。身穿灰制服的二十九军士兵或凶神恶煞般地躲在街头的沙包工事之后，或勇敢地大步行走在宏伟的城墙上。七月的阳光照射在光秃秃的大刀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整整一天，日本飞机旁若无人地到处耀武扬威，在城外暴露出来的中国阵地上倾泻着死亡。第二天早晨，北平人感到了一种奇异而生疏的宁静气氛。那些穿灰制服的军人已从门前撤走了，唯有沙包工事留在那里，上面插着日本旗。

就在当天午夜，宋哲元将军“热泪盈眶”地离开北平，带着他的残余部队，撤到了保定府。此后一周内，市内的中国警察也都顺从地自动解除了武装，准备应付最坏的结局。8 月 8 日，在一批由日本使馆挑选出来挥舞着旗子的当地日本浪人和毒品贩子面前，河边将军沿着东长安街检阅了他的部队和坦克。日本对中国这座古都的军事占领，终于成了事实。

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多么惊奇：这种结局早已为人们所料到，因而它的到来，反倒像是使人们松了一口气。日本的占领，“北平的失陷”，充其量只不过是摘去了一片内部早已腐烂了的表面疮痍而已。

北平算完了，有位美国诗人在一首挽歌里曾坚持这么认为。她在  
这首像是专为这次最后的大崩溃而即兴创作的诗中写道：

啊，当一个美丽的、皇后般的城市失去了她的尊严，  
有谁为此而不感到遗憾？

如同诗人说到，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遭到了毁灭，  
会痛苦地说：她遭到了蹂躏。

可是，北平并没有受到蹂躏，  
就像被皮条客收买、出卖的痴妓女一样，  
用肉体赚钱，根本算不上受到蹂躏。

北平啊，古老的北平，  
在她漫长的遭到围困的历史上，  
还从未有过，  
不经过搏斗，便告苟安。

北平此时不再是至尊至贵的了，  
她那幽灵般的宫殿死盯着你，  
大睁着茫然无神的双眼，  
以及昔日禁城皇家宫殿琉璃瓦顶上的龙檐……

昔日盘踞在金光璀璨的排排瓦顶上，那些象征帝王的龙，  
看上去就像，

秋天屋顶上那一排排  
等待晒干的金色玉米中的毛毛虫，  
一样的温顺，  
一样的无害。

这都是两年前的事了，也是早已为这座北方首府谱就的“天鹅之声”。

当我于 1936 年初来到北平，在一所中国大学工作时，我发现雪后的北平很美，而且充满了政治矛盾，这比都柏林②或但泽③多。它形式

上的权力机构是“冀察政务委员会”④，这是日本人于 1935 年后半年强制推行“华北自治”后，最终产生出来的一个机构。这场华北自治运动来势汹汹，搞得山摇地动，其结果不过是逼出了一只“耗子”⑤。从表面上看来，虽然“委员会”的委员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宴请款待日本军事要员上，与日本亲善，但是，它终究是一只中国“耗子”，即使不与南京方面有着生死相依的联系，也仍然受着南京的保护。

北平当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而中国学生则是该国最活跃的政治因素之一。对日本搞“自治”运动的唯一真正反对者，几乎都来自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团体。正是他们组织了 12 月 9 日和 16 日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充分表明：华北人民并不稀罕日本人包揽下的所谓“自治”。但校方的态度——使人们再一次领略到贯穿于整个政府机构的固有矛盾——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和平。学生们被反复恐吓、规劝，要他们远离政治，把心思更多地用于像“新生活运动”那样的娱乐、消遣上。

正如稍后不久事态所显示的那样，当时在北平，唯有学生对形势持有现实主义的观点。他们在市内和周围农村，组织示威运动，呼吁建立“救国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军训和群众组织活动，以便为他们所预见到的，日益临近的战争积极做好准备。他们是主张对日本在华北的入侵实行抵抗的唯一倡导者。残存于这座濒临死亡的城市里的唯一有生气的力量，就是这些受到严密监护，被告知要埋头读书，钻研学问，而不要过问国事的几千青年人。

当时的北平气氛也不适于政治上的狂热。对学生们的流行观点——

——特别在外国社团中间——就是，他们只想在学期结束时叫学生玩弄一下政治，这样就可以避开学校的考试(显然，学生们宁愿冒警察开枪的危险，也不愿接受试场那种无法预料的前途)。庄严肃穆的英国大使馆就坚决认为，这些孩子们最多可拿到两角钱——大概是莫斯科给的——因而敢于面对机关枪、逮捕，以及目前专门用于对付政治犯的中国传统酷刑。照此看来，他们中的有些人肯定发了财。

然而这个外国社团，这个为女性小说家所钟爱的北平“社会”，自身就是个罕见而微妙的现象，而它的必然走向消逝，无疑将使各国那些把北平当作避难所的唯美主义者和同性恋者感到悲哀。当它仍然存在的时候，它或许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这是一种与时代发展不相符的现象，像一次世界大战前佛罗伦萨⑥的外国侨民一样，欣欣向荣地苟延残喘着。它也是一个自立自主的世界；它很少会受到“活的中国”的冲击。它的娱乐优雅而有点颓废，宛若置身于一座古都里。它是一个没有人能长大成人的世界，在这里的所谓举足轻重的大事，就是获得一次参加鸡尾酒会的邀请，或乘月色去观赏天坛公园(北平之令人迷恋，犹如牛津一样，是要命的，在这两个地方生活过的人都会被深深迷住，难于自拔)。

尽管如此，比起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有一些更富有才能，眼界开阔的外国人居住在北平。他们中大多数，也的确对中国怀有纯真的感情：但通常这种感情(我觉得)是发之于对过去的中国。他们所寻求的是古老、离奇或漂亮美丽；庙堂里装上收音机，会使他们那脆弱的感情受到严重打击；一本拉丁化的课本，会使他们对中国字的独特风貌面临取代而恐慌不已。他们会来到一个很不舒服的剧院，去听梅兰芳或程砚秋这二位在前门外享有盛誉的古老“京剧艺术大师”的戏，但发现有人企图在中国戏剧中搞点现实主义的东西，便认为是离奇古怪和有点荒诞。从唐诗的美妙篇章里，他们心满意足地领略到了旧时代的风貌；但对来自地下小报的现代无聊新闻，他们却感到接受不了。自满洲事变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一场历史的失误。

他们感兴趣的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标本，而不是中国的变化。

而北平，这个昔日帝国事业的发源地——一切都是为他们安排的。比起在席卷中国社会大动荡中飘摇的其他任何大城市来说，北平能够较少地勾起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追忆。它用庞大厚实的城墙保护着他们；用一年一度的庙会迷住了他们；用默默无言的杉树上面露出来的金色屋顶构成的街景，及远方那隐约可见的西山轮廓取悦他们。北平是中国灵魂的最后归宿——直到日本人来了，涂在它身上的那层空幻的神秘色彩才被揭开。

好啦，不说啦，现在一切都过去啦。另一个对日本的旅游贸易更加光辉灿烂的北平就要产生了；一旦时机成熟，昔日“天子”的儿子还会重登“龙位”，但许多外国人不可能在这里看到这一天。生活在北平，(哎哟!对于那些非常喜爱北平的女作家们来说)将不会像过去那样了。

临近末了，甚至北平的这个社会，也随着末日将临的各种谣传而发生了动摇。当日本军队在城墙下进行小规模战斗时，当这个帝国那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坦克沿着大街，毁灭性地挺进时，北平那超然物外的独特风貌，就再也无法维持了。中国的商人们站在店门口，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冷漠神情，观看阅兵式。听不到丝毫反抗的声音。

在整个北平，唯有学生们无所顾忌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只有他们，自 1935 年 12 月以来，在随时都可能威胁到华北安全的武装停火协议已签署的情况下，在日本坦克横冲直撞的北平街头，敢于组织起来，发出了民族抵抗的呐喊。然而，当他们的旗帜在“牌楼”下升起的时候，在成千上万名学生来到城壕边，进入“禁城”内那些宏伟的塔楼的时候，把他们驱散、赶回去的，正是那些背着毛瑟枪，挎着大刀的中国警察。

本篇故事的内容始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在北平举行的一次学生示威游行。在同类活动中，这是最后的一次。

当陕西的曙光破晓之时，身着睡衣的蒋介石将军，正慌慌张张地

向临潼后面冰雪覆盖的小山丘爬去。与此相类似的一个悄然行动，也在北平的大学和中学里紧张进行。一小队一小队的学生穿过校园后门，翻过院墙，在昏暗的街灯下摸索着前进。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围着羊毛围巾；许多姑娘穿着法兰绒上衣和肥大的裤子。队伍的前哨扛着卷起来的旗子，带着一捆捆印就的传单。他们准备举行一次爱国游行，而警方可能已风闻到某些消息。

这天一大早，我匆匆吃了早饭，便和一群新闻记者搭伴追寻游行队伍。我们向城西区出发，大部分中学和大学生都集中在那里。

此时，街头已挤满了司空见惯的那一堆堆小贩、打水者，以及看上去漫无目的的行人。街头叫卖的吆喝声，木板车轮轴挤压的吱哼声，构成了北平特有的晨曲。我们的汽车驶过了几所学校的门口；警察用步枪交叉着封锁住校门，阻拦里面群情激昂的学生。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一个宪兵——也就是特务，在诸如此类场合，他们那穿黑色皮夹克，骑摩托车的身影总是很熟悉的。他们是别动队，专门训练出来从事这种工作，与在中国所有建筑物门前游逛的那些可亲可近的公众安全保卫者截然不同。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我的朋友唐⑦说。唐是个年轻的美国记者，曾经见过去年 12 月的几次示威游行活动。“附近不会再有什么警察了，因为大多数中学的学生肯定都走光了”，他使劲抽了口烟，摸着胡子把茬的下巴说。早晨的空气中含有霜冻气息，有点寒气袭人。

越过西城的南北大街，我们和第一批学生不期而遇。他们走得飞快，故意专走背街小巷，每个拐角似乎都有三三两两的学生闪现出来，插入队列中。在这支零零散散的队伍前面，骑自行车的巡视员警惕地察看着周围的动静。一旦有警察在某一地段出现，队伍便很容易散开，过一会儿再重新集合。

我们叫住了一位看上去挺认真的年轻人。他身着中学校服，戴了顶有檐的帽子，挟着一包油印传单。

“你们在哪儿开会？”唐和颜悦色地问。

这个男孩疑虑地皱起了眉头，然后把脸转到了一边。这时一个女学生跑了过来，她个子不高，刘海搭在眼皮上，急忙为我们辩解：“这是外国记者——我们的朋友”。她说着一捆海报和五颜六色的漫画塞进我们的车里。“我们一到西四牌楼，就在那里开会。北大的学生正从东边开过来，群众大会十点在景山后面召开！”

说完，她向我们挥了挥手走开了。学生们意识到有了听众，便喊起口号：“中国绝不会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他们都是些非常年轻、无忧无虑的孩子。当这些队伍在大街上汇合的时候，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西四牌楼下面的十字路口上，站有警察岗哨，但尚无宪兵。

我们一直等到主要游行队伍的排头出现——此时约有三四千人之多——并开始穿过大街，向东开去。旗帜举起来了，歌声唱起来了，十字路口鬼使神差般地聚起了一群人。苦力们拼命稳住足使一匹牲口穷竭其力的手推车上的货物，擦去淌落到眼角上的汗水，挺直腰板向前观望；从市场上招来的那些小学徒们，也跑到旗帜下跟着呼喊。

在前进着的游行队伍里，总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令人感到兴奋——在柏林腾伯尔霍夫区和莫斯科红场所发生的那两次引人注目的事件，正是如此。然而，比之于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所有那些被吹得震天价响的五一街游行，比之于莫斯科举行的“团日纪念会”，我觉得中国学生游行队伍，更能够使我为之激动。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他们怀着最后的一丝希望，这是一种为争取微渺的希望而奋不顾身的形象。当天他们所面临的唯一问题——也如同他们在过去历次活动中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就是在他们未被粉碎之前，在先被恐吓，续之以机关枪代替语言的计划实施之前，他们究竟能够行走多远。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毅然决然地自愿前去冲破警察封锁线，面对枪林弹雨而毫无惧色——其中许多还只是年龄在 14 岁—18 岁之间的中学学生。

12 月 12 日，正巧也是段琪瑞的丧葬日。这位臭名昭著的前皖系

军阀首领——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北洋政府”头目，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正在他的故都被掩埋。“段帅”是 1926 年 3 月 18 日下令枪杀北平游行学生的元凶。在学生们被诱入他官邸外一条狭窄胡同时，正是他下达了对学生的开枪令。当这群学生惊慌失措地从段琪瑞卫队枪口下逃出时，近百具尸体堆积在胡同的墙壁之间，学生们的鲜血浸透了地面。这一天导致了段琪瑞政治生涯的结束，但他的葬礼依然很排场，并未受影响。

也许是由于从城外一所庙里往西山去送葬的人群引走了市内的大部分警察，我们所追随的这支游行队伍，此时至少已有五千人之多，而且进展得很顺利。前面就要到景山公园的后门了，民族大学的一支分队，正在那儿等着与我们这支队伍相汇合。

一小队宪兵终于出现了，与游行的队伍并驾齐驱。他们显然在伺机发起攻击。到了某所女子中学校门外，机会忽然来了。一些学生从队伍里跑了出来，跑到庙门口招呼里面的女生们出来参加示威游行，这时游行队列出现了漏洞，警察们刀出鞘，枪上膛，猛扑了过去。

霎时间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许多跑着躲避这种突然袭击的姑娘，被长袍绊住了脚摔倒在地上。那些停下来想扶助他们起来的学生，则被警察用刀把痛打，或用脚狠劲踢。尽管警察尚未开枪，但已有好几个人被捕——他们是预先被暗探指认出来的学生领导人。警察突袭时机掌握得很好，这支队伍暂时被驱散了。

但这只是个暂时的停顿，警察人数太少了，造不成什么大问题。其他几支队伍距此还不到半里远，于是学生领袖便把我们这支队伍重新组织了起来。我们已经能看见对面的旗帜，听到他们的呼声。

“你想他们能成功吗？”我问唐。我们现在开始步行，忙着拍照。他猛地伸出手指向前面的门楼一指：“看那！”

前面塔楼门前站着约三十人的一队宪兵，堵在两支游行队伍中间。他们携带着步枪和机关枪，显得很紧张。情况看来愈发危险了。

我们匆忙赶到队伍前面，队伍正停下来召开紧急会议。两支被隔开的主要学生队伍相距只有几百码——合在一起足有一万人之众。这是罕见的机会，在街头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人，而要对付这么多的学生，警察的人数又显得实在微不足道。然而，这一方有枪，而且看起来他们现在就可能使用；而另一方前程远大，来日方长，不值得以此招灾冒险。于是他们决定撤退。

命令开始在队伍中传达。有人嘀咕着反对这道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走散，就等于要求敌人对自己发动进攻——但秩序井然，队旗掉转了方向，庞大的队列开始移动。“大事不好！”有人在我身后悄声说道。

果不其然，一队精悍的“皮夹克”跑着逼上前来。他们意图很明显——从背后偷袭这支行动迟缓的庞大队伍，使其因发生拥挤而造成混乱。走在队尾的学生提心吊胆地望着身后，但并未掉队。警察加快了他们的袭击步伐。这情景看来就像要搞一场大屠杀。

就在那位警长——一个身躯肥大，端着大张机头的毛瑟枪的汉子要下攻击令时，一个奇特的调停方式产生了。在警察身后出现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学生。他平静地走上前来，显得正大光明。在从警察身边经过时，他笑微微地对他们慷慨陈词：“同胞们，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呢？我们并不反对你们，只反对小日本鬼子，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你们也一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番话说得丝丝入扣，通俗易懂，因而产生了神奇的效力。警察立刻停止了行动，狂怒的表情从他们那傻乎乎的宽脸膛上消失了。学生们不失时机地齐声高呼：“爱国警察万岁！”从此而后，理所当然地没有什么事儿发生。

中国有许许多多像这类真戏假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演说家具有如此超凡的力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是感情最丰富的种族之一；而且只要时机得当，恳切的呼吁总是会在他们身上发生效力的。中国人对人生平时采取一种淡泊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日本

人中间，也许要更广泛些。不过，他们有时也表现出一种豪迈的气质，这种气质会奇异地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反而言之，这种气质也会变为极端冷酷残暴。那天稍后不久，同样是那些被学生当众用言语打动了的警察，对那些为他们的善意举动而欢呼的学生，发动了野蛮袭击。当队伍从大街拐进小胡同时，他们骑着摩托车从后面追了进去，那些挑出来准备逮捕的学生，被拖到死胡同里，打得昏死过去。在整个这段时间，日本官员从一辆使馆车里一直监视着他们的行动。

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就是北平所能见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活动。事实上，甚至在整个华北，这几乎也是最后一次振奋人心的公开政治活动。在这座濒于死亡的都市街头，如果说这些半大小伙们举起民族抵抗标语的壮举曾令人为之感动，那么，这也预示着某些非常事件的发生。

中国的未来——这句话现在看来并非完全是陈词滥调——寄托在中国青年人身上，因为除了这些年轻人，其余的一切都在从根上腐烂，正在走向死亡。

近年来，在中国舞台上，学生运动所发挥的作用，是个历史性问题。在一个一直保持着尊重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家里，学生所维持的——虽然经过不知多少反复——就是要政治上的自由权力。他们对此最为重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在经历了最耻辱的不幸岁月之后，学生们使得民族独立精神长存不灭，例如 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25 年的上海“五卅”示威游行，以及 1931 和 1935 年 12 月的运动。在一个连虚有其表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甚至都不存在的地方，学生示威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公开舆论表达方式。学生在中国是一个事实上的反对派政党，具有独立的公众支持。人们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们，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唯有他们用清晰的声音表达了民意。

12 月 12 日在北平举行的示威游行是一次成功的行动，虽然还没有完全收到所预期的效果。这是一次针对日本入侵绥远，日本海军陆

战队武装占领青岛和上海逮捕“救国会”七位领导而掀起的一场群众抗议活动。这是一次为了谋求更进一步加强反对外国侵略的行动，同时也是在国内为争取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而发出的强烈呼声。

日本在北平的官员把这一事件看得很严重。他们坐在“参谋总部”的小汽车里，在所有路线上对游行队伍都进行了跟踪。他们对处境最为难堪的中国官员宋哲元将军发出警告：如果他不调来中国军队“维持治安”，日本驻军就要介入了。所以，当天下午很早就可见到被驱散了游行队伍，而最大的一支分队——约五六千学生的一股——被诱入煤山公园的广场上，由好几营廿九路军看管着他们。

这是一个唯有在北平才能够见到的奇异景象，警察和士兵严密守卫在沉重的公园大门内，令人印象至深。而在五锥形的山脚下，昔日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吊死的地方，那些被看管着的学生却在举行群众大会。大门正对面，“禁城”内那些金色瓦铺就的宫殿里，惊慌失措的官员们在低声开会；警察的警戒线洒满街道，在警戒线的外围，则聚集着一堆堆一群群急于打探消息的人。

学生们被告知宋将军要来和他们谈话，他们对这种保证一度也感到快慰。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最后他们又得到通知，宋哲元在西山参加段琪瑞的葬礼。天色渐渐黑下来，山头五个亭子的影子，在冬日的余晖下已经显现出来。

我在一个中国同伴陪同下，等候在园门外；不允许一个人进去或出来。“我不想等了”，我们的朋友最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要等到天黑，宪兵才会放出这些学生”。以前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宫殿门口的官员们中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北平市长到了。一些穿着丝绸长袍的人闪开一条道。有个矮个日本人，很得体地穿了件配有天鹅绒领子的深色外套，正在气冲冲地说着些什么。怎么回事？

“市长要对学生训话啦”，一个头戴俄国羔皮帽的胖侦探大声宣布道。我看着我那位中国朋友惊讶地问道：“这种情况常见吗？”

“我也不清楚”，他答道，“快看！他来了。”在大队警察的严密包围下，市长正飞快地穿过大门，园门随即又被紧紧关上。

市长讲了很长时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事后我才得知，他发言并不那么合题，但他的态度却出奇地友好。里面赞成和反对的呼声融合在一起，透过笨重的大门，引起了拥挤在门外听众的极大兴趣(此时警戒线已撤除)。

最后传来了一阵欢呼声。园门大开，泰德纯市长像来时一样匆匆而去。有人谣传：“学生们还将到外面列队游行。市长叫他们随从返回各自的学校；可以举着自己的旗帜，唱着自己的歌而无须担心。”当官的似乎也生了怜悯之心。原因何在？没有人猜得出来。

学生们欢呼雀跃着涌入昏暗的街道；警察士兵早就消失了踪影。东、西两支学生队伍贴着皇宫的城壕向前迈进，沿街突然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城墙下，鲜明的旗帜在街灯下闪闪发光。

人们所熟悉的民族救亡歌曲在夜空中荡漾，行人中有些人也跟着唱了起来？当最后一队学生走出这座空旷的公园，把它抛给了阴影，抛给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那不安分的幽灵时，我听到了一首新的歌曲。这首歌节奏明快强烈，有点像“马赛曲”。

“他们唱的是什么？”朋友转向我，他的眼睛在薄薄的眼镜片后闪现出光芒。

“这就是红军进行曲。这首歌以前在北平街头还从未唱过。”

几小时后，一个学生拿着份赶印出来的海报，来到我这儿。当他把海报递给我时，双手在颤抖着。

“你听说了吗？今天早上，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杀了。”

我们明白了。

译注：

①罗马最初建在景色秀丽的七个山丘上，故有“土丘城”之称。

②都柏林，爱尔兰首都。

③但泽，波兰北部城市，即现今的格但斯克，1919—1939 年间为“但泽自由市”。

④1935 年后期，“何梅协定”签署后，南京政府为了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于 12 月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叙、齐燮元、曹汝霖等 19 人为委员，这个“自治”机构原准备于 12 月 16 日成立，由于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而被迫延迟。由于这个机构是国民党卖国政策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妥协的产物。因丽也受到南京政府的赞许与保护。

⑤作者在这里用了《伊索寓言》中的一个典故：一座山有一次受到了大震动。只听得大声的呻吟和喧扰；许多人跑去观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他们聚在一起，焦灼不安地期待着什么可怕的祸变时，只见一只小老鼠从山里跑了出来。借此隐喻被搞得沸沸扬扬的“华北自治”运动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⑥佛罗伦萨，意大利中部城市。

⑦唐即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麦克·费希尔。作者在写此书时，为避免有关人员会因此招致报复，对其中所涉及的某些人隐去了真实姓名。

## 第二章

### 蒋介石死了吗？

没有人知道，过去有关蒋介石死亡的传闻在中国是常有的事。在最近这几年里，这类谣言就不那么常见了。不过，这次恐怕不仅仅是个谣言吧。

西安，这座“西部平安之城”，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皇都，12 月 12 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儿发生了一次“叛乱”，而张学良和杨虎

城(陕西地方军总指挥)则是“叛乱”的领导人。这一切似乎都是明摆着的事：他俩采取联合行动，扣押了委员长。他们向南京的“中央政府”发去了一封电报，通报了这一事实，并明确要求改变国家的现行政策。对他们所提要求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对他们的解释彼此相距之遥远，就和莫斯科与东京一样，大相径庭。在最初几天里，有一个问题一再被提出——蒋介石被杀死了吗？

据悉，少帅曾给蒋夫人发了份私人电报，向她担保她丈夫的安全。了解张学良的人相信这可能是真的。而另外一些人只知道他过去“奸诈狡猾”，则对此更多地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一种计策。但任何一个对张学良的军队、这支来自满洲的旧式东北军有所了解的人，则认定：不管张学良想要怎么办，他的军队此时肯定已经把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生命在他们手中一个铜板也不值。

最初传来的消息在全中国引起极大恐慌。如果说，此时还难于在南京政府内部搞一次信任投票，那么，目前这一情况无疑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声誉的一种颂扬。此外，最近几个月，即使那些对这位委员长非常冷淡的人，也开始把他看作是能够使中国走向团结的“强人”，全国唯一可接受的领袖。有两件事最能说明这一论点。第一件，是这年夏天由李宗仁和白崇禧领导的西南叛乱运动的和平解决。第二件事是众所周知的，随着这年秋天的日本人侵绥远，中国的外交政策因此而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它具体表现在南京政府终于开始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一种积极抵抗的政策。

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其他两件事情。其中一件事可谓吉星高照，而另一件则愈发令人迷惑不解。

10月30日，在对这个特定日期经过几番犹豫之后，用盛大的礼仪庆祝了“委员长”的50岁生日。这件事被用来作为加强该国空军力量的一次大规模运动。各省政府和贸易商社，竞相给这位抗日战争中的国家领袖捐献“生日飞机”。许多购买飞机的钱，是由全国各地的在校儿童和赤贫阶层捐献的。在本书中，我们还将会再次谈到这些

飞机。

11 月初，上海的棉纺工人发起了一次大罢工。刚开始，只是一次一般性的罢工运动，但当它在日本人控制的纱厂里持续了一周后，就变得目的明确了，而且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罢工的浪潮像野火一样，蔓延到了天津、青岛和济南。这是近年来劳工运动所造成的第一次严重动乱。

我曾于 10 月份冒险沿着新建成的广汉铁路做过一次旅行(这条赶建成的铁路使蒋介石具有了迅速派兵平定两广叛乱的能力)。举行祝寿活动时，我正好在广州。西南问题这时已经为银弹所解决。当我抵达时，广东的军人暴君陈济棠，已经离开广东去欧洲作一次愉快的巡游——或者，按中国人的那种更好听的提法，叫作去“出国考察”。陈济棠是中国名声最臭的赃官之一，他动用政府的炮艇在珠江上为自己走私违禁品，并在一位极其能干的“盖世太保”的帮助下，按芝加哥匪帮的组织方法维护其统治权力。

广西的统治者和这次叛乱的主要发动者白崇禧，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品格。早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曾当过蒋介石的参谋长，被广泛认为是(除委员长之外)中国最有才能的军事和政治领袖。陈济棠垮台后，他把军队撤回到本省的据点里，在过去短短的几年里他极其出色地治理了该省。“西南运动”被平定后，白崇禧在南京接受了新的职位，但他显得并不急于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钻入“紫金山”那乌烟瘴气的官场中去。他也不想效法冯玉祥，在公众中声誉甚高，但在政治上却无能为力。

陈济棠与本书大概除了间接提到外，无直接关系。可以这么说，——当然是带点愤世嫉俗、牢骚满腹情绪的——广州方面对于和南京联合，以及蒋介石以国事访问为名，来到广州，报以极大的热情，是继陈济棠离去之后，所表现的一种延缓已久的欢情。除了最近下台的英国首相<sup>①</sup>外，我很难找出还有谁像陈济棠那样为如此众多的人所厌恶。但白崇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依然是个重要人物，在这本书中他还

将要与大家见面。

对于“委员长”在华南的声望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现在尚难评定。蒋介石本人就是个南方人，而且正是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军校，他才首次出人头地。1926年，他作为“北伐军”司令离开广州，在此后其生涯至关重要的十年里，他再没回来过。这十年中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右翼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上海金融家的财政支持下，建立了南京政府，并不断扩大其权势范围，致使它看上去像个具有代表性的“国民政府”。他凯旋式地重新回到所有大城市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南京，表现出一副“南京”与“南方”已经完全彻底修复了彼此关系的神气，从而向着国家统一的奋斗方向，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蒋介石生日那天，铜管乐队的奏鸣声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给已习惯于喧闹声的广州人平添了几分喜庆的热闹气氛。当晚我在一个小电影院里，观看了一部特意放映的有关蒋介石检阅他的“礼物飞机”的影片；接下来是一部反映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新闻纪录片。当银幕上出现蒋介石的形象时，观众全体起立，齐唱颂扬国民党的歌曲。然而，斯大林和红军则受到了喝彩。

广州人过去最后一次认识蒋介石，还是他当革命军司令的时候(这是他一直骄傲地保持着一个头衔)，而蒋介石也十分注意不触犯他的南方支持者。他没有直接参与对南方革命运动的残酷镇压，因为他的官方命令在那里不发生效果。现在，南京正在为一项复杂的工业发展和建设计划谋求广东的进一步支持，而对华南兴趣逐日增长的大英帝国，则给予该项目以巨额财政援助。如果南京想要西南对它俯首贴耳，它就必须奉行一种能够为这个国民革命的发祥地接受的政策。

上海大罢工兴起的时候，全国各界救国委员会(一个超党派组织)领导的爱国运动，也正处在最高潮。为了保卫绥远，人们正在天天筹备资金，商业界和银行家也公开支持起了“救国会”，抗日的情绪空前高涨。不同以往的是，目前的抗日情绪中包含着某些自信。

在“全救会”的七位领导人于11月22日晚突然被捕，并被引渡

——在“租界法庭”经过一番疑窦丛生的审理后——引渡给中国当局这一事件发生后，我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上海各界对此所感受的强烈震惊。逮捕的理由是他们从事颠覆和谋反活动；日本人指控“救国会”支持日本棉纺厂工人的大罢工。此后不久，大批大批的自由和进步杂志(在中国，事实上没有任何公开发行的杂志是完全民主和自由的)，以及一些说真话的书籍，被官方查禁了。形势又恢复到了旧反动势力统治下的最黑暗时期。

中国政府态度粗暴地匆忙解决了罢工问题，丝毫不理会工人们的请求。一支日本先头部队已在青岛登陆，而上海街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则密切注视着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在此情况下，南京政府和那位“委员长”不知采用什么手法，竟轻而易举地保全了自己的面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针对入侵绥远所发动的一场极其高明的舆论战。在 11 月后半个月，南京政府内充满了“政策强硬化”的狂热，通过了断然拒绝日本人的某些提议，增援部队也在被派往北方前线。一次豪华的午餐会后，有位情绪激昂的南京官员对我说：“我们要继续保卫绥远；我们要挺进到察哈尔。接下来的目标是多伦诺尔。然后——不是还有沦陷的几个省吗？”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太甜蜜、太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梦。但它的宣传价值却是不可估量的。

欲理解中国对来自西安消息的反应，了解与此相关的某些背景材料是很必要的。人们普遍反对逮捕“救国会”的几位领导，他们都是享有盛名的专家和卓越的学者。日本陆战队在青岛的登陆，眼看就要酿成头号的民族危机，但这一危机终于在谈判中以牺牲中国工人的利益来挽回政府的面子为代价，成功地得以避免。时值绥远战役方兴未艾；只听得一个师又一个师的军队正在派往前线，“生日”飞机很快就要飞向北方，与日本的轰炸机展开会战。报纸充斥着“英勇的绥远保卫者”的司令傅作义将军的照片。由于无论是增援部队，还是“生日”飞机都甚至连前线的边也没沾上，因而绥远保卫者的英雄业绩尤为令人赞叹。

正因为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怅然若失感，或者甚至把蒋介石在陕西所处的险境，视为是对中国的一次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打击。正当国家的统一举目可望的时候，就在政府要下定决心，采取行动进行“神圣”的民族防御战争之际，国家首脑人物的有效统治，却在西安被“匪徒”们断送了。

在这个时候，用“叛变”这个词来形容这一行动，还算是好听的，委员长即使尚未成为殉道者，也成了个突出的悲剧人物。尤其令人赞叹的是，他奋不顾身地冒险深入西北这个素怀不满的地区，和由此而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至于他究竟为什么去那里，却没人知道个所以然。不过大家都认为，这是他逞能逞到了不顾后果的程度。

现在，说他鲁莽是对蒋介石的最低限度的一种指责，甚至他最忠实的崇拜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为了掌握权力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他的南京政府在国内外所享有的团结声誉，统统都是一种政治诡计的胜利。而且，必要的时候，这种胜利来得绝对残酷无情。比较起来，有着不负责任和荒唐鬼名声的张学良，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则完全有可能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情。

西安舞台上这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鲜明个性，是非常富有刺激性的，而少帅所扮演的角色则至少符合其本人特点。但从未栽过跟头的政治高手蒋介石，为什么竟会毫无顾忌地钻入蛇窟呢？既然最糟的事情业已发生，说这是因为他有勇气，倒也还冠冕堂皇。可是那些更了解蒋介石的人，则将这说成是一次判断失误。对于一个惯于使用甜言蜜语和采用血腥镇压手段，击垮了一个又一个对手，把“中央政府”组建成一个客观实体的人来说，说他这次行动是轻率、鲁莽，也未免太天真了。

在“双十二”（中国人对12月12日所发生事件的通俗提法）之前所产生的一系列戏剧性发展变化的真情实况之上，笼罩着一层神秘莫测的云。有许许多多的核心环节不为人们所知，有许许多多的动机人们弄不清楚。

北平当时的生活和往常一样，街头上既没有集会，也没有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兴高采烈的东北人躲在紧闭着的大门后，为张学良的身体健康而拼命干杯——他肯定挣得了——至少在这会儿——极多的“面子”。但大多数人的心思实在难于摸清。在旅馆和酒店，谣言四起。对北平来说，最紧迫的问题当然是，日本人对此将有何举动？

不过，此时的日本人也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不知如何是好。在正式场合，他们把这次叛乱斥之为“共产主义阴谋”，利用西安事变为其最近与德国签订的“反共盟约”<sup>②</sup>张目。他们的反应比莫斯科更为迅速，在中国，他们的宣传活动无疑更有效果。然而此时此刻，他们为了万全起见，没有采取突然的行动。

英国使馆以超然的姿态忍受着煎熬。此事正好发生在它的一位君王逊位后没几天<sup>③</sup>，令它恼火的沉重打击一个紧接着一个，纷至沓来。就像该机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说过的那样：“英国的君主体系危机四伏，摇摇欲坠；中国的委员长遭到绑架；更糟的是，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我们

要输掉‘第二次测验!’”然而，正如为以后事态发展所证实的，英国使馆这一关过得还算顺利。

我当时热衷于收集当地的反应。一位住在中国人家里的英国朋友，向我讲述了他的女房东对此的反应：当她一抓起星期日早晨的报纸，刚读完那吓死人的大标题，便将早饭一下子喷吐了出来。毫无疑问，她的行为表现了强烈的激情。但是，我感到对这还可以做出种种不同解释。

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知名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危机降临时，会被看作是引路的导师，但还不能说他们的表现就十分高贵尊严。他们中有一个大概算得上是最知名人物的，是位多年来致力于寻求和平与理智的知识分子，盛怒之下表现得比其他一切人都更为暴躁，主张发动一场把西安的叛乱堡垒夷为粉尘的讨伐。那些支持与日本建立一种相互理解合作关系的人，则毫不动摇地坚决

要求对西安的叛乱者实施报复行动。然而他们中似乎没有一个人，做出哪怕任何一点努力，去探求隐含在这次兵变后面的真实情况。

相比之下，那些军事领导人，那些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军阀”们，却极其引人注目地保持了冷静，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消息更为灵通。而学生们，这些性急如火，被说成是在一切事件中都会迫不及待地制造麻烦的不安定分子——此时则抱成一团，保留着自己的判断。

至于人民，这个有四亿中国人凝结成的巨大实体，名义上他们被人尊重，但实际上却很少有人关心他们，则沉默无言。但他们一直是在沉默着，这不仅仅是由于南京政府表现了自己的权威。在这样一个有着一套为学者——官员所钟爱的复杂文字系统，而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注定要成为文盲的国度里，人民在危急时刻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不足为怪的。只有每隔一个长时期，凭借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掀起的一次次运动，他们才能够在中国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拳”起义，或1925—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时期。在其余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是存在着。

流传来的谣言和新闻报道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对西安所发生着的事情了解不够，而这些事情听起来却令人激动万分。我在陕西的这个首府有几个朋友，其中一位是张学良所办报纸的编辑。要是能去趟西安该多好，这样就能搞清楚这些神秘的问题。

但怎样去呢？在正常情况下，通过陇海路可抵达陕西省。这条铁路线在郑州横穿过平汉铁路，再沿黄河在潼关经过一个隘关要道，然后进入陕西。可是，现在潼关是内战的前线，铁路和靠这条线路传递的所有通讯联系已被切断，而与这座“叛乱”者省份交界的地方，则因有政府军据守而处于僵持状态。”

剩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乘坐飞机。我给那天和我一块参加示威游行的那位记者挂了个电话。

“飞到西安去一趟怎样？”

“这还用你说!”他答道。“在中国没有哪个记者会不乐于立刻抓住这个难得机会的。不过,我试探了一下‘欧洲社团’,提出由我自己包租一架飞机——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害怕把飞机都赔了进去。你甭管花多少钱,都休想乘飞机去西安。”

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了。自事变发生后,三天已经过去,而形势依然令人扑朔迷离。大家都认为蒋还活着,但无疑在当囚犯。我极其渴望能够去西安。

第二天,晚上稍晚些时候,一位中国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你看过塔斯社关于西安的报道了吗?”我没看过,但这些消息却是令人兴奋的。根据“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论的说法,西安叛乱是日本人以汪精卫作为主要中间人合谋策划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汪精卫还在欧洲)。就在政府要抵抗日本的时候,张学良却在背后捅了政府一刀;他宣传中所有关于联合阵线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至于与苏联结盟的建议嘛——这显然是有意向世界革命队伍表明苏联与他们有牵连。而这种话或者是从东京传来,或从墨西哥城飞到。苏联宣传机构说了“少帅”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说法实在荒谬不堪。如果要问某人关于张学良的印象,撇开过去所听到的不好印象不谈,那么,这就是他一直坚决抗日。“高明的宣传战,”我说,“不过莫斯科的做法似乎有点太过分了。里面还有点真理吗?”

我的朋友就是个东北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急得开始乱说。一气,而这种情况在东北人中是很少见的。“不,当然不会。他们怎么会得到西安的情报呢?但你看这将对产生什么影响。所有对联合阵线持骑墙、观望态度的自由和进步力量,将很快返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要是俄国不支持这种政策,还会有谁呢?”

他显得极为愤慨。然后,像是又想起了什么,他加了句:“您愿去西安吗?”

问我愿不愿去西安?这正是我数日来朝思暮想要干的事。“怎么

去?”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和张学良很熟的东北人，今夜打算去太原。

××先生——您认识吗?”他道出了我那位在报社当特约通讯员的朋友名字，“他也打算去。计划是准备经过山西到达西安。”

要是唐打算去，那再好不过了，我知道我会被几家英国报纸派去采访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除非在西安已有了其他的通讯员。

“我打算去，”我说，“我在哪儿和你的朋友见面呢?”

他提出了一个约会地点。这趟火车在一小时内就要离开。

译注：

①指 1935 年 6 月 7 日下台的英国首相麦克唐纳。

②1936 年 11 月 25 日，德日两国在柏林签署《日德防共协定》。

③指 1936 年 12 月 10 日逊位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爱德华八世坚持要与辛普森夫人结婚。但王室和内阁因二人贵贱悬殊而竭力反对。他于是毅然将王位让给其弟乔治六世。这在当时曾引起轩然大波。史称爱德华八世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皇帝。

## 第三章

### 我们去西安

他看上去就像从监狱里刚放出来。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稀罕。

这是一幅消瘦而显得皱巴巴的形象，穿了件深褐色外套，皮领翻上去把耳朵裹了起来。他老戴着帽子，即便在旅馆的休息室里也不脱下。他的嘴唇绷得紧紧的，眼睛不停地四处张望，密切注意着周围不熟悉的目标。

他一口接一口地不停抽烟，一双细致的手神经质地动着。消瘦的面容，显得非常富于理智。他的微笑十分迷人。与周身装束不甚协调的是，他打着一对淡紫色绑腿。

据说他姓周，我们对他所知道的也仅此而已。那天晚上，尽管他看上去神情十分紧张，给人留下的却是一个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印象。这一点，正如我们以后所知道的，正是他最典型的个性特征。

我匆匆卷起几件衣服——大都是羊毛线衣和厚毛裤——塞进背囊里，然后把长筒靴和马裤打进一个带绸子被里的铺盖卷(我最后带的这东西，可用来防御传播斑疹伤寒的虱子，这种虱子在冬季的华北最为常见)。我当时还认为这算得上是轻装上阵，然而过了不久，我便为有这么大一堆行李而后悔不迭。

我们到达北平西站，距开车尚有十分钟。其他人都有了车票，而我还得为自己买。此时票房已关门了。

“买票!”我竭力用汉语大声喊道，尽可能引起里面的注意。搬运夫拿着我的行李呆呆地站在行李车上。有位警察冷漠地耸了耸肩，说火车已坐满了。我狠命敲打着售二等车厢的窗口，即将开车的警铃已经响了起来。

那扇窗户很不情愿地拉开了，一个睡眼惺忪的职员用冷漠的眼光扫了我一眼：“没位子，人太多。”他漠然地说道，然后啜了一口茶。

这简直令人绝望。“头等车厢怎样?”我急切恳求道。他郑重其事地查了查票本，正巧，还有一张卧铺票。于是，他摆出一副卖力的学者风度填好了票单。我几乎等不急他给我找零钱。

我们总算找到了我的包厢。我和一个胖乎乎的中国商人分住在这里。他在下铺已经鼾然入睡，敞胸露怀，看上去活像个睡佛。车厢里的高温令人实在难以忍受。

在站台上，我见到了唐和他的朋友，周却不见了。火车的汽笛在凄厉地鸣叫着。

“喂，再见。你们都……”

“再见——等着你们的消息!祝你们一路顺风!”

我觉得的确需要这几句吉言。

火车从北平城墙下缓缓驶出，墙脚下的积雪反衬着周围的暮色。向车后走去，我发现周独自站在一等和二等车厢的入口处，呆呆地望着渐渐逝去的城市灯火。他看上去非常忧伤。

“我妻子在那儿，”他突然说。他那忧郁的语调使我认识到，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尽管他的神态十分谦和，但唯有这一次，我听到了他的话音里有点语词支吾。

“你估计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她?”

他耸了耸消瘦的肩膀，有气无力地笑道：“谁知道呢?反正我已经跟她道了再见。”

唐沿着过道拉着一个体胖神怡的人走了过来。“噢，你们在这儿呀。去喝杯酒怎样?这位是神甫……您叫什么名字来着?”

那位神甫冲我俩微微一笑：“科克伦——科克伦神甫。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他有一头灰发，显得孩子气十足，且极为友善。我们几个在餐车上搞了个奇妙的杂餐会。

科克伦神甫属于美国一家圣公教会，正要返回他在华中的传教点。他旅途经过了西伯利亚，满肚子都是急于找人倾诉的俄国故事。一杯啤酒下肚，他便大谈起来。

“那些俄国人掌握着正确的观点呐，”他吵吵嚷嚷地大声宣布道，好像预计要招致反对似的。“我给你们说，我们都可以从苏联学得不少东西哪。”

我看了一下唐的眼色，令人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本人为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当特约记者(此时荣任这一职务已有一个半小时)，因此，这本应是我的事。但我与《太晤士报》还有一点关系，我一度曾通过

该报的正式审查，得到过那么点不大牢靠的特权，这可能对我的西安之行更为有利些。我最安全的保护色还是大英帝国的报纸记者。唐是美国人，一个正儿八经的报人，因此他对任何事情都要求作到令人信服。我们客气地表示了自己对他说法的怀疑。

然而这位神甫有着改变我们信仰的强烈愿望。他的激情汹涌澎湃，犹如波涛一般。我不时看周的眼色，他一直在用一种神圣般的敬仰目光注视着这位奇异的传教士。我们把他当作一个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介绍给了神甫。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诚实，我感到我们仿佛全都是出席化装舞会的假面人。

“你们会这么想”，这位和善的神甫滔滔不绝地说，“他们不会在干我们这行的人身上花多大工夫。可是，我从没遇见过比他们更友好的人民。他们把我领到他们的反宗教博物馆，认为我会因此大吃一惊。”他模仿“切斯顿方式”(Chestertonian Fashion)嘿然一笑，继续说：“当我告诉他们说，他们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在美国的一次优秀科技展览会上不曾有过时，感到吃惊的，反而是他们了。他们肯定认为资本主义者的态度愈来愈软化了。”

我们怀着遗憾的心情和科克伦神甫分了手。正如我此后将认识到的那样，在中国像他这种人实在太少了。他的声音顺着车厢的走廊在我的耳畔回响“……记住，孩子们，正因为我是在教的人，我无须闭上自己的双眼。我觉得，我们对一切问题都不应怀有成见，对一切问题都不应怀有成见。”

在头等车厢内那温室般气温下，是无法睡着的。大约四点钟，我走到包厢外面的过道上透透空气。再过不了一小时，就要到石家庄了，它是到太原的中转站。火车伴随着平汉铁路线上那种特有的颠簸摇摆，轰隆轰隆地向前开进。这条铁路曾因一再发生战乱，在内战中不时被打断，路轨、机车、车辆都尚未完全修复。

列车员在过道顶头的一把折叠椅上昏然入睡。然而像是受到了什么暗示，他突然四处张望了一下说：“滹沱”。我们此时正在过滹沱河。

透过钢骨铁架的桥梁，只见一脉河水隐隐泛光。病恹恹的月亮朦朦胧胧地在水面上闪烁。这就是所谓“月在黄河中”吗？也许，它还有一定的含义吧。

一到石家庄，我立刻下了车，对此番旅行因情况不明而被迫付出的超额小费而很有点愤愤然。在列车的另一端，我发现了唐和周，后者正和几个穿皮袄的中国人在热烈握手。这几个人看上去很神气，而且见到他显然非常高兴。在他们身后的几个士兵——马弁——提着我们的行李率先从车站的进出口快步走向市内。停机待发的机车喷出的蒸气，一下子湮没了我们。

车站周围那种神秘气氛，使我们这两个外国人有一种惬意感，而其他的人对此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这些人都是“少帅”的朋友，因为从石家庄到保定的铁路沿线，均掌握在万福麟将军领导下的东北军手中。万将军以前是驻扎在满洲的一位指挥官，为人多疑是出了名的。据说他外出走动时总在一只口袋里装着一把左轮手枪，而在另一只口袋里则藏着他的想法。这些东北人对社会舆论力量之信任，达到了令人为之动容的程度，而且他们最渴望外国记者进入西安，以便能够至少把他们那边的真实情况告诉给外界。正如事态发展所证实的，他们没料到在全国实行新闻审查制度的利害程度。

我们跟着向导穿过铁路，走进一家灯光昏暗的旅店。我们径直接被领到楼上一间可能只适用于革命前的俄国贵族居住的房间里，房门上标着一个小铜牌，上面写着“豪华间”。室内只有床是中国式的，这种两头配有镜子的中国床，在大城市的妓院中，你可以见到。窗户关得很紧，遮掩得严严实实。

茶端上来了，我们围坐在大理石桌旁讨论下一步计划。报信的人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我们展开地图仔细研究考虑。周现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眼睛闪烁着热情的火花，完全失去了我在北平初次打量他时那种被追捕的惊恐神情。我们现在是在朋友中间。

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个行动方案相当简单，我们要乘第一班

列车赶到山西的省府太原，在那儿过上一夜，第二天我们将改乘南下潼关的窄轨列车继续赶路，在一个叫“侯马”的小站溜下车，走到陕西、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黄河岸边，然后设法渡过黄河。周说，我们可以先派人给西安送信，然后我们一过河，就会有一辆汽车在等我们。从那里到西安只消两天工夫。我们这趟旅行最多只要五天时间。如果幸运的话，还用不了这么久。

即使这么多的延误，也能把人急得发疯，但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安全方法。南边的大路为南京军队所封锁——随时都有爆发激烈战斗的可能。唯有这条渡河入陕的道路还行得通。

在我们的整个计划中，我们还必须考虑某些我们无法掌握的因素。目前，山西省在“模范省长”阎锡山那种比仁慈的独裁强不了多少的统治下，多年来一直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就他在中国政治上的表现而言，阎将军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大家对他的精明、乖巧、工于心计传闻很多。在西安问题上，阎锡山一直扮演着一个在西北和南京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而且他也总是恰如其分地置身于事外。在当前这种情况下，随着大多数人因其势力强大普遍倾向于支持南京，他可能会被视为是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终将站到南京一边。

个人因素之二，是冯钦哉将军，他据守着陕西境内的部分地区，我们如果成功渡过黄河，那里是我们必经之地。冯钦哉是杨虎城的部下，换言之，正是由于这位陕西领袖的垂青眷爱，他开始才得以获得军队的指挥权。但有消息说冯钦哉在动摇，由于他所占据的是关键阵地，包括潼关要道和东面临近西安的战略位置，所以南京对他提出了许多富有诱惑力的条件。我们有可能在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却发现实际上还是处在南京方面的阵地前沿。但这却是个必须要抓住的唯一机会，因为除此而外唯一可行的途径——一条位于北面的通道——在这个时候由这条路进入西安，意味着至少要花一个月的旅程。

我们在旅行出发之前，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又有一个人进了我们的房间，正在压低嗓门和周谈话。我听到了“飞机”

这个词，引起了更大的兴趣。周喜气洋洋地转身对我们说：“有架飞机明天将来到太原——是从西安来的！没准儿我们在其返回时还能在上面找个位子呢。”

“这真是个好主意！”唐由衷地称赞道。“这架飞机来太原干什么呢？”

“西北方面的代表要去见阎锡山。这是架大飞机，可乘坐六个人。”

“你能把我们带进去吗？”我急于想知道。周温和地答道：“当然可以喽。那是少帅的飞机。”

如果这种安排能够顺利实现，我们次日即可到达西安了。看来，我们真得要吉星高照了。

石家庄至太原的铁路支线是由一家法国公司经营的。这条铁路线铺着用铁钉铆起来的短铁轨，就像沿着小车站建筑物屋顶上的防盗钉一般，煞是好看。我们花了点功夫，在二等车厢里为我们和行李安置了一块极为紧凑的地方，其余大部分地方，均为巨大的木桌所塞满。车上的窗户——一种漂亮的法国式样，镶着花玻璃，玻璃上漆有情人结和小簇的玫瑰花蕾。

由于我们的旅伴希望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所以只有我和唐在尽情交谈。我惊奇地发现，列车员在说“是”和“不是”这两个词时，带有标准的巴黎口音。遗憾的是，他所掌握的法语词汇也只到此而已。

像在中国旅行所见到的所有铁路站台一样，石家庄车站的站台上也挤满了士兵和警察。“他们全都认识我”，周从他角落里悄声说道。我再次对他的真实身份感到诧异。这个形容消瘦，总带着一点疲惫神态的东北青年，他那双目——一双梦幻般的，或者是一个狂热分子的眼睛——能够很方便地变成一个笑容。也许，我们不完全了解他反倒更好。

就在火车行将开动之即，一队奇特的中国青年人出现了，他们带着一面巨大的绸旗。他们对这面旗显得有点过分爱护，护着它走进了

另外一节车厢。这队人有四个男的，看起来是学生或职员；还有三两个梳着短发，穿着宽大裤子的姑娘。后来我们才得知，他们是从南方前往绥远的一个代表团，带着锦旗和大量食品，去慰问英雄的民族保卫战士。他们从广州来，说的话大部分很难听懂。但那两位姑娘长得非常迷人。

我们的列车终于开动了。我们离开了这熟悉的景物，这在中国几乎是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的城墙，和高耸在城墙之上那残破的古塔。起先，我们和一个便衣警察同坐在一个包厢里，这可能会使人感到有点不便。但在大部分旅途中，他显然睡得很死，我们相互用英语交谈，这么做绝对安全；唐和周说的是日语，这就更安全了。这次的旅途平平安安。

在直通山西的山间要道娘子关，列车爬上了一个夹在两座险峰绝壁之上的河床。我们的视野里开始出现长城——一座蜿蜒伸展于座座山脊之上，一个个堡垒横贯云天的砖石防线。再往低处看，清凌凌的雪水贴着山石流淌。我们的列车摇摇晃晃地刚驶过一座大桥，悬崖绝壁便扑面而来。一座无线电铁塔，几个士兵微小的身影，就像是沿着山顶峰在用墨水描绘出来的，过了这座天桥，我们就进入了山西。

这就是令日本人垂涎不已的煤都，它的每一块路基都是浅黑色的褐煤。一座座黄土丘陵从河谷中逐渐升起；昏黄的村庄沿着山间的平地，像堡垒似的簇拥着。冬天，它是一片无遮无盖的区域，但山丘的外貌则很清晰，宛若保罗·纳西的风景画<sup>①</sup>，铺排得错落有序，美丽极了。这里的农民都穿着黑色服装，人影与昏黄色的原野和山丘相映，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就是真正的西北，真正的黄土地带。

当我们驶进太原的时候，天色渐暗，刺骨寒风荡涤着这片辽阔的平原。铁路线外的积雪被寒风吹成座座雪堆。来自广州的那队人被这种景色迷住了；他们过去还从来没见过雪，抓住停留的每一分钟，在站旁相互用雪球打着玩。他们仍不相信这是真的。

太原首先让我们领略的是它的火车站，林立的岗哨和站旁的一个

大广场，伴随着傍晚刺耳的山鸟鸣叫。退了色的窗帘，巨大的拱形顶居室，使“山西大厦”看上去活像上个世纪的遗物。你会在任何一个法国省份里找到我们用餐的那个餐厅。一个头发蓬松，长着一络黑髭的小个子男人，像伦德·克来尔②所摄影片中的人物一样，就着旁边的一张桌子闷头喝苦艾酒。

我们的精神一下子上来了。周对旅馆的旅客登记本做了一番侦察，通知说那架飞机肯定已经来了，因为东北军的代表中有两人刚刚才离此前往北平。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们三个合住一个大红套间，这是我的主意。它的地板铺着红色瓷砖，天花板的颜色剥落得模糊不清了，还有一个虽然式样老一点但还是很宽敞的浴室。于是周便嚷着说他要洗澡。他说这对他是一个安慰。

唐此时外出去寻找一位朋友，打探消息。

没等警察来检查我们的护照，我就开始编起了能够把他们糊弄过去的美妙故事——要是有人盘问我们的中国旅伴身份来历的话——这时周突然从浴室里神秘地闪了出来，凑到我的近前说：“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他看上去非常年轻，穿着没有扣子的衬衣，湿漉漉的头发耷拉在前额上。很难看出他已结过婚，而且有了个八岁的女儿。

我说，欢迎他来向我提出他要我解决的问题，不论是什么样的问题。但我对他下面要提些什么问题则毫无准备。

“今晚我想去见阎锡山，您看怎样？”他问我。“我想，要是我能见到他，我就能劝说他加入我们的人在西安发起的运动。”

这话听起来使我感到非常希望。我深知阎锡山有什么样的名声：没有明确的报酬，他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被说服了。周并不认识阎本人，但他曾被介绍给了阎的一位秘书。

开了一次战时紧急会议。苗呆在太原显然不安全，每时每刻都可

能有警察来找麻烦。此外只要还有乘飞机直达西安的一线可能，我都不想走穿越黄河的那条“漫漫长途”。在石家庄与东北战士在一起，苗是安全的。而且我们也能与“叛乱者”直接取得联系。

最后我们决定，唐依然留在太原，而他的朋友和秘书则因紧急业务，奉召返回。在此之后他可以按自己的想法经潼关入陕。苗和我在回到石家庄后，再看情况决定行踪。

当我们把这些谈完之后，天已很晚了，苗有好几天都未睡成觉。在这个隐含着任何不测事件都有可能发生的不祥气氛的旅馆里，我们几个都有点过于紧张。唐和我提心吊胆，心慌意乱地渡过了这天的后半夜，唯恐听到那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译注：

①保罗·纳西 (1889 — 1945)，英国画家和雕刻家，其英国风景画中饱含某种神秘和梦幻般色彩。

②伦德·克米尔，法国电影导演和制作家。

③据有关同志回忆，当时在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完话后的第二天，苗在会上公开说：“昨天有人说，有的人不明敌之远近，事之缓急。把东北三千万人都丢了，还讲这混账话，简直是放狗屁。”苗把上衣领子一把扯开，又说：“什么领袖，稍有血气的人，就应该让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 第四章

### 东北人

一个阴寒刺骨的清晨，我和苗剑秋溜出了旅馆，向火车站直奔而去。我们在太原只不过逗留了十二个小时，现在却要鸣锣收兵了。

买票是苗剑秋的事，因为他现在变成了我的秘书，而我则不得不

装作一点也不懂汉语。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这就可以使我们借故延捱一时。苗剑秋显得神情烦躁，心不在焉，显然是因为他为自己未能成功地策反阎锡山倒向“少帅”而感到内疚。

为免闲人打搅，我们坐上了头等车厢。我独处一隅，尽可能装得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我发现：我只消用眼光一扫，就足以镇住那些好奇的警察或卫兵。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各方面都相当优越。

在我的生涯中，这是我经过的一次最漫长的乘火车旅行。作为一段经历，它是有趣的，因为一个人并非每天都能和一位革命者旅行在一起。此外，我非常了解中国人所说的那种“恐怖”——尽管这种恐怖几乎从来未被公开过，然而与之相比，即便是“德奥”和“奥拉宁堡”<sup>①</sup>这两个纳粹集中营的某些景象，也算得上是温和的——我认识到，如果我的朋友被抓住的话，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在一个把共产党称之为“匪”，并用对付“土匪”的办法来对付他们的国家里，不说别的，光是沾上点“共产主义”的嫌疑就够你受了。要是我在这方面能帮他一把，我将努力不使他落入“蓝衣社”手中。

我们几乎不住嘴地谈着话，以消磨时间，我想知道的还有许多的事情。我向他询问了关于西安，关于“少帅”，关于东北军方面的许多问题。他曾和张学良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最重要的是，他熟知张学良最近几年在西安的经历。

我曾想得到一个描述东北问题内幕背景的说明，这我从苗剑秋那里得到了，而且还知道了所有在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时的戏剧性细节内容。即使在中国，“满洲”那场悲剧的实质，也几乎完全不被人们所认识。就连“东北”——东北人这个词，也具有各种不同的内在含义。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东北人是一些在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住不习惯的少数野蛮流亡分子。这些人很难找到生活出路，他们常常为了一些不必要吵闹的事，和人争吵不休。对这些中国人来说，“东北”这个词就带有蔑视的意思；他们对现在仍滞留在那里的数百万中国人所能经受的那种骇人听闻的生活状况毫无同情之心。然而，那些处于流亡

境地的东北人以及许许多多发现已根本无法在“满潮国”的“五条旗”下生活的入们，则怀着痛苦和日益强烈的愤恨情绪，念念不忘自己的东北家乡。他们算得上是国家统一主义者，是全中国最坚定的抗日分子；他们始终不渝地持续努力，就是要使他们自己的斗争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斗争。

苗剑秋如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学者一样，有个令人不愉快的习惯：谈话时要记笔记。就凭这一点，就使我相信他不是共产党。我焦虑不安地注视着他的笔在纸上滑来滑去，对他来说，这么做能够使他解脱烦恼，但在侦探随时都可能闯进来的情况下，则成了我的忧虑之源。每当他写满一张纸，我就凑过去把它撕下来，然后卷起放进我的衣服口袋里。到我们抵达石家庄时，我简直成了一个会走动的废纸篓。

通过这次详细交谈，一个清晰的故事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对张学良已经有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描述，但如果要想理解这个人，理解他在政治上的发展，以及他在西安兵变后对中国问题的新政策，就必须尽可能地像他自己身边的人那样看待他：既要看到他的长处，也要看到他的缺点。仅凭偶然的天生条件，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他就在中国舞台的前沿占据了一个显要位置。以下是他在过去那些年代里的一些故事，逐步将进入到目前距我们最近的这一阶段。

在昔日曾是皇家乐园的古老北平南湖边上的一座亭阁里，张学良在他 28 岁生日那天，开始醒悟了。他年轻，无忧无虑，没有任何责任——是一个性如烈火的军阀父亲的花花公子。老师张作霖，依靠自己真刀实枪的非凡领导才能和阴谋家手腕，在整个东北完成了他的铁腕统治，然而这些手段在长城以南使用时，则几乎每次都遭到失败，此时因受到北伐的国民主义军队的威胁，于前一天去了沈阳。他再也未能回到家。

就在 1928 年 6 月 6 日的早晨 10 点左右，一封电报送到了。当“老师”的这个儿子在读电文时，白鸽在湖面上展翅翱翔，鸽颈上缚着的小鸽哨发出的悲鸣声在空中荡漾。他那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四个小时前，就在“老师”的专车通过接近沈阳的一座日本人的铁路桥时，有一枚炸弹在他的专列下面爆炸了。日本人对东北的征服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天下午，“少帅”便赶往东北，北平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离去；张作霖死亡的消息封锁得很严密，甚至日本人也无法知道他们的阴谋是否真正得逞。直到张学良回到沈阳，把军队从华北调回来之后，才公布了“老师”的死讯。一直都在伺机而动的日本外交使团，事情发生后曾期待着会发生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反对行动，然而很快便发现自己打错了算盘。他们不得不与之相较量的是个新对手——一个与他的前任比较远为缺乏经验，在相互友好交往中也不那么会耍手腕，连在自己家里也没管过事，有名的被称为“荒唐鬼”的年轻人——然而却是一个不怕威胁，不受利诱的统治者。

现在看来，这些事情都成了老掉牙的历史陈迹，但最近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唤起了人们对当时那些事件的回忆。对于到底是谁策划了对张作霖的谋杀，这在当时，许多人都不敢确定——可能是日本人，但也可能是“国民军”分子干的。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对此确信不疑：他猜测这事可能是他父亲的心腹干将、总参谋长杨宇庭干的。因为此人与日本人公开勾结，同时也是他本人的老冤家对头。尽管这位少帅总是西装革履，骑着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但他基本上还算是东北平原上的这一代人。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仇子报的基本责任感愈来愈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有声有色地详细描述张学良年轻时荒唐行径的材料并不少见。由于他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是“东方卡罗尔王子”<sup>②</sup>，以致今天很少有人能把他想象成另外的样子。尽管如此，他早期的生涯还是颇为有趣的。

他一度曾有过想当学者的念头(他不是在学校受的教育，而是由私人教师教授的)，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他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中心北平，开始到“民族大学”听课。然而“老师”决不容许他这么干下去，硬把他曳回沈阳，送人军事学

院。“老师”的儿子必须成为一名将官。

“小张”以士官生的身份进入了军队。晋升——如所预料的那样——对他来说机会来得很容易，但要提升他也需要有点根据。他聪明、伶俐，而且天性爱交朋友。在沈阳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外国传教士中间交了一大批朋友，同时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积极分子。教会组织用尽全力想使他皈依“基督”，而对于接受了形形色色西方生活方式的张学良本人来说，对于接受一种西方宗教，倒也没有什么不乐意的。再细想一下这种改变宗教信仰所带来的结果，也是蛮有意思的。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采用这种战术，一向是很成功的。

这位毕业于“沈阳陆军学校”的年轻少校，很快便在无休止的内战中获得了实战经验，这就是本世纪 20 年代在华北进行的那场破坏性极大的内战——张作霖不顾自身安危，趁火打劫，企图从中浑水摸鱼。张学良当时在部队里的亲密朋友，似乎是两个名声截然不同的东北军指挥官：一个叫郭松龄，一个叫韩麟春。郭显然是个很有才干的军人，也是东北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负责东北军的重新整编工作。他比张学良年龄大，但他俩结成了密友，而且这种友谊很有点“贝尔德”<sup>③</sup>式的骑士风度。有点不幸的是，在 1925 年后期“基督将军”冯玉祥为反对“老师”的独裁统治发起的一次兵变中，郭松龄卷入了风云莫测的中国政治漩涡。尽管“小张”想尽办法为他辩解，他还是被逮捕并被处决了。

随着天使的离去，恶鬼便顶替了他的位置。韩麟春——另一位真正有才干的指挥官——则成了张学良的一个比郭更鲁莽的伙伴。1926 年，他和张学良一起在河南率部打仗，未能打胜。仗刚一打完，张学良便立刻受到了以杨宇庭(后来涉嫌参与谋杀老师的那位)为首一伙人的大肆攻击，当着他父亲的面羞辱了他这个当儿子的。“小张”差一点被弄掉了官——他当时是个旅长——有好几个月都不敢见他的父亲。

然而，河南战役更倒霉的后果，则是在与他的朋友韩麟春相处的

这段日子里，他开始学会了抽鸦片。没过多久，张学良便认识到染上这种恶习的危险性。可是，就在他按照一种无痛苦的治疗方法经过的一番努力，使他完全“痊愈”的时候，所采用的吗啡和其他镇静药品又使他上了瘾。“少帅”身体虚弱，喜怒无常的名声，正是在他染上麻醉品瘾这段时间里被牢牢树立起来的。倘若他不是成为隐君子而是成为基督徒，那么，东北的历史进程就可能变得与现在大不相同。在张学良于父亲死后回到沈阳时，他自己的地位尚未确定。他当时任东北军第三军和第四军的总指挥，并被省议会授予“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这一头衔。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财富，而且还继承了他父亲对日本做的某些模棱两可的承诺。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小组，由高级官员和顾问们组成，为首的是他的老冤家杨宇庭和一个叫常荫槐的，公开支持要东北“独立”，并与日本结盟。显而易见，他要在“南京和日本这两个方面作出挑选”。在这种选择面前，张学良没有丝毫犹豫。

他打心眼里厌倦了中国的内战，真诚相信东北各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应当与中央政府建立密切联系。南京授予他“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官衔，作为对他的鼓励。杨宇庭和他的那帮人支持在华北继续打内战，而冯玉祥、阎锡山和蒙受耻辱的汪精卫，此时则在华北建立了一个很不牢靠的“三人执政同盟”，仍然坚持反对“国家主义者”的统一要求。而张学良对此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宁愿国家统一，而不要内部争斗，并通过兵下北平和天津而为其指点迷津。在他的打击下，北方同盟的抵抗迅速土崩瓦解，对他感激不尽的政府使这位年轻的东北领袖当上了中华民国的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

1928年12月29日，尽管有受到日本人大力支持的反动势力的强烈反对，此后成为“满洲国”标志的传统五条旗，正式在东北全境为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旗帜所代替。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全东北到处飘扬。

但在沈阳唯一一家的门上，还悬挂着早已不存在了的袁世凯帝国的五色旗。这面旗就悬挂在“亲日派”小组头目、杨宇庭将军的门上。

这位“满洲第一人”，和老师以前的顾问人员中目前最有影响力、最反动的人物总是按照自己的独特方法行事。这一行动表明，反对派还很活跃，还非常有力。

年迈的反动派人物总把张学良看作是个小娃娃，只知道一味沉溺在生活上的享受之中，而在政治上则可能会是软弱无力的。这是传统的宫廷阴谋的一小部分，在过去，这一类的阴谋曾经取得过圆满成功。但这位年轻的统治者现在已经轻相当老练，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对自己的政策有非常明确的概念。在与南京统一这个争论的焦点上，他从一开始就向反对派发出挑战。此时此刻，两派之间就在“满洲”的内部发展问题上展开了冲突。

张学良的计划事实上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因而立刻便招致反对。他鼓励移民进入东北各省，尤为重视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沈阳兵工厂得到了扩建，直至成为远东最好的兵工厂。按少帅的想法，他打算把这个兵工厂变成一个综合性工厂，即办成一个能生产汽车和飞机的工业中心。原来的军队重新整编了，成了一支在中国拥有最好装备，最为训练有素的军队。一个发展运输业的宏伟计划，已经开始实施。

张学良认为，运输是整个东北经济的关键所在。而当时的情况是，除了“中东铁路”外(这条铁路自 1924 年以来，名义上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管理，各自分享一半权力)，东北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铁路所有权掌握在日本手里。张学良决心在修建中国铁路上与日本人展开竞争，以此打破外国人控制中国铁路的垄断局面。日本人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要求禁止采取上述行动。双方在铁路问题上的争执引发了一系列麻烦事件。张学良不仅引起了与日本的纠纷，而且与日本的“满洲”盟友产生了矛盾。

这是因为，杨宇庭掌管着沈阳兵工厂，而他的同伙常荫槐则是交通部长。

除此而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造成摩擦的原因。在鼓励大兴教育方

面，“少帅”是个坚定的信徒——即使那些诽谤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对的。提出兴办教育永远是一个保险的政治游戏，但张学良却动真格的。他从他父亲的财产中抽出了一大笔钱，在沈阳建立了东北大学，并在全地区建立了很多中小学。他无疑喜欢为自己塑造一个贤明的启迪教化者的形象。然而，当他得知一笔原打算作为教育辅助金的五百万美元经费，其中有三百万元落入了狡猾的杨宇庭的腰包，被他用去作开矿投资时，他真的动怒了。这是中国官场里最典型的传统惯例，然而此时此刻，杨宇庭所玩弄的真是一出危险的把戏。有时候“小张”也可能不愧是“老师”的儿子。

最后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当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以一种非常显赫的东方排场，在沈阳为自己做寿时，在所有的客人中，张学良这位年轻的东北统治者，是其中最礼貌、最恭敬的一位。两天之后，杨宇庭和常荫槐双双接到邀请到“少帅”家去赴宴。席间他的主人巧妙地摆弄了一下手绢，然后借故离开。卫兵们一下冲进屋内，将他俩就地处决了。

当蒋介石在西安为张学良所俘获时，人们会想起那次引人注目的事件。很多人都坚信，蒋也受到了同样殷勤的款待。

关于那晚在沈阳举行宴会之前，广泛流传着一则很有说服力的故事，说是张学良曾用抛硬币的办法决定他的敌人会不会被杀死。所用的硬币是袁世凯的银元，它有一面刻着这位一心想成为“恺撒”般的独裁政治家的头像。“少帅”念着：“要是正面”（袁世凯的头）“他们就得死”。袁世凯仰面朝天。’他还不放心，又抛了一次，落到地下的银元还是袁世凯的头朝上。

“你在忙些什么呢？”他的妻子从屋子的另一端向他发问。

“我用抛硬币来决定杨宇庭和常荫槐会不会被杀”，张学良答道。

“已经有两次出现头朝上的情况了”。

她对此感到有点不放心，坚持要他至少抛三次，才能做出最后决

定。这一次头朝下才算赢。

张学良又抛了一次，袁世凯的脸翻了过去。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这枚孤零零的银元被当作纪念品，体体面面地放进了张学良私宅里的一个大钱柜中。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之后，沈阳城受到日本人的洗劫时，“少帅”的家自然被认为肯定留有大量财宝。张学良家秘密财宝之多，是无法估量的。

士兵们满怀希望，兴高采烈地发现了那个钱柜。打开之后，不难想象，他们对里面那微不足道的一块银元战利品会感到多么意外。

日本人究竟怎样处置那块银元，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五年之后在西安的张学良手头还拥有那块银元的话，他大概不会再用抛银元的办法来决定蒋介石的生死了，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关于“少帅”治理东北那个短暂时期的情况，还有更多人们所熟悉的基本事例。他坚持实行他所制定的关于内部和平、与南京政府联合的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总把对日交涉交给政府来办)，并继续执行“排挤”日本的经济方针，不顾一切地修铁路。对此，日本扩张主义者，尤其是关东军的本庄繁将军，终于忍耐不住了。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发动了突然袭击。对日本人的抵抗只是一场受到世人嘲弄的悲剧。

东北军的失败——一支在数量和来源上占有无法估量优势的军队面对一支虽小却决意发动进攻的军队的失败——通常总是被说成是它的最高指挥官——张学良的失败。沈阳事变发生时，他正在北平，而他的大部分部队则驻扎在长城以南。当冯玉祥和阎锡山在华北再度举起反叛的大旗时，他赶去救援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占领了北平以后，张学良随之再次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政策，这就是维护中国的统一和阻止内战的延续。毫无疑问，在当时他是忠于蒋介石的。也正是这种忠心，不仅害了他——也害了中国——东北。

当日本人对沈阳发动突然袭击时，张学良还在北平洛克菲勒医院里，正在从一次几乎将他置于死地的伤寒病侵袭中恢复过来。(他的这次害病一直为人们所怀疑，被看成是为了延长他的戒毒时间而制造的借口；但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从医院的病历记录上可以得到证实，这些记录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张学良便从医院回到家里。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这是决定东北数省命运的灾难深重的几个月，他的病还未得到恢复。此后，他一直为他在这段时间里的优柔寡断而痛心疾首，自责不已。

东北人一直把9月18日称之为“卖国日”；他们并不像憎恨其他某些人那样憎恨他们的年轻统帅。他们断定，张学良只不过是服从了他从南京接到的指令——避免抵抗，以免危机变得更为突出，然后像乞求《凯洛格条约》<sup>④</sup>和《九国公约》<sup>⑤</sup>那样等着“各国列强”的最后仲裁。这正是蒋介石所倡导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的动机比张学良的问题更令人生疑。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张学良本人起初只是把九月份的事变当成是另一次偶然事件，如同1916年日本对济南的占领<sup>⑥</sup>。而且也像那次一样，轻而易举地便通过仲裁的办法解决了。正是他对南京政府的这种支持，才使他陷入了南京政府投降政策的罗网之中。

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对日本侵略所进行的唯一一次有效的抵抗，是在不顾最高统帅部意愿酌情况下进行的。就在日本人侵东北后的次年一月，十九路军在闸北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军人也是一个顶一个的，至少堪与日本人相匹敌。然而在四个月之后，继东北的失陷，十九路军被以“避免导致一次危机”的同样命令，调离上海。而一年之后，热河的失陷甚至更清楚地展示了它的悲剧色彩。

在“东三省”失陷之后，保卫热河就成了一个与民族尊严荣辱相关的问题。保卫热河的领导权，被委派给了那位臭名昭著的唐玉麟，他用军用卡车装载着他的成包鸦片所创造的撤退纪录，已成了中国的讽刺家们嘲讽的主题，整个热河防线的总崩溃是“南京政策”的彻底大暴露。“不抵抗”或用“外交手段抵抗”被正式放弃了；蒋介石也

宣布说，他已做好了“誓死”保卫华北的准备。据国防部长何应钦说，当时有近 50 万政府军忙着在中国内地打“共匪”；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头面人物却一再表示要求停战，以加强抵抗日本的实力。但是，并不曾有过一支援军被派到北方。而当日本人于 1933 年 2 月发起进攻时，中国的军队防线顷刻便可悲地土崩瓦解了，到 5 月 4 日，侵略者便踏进了热河城。

张学良当时对此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他当时在北平，热河境内有 4 万名拨归唐玉麟指挥的东北军官兵，其余部队则在北平以北运动，沿着铁路开往山海关。如果说他一度对“国际联盟式”反对强权政策的正义力量还曾抱有信心的话，那么，现在这种信心早已消失殆尽。据他手下的人说，自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就想着率领全部军队，进军热河，参加战斗。

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秘密访问了保定，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位“委员长”利用一艘象征国家的船触礁的常见寓言故事，描述了中国当时的情况。他说：“这艘船严重超载，必须将一些货物抛入海中，否则船就会沉没。”看来，张学良就是这些抛弃的货物。于是，他在保定“委员长”的私车里，草拟了一份颇为伤感的辞职信：“……在请教了蒋介石将军之后，现在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使我真诚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辞去职务，将被视为对‘中央政府’的贡献，从而加强政府的力量……在我离任之际，我希望我的同胞们相信：我的这种做法完全出自诚心诚意，并清楚地认识到，不管我有什么过错或失误，我总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委员长”，立即被派往南部，调到河南，张学良被送到国外疗养身体。从强权政治观点看，蒋介石处理东北问题的手腕是十分高明的。从那时起一直到西安事变的爆发，他的声望一直在稳步增长，从未间断。张学良的名誉似乎永远地被他搞臭了。

1935 年我们告别了“少帅”，他的形象对各国报刊的远东专栏读者来说是那样的熟悉——在“双十二”以后的日子里，人们从许多报纸的头版上又见到了他病怏怏的黄面孔，隐君子特有的那种黯然失神

的双目忧郁凝视的肖像。他的传奇故事依然在流传，甚至在中国也未能被完全消除。这位失去了北方一大块国土的汉子，会发现要想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重新出名，是相当困难的。

在出国之前，张学良费时两月，在上海进行了强制性的戒毒治疗。在这方面他得力于许多外国朋友，特别是他的前顾问端纳，此人在后来的西安谈判中再次充当了友好的角色。这次的治疗取得了成功，此后在国外的几个月则彻底根治了病。当张学良从流亡之中归来时，他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关于东北的故事，从来没有人完全讲出来过。唯有在东北事变发生之后的岁月里，世人才开始认识到了“九月”的那些日子究竟损失有多大。阿比西尼亚撬开了许多人的双眼；从各国使馆人员的惊慌失措中，从竞相签字支持扩充军备的浪涛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对此的认识程度。“集体安全”在 1931 年还是一个美妙的词语。今天，它可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了。

从李顿报告书⑦这份精确的外交文件中，人们可以了解到东北人民的悲惨命运(还将编辑另外一份报告，它讲述了那些贸然当着“李顿委员会”的面作证的中国人以后的个人命运)。把那场悲剧归咎于因没机会实施抵抗而撤出家乡的东北军是毫无道理的。然而，面对“东——北”那复杂的背景——白山黑水的故乡——像东北人所喜欢称呼的那样——这出戏还不算完。因为，在这些灾难深重的年月里，至少东北已经有了自己的英雄。

也许，那位倔强的矮个子骑兵马占山将军，便是东北大地要出现英雄人物的先兆。他在冰天雪地的齐齐哈尔对侵略者的英勇抵抗，已激起了世人的许多遐想。但他也从此成了许多中国最优秀的现代作品讴歌的主题。你可在任何一个现代美术展览会上，或那些曾受到过鲁迅称赞的年轻上海艺术家们所制作的木刻作品上，见到他戴着皮帽，乌黑的步枪与白雪相映的形象。他还不是“中国革命”的“红色卫士”，他属于那支“东北义勇军”。

我们抵达石家庄时，天又黑了下来。我们似乎每天都在晚上抵达一个警戒森严的终点站。满怀着失望的心情，我们又回到了那家熟悉的旅馆。西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距我们遥远。

走进一楼我们的那套房间，我们便听到整齐的前进脚步声。苗剑秋跟着我走到窗前，只见有一队穿灰军服的士兵，在夜色朦胧中的灯光映衬下，正在列队返回营房。当他们经过时，突然响起了一首爱国歌曲——音调清彻而不连贯，但含有一点陌生的思乡情绪。

“这是我们的东北军”，苗在我身后说。我明白他在想什么。

当晚，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讨论行动计划。要是我们在太原能和西北方面取得联系，我们就还有乘飞机的可能。可是，这至少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得到西安的答复。

当天夜里，有个男子在我们房间里逗留到很晚。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是个东北人，有着宽阔的额头和北方人特有的那种宽大的颊骨。他写下了一首新的东北之歌。

在昏暗的屋子里，他轻柔地为我们唱了起来。这是一首在此后的日子里我经常要听到的歌曲，歌曲的开头是：

我的家在那遥远的黑龙江

在那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熟悉的小屋、土地，

玉米、大豆和高粱……⑧

然后，歌曲唱到了被称之为卖国日的“九一八”；唱到了在日本统治下的农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这些流浪者渴望返回家园的心情：

爸爸，妈妈，

小弟弟，小妹妹，

何时我们才能重相聚？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

我们才能在我們的小屋里重新相聚。

中国人的感受力较之英国人要更为细腻优雅一些。但苗完全被这首歌迷住了。为了学会这首歌，他俩凑在一起唱了一遍又一遍，一连唱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终于能把这首歌的词、曲都背得下来——这是一首忧伤、细腻，曲词优美的歌曲。那个人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消失在夜色之中。苗剑秋转向我，他的眼睛湿润了。“我们到西安后，我要对蒋介石将军唱这首歌——他也非流泪不可。然后，我想，他的心也将会由此而改变的。”

我不知道是否真会如其所言。

译注：

①德奥，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奥拉宁堡，在今德意志共和国中部，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均为纳粹集中营。

②系指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1930—1940年在位)之子，1940年继位，1947年逊位，以生活豪华放纵而闻名。

③贝尔德(14737—1524)，法国之武士，被誉为无畏灭过之武士。

④亦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或《巴黎公约》，《非战公约》，由法国外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于1928年8月27日由法、美、英、比、德等九国作为创始国在巴黎签订，1929年7月25日生效。到1933年，参加国共有63个。公约规定：禁止缔约国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要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但在订约的同时，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都先后发表了备忘录、声明和保留条件，以保留“合法的防卫权”为借口；声称各国有权视情况决定是否“诉诸战斗”，从而使该条约实际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⑤全称是《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名《华盛顿条约》。1921年11月12日，美国召集中、英、法、意、日、比、葡、荷九国在华盛顿，开会讨论远东问题等。1922年2月6

日会议结束时签订了《九国公约》。该公约在提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同时，规定“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从而为各列强共同控制中国制造了口实。

⑥即“济南惨案”，实际发生日期在1928年。蒋介石在美英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5月1日蒋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大举进攻，蒋下令不许抵抗，并撤出济南。日军在济南大肆烧杀抢劫，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造成惨案。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军于1929年撤出济南。

⑦即国际联盟于1932年10月发表的《中日纷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政府请求下，国际联盟派遣由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任团长，由英、美、法、意、德五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国和日本进行调查，发表了调查报告。该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犯中国边界，而是为了对付“赤色危险”。同时主张东北脱离中国政府管辖，设立所谓“满洲自治”政府，阴谋以国际共管来代替日本的独占。并提议在中国东北组织特别宪兵，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规定“自治政府”聘请外籍顾问，把一切政治、财政、警察等都由外国人组成的“顾问会议”控制。这种怂恿侵略，妄图乘机瓜分中国的阴谋，一出笼便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从而使该报告书终于成为一纸空文。但该报告也谴责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措施”，申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因而亦为企图独占东北的日本所不容。

⑧此据英文译出，与原歌词不甚相符。

## 第五章

### 黄河

一天以后，我们再次从石家庄出发。“这条路线上的人肯定对我们非常熟悉了”，当我们又乘上开往太原的早班列车时，我不由说道。

苗剑秋乐得合不拢嘴，两天的睡眠已使他神奇地焕发了精神。

“他们会把你看作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说，“有许多公务在身。你是个外国人；你坐头等车厢旅行。有一个秘书，你有极大的‘面子。’”我希望他是正确的。按西方人的一般心理，我们过去三天的活动的确令人觉得可疑。

然而，我们并不打算坐到太原。前天，从唐那儿传来口讯，说他已经无法在那架去西安的飞机上找个位置。他打算乘火车到潼关，试图通过这条关卡到达西安。这是在此之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最后一次得到的有关他的消息。返回北平后我才得知，他在潼关边境对南京军队丝毫无法施加影响，只好返回，并因染上了像斑疹伤寒之类的病症而病倒了好几个星期。我们虽然拖延了一些时间，但较之于其他人(正如以后所证明的)，我们要更为幸运一些。

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要在太原前一两站溜下火车，因为太原——经过探询已证实——对我的朋友苗剑秋来说绝非安全之所。要是还有一架飞机从西安飞来，我们在那儿可获得通知。如果此项计划失败，我们就打算连夜乘慢车赶到侯马，然后突破天险过黄河。

在这三天里，我们三次走上了同一条熟悉的旅程，使人内心非常焦急。好在这一切都顺利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不测事件。在三等车厢里，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和我们同行。到了该下车的地方，他将给我们发出信号通知。

当天下午稍后，一直坐在位子上，鼻子紧贴着车窗玻璃的苗剑秋，凑过来对我说：“下一站”。我们买的是到太原的车票，因而当我们开始收拾行李时，列车员感到非常惊奇。一张两美元的钞票刹住了他的好奇心。

火车缓缓驶入一座小车站，看守它的，只有几个睡眼惺忪的警察。我们匆忙下了车，立刻穿过铁路线，就地堆起行李，等待火车驶离。那位神秘的朋友突然出现了，还带着两位铁路工人。

“跟我来”，他简单说了句。我们跟着这几个人，顺着铁轨边道前进，最后来到一辆停在铁轨转换器旁边的废弃轨道车前。我们都爬了上去，那两位铁路工人开始压动手杆。随着道岔的咔哒声，我们静静地滑向了黑暗。

天气冷得要命。我们坐在狭窄的车板上，冻得直打哆嗦；对于要走向何处，我一无所知。山风扑面而来，那两名工人在我们身后有节奏地操纵着轨道车，真令我们羡慕。似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车才离开铁路主干线，拐进了一座工厂的院内。铁门在我们身后发出咣当的声响，我们几个感到喘息都轻松得多了。

饭菜为我们端了上来——热气腾腾的面食，烧猪蹄，甚至还为我们特意蒸了米饭。我突然意识到，对我们的这种殷勤款待，较之于我在大城市里应邀参加的那些正式宴会，要更有价值得多。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次这种中国式宴会的花销，足够像这样的人家生活一年。

那晚在一个工人家的茅舍里渡过的时光，是一段美好的插曲。我详细解答着对我的服装每部分价码的询问。在门口拥挤着的一群孩子们的注视下，我袒露起前臂，喝下一碗又一碗味道苦涩的茶水(每敬一碗，总有说不完的道歉话)。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派出去的朋友带回了消息。西安的附近在打仗；那架飞机也来不成了。我们必须连夜搭火车，加紧行动。

这位朋友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似乎认识这里每个人。在我们临行之前，他给我们准备了食物——饼干和牛肉松——以备旅途之用。此外，有点出人意料的是，他还给我们找了个仆人。他说，为了“面子”的缘故，我们必须至少得有一个仆人，而他是会被派上用场的。

我们的仆人是面容消瘦的东北人，以前在东北军里当兵，是被该村的朋友“借”出来的。他姓李，也将跟我们一起到西安。我喜欢他们这种安排上所体现出来的出于自然的同情和理解精神。对自己的仆人，中国人的支配欲望要比西方人弱得多。尽管如此，目前在中国，大多数经营着某个中国机构的外国人，都为他们的厨师或管家所支配。

他们处在一种体系的压制下，而在这种体系里，中国人却可以应付自如。

到了邻近的车站，我们就能搭乘上开往潼关的慢车。我们把自己的东西都堆进黄包车，大家非常庄重地相互道了别。李带头走进茫茫夜色中。我们必须穿过一片乡间原野，在这段路上也没有一丝月光。我前面的黄包车里，苗剑秋自吟自唱：“我的家乡在松花江外的……”。

犬吠声伴随着我们悄然通过荒凉的村庄，进入旷野之中。羊肠小道的两旁，一座座坟堆隐约可见。火车在远方发出忧郁的鸣叫。我切实感到，我们的真正旅程终于开始了。

我站在四面透风、寒气逼人的候车室里。不管怎么说，就这种情况下的旅行而言，我基本算得上是装备良好，拥有长筒靴和蒙古式皮帽。苗剑秋穿着那身黑色服装，打着那副古怪的绑腿，看上去不折不扣的像个秘书；他把大衣披在身上，活像一只羽毛蓬松着的画眉鸟，同时双脚也在不停地移动。李向导穿着棉布外套，脚踏一双城市式样的旧皮鞋——肯定是他的主人穿过的，要算是我们三人中最受冷的一个。但他除了把手插进袖筒里，看上去有点怕人外，丝毫看不出感到寒冷的迹象。

列车到来了。就像在中国乡下的慢车会遇到的那种情况一样，车厢里挤满了人。我们奋力挤过一个与车身不甚协调的门，进入昏暗的车厢，里面顺长摆着可坐三人的木椅。车厢的厢壁是用弯弯曲曲的板子拼凑起来的，里面用麻布填补着它那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缝隙。在车厢的两端，各有一个很不起眼的炉子，以及一盏孤独的煤油灯。显而易见，我们要度过的这个夜晚是不会那么好受的。

凭借优越的战术手段，我们在座位的中心地带设法占据了一片地方，并设法尽量离火炉远一点。苗剑秋用一种普遍为大家所认可的中国方式，在我们的中间堆起了几包食物，采用这种办法能够使我们尽可能多占据一些活动空间。他把一支安在饼干筒角上的蜡烛，巧妙地掏了出来。李则更乐于站在火炉边，不时给炉子里填几块散落在地板

上的煤炭，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山西铁路部门的吝啬。“阎锡山这家伙倒真会赚旅客的钱”，苗冻得哆哆嗦嗦地说：“你瞧，山西的一切都是那么唯利是图。”

在我的生涯里，那晚是我所度过的最寒冷的夜晚之一。火车轰隆轰隆地向南驶去，在小站也无休止地停上那么一段时间。寒风透过火车厢壁，发出凄厉的声响。每时每刻都有农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炉子边去烘烤一下手脚。对含有外国人在内的我们这几个人，(同车的旅客们)失去了任何特殊的兴趣；在寒冷和难受面前，我们落到了和大家同等的水平线上。

然而，即便如此，老天也注定不让你安生。午夜时分，在一次短暂停车时，门外突然出现一阵骚动，车门猛地一下给打开了。两名身穿羊皮服装的士兵冷不丁地闯了进来，而且——对车厢里那些睡得迷迷糊糊的人们极其勉强地打了个招呼——在我们正对面的座位上清扫出一片空间。一个皮大衣裹着的胖家伙挤在门道当中。

苗瞟了一眼新来者，对我耳语道：“南京！”然后，他把外套的领子翻了上去，把帽子压到眼皮上，从而使他看上去活像电影里的阴谋家一般。新上车的这位军官是个红脸大汉，带着一个黑色公文箱，肯定负有重要公干，这才在这般时候被迫赶乘这种慢车出行。

我注意到，他是个上校，随身还带着几个手提箱。其中的一个手提箱被放在座位上，上面燃着蜡烛，由一名士兵仔细看管着。这位新来者哼了一声，扯长身子在座位上躺了下去(他是容许自己这么奢侈享受的唯一旅客)。用一只公文箱充作枕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着的报纸，就着烛光仔细地阅读了起来。

苗抓住这个机会迅速窜到炉子那边，把自己的面容用炉子的阴影隐藏起来。过了不一会儿，我也来到他那里。

“你觉得我们的军人朋友怎样？”我问他。火车行驶的咔哒声淹没了我们的交谈。

他悲伤地笑了笑，答道：“他正在那份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情况。他大概要到潼关去。他可能是个专差。”

“他有可能认出你吗？”

“我想不会。但我并不因此而庆幸。”

那位上校读完了报，对着车厢四周长长地扫了一眼。他的眼光带着一种克制的好奇心，默默地盯在我身上。作为一名欧洲人，我的引人注目实在令人心烦。接着，那双目光又转向了苗剑秋。他把脑袋耷拉到胸前，装作醉酒模样。我觉得应该由我上去和他搭腔。

“你要去哪里？”上校突然向我发问。这是旅途中通用开场白，并无具体所指。

“侯马”。

“去那儿有何公干？”我就知道下来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打算去拜访几个朋友，教士朋友”。我并不知道侯马是否有传教士，但不妨借此碰碰运气。对任何外国人来说，这是一种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在这种时刻出外旅行的唯一理由。“那么你去哪儿？”我反问道。

他用一个我搞不清楚的地名回答了我。但不难看出，他显然对苗的行为感到好奇。“我的朋友累极了”，我说。“在这种车上可睡不好觉”，说着我深深地打了个哈欠。

上校领会了我话中的含义，他再次扯长了身子，不一会儿便打起鼾声。他那贴在绿色手提箱上的脑瓜也在有节奏地晃动。公文箱紧紧地压在他的一只臂膀下面。

这一夜似乎总也过不完。每到一个大点儿的车站，总会有一名警卫叫醒上校。他会走到寒风凛冽的站台上，对那些恭候着的部属讲上一通。停车的时间因之而愈来愈长。

如此这般，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天色破晓了。时光的变化对于

那些像倒下的“泰坦”<sup>①</sup>般横七竖八地昏睡着的大多数乘客来说，丝毫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对我们而言，天色破晓至少使我们能够浏览一下除了“南京”上校那幅粗野的睡相之外的其他东西。

因为这是一个宏伟壮丽的国家，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具有历史意义。而我们正在驶过的“汾河河谷”，以及它那从赤色大地上扑面而来的一个个城墙环绕的城市，在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上则是最古老的战场一。远在苏格拉底<sup>②</sup>之前的两千多年，这里就是许多声势浩大、风云激荡的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而这些事件大都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这里掩埋着中国的第一代国王；早在“贝尔伍夫”<sup>③</sup>成为传奇性人物，为英国的吟游诗人所传唱之前，他们的坟墓就已陵夷。这条河谷的每座城市都有一段自身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在露天戏台上的概要描述，展现出了古代人们的喜怒哀乐的生活气息，从而使得每个像黄包车苦力这样最普通的中国人，都能从流传下来的中国古老戏剧里，非常熟悉地领略到他们的历史。没人知道亚瑟王<sup>④</sup>的坟墓所在；史密斯<sup>⑤</sup>的遗骸又埋在哪里？可是中国人却记得他们最早的三个统治者尧、舜、禹的陵墓，历经 40 个世纪的变迁，他们的纪念物依然遍布于华北和中原的各个地区。

中国历史的延续性是令人惊叹的；然而，只有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人，才会把它那异常丰富的东方式文明看作是一成不变的。那位在“商朝”兴起于河南之前就“制服水患”，开辟了黄河河道，使那些“避水于山丘之上”的人民能够“从山丘上下来，重新耕作平原之肥沃农田”的大禹，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英雄；此外，他的出现也预示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治水”，这是一个亚洲型农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而在中国，则成为其全部生产构成的主要特征之一。根据关于中国历史的《核心经济区域论》一书的理论，现代经济学家们业已对历代王朝的无休止内战提出了某些见解。一旦中国经济的真正特点为人们所充分认识到，历代王朝的兴衰就成为不仅仅是光会引起行家们注目评鉴的色彩斑斓的文史画卷。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才能够展示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往今来持

续不断的一切冲突和搏斗，也才能够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苗靠着车窗依我而立，给我讲述着所经过的一些城镇的名称。朝阳穿过山谷，刺破迷雾，给塔楼、树木披上了金光。列车来到了一个小站，卖稀饭和面饼的农民的叫卖声响成一片。

“外国人”！苗突然叫道。看得很清楚，有三个传教士进了车厢——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和他的妻子，另外一个穿着学者长袍，显得容光焕发的青年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中国牧师，那副怡然自得的派头就像是在给全中国的皈依教者在做祝福祷告一般。

他们自成一堆儿，坐在门口附近，以一种传统的英国式矜持冷漠态度把自己与车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以显示他们是一伙外国人。那对老夫妇心情有点小小的不快，闷闷不乐地吃着三明治。那个年轻人用好奇的目光朝我们这边扫了一眼，然后便和中国牧师谈了起来。“他们去侯马”，苗悄悄对我说，“去会朋友。”

因为有“南京”上校的存在，而他对我们的行动开始异乎寻常地关切起来，因而形势变得复杂化了。看来侯马肯定有不少传教士。我觉得还是由我和他们先拉上关系为好。

那位年轻教士来华才一年，还有股子狂热劲儿。我们谈起了城墙环绕的山西城镇，谈起了这个“模范省”的农民生活。就是在这个“模范省”里，鸦片被地方官员们以整治鸦片为名而公开出售。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西安，转到蒋介石被扣押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使得直到刚才还骄傲得不得了，坐等别人介绍的老夫妇迫不及待地插了进来。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在这里的出现与其说是为了寻求保险，倒不如说是更加引人注目。

“张学良这个该死的家伙！”老教士的妻子怒不可遏地说，“我每晚都要为委员长的平安而祈祷。”

自从蒋介石皈依基督，接受洗礼以来，他所受到的最热烈赞美，来自于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们。而与此同时，我想到了在国民党监狱

里惨遭横死的无数中国青年人的生命。我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九年的剿灭“赤匪”的战斗中，委员长漫不经心地翻开他的圣经，为其迅速调集更多的飞机轰炸中国的村庄寻找合适的理论根据。我感到，把祝福祈祷给予这样一个现代“约书亚”<sup>(四)</sup>的，正是旧约里的那种基督精神。

我凑到苗身边。他独处一隅，看上去就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似的。南京上校使他感到非常焦躁不安。然而，整个早晨都在呼噜大睡的那位上校，突然动作麻利地站了起来，带着卫兵和行李在一个偏僻的小乡镇下了车。

狭窄的车厢顿时显得宽畅了许多。我们的列车沿着河流，穿过冰封雪冻的高山时，窗外的阳光明媚灿烂。下午四点过后，我们抵达侯马，阳光依然当空高悬。

那几位传教士在站台上受到了大声喊着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乘他们忙着相互问候无暇他顾之际，我们赶忙带上行李，穿过铁路，从围墙下面出了侯马站。一群急于揽活的黄包车苦力、驴夫和搬运工立刻把我们团团包围了起来。

打从一看到这一带的情况，我们就开始料到在这样一个地方，是不会有汽车或公共汽车可供乘坐的。听说侯马有史以来唯一的一部“抽油大车”，是河边那家棉纺厂经理的，已于两年前被他带回上海。在我们要走的这个方向上，道路似乎还可以；我们所能利用的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是骑自行车。可是，我们随身携带的零碎东西太多了，而且苗还不会骑自行车。我们只能在黄包车、毛驴和北京的那种马拉大车中做出选择。

我们怀着强烈的受挫情绪，一致同意选择黄包车。一般说来，这种交通工具能像其他车辆一样跑得飞快，也肯定要舒服一些。我曾在一辆北平式大车里乘坐了约十分钟，那是一种围得严严实实，座位没有一点弹性的交通工具，比你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任何运输工具都要令人厌恶。我发誓决不再重复这种经历了。

我们迫切希望能够以低廉的价格租到能一直把我们送到新绛(在当地的口语里，它叫“绛州”)的黄包车，这是位于汾河另一侧的一个县城，而当晚我们必须尽量地做好这件事。李很在行地仔细为我们挑选了四个看上去最强壮的年轻人；我们可能要雇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黄河边上。我们把行李统统堆集在一个黄包车上，沿着黄土大道出发了。

我们横穿过一条宽阔的山谷，它的四周是平缓的山岩。金褐色的乡野在冬日夕阳的照耀下，令人觉得心情为之舒畅。我们经过了一些建造别致的小碉堡，它的墙上贴满了反共标语——这些碉堡是今年春天红军自陕西袭击后修建起来的。抵达汾河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新绛的城墙高耸在河北岸的黄土崖上，煞是好看。

冰封雪冻的河流上面架着一座舟桥。在舟桥的附近，有几家供驴夫和小贩们歇息的廉价小客栈。但这是一个有军队驻扎的小镇，而我们要想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必须能够住上新绛所能提供的最好住房。不等门口的哨兵向我们发问，苗君便抢先提出要求，要他们为“重要外宾”安排个干净床位。我们的名片被很庄重地接受了；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特别是如果有和他一道外出的人能够详细描述他的重要干系时，一张名片便可成为他的万能护照。卫戍部队的头目亲自把我们护送到了该镇最好的客店。

我们在一家住满士兵和到处贴着日本春药广告的餐馆吃了一顿饭，饭菜极其可口。当我们回来时，砖炕已经生上火，桌子上还摆了盏油灯，客房收拾得基本还算干净，确实使人感到愉快。李向导把我们的铺盖卷在炕上铺好，我的丝绒睡袋成了不折不扣的奢侈品。

从外面的院子里，不时传来时断时续的对话声，仆役们的喃喃报怨声，以及路对面的喝酒划拳声。直到我们隔壁的房间猝然爆发出一场可怕的争吵为止，这些声音都在逐渐减弱，令人颇为愉快。邻屋传来的是三个人的声音，两个男的和一个女人，用的是一种很难听懂方言土语。那位女的听来倒像是在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他们在争吵谁应该和她睡觉，”苗说道。“不过声音也未免太大了。我去和他们谈谈。”

这是我的朋友第一次在我们面前显露他的雄辩才能。只见他紧了紧裤带，披上大衣，一头冲进了院子里。当我听到他用平静的语调略为责备这三个人没有良好的旅行常识时，我预计他八成要被顶回来。然而过了不一会儿、他安然而归，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沉寂。我对他的尊敬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被不知疲倦的李向导唤醒。因为没有更好的交通工具，他重新雇用了原先的人力车夫。我们匆匆吃过饼干和面条的早餐，结清账后便离开了这里。

在中国，不管你起得多么早，总会有人赶在你的前头。牛车吱吱哼哼地从狭窄的街道中走过，运水的手推车发出难听的呻吟声，我们吃力地向西城门走去。牛车所过之处，泥泞的路面被辗出八英寸深的车辙。我们从城墙下出得城来，走上汾河边上的一条冻得梆硬的大路。

天气太冷，坐在黄包车上实在冻得受不住，我们只好下来步行。原来因穿皮鞋而大倒其霉的李向导(他之所以穿皮鞋，仅仅是因为要“面子”的缘故)，也给自己买了双轻巧的中国便鞋，独自走得飞快，我们谁也赶不上他。他实在是感到痛快极了。我们是一支不为人们所常见的团伙，但是在中国，公路上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人。一旦有人问及，我们总能冒充传教士而蒙混过去。

走了不一会，公路便向上拐进了塬的边缘；我们下面的汾河渐渐变成了蜿蜒曲折的白带，宛若冰河一般。在我们的前面，透过宽阔的谷口，有一条山影隐约可见。“那儿”，苗费力地说，“就是陕西”。这段旅途看来还很遥远，而我们的行进速度也实在慢得可怜。

我们在一个路边小店里吃了午饭——它肯定曾是个专供商队投宿的旅馆，里面有着这类旅馆的一切传统东西——包括跳蚤在内。我从来对虱子怕得要命，而苗则对此一点也不在乎。这真令人感到惊奇，因为我来时注射过防斑疹伤寒的疫苗，他却没有。此后不多久，我们

便经过另一座县城的围墙——稷山县。到禹门口——这个黄河的渡口，我们还有一半路程。太阳离落山还早呢，剩下的路程要好走多了。

不过当晚我们并未抵达黄河边。当一抹晚霞依然悬挂在陕西那边的小山之上时，我们正好快到河津，这是我们这一路上的最后一座像样的县城。晚间在中国旅行是不大常见的，尤其在这个通常以土匪闻名的两省交界的地方。我们决定留待明天再过河。

我们就在所遇见的第一家客店里停下来喝茶。但这家客店的屋子实在太脏，我的心不由得沉了下来。苗在这里表现得却十分出色——他向该处的卫戍队长提出要求，坚持要受到更好的招待。那位非常年轻、显得有点局促不安的卫戍队长承认，该城再没有更好一点的客店。他建议我们去拜访一下县长，然后就住在县衙内。不过已为时过晚，不适于进行礼节性拜访。最后，他灵机一动，把我们引到街上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一个棉花商，也是该城最大的富翁之一。

一座不起眼的临街店铺那沉重的大门打开了，我们走进一座堆满棉花的院子，白色的棉花与灰色的院墙隐隐相映。这家店主外出未归，但我们受到了他侄子的接待。他毕恭毕敬地对我们尽了主人之谊。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一间天花板上刻有图案，配着漆光家具的屋子里，睡在砖炕上。即便是从各方面对中国都有所了解的苗君，也对我们住所之豪华感到惊异。我们对所受到的欢迎表示感谢。但拿这家的富有和我们沿途所见村庄那一目了然的贫困面貌相比较，对我们也不无启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穷人和富人这“两种民族的人”之间的差别像中国这样的悬殊。

第二天清早，我们看望了那位友好的卫戍队长，向他请教了在禹门口渡河的问题。他给我们打了保票，说渡河是不成问题的，河道上面冰冻得很结实，我们轻而易举地便可徒步过去。地方官员一般来说不会找麻烦。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感到他这么说是故意把问题说得容易一些，免得我们失望，从而使他所建立起来的我们受到友好欢迎的美好印象

不致遭到破坏。但我们正急着离开。我们距黄河边只有两小时的路，主人竭力反对我们给仆人付钱，当然我们留下的要比他们应得的多得多。我们感到都有点不顾一切了，因为过河就是韩城，有一辆汽车安排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我们终于来到了可随时到达自己目标的距离之内。

天气十分晴朗，但就在我们快到河边时，开始刮起了风。我们很快便得知，禹门口这地方终年有风。车夫与扑面而来的疾风进行了英勇地搏斗，到了最后，我们都下来步行。这条路逐渐缩减到只有一辆牛车辙那么宽。

远在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条伟大河流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大自然中感到了它的存在。又干又硬的黄尘被疾风吹打在我们的脸上，在眼角、鼻孔里凝结成小土块。距河口一英里或一英里左右的下游方向，看得很清楚，峪口的开阔地面上堆集着一个巨大的黄尘圆锥体。这是被疾风从河床上吹来的尘沙，像通过一个漏斗那样受到两侧山丘的夹击，聚集而成的。

我们下到了黄土塬的最后一级地面，平展展的地面上乱石横陈，寸草不生，零零落落的田地和数百个墓碑散布在它的中间。似乎那里没有生命在成长，那里便成了祖先们安息的好地方。

由此向南望去，汾河沿着河谷的另一端绕过黄土崖，汇入了黄河。由此向北——巍然高耸于眼前的——是山西境内的最后一座山脉。黄河的峡谷就位于它的后面。禹门口在这片山脉的尽头，就在黄河西岸那排小山嘴的对面。

我们从小山的边缘绕过去，这时疾风突然被挡在了山那边。我们走进一个狭窄的村庄街道，街道上尘土能盖住脚面，两边是深黑色的小石房。前面就是高耸的峪口，我们不由得加快了行走速度。顺着街道往前走，我们突然进入一片开阔地，道路上的鹅卵石在此没入了沙中。黄河在我们的脚下奔流，黄褐色的浊水夹杂着嘶嘶作响的冰块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我们脚下奔腾。

“Tao—la!” (到啦)苗大声喊道，大风吹得他言不成句。“我们终于到啦!”

译注:

①泰坦,亦译提坦,希腊神话中天父和地母所生的巨人家族成员。

②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③贝尔伍夫,公元 8 世纪初英国史诗中的英雄人物。

④亚瑟王,公元 6 世纪传说中的英国国王,圆桌武士的领袖。

⑤史密斯(1580—1631),英国殖民主义冒险家。

⑥约书亚,圣经中的以色列领袖,摩西的继承人。

## 第六章

### 禹王庙

这是一个荒凉而富有浪漫色彩的所在,有点像置身于巴利伐尼亚的阿尔卑斯山区,或接近于阿迪杰河的上游一带。穿过水流,有两面石砌的绝壁互相对峙着,每一面绝壁上面都有一些庙堂或建筑物。每一面绝壁都是一座碉堡,仰望我们身旁的断崖顶端,我们看到了墙头上的刺刀在闪光,我们还看到了士兵那灰色的军帽。我们已处在一个叛乱省份的边缘。

此时要想乘船渡过黄河显然是不可能的。像脱闸之水一样的急流,带着从大浮冰边缘(这块大浮冰在距隘口约一英里的上游地带)冲扫下来的巨大冰块,荡涤着沿途的一切险阻障碍。有一道横贯激流的钢缆索,但这对我们来说也帮不了多少忙。村子里的船只都被收拾起来过冬,整整齐齐地沿岸半埋在沙滩中。

李从一家破旧不堪的小酒馆里出来。在那里,他曾经探听了一下

情况。他听人说，过河的唯一通道是走上游的浮冰，黄河在那里被夹在山峦之间，冰冻得非常坚实。到这条通道还有一条路线——如果我们不想折回去翻过那道山梁的话——就是走直达断崖之上庙宇碉堡的小路。

“看来我们只好试试了”，苗点头同意。我们一起登上从硬石上挖出来的台阶，来到寺庙的入口。

寺庙是个气势宏大的建筑物，是为纪念古代征服了水患，固定了黄河通道的大禹而修建的。在主祭坛下面的一个地窖里，据说埋藏着他为规划这项宏伟使命而用的器具。这项使命就是著名的大禹治水——“开九省，疏九途，筑堤于九沼，推平九座大山”等等。要是禹的后人们能够依照禹的计划，继续为疏通充满淤泥的河水而开挖水道(而不是企图靠建立越来越高的堤坝来堵住它)，黄河也许早就不成其为中国的忧患了。

此刻，当我们就站在禹庙入口处对面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河边有一扇小门开着。这扇门直通绝壁上的小道，仅有一名士兵把守。他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们，但似乎并无敌意。

“你有何打算？”我问苗。“五美元就可打发他让我们通过。”他想了想说。

“不过太危险，”他最后又说道，“你是个外国人，而这里却存在着内战。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弄到个正式通行证。”

这一犹豫，使我们在禹门口白白地耽误了三天时间。

我们找到了负责这个要塞防守的一名年轻上尉，用很庄重的礼仪与他进行了交涉。他的态度无可指责，但却用遗憾的语调通知我们说，他受命严禁任何人过河。所有从陕西那边过来的人都要立刻被逮捕，说着他领我们看了一群反绑着双手，关在一个由士兵把守着的内院里的不幸者。当我们为所处的情况紧迫性和自身的重要性极力辩解时，他优雅而恭敬地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然后请我们去吃饭。他表

现得实在出色，我们再次拿不定主意是否给他塞钱。结果，我们失掉了一次机会。此外，我们还提出要求，要他给河津的驻军长官(我们前一天夜里结识的朋友)挂个电话，那位是他的上司。他照此做了，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被告知必须与河津的地方长官接洽，得到他的批准，才能放行。

甚至苗也开始对这种情况感到心灰意冷，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叫通了电话。那位地方长官自然又是外出赴宴去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向我们道歉，并说他要拍电报到太原去请示处理意见，要得到答复，可能要等一两天。在此期间，要是我们在禹门口感到不舒服，因为这里是一个条件恶劣，终日有风的地方嘛，那么，如果“贝”先生和他的秘书能够作为他的客人来河津，住在他的“鄙衙”里，他将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这下可没辙喽!”当苗把交涉的结果转告我时，我不由得叹息道。一旦我们的要求被正式驳回，就是想给谁行贿也行不通了，除非我们能买通阎锡山。“你怎么看——留在这儿对你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

“要比在河津安全得多，”他答道。“我认为我们还是留在这儿，然后再试图找其他的出路”。他用大量的恭维话拒绝了那位地方长官的盛情邀请，对他说外国人都很固执，而这位外国人也不愿意返回去，即使只有二十里也罢。要是长官能给上峰发个加急电报，他将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我们一边对寺庙进行考察，一边和士兵们拉关系，交朋友，以此打发了当天的剩余时间。我们很快便发现，这座要塞里最受宠爱的竟是一个叫作“小虎”的小男孩。他的父亲是侦探队长，也是禹门口驻军的一个老资格军官。我们决计加意培植与小虎及其家人的关系。尽管我们也认识到，这么拉关系是在玩火，但照目前情况看来，舍此似乎再无良策。

侦探队长王，也就像现实生活中和电影故事里经常出现的那种侦

探人物一样，是位体格高大、天性快活的汉子。他的职责是监视越过黄河的鸦片走私和查找共产党。对他来说，头一项工作比第二项工作可能油水要多一些；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似乎完全能够安心于这种在荒野中生活(不像那位上尉。他的神经比较脆弱，老是嘀嘀咕咕地怨恨这里娱乐生活不足)。王队长显然成了我们的人。

小虎是我们打开他心灵的钥匙。我们称赞这孩子那胖乎乎的四肢，称赞他聪明有力，称赞他和父亲的容貌酷似。我教他说“哈喽”，“古得拜”，我也希望我们在禹门口的逗留也恰好符合这两个词汇的含意。很快，我们便应邀和王队长住在了一起(他有一间专供自己使用的庙里厢房)，愿留多久，就住多久。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铁了心的——我们决不打算原路返回。

第二天，天气愈发寒冷，风也愈来愈大。我们来到下面的村庄里，与李一起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我们独自爬上山去，找个渡河点渡河的可能性。但除了那条现在受到严密警卫的寺庙小道外，通往结冰河道的唯一路线约有好几英里远，而且其中有一段实际上攀登起来极其费力。我们再次咒骂起了自己所带的这么多行李。

中午回到寺庙后，我们发现通往河道的小门敞开着。警卫们正在换岗。此时我变得不顾一切了；我建议发动一次正面突击。征得苗同意后，我们便火速打点起行李，尽可能地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从门口走了出去。

就在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了约五十码左右的时候，突然从上面传来了哨兵大声呼唤警卫的喊叫声。我们摆出若无其事的架式，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抗议声，我很快便发现我们已陷入一群试图用步枪把我们赶回去的群情激昂的士兵包围之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对苗悄声说道。他点头表示同意。我们脸上挂着一种凝固了的痴痴呆呆的微笑，继续向前走去。

我们那位上尉朋友快步从后面的小路上赶上前来。无论他怎么说，得到的只有一种回答。这位是个想过河都想疯了的外国人，就是游过

去他也在所不惜。谁敢阻拦他，谁就要负责任。外国人会在一时的冲动下产生希奇古怪的念头，他们还享有许多令人棘手的特权。而我们的这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外国人。

一幕奇异的景象出现了——在这条伟大的河流上方，狭窄的石阶小道上，站着一群人在比比划划地争执着什么；下面宽阔的河湾里，黄河奔腾不息，浑浊的河水翻卷出朵朵白色斑点。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寒冷的会谈，我觉得我们中大多数人挥动手臂，与其说是为了加强自己论点的说服力，倒不如说是为了取暖。在此情况下，我的行为已经大大超出自己的正当权限。但这位青年军官并不知道这一点。他所认准的就只有这一条：要是我们得以逃脱，他就要承担责任。

士兵们企图扣押我们的行李。我把我的行李重新又夺了回来，但苗就不能这么蛮横。他被两个人用胳膊强行扭住；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把他往回拖。“你走吧”，他招呼着我，但我可不能抛下他不管。上尉眼里饱含着泪水——部分是因为激动，部分是因为有刺骨冰凉的风。有些极端措施看来非采用不可了。

我们发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如果想让我们现在就回去，上尉就必须保证到明天中午允许我们渡过河去。这纯粹是恐吓手法，但我们要使自己的努力得到一点实际的收获。他很不情愿地勉强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于是，皆大欢喜。我们舍弃了寒风中的论战场所，回到了寺庙里的避风处。

这次行动对我们来说真有所谓吗？一小时后我注意到，通往河口狭道的小门被用一根粗大的木杠顶得严严实实，插上闩，落了销。李悄悄对我说，士兵们已获得了射击命令——不管是不是外国人——要是我们再企图逃离的话。我们成了监禁在胖侦探屋子里的囚徒。

上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是圣诞节之夜，我们有好几天都丝毫得不到西安的消息。我们被放逐到这样一座荒野寺庙里(无论多么著名)。它的屋梁在狂风的袭击下不断地呻吟着：它的石基座受到滔滔激流的不断荡涤。正是这

股滔滔激流，才阻隔了我们，使我们到不了目的地。直接行动失败了，除了返回依靠外交途径再交涉外，再不会有什么好的办法。苗把当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电话上。我躺到床上——唯一可以勉强取暖的地方——竭力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来安慰自己。这也是我随身携带的唯一的一本书。眼下的情景需要剧本排遣心中的烦闷；我感到我也与把自己封闭在石城堡里苦等情人的易梭德<sup>①</sup>的处境相类似。然而面对着风浪发出的那深沉的音调，我为我们变化无常的命运找到了共鸣：

我的判断并不是来自显像中，  
不过我想我自有占星的学说；  
可是我不用它来卜命运的吉凶，  
卜疫疠，灾荒或季候的性格；  
我也不会给一刻刻时光掐算，  
因为我没有从天上得到过启示；  
指不出每分钟前途的风云雷电，  
道不出帝王将相的时运趋势。  
(但是我从你眼睛里引出知识，  
从这不变的恒星中学到这学问；  
说是美与真能够共同繁滋，  
只要你能够转入永久的仓廩。)②

要是我们还这么被这不明不白地强行监禁起来的话，我起誓，我至少要写出一本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新论著。这对一个中世纪经院的僧侣来说，倒是一个很合适的职业。

然而却有几位不曾预料的盟友站到了我们这一边。那位侦探王队长，开始对我们表示同情；看来给小虎拍照，让他毁灭性地摆弄我的

打字机，也并非毫无效果。王队长与他在河津的朋友进行了磋商，然后通知我们说，他们中有两个人当晚要来拜访我们——一个是县长的秘书，一个是驻军军官(我们看得出来，后者肯定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他曾听任我们一直走到河边，而并没有警告说不能过去)。

大约五点钟，县长的秘书到了，骑着自行车，冻得脸色铁青。稍后不久，河津的那位卫戍队长也骑车走了过来。王侦探长把我们都请去赴宴。在设宴的地方，上尉出现了，他为那天早上的莽撞行为一个劲儿地道歉，所有的分歧在米酒和香烟的云雾中消散了。

王侦探是个出了名的酒徒，也是这次宴会的东道主。这一情况为我们的前景似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和苗简要交谈了几句(所幸的是，在这些人里英语是我俩的专用语言)。

“这可是你大显身手的有利时机”，我提出，“要是你能保持头脑冷静，我来给大家劝酒。”他神色庄重地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这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宴会，“白干”是中国酒中劲头最大的酒之一。它倒有点像荷兰的杜松子酒或伏特加；根据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它的某些作料是用鸽子粪作为调味品的。这种酒被成杯成杯地喝下去，味道十分浓烈，它的后劲令人可畏，

就喝酒而言，中国人讲究不过量。他们有好几套酒令，以示惩戒，通常总是输家要喝酒。这就像英国大学生以酒罚人的那种原则。饮酒的杯子虽然很小，但受罚喝酒的机会却很频繁。在这些酒令中，两个人亮出手指，互猜双方手指加起数目的玩法最为流行。当猜拳进行到决胜阶段时，双方呼叫的声音便会愈来愈强。然而对于胜者而言，要是他还有点大丈夫气魄，也总会满怀同情心地与其“受害者”共干了此杯。于是，两个对手不仅在道义上，而且连于渴的嗓门也都得到了满足。

我对猜拳行令完全一窍不通，但这倒对我更有利。当酒宴隆重而

热烈地开始举行之后，这伙人就不由自主地聚成一堆。王侦探是一个惯于后发制人的家伙——他声称他的酒量在三斤上下，因而可把他归之那种最能喝酒的人；第二条好汉是上尉(娱乐活动极度贫乏的禹门口，正好为酒徒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训练场)；河津的那位卫戍队长堪与他匹敌。书生气十足的县长秘书酒性最差，没喝多少便被搞得十分伤感。苗借口胃口虚弱，不能饮酒，因而在这伙人中唯一保持了头脑的清醒。

通过一只酒杯，我依稀记起那个圣诞节之夜的情景：我们的主人给我的杯子斟满了酒，他那张大脸盘变得容光焕发；上尉紧蹙双眉全神贯注，不顾死活地想要战胜他的上级；县长秘书(他才是真正的关键人物)躺在炕上，看上去愁容满面，悲切切地死盯着天花板，一个劲儿地在想他怎么会到了这里；苗每隔一会儿便从桌旁拉走一个喝酒的同伙，急急忙忙地在屋子顶头低声交谈；我极力睁大我那锐气早已消尽的双目偷眼观瞧，勉强能够看见他在力求说服人家。没有哪个推销商或拉选票的人员，能够遇到比这更能顺从人意的材料了。我们主人的酒量大得好像总不满足，他一个劲儿地嚷着叫添酒，连仆人都感到有点吃惊。

宴会到午夜前方告结束，这时我也已经喝得够多了。两位传令兵把我们这位英勇的指挥官护送到了床上，苗仍然抓着县长秘书的夹克；把他扶牢，对准他就像在施行催眠术一般。侦探王队长迈开他那熊一般的步伐，正在对我讲着一个即将结束的故事。我半懂不懂的，听起来很吃力。

等到他们都已离开后，苗兴高采烈地走上前来。“我们明天就走，一切都已安排就绪。”

“好”，我费力地说。“用冷水把我浇醒。”要是我们确确实实能够走脱的话，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我们是醉酒过黄河。第二天早晨——我蓦然想起今天正好是圣诞节——我们立即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采取了行动。我晃动着冻得僵硬的手指，忍受着晚宴

后一直未恢复过来的头晕，给山西省的最高统治者阎锡山写了一份言词能够打动人的信。在信中我向他解释道，我们擅自决定冒险渡过黄河，尽管他的属下官员曾竭力劝阻，我们并未听从他们的劝告，切莫因我们的一意孤行而责难他们。我把信文的一个副本交给禹门口的那位侦探，另一个交给河津来的那位县长秘书。苗用中文拟了一个内容相类似的声明书，我们非常隆重地为这份声明举行了签字仪式。作为回报，王队长给我们开了张渡河的特别通行证，要求河对岸的守军给予我们一切协助和方便。我们真不知道如何报答他的盛情厚意才好。最后苗花了十美元的巨额代价，买了一副墨镜(约为实际价的十倍)。他说他要以此抵御尘沙。实际上，在这个他有可能被人们认出来的区域里，这付墨镜是件非常有用的伪装品。

我们神色庄重地告别了禹庙。它那彩色的瓦檐在惨淡的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在愈刮愈大的风中，那几株零落的参天大树开始了哀哀地呻吟。由于出现了在寺庙围墙内这段奇异插曲，此时我们几乎不敢相信，我们在继续赶自己的路。苗倾向于把我们的成功归因于他那娴熟的外交手腕；我则确信我们无疑应当感谢小虎和白干的力量。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们才了解到，比上述原因都更有说服力的，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因素。

小虎最后一次对我们说“古得拜”(虽然我明知他往往不分场合地对其他许多人不住嘴地一再说这句话)。他那圆圆的小脸蛋为我们给他收集的一堆铜板而乐不可支。我们的主人——王侦探和上尉——沿着一天前双方曾发生激烈争执的那条绝壁狭道，友好地陪伴着我们拾级而下。他们雇了三个挑夫为我们挑行李，并派一名士兵领我们过冰道。我们在悬崖下友好地道别分手，也许这些友好的词句并不完全都是虚情假意的呢。

至此，我们开始沿着石阶向上攀登。每绕过悬崖绝壁的拐弯处，强风就像坚实的物体一样扑打在我们身上，我们紧贴着绝壁，历经艰险才下到了大浮冰的边缘。向导给我们指出了浮冰上面的那条渡河冰道，冰道背阳光的一侧有数英寸厚的尘土和雪粉聚集着。他给我们指

明好方向以后，便匆匆赶回去了。

这次渡河可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这里风吹打在平坦的冰面上，把它于舸得像玻璃一样光滑。在过这一段时，我们小心翼翼地在滑行着。我那双为便于行路而钉上掌的靴子，走这种路面很不适应。我极力稳住自己，拍下了一两张照片，疾风差一点把照相机从我手中夺了去。我想起我在穿过西伯利亚时，曾在克拉斯亚尔斯克停留了的五分钟，当时车厢外面的气温在零下六十度——风也像现在这样寒冷刺骨。不过在那儿，你总还能够立刻掉头重返暖气袭人的车厢。

一到河中央，我们便处在湍流最猛烈的冰面之上，湍流向着对岸的那条弯堤急冲而去。这一带的浮冰都被分割成了巨大的厚冰块，犹如颓塌的砖土建筑物一样堆集在四周。在这些巨大冰块的边缘，总有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裂缝。而且就在距此下游仅几百码的地方，便是这片浮冰的边缘地带，每时每刻都有大块的断冰带着撕裂人心的吼叫从那里消失，顷刻便又令人吃惊地在远处下游的浊流中浮现了出来。一想起有如此浩大的水流正在我们的脚下流过，想到它在两岸山脉之间所挟持的流速，我的头皮就禁不住发麻。

李现在开始在前面带路，我们几个零零散散地跟在他后面，弯腰弓背地顶风前进。风挟着沙尘和干雪扑打在我们的脸上。然而在另一边，我们却迷失了道路，碰上了一片石崖。我们没有斜穿过上游，而是抄直路过的河。不过我们中还没有谁特别急于想返回重来。

我们能够看到小路的走向，它高高地悬挂在山丘坡上。除爬上去外，再没有别的办法。

李成了这段戏剧性事件中的英雄人物。他想方设法找到了一条通向绝壁的路，然后把我们较大一些的行李先递送上去。身体看上去不那么强壮的苗，事实证明在岩石上犹如狸猫一样灵巧。当我们最终到达了那条小道，不由得俯视身下那有点望而生畏的深渊，这时我们才感到现在可以为我们庆贺了。我们终于来到了陕西。

尽管风寒刺骨，我们的浑身却为汗水所浸透。李坐在铺盖卷上，

掏出一个红手帕擦他那张脸，然后说出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

“他们所以放你们走，”他兴致勃勃地宣布道，“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损失太大了。”

“什么？”我不解地问。我猜想他肯定指的是我们的膳食和住宿，而这总计并值不了多少钱。

“在你们到来之前，许多人都从这里过河，过河的人要给警卫的士兵交四美元。但在你们给地方长官通过电话之后，他们便不得不把那扇门关上，不让任何人通过。这三天每天都有百余人被迫折回。”

我看着苗。损失竟有一千元以上之多！怪不得他们放我们走。在这个我的所有“面子”和苗的外交手腕都办不成事的地方，由此看来，经济压力却成功地发挥了作用。我们无疑从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给我们的暗示。

自此以后，我们对李的见解也有点更加看重了。

我们兴高采烈地贴着悬崖绝壁，沿着山道大步前进，一气直下到了稷门口，它的寺庙正处在我们这几天被囚禁过的那座寺院的对面。当我们的目光扫视寺庙的瓦屋顶时，只听得一阵发动机的音响——一架飞机低飞着掠过我们身后的山丘，朝太原方向飞去。我们甚至都能清楚地看到机翼上那银色的国民党太阳徽章。这架飞机也许就来自西安。

在河这边的寺庙里，我们掏出王队长给我们开的通行证，请求给我们提供骡子或毛驴。庙里的人们见到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李后来告诉我们说，他们一致认为我们肯定是从飞机上下来的，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曾有人渡河过来。不过他们还是给我们派了向导，把我们领到距此最近的一个能雇到毛驴的村庄。

我们是最后一次向禹门口的卫兵招手告别——在那座最高墙垛上的那个小小身影，我想肯定是小虎的。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沿着河岸沙滩地走了好几英里。在狭窄的山道下方，道路一下子开阔了，至

少有半英里那么宽，这里正是黄土崖的背阴处，使人几乎感到了温暖的气息。除为数不多的几处狭窄水道外，整个河面都结着一层薄冰。

在黄河岸边上有一个贫穷不堪的小村里，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雇到四个肯把我们送到韩城的毛驴。韩城是个县城，在南边约二十英里处。苗就是在这里指望和他的朋友取得联系的。我们决定一鼓作气完成这段旅程。

我们把携带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了毛驴身上，而对于是否还敢再往我那驮满行李的牲口身上加上另外十二对石碑，我暗自拿不定主意。这时李突然发出了绝望的哭泣，我从来还未见他流露过强烈的情绪，其原因似乎是因为他在攀越河边那道山梁时丢了八美元钱，因而决心转回去把它找来。我们劝说他相信赶往韩城对我们来说更为紧迫，但他仍然显得悲痛欲绝。整整一天，在此后旅途的每一个间隙，他都要活灵活现地打着手势，描述他抬起一条腿向上攀登时，那笔钱是怎么从他的内衣口袋里溜出去的。这次个人的不幸比之于任何一次险象环生的冒险经历，都更为使他震动。在其生涯中，这也可能是他首次遗失钱财。

这天是我所度过的最为艰辛的一个圣诞节。即使在英国所度过的一个下午打混合曲棍球，晚上又玩室内游戏的圣诞日，其劳累程度也根本无法与此相比。我们又上了平川，路应该说是好走多了，但黄土平原一上一下，连绵不断，我们只能沿着从黄土里开辟出来的崎岖小道攀上翻下，走个没完。黄土在我们周围卷起一团尘雾，使我们变得如同所雇毛驴一样，满身皆黄。大半旅程我都是徒步而行，因为我对骑在一个只及我身材三分之一大小的牲口身上，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感。我的这个怪习惯使驴夫们取笑得没完没了。

然而在和煦的阳光下，这里的乡间依然是美丽的，古塔和寺庙的房檐打破了原野那褐色的格调。我们一路大都循黄河而行。我们的确对这条河流产生了喜爱之心，喜欢它那宁静的平原式的气质风格。像华北许多地区一样，这一带的景色总的说来是绝对意大利式的。荒山

秃岭的格调色彩也是那样的秀气。

走进一座小村庄，我们听到吹奏军号声，随即与一队向外走着的士兵相遇。他们是在前往稷门口的途中，所以，我们渡河的时机确实非常及时。苗剑秋说他们是冯钦哉的人，但我们不敢停下来询问。我们只有摸清了韩城的情况后方敢有所举动。

当晚是个满月天，是明月解救了我们。直到晚上快九点的时候，我们才转过一个小山包，居高临下地打量这座浮在眼前的县城。当我们临近月光下的城门阴影时，受到了厉声喝问。现在已经到了好人都回了家，在外面没有好人的时分，而我们也已疲乏得连答话都没有力气了。

我们找到了一家小客店。与大多数这类客店相比而言，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我们蹲在火炕上，吃了面和麦饼，算是一顿圣诞节晚餐。在中国所度过的这个圣诞节将被看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尽管当时我们还不曾认识到这一点。“明天咱就去查明附近那辆来接应咱们的汽车。”苗满意地说道。睡意像波浪一样湮灭了我们。在朦胧中，我依然能听到黄河的波涛声。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早就去拜访该县的县长。这位官员对我们来说是个未知数，因为我们得不到一点关于冯钦哉的消息，也不知道这一带到底是对南京还是西安友善。县衙门布置色彩协调，是国民党那种兰颜色，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到这么多的“新生活”运动标记。当我们正等待着县府里的大人物光临时，我悄声说道：“我觉得这个地方似乎不太妙。”但苗却显得更加乐观一些。

该县的县长终于出来了。这位县长属那种圆滑型官员，但能够接受新思想，且注重实际。双方开始了正式谈判，苗剑秋被迫掏出他的最后一张名片，这张名片上面印着他姓周。县长对我俩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因何如此急于赶到西安？

我对他解释道，我是个旅行者，并进一步说明我与张学良和委员长都有着重要的事情要联系。

“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要去西安呢？”县长和颜悦色地问道。他的眼光盯着我，然后又看看苗，“这两个人你们到西安一个也找不到。”

这样一来，我们感到倒使自己无话可说了。我不喜欢他那神态。“为什么？”我脱口质问道。

“你们还不知道？不过当然喽，我也是昨天从南京的无线电广播里收听到这一消息的。张学良和委员长已于昨天一起从西安飞抵洛阳。委员长今天将会返回首都。”

他留心察看我们对这一消息的反应。苗剑秋的脸色变得发白，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蒋介石会被释放，又是这么快，这是不可能的。

“尽管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到西安。”我坚持道。“韩城有小汽车或卡车吗？”

县长一个劲儿地对此直表歉意。韩城有好几周都没见过小汽车了。他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肯定。与此同时，他还用审视的眼光仔细地打量着苗，而苗则戴着墨镜，神情紧张地避免与其对视。

我们顾不得体面，匆忙离开了县衙门。“这则消息会是真的吗？”

我问我的朋友。“这是南京广播上说的。少帅也曾一再说，要是委员长被释放，他就要跟他一道去”。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不过，我们必须离开韩城——立刻就走。我不喜欢这位县长。”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

译注：

①易校德，通译绮瑟，中世纪爱情传说《特里斯丹和绮瑟》中的主人公。

②译文引自屠岸所译的《十四行诗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括号中的内容是本书作者省略掉的。

## 第七章

### 西安的城墙

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小客店。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我们的艰难旅行，看来几乎要落得个一场空。

在这个变幻无常的圣诞节期间，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那么看来似乎西北方面已经从根本上退出了一切运动。处在囚禁状态中的蒋介石，是他们最强有力的政治讨价还价的本钱；放弃这一有利的条件，他们必定要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再不然就是陷入了完全的绝望。苗剑秋处于茫然无措的境地。

我们自己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我们远离西安百余英里之外，正好处在冯钦哉的地盘里，这个富于冒险的军阀所持的骑墙态度肯定维持不了多久；如果我们听到的消息是真的，他肯定要把自己的命运赌注抛向南京一边。我们处在敌方的地域内，我的朋友更增加了被认出来的危险。”

原先我们曾预料会有一辆小汽车来迎接我们——但如果那位县长的话真实可靠的话，那辆车根本不在韩城。苗决定冒险给西安的朋友拍一封电报，要求派一辆小汽车到郃阳，这是韩城以南的一个城镇。在此期间，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韩城——它在一小时前看上去还是我们的一个安全避难所——现在则令人开始感到并不那么安全。

我们不得不再次依赖黄包车。我们搜遍全城，才设法搞来三辆，他们愿意把我们送到郃阳。然而就在我离开客店内院时，一个车夫的车翻了，差点把不幸的李摔昏死过去。显然，这个车夫是生手，是来支应这个差使的，此前毫无拉车经验。李发誓，他决不愿让这种生手送掉他这条性命(从黄包车里翻下来也的确很危险)。于是，我们打发他去找了头毛驴，然后便继续我们的旅程。到西安还有三百里路要

走，而我们的平均速度大约每小时五英里。

我们经过一座古老的石桥，然后开始向上走进黄土丘陵地带。在一座高坡处，我们遇见了一座宏伟的庙宇，那是为纪念“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而修建的。要是有时间仔细考察一下多好，这实在是一块令人迷恋的地方。从这块台地的顶端，就在我们等待拉行李的黄包车上来的地方，我们能够观赏到宛若白带的黄河在远方的小山下缓缓流去。深褐色的原野略显出几缕绿色，早发的青草和第一茬庄稼开始破土而出。高地上铺着一层新雪，空气爽快清新。

黄包车夫们大汗淋漓地来到了坡上，古铜色的面孔闪闪发光。他们把黄包车套在李雇的毛驴身上，而毛驴此时还载着李和他的铺盖卷。这种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牲口——毛驴，似乎已惯于忍受比这更糟的待遇。恰在此时，我们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

“飞机”，李边说边扫视天空。“哪有什么飞机！”我大声说道。“这是一辆小汽车正在向山上开来。”

我们正好处在这座山的顶端，车走到这里肯定要减速。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激动的时刻——距西安还有三百里，几乎成了长期压在我们心头的精神负担。这辆车是朋友安排的吗？它会停下来吗？

过了不一会儿，我们便看见前方有一辆军用卡车以低档向山上驶来。在车座的后面，闪现出穿蓝灰色军服的身影和步枪枪口。这辆车最起码也是被严密警卫着的。我心烦意乱地用目光向苗询问，他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辆卡车。不管有多大危险，我们也要乘上这辆车。

中国的第一幕——西寰事变秘同

我们从路当间拦住司机。起先，这辆车看来不愿意停，我们只好闪

到一边。正在此时，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突然从驾驶室里传来了相

认的叫喊声。坐在司机旁的一个穿军服的年轻人跳下卡车，与苗

热烈握

手。我们终于时来运转，找到了自己人。

这位年轻军官是与张学良协力发动西安事变的陕西军阀杨虎城派遣

的特使，去找杨的不忠之徒冯钦哉交涉，而正是这位冯钦哉的倾向态

度，才使得我们一路上担惊受怕，焦虑不安。在 11 个小时的使命中，

他竭力要使杨的这位动摇不定的部下重新归杨管辖。然而迄今为止，他

的努力尚未取得多大进展。

冯拒绝见他，质问作为一名友好使者却带着一卡车武装警卫闯进来

的居心何在。冯钦哉的这种态度是风向倒向南京方面的明确征兆。这位

特使也受命在寻找我们，他知道我们要来，便于前天驱车往北到了韩

城。当天晚上，韩城县长(就是我们几小时前才见过面的那位)企图

把他们全抓起来，但这位特使是个非常果断的年轻人，他凭着手枪，

畅行无阻地逃了出来。

“释放蒋介石究竟是怎么回事？”苗张口就问起这个热门话题。

“我们是两天前离开西安的。不过恐怕这是真的。”

我们凭直觉感到火速离开韩城做得很对。现在卡车直向郃阳驶去，那里当权的是位“中立派”县长。当时的那些不同人物，不同程度的效忠是很难辨别清楚的。从表面上看，冯钦哉还没有断然与杨虎城决裂，尽管他已拿到了一百万美元，并晋升为南京的第一流指挥官。像绝大多数中国的军阀一样，他也会竭力从敌对的双方谋取最大的利益。但杨对他的挟制——一个前匪首对其部下的挟制——依然是非常强有力的。

这个听起来如此复杂的问题，在这面山坡上只花了一分钟便解释清楚了。李早已付清了黄包车费，把我们的行李甩到了卡车上，我们从卡车的一侧爬了上去。过了不一会儿，我们便全速向南驶去。

无论局面多么混乱，但是只要有这种接触，并有更合适的交通工具代步的话，这就是很大的宽慰。最后这 150 里已经花了我们五天时间，而现在，我们则以每小时 40 英里的速度在黄土高原上向前飞奔。从这辆坚实耐用的美国六轮卡车上，似乎也给我们传来了某种新的极其微妙的动力。那几名卫兵——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中的几个体格健壮的陕西人——始终给步枪上顶着子弹，并放在随手可用的地方。我感觉到，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能够打出一条到西安去的路。

当我们抵达郃阳，并高速开进县府大院时，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那位县长有病(也许是用装病来应付差事)，但他的属下官员却使人感到我们非常受欢迎。我们受到了极其友好的款待。

然而到了午夜，当我和苗躺在一个木“炕”上睡觉时，李带着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溜进了我们的屋子。他说那辆卡车已被扣留，那些人全部要在天亮时被捕。李平时头脑非常冷静，但此时此刻，却显示出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这可能是仆役们的多嘴闲谈；反之，也可能就是真的。

我们对此无计可施。不过，我们返回床上时没脱靴子。

第一缕灰暗的光线透过纸窗，突然一名士兵进了我们的屋子，给苗捎来了口信。我在朦胧中听到压低嗓门的急促谈话。苗用手轻轻地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们必须立刻就走。冯钦哉在大荔，我们现在就去那儿找他。”

这时，我一口气喝下一碗大米稀饭，并把另一件毛衣套在身上，暗自思忖道：去冯钦哉那里的确令人不大放心。我怀疑他此番去是自投罗网。

当我们驱车穿过晨雾，行驶于堆堆积雪之中时，天气寒冷刺骨。公路在黄土塬的深谷边缘上绕来绕去，忽上忽下，从一块平坦路面一下便转到了另一块地面，急转弯转得令人不知所措，颠簸得令人头晕目眩。我敢肯定，我们的司机要么是天才，要么就是疯子，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大多数中国人的驾驶技术良好——他们是优秀的飞机驾驶员，具有日本人所明显缺乏的那种鲁莽精神。但他们对所驾驶车辆的机械性能绝对信任。我真担心要是刹车失灵该怎么办，所幸的是，这次并没有失灵。

在卡车上，我们同士兵们一起抽烟。这些士兵中有两名是军士——其中一个早年追随冯玉祥的老兵。冯玉祥，这个中国政治中的神秘莫测人物(无论他还做过别的什么事情，在其一生中，他已经取得了最大的成就)，本来就是天才的领袖。而且他还用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训练军队，唯有红军方能与其匹敌。这名士官长着一副堆满像胡桃皮一样皱纹的褐色脸膛，脸上零乱地长着一些胡须；对曾经当过冯玉祥的兵这一点，他感到骄傲。他的双耳各戴一只好看的心形耳套，上面绣着农民喜爱的图样。那个下士是个典型的陕西小伙，长着一张红扑扑的苹果脸。当我们疾驶而行时，他站在卡车边上，对路上赶牛的人或零散的乞丐，狂呼乱叫，嫌他们避车太慢。我们身后卷起了一道宽阔的尘土，引起车后的家畜一片惊慌。

我们赶在午前抵达冯钦哉的大本营。这是一个很紧凑的小城镇，城墙给人印象颇深，而且警卫森严。城墙的垛口上浮现出士兵那灰色的帽檐，露出黑洞洞的机关枪口。我们沿着一条凹陷下去的公路走到距城墙不远的地方，在西城门外几百码的地方停了下来。冯钦哉不想

冒把卡车放进城内的危险。

那位特使在一排冯钦哉的武装警卫簇拥下，消失于城门之内。中国的军阀都具有多疑的特性，我们的部队留下来守卫卡车。苗和我躲进一个卖花生、糖果的小铺里，喝着劣质茶，饥饿地吃着麦面饼，置身于事外。

就这么过了两小时，那几位士兵镇定自若地坐下来玩赌博游戏。我和苗心烦意乱地走来走去，忧心忡忡地胡猜乱想。

“您想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问道。他耸了耸肩，用他那富于表现力的姿态打着手势说：“或者他已见到了冯，而冯此时正在招待他吃饭——这大约就需这么长时间——或者他就是被扣留了。”我倾向于考虑后者。

不管怎么说，大荔还算处在现代文明的边缘。在城门外铺石子的街道两端，不时有破旧的汽车、卡车驰过。其中有一辆是邮车，载着两名邮差。他们身穿中国各地常见的那种绿色制服，坐在帆布邮包上。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苗突然大声招呼着喊出了其中一个的名字。他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朋友圈，我有时都感到，他认识在西北的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坐邮车走”，他建议道。“这辆车子可以予以安排。”

我一边用疑虑的眼光看着这辆被撇在一旁的卡车，一边在想：各地来的邮件竟然畅通无阻地运进了陕西，这真是个奇迹。就在这时候，传来了士官那沙哑的喊声：“Lai—La!”(来啦!)他们正向这边走来。

我们的特使在城门口出现了，有半连的冯钦哉的队伍在客气地护送着他。他和他们客客气气地分了手，但中国人的礼节有时非常虚伪。我们很快爬上了自己的卡车。

“冯钦哉这个坏蛋，”那位特使登上卡车以后，就骂了起来，“不过我有一张到渭南的通行证，这样咱们就能走直道。”这可是件大好事，要是没有它，我们就得走老远绕路到西安，以避开冯钦哉所控制的所有地盘。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了司机，他正在一个小酒馆里

喝酒。但他一到便风风火火地把卡车发动了起来，如释重负地飞快把车开出了大荔。过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关我们走得是多么幸运。要是放在另外一天，想走，可能就太迟了。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都飞速行驶在陕西的原野，只是在从车上的油桶给油箱加油时，才略停一停。这种紧迫感倒正对我们的脾气。除非到了叛乱的首府，否则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无法获得对事实真相的充分认识。因此，我们希望能在夜幕降临之前赶到西安。

沿途经过的是一片极度贫困的乡村。田野光秃秃的，零散的土地被严冬冻得很坚实。孤零零的坟墓看上去倒不少，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坟墓是精心设计出来的砖瓦结构，比活人的住房还要考究实在。当我们驶近某个村庄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的城墙。但从城中穿过后，才会发现其中有一半房舍都颓塌了，也许只有四分之一的房子住着人。路边的农民冷漠地看着过往的军用卡车。到处都有士兵，到处都是武装着的军人。空气中弥漫着战争气氛，战争的威胁悬挂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空。

我们在每个城镇都要受到盘查，但只要同行的下士把通行证一晃，大声喊上几句，我们一般都会畅通无阻地直开过去。积雪愈来愈深，我们乘坐一条很不牢靠的驳船渡过一条河，驳船破开浮冰奋勇前进。当我们抵达渭河，这条从陕西西边流来、与黄河交汇于潼关的大河岸边时，天已渐渐黑下来了。

我们绕过沿途一个个巨大的炸弹坑，把汽车一直开到水边上。这个渡口曾于一周多以前遭到了来自空中的袭击。在这里，我们遇到满载着士兵即将开往北面的其他卡车——除非他们打算和冯钦哉开兵见仗，我想不出还会有别的什么原因。我们乘坐一艘平底大船渡过渭河，然后大家一齐协力帮着把卡车推上光滑的河岸。此时此刻，我们已处在战争区域之内，因为渭南是由东北军重兵把守着，是内战的最前线。

在曲折迂回的大街上，家家门口都挤满身着蓝灰色制服的人们。

东北的军人戴着一顶灰色的皮帽，这给他们平添了几分野蛮气息；此外，他们都高大而健壮。东北军中有许多都是早先从山东来的移民，该省人素以体格健壮而著称。它曾产生过一些中国最优秀的战士。再次又回到自己人身边的苗剑秋，像个小孩子似的激动不已。

现在距西安只剩下最后的 80 里路，我们贴着陇海铁路向前疾驰。南面是一脉阶梯形小山，渭河谷地在我们面前展开。这是一片肥田沃土，冬日的黄昏下显得异常宁静。然而，存在于这个昔日帝王争杀的战场里的这幅和平景象，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沿着南面的山脉驻扎着军队，我们在公路上又遇见一队队骑兵。骑兵战士们都牵着马步行。这些马匹是那种长毛的蒙古小儿马，昔日成吉思汗率众南征北战的那种坐骑的嫡系后裔。它能吃苦耐劳，具有极强的耐久性和令人吃惊的变速能力。由此我想到，在冬季骑兵作战中，比起日本人在北平缓冲区演习时乘坐的那些洋种军马，这种马不知要强多少倍。

“你熟悉这一带吗？”我问我的朋友。他微微一笑：“太熟悉了。在‘双十二’前我离开西安时，就是从这一带逃出去的。一会儿我们就要到临潼，蒋介石被俘前就住在临潼的温泉区。”一提起这件事，他就重重地叹了口气。对他来说，随着委员长的被释放，这次运动已经失败了。

太阳像只巨大的橘黄色圆盘，向着远处的山头坠落下去，在脉络轮廓分明的小山脚下，我们看见了一座小城镇的围墙，它就是临潼。小城的对面，骊山山脉的第一面坡上，有一簇寺庙的屋檐顶隐现在满栖着乌鸦的树木丛中。那就是华清宫，著名的游乐胜地，中国最著名的美人杨贵妃在唐朝崩溃之际，与其情夫调笑嬉闹的地方。无独有偶，也就在不到两周之前，这里成了一名当代独裁者的受俘之地。

到西安还有 12 英里，而那辆帮了我们大忙的汽车的发动机，却发出了过于疲劳的信号。此时天色完全黑下来了，车灯在朦胧的公路沿线抛出一道光柱。在铁路路基的上方，我们能看见几辆被遗弃的卡

车那一动不动的轮廓。前面，河水闪动着苍白的光。

“灞桥——中国最著名的桥梁，”苗介绍道，此时我们正颠颠簸簸地驶过那两侧有低矮防护栏杆的凹凸不平的大理石桥面。苗是一位很博学的人，他知道自古迄今回荡在这片河谷里的历史或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闻名人物。3000年前，长安(现代西安)是中国第二个伟大朝代的首都。早在耶稣之前250多年，声势浩大的秦朝农民革命就已席卷了这片河谷，横扫我们所经过的所有乡镇。此处是一个适于滋生暴乱的地方。

我们心情都既紧张，又满怀期待，晚间在这里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说，是既陌生又感到困惑。我们经过一个村子——看不见一丝亮光。然而，就在我们爬上一个两面是黄土岩的陡坡时，突然传来了尖厉的喝问声，几个头缠毛巾的人影威胁性地用步枪拦住了去路，一束光线突然照在了卡车上；车上有人说了句口令，我们的车慢慢开了过去。汽车的发动机只剩下三个或四个气缸还在转动。

突然，苗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看见那片灯光了吗？在它后面就是西安的城墙。”

一个工厂正在上夜班，所有的窗口都灯火辉煌。远处，在比阴影还幽暗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物体刺破昏暗的星空。当我们仔细察看时，一束探照灯光线掠过城垛，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它那宽厚的条条城壁，以及用白色帆布掩着的直冲云天的炮口。西安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城市。

经过外城门时，我们被哨所的警卫拦阻了几分钟，向他们出示了我们所有的证件。随着一阵刺耳的拉门闩声和叮里咣当的沉重的钢铁声，城正门的一扇大门缓缓打开了。卡车的发动机艰难地颤动着，慢慢地从城下向前开动。这是12月27日，星期日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的西安之行，花了11天时间。

“一进城，我们就先到我的一个有钱朋友家住下，”苗曾经这么说过。“然后，你在西安宾馆找间房子——蒋介石的随员就曾住在那

里。这所宾馆非常现代化——你能洗上个热水澡。”

我对他结交富有朋友并不感到奇怪，然而在十分钟之后，当我发现我们已置身于精美豪华的屋内时，我思想上几乎毫无准备。仆人们端上热水和香喷喷的茶，两个迷人的小孩子，怀着纯真无瑕的喜悦从后屋扑了进来，喊着叫“叔叔”。这是我这位朋友的另一个个性特点，而这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他天性感情丰富，而且甚至能够(我猜测)与那些最不相信其观点的人结交朋友。

此时此刻，我注视着他，穿着那套在我们这次艰难的旅途中被搞得破烂不堪的深色制服，正在逗弄着小孩玩耍。他似乎天生就应该在这种温暖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在这墙上挂有装裱精美的卷轴画的、一切优裕闲适的平安生活中，他应当成为主人。然而过了这一刻，眼下这些他显然非常乐于享受的生活环境，对他来说(我深知)就会变得一钱不值。以前他曾为追求这种生活而冒过险，而且为了某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东西——至少可以用“中国”这个词来概括一下，他也会完全失掉这种生活享受的。从气质上看，他也许是个革命者，但至于革命这个词的真实含义，无论是像列宁所理解的，还是中国红军的领袖们在其十年斗争中提倡的，他几乎都一无所知。

有次我问他：“你做这些事情，为的是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参加这次运动？”他露出那副有点神经质的迷人微笑，然后开始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家——一座小小的村舍；我知道他的叔叔和两个兄弟参加了东北义勇军，死于战斗中。也许这就是答案。这，以及时时在他那双大睁着的带有某种梦幻般神色的褐色眼珠里闪烁着狂热火花，便是答案。朋友们称他为“苗疯子”，但他得的是一种流行性疯病，这种病在全中国青年人中流行，它并不仅仅局限在东北的流亡者中间。

他出去给总部挂电话。回来后，他说，“我的朋友很快就来了。届时你将会见到”——他时常表现出一种神气活现的样子——“那三个制造了西安事变的人。”

对苗的话我并不样样都信，但是，正如我以后认识到的，这一次他所说的并不算夸张。

我们品着香茗，享受着火炉的温暖，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旋即便有一个青年军人走了进来。此人身材不高，非常壮实；由于穿了件皮大衣，使他看上去身高和体阔几乎一样。摘掉帽子，他露出剪得很短的一头浓发，显得生气勃勃。他的年龄是 26 岁，但他那副神态却像个怕羞而又渴望知道些什么的小学生。

苗兴高采烈地上去和他打招呼，而这位新来者安详地和他握手，但却带着显而易见的满意神情。“这位”，苗骄傲地介绍道，“便是孙铭久少校——俘虏蒋介石的人。”我感到他大概希望我能说几句恭维话。

话声没落，第二个就到了。他个子稍高，年龄也大一些，穿一身黑色的干部服，戴着无边眼镜，眼镜后面那双锐目眯成一条缝。他的整个气质像个典型的中国官僚，而他的脸上则显示出旺盛的精力。在受到介绍时，他的神态举止显得沉着冷静、一本正经，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应德田先生，”苗介绍说，“张学良少帅的秘书。”

我立刻感觉到，在这三个人中间有一种兄弟般的友谊。苗赶忙对这种关系作了解释：“我能产生想法，”他谦虚地说。“应德田是智囊——他制订出计划。而孙铭久”——这位年轻少校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是行动者。你在这里见到的的是西安的三个火枪手！”

当天夜里，我们谈到很晚，因为许多事情对我，甚至对苗剑秋来说，还是神秘的。我终于能够对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得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记述。关于蒋介石被释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很难搞到确切的情报——显然也使孙铭久和应德田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然而在这座叛乱城市所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我见到这次事变的全过程像电影一样在我面前一幕幕地展开，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委员长和少帅这两个人身上。但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并不是因为它是一幕暴露个人野心的话剧。从这篇故事里人们感受到了军队的群情激愤；感受到意

见的冲突不是个人的，而是关系至 0 国家的高级政策；人们感觉到一场可能会席卷全中国的伟大民族运动以及由此而激发起来的感情波动。此时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人们是多么关注西安叛乱的结局。起先，我们总认为，随着蒋介石的获释，一切都算完结了，而现在看来这是多么错误。这场运动必将继续进行下去。

下面我就讲述发生在西安的这段不寻常的故事，因为从这几位协助发起这场“叛乱”的人物那里，我了解到了它的全过程。

## 第八章

### 西北的“剿匪者”

自从张学良于 1935 年 10 月把东北军带到西安后，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就揭开了新的一章。东北军——这个中国最激烈的抗日军队，当时的调动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当时，使地方官员感到恐怖、南京政府感到恐慌、并引起华北日军参谋部为之哗然的，则是绣着黑色锤子和镰刀的鲜艳红旗在陕西西部边境的出现，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红军主力先头部队的向前挺进。正是为了应付这一挑战，张学良才被派往北方。

1935 年热河的大溃败使中国失去了两倍于奥地利的领土，日本的太阳旗插在了雄伟的长城垛口上。在此之后，张学良灰溜溜地去了国外。早就有人认为：人们之所以常常把这类事件的责任直接归咎于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如在 18 个月前的满洲事件)，与其说他是个懦夫，也许还倒不如把他看成是受一种蛮横无理的错误政策摆布的工具。不过，他的确为此受尽了耻辱，因而在热河事件之后，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张学良痛下决心，彻底戒掉了鸦片瘾这个危急时刻他最可怕的敌人。这是他朝着关心政治的发展方向迈开的第一步。而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他要在我们时代的两个极端的政治信念——法西斯主义和

共产主义之间实现完全的过渡。

张学良带着包括其妻子、三个孩子，以及他当时的密友、意大利前驻上海总领事，现在则以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乘龙快婿和既定继承人而闻名于世的齐亚诺伯爵等一行人离开了上海。他们直接来到了意大利，在那里张学良逗留了好几个月。他会见了他所敬仰的墨索里尼，并驱车沿着新建的公路游览，沿途见到的“组合国”④所取得的实质性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德国，他会见了希特勒和格林将军，他们给他留下的印象不那么太好。他访问了法国，并与李维诺夫②偶然邂逅相遇。由于张学良当时在政治上还不是很成熟，因而非常渴望访问苏联。但他的这个想法似乎并未受到鼓励。对于李维诺夫与张学良的邂逅相遇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张学良曾要求在他访苏途中，他愿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一要求未得到允许，而他则反对对他的行踪附加任何其他条件限制。除此而外，还有一种更为接近事实的说法，说是苏联当局担心：如果邀请“满洲”的前统治者到其国内访问，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远东关系。不管怎么说，这位少帅终归还是没能去成苏联，有关他曾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

他这次旅行的最后一个月是在英国度过的。这个国家——继意大利之后——似乎对像他这样的现代“国际公民”产生了最强烈的诱惑力。张学良在布赖顿租了套房子，把孩子放在那里上学。不久又来到伦敦，居住在多切斯特，并会见了一批著名人物，其中包括黑尔什姆爵士、阿斯特夫人，以及拉姆斯·麦克唐纳先生。在他的整个旅程中，少帅似乎又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要夺回他已逝去的青春。然而，他此行所得到的许多印象却只有在以后的岁月中，才能够搞清楚。从他归国后所拍的照片上看，他是一个身着苏格兰粗呢制服的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张爱好的运动项目是打高尔夫球)，看上去至少要比满洲时代的那个蓄着长长八字胡，形容消瘦的张学良要年轻十来岁。

从欧洲回来的张学良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了吗？由于西安事变后有许多关于他在这方面的传闻，而他在归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显然倾向于支持在中国搞独裁统治，因而这个问题是饶有趣味的。毫无疑问，

当时他曾对“元首号令”坚信不移。对他来说，中国的唯一领袖(他对此从未动摇过)就是蒋介石。但问题在于，更确切地说，就是蒋介石究竟会成为哪种类型的领袖。在少帅归国伊始发表声明中，有这么一段话，说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径是拥护领袖”。这番话说在1934年初，适逢“福建叛乱”刚刚发生，领袖当时正在全力以赴地指挥着大轰炸——用那些从未被用于抗击日本人的飞机扔下的炸弹，来轰炸“英雄的十九路军”的残余部队。这支部队两年内在闽北打仗异常英勇，但是勇而无谋。回国后不久，这位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便被任命在河南、湖北和安徽这三个“核心省份”担任剿匪司令职务③。

张学良的这个新头衔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所谓的“匪”，自然指的是中国的“赤色军队”和“赤党分子”——迄今为止，“共匪”一称呼任何一个共产党或任何一支“中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成员的通用名词。在1933—193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的“苏维埃”已经在江西南部 and 福建省内巩固起来，并将其首都设在瑞金。在其余六个省份里，也都存在着共产党的武装。而生活在“中国苏维埃区”内的人口总数，据估计则有六千万以上。既然“剿匪”是南京政府的国策，张学良的新岗位便非同寻常了。1934年春，他在武汉扎下了大营。以后，立即开始训诫其部下所有军官，以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为其天职。但过了没多久，他发现自己对许许多多的问题都还并不明白。

1934年，是对共产党发起大规模攻势的一年——这就是所谓的“第五次围剿”。在这次战役中，南京政府投入了它能够征集到的最为庞大的陆空军力量。蒋介石决心要在这一年内彻底剿灭共产主义运动，从江西的“赤色”根据地开始。东北军也参加了这次战役，但他们的心思却不在这里。要他们去驱赶自己的同胞，而他们本身就是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因而也同他们那位逍遥自在型的司令一样，对执行任务一点也不热心。自从他们甚至连一枪都未放便撤出东北之后，不信任的种子便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萌发。只有一种战斗能激发他们的兴趣，这就是打回自己的老家去。

在中国，关于“第五次反共战役”的故事是人人皆知的，然而在

国外，也许就不那么为人们所熟知。在此之前，漫长而损耗巨大的反共战役就曾进行过多次，每次均以失败告终。乡村地区特别适用于共产党的那套打法，他们能够以比任何进攻部队快三倍的速度迅速转移。而在所有地区都和他們站在一起的人民，则会和他們一道重新杀回去。南京当时的计划是把主要“苏区”割裂开来，实行全面封锁。并尽可能不断地调换进攻部队人员(因为与红军接触的南京部队时间一长，便会染上一个致命的习惯：反正投红军)。这次围剿规模极大，事实表明是无法抵御的。

蒋介石把他的司令部建在了南昌。它是江西省的省会，也是六年前朱德领导的那次轰动一时的起义的发源地。正是通过这次起义，中国的红军才得以创建。为了进行他的“第五次围剿”，委员长动员了近百万军队，其中至少有一半被直接投入战斗。南京政府所拥有的全部军事力量——这些军事力量在一年前日本入侵热河时极其可悲地未曾用于保卫国土，此时却被投入到反共战役中。德国军事专家制定作战计划：重炮、坦克、飞机在轮番轰炸，毒气也被用到了地面攻击中。与此同时，绕着“苏区”撒布下一条钢铁索链，随着新的公路和碉堡的兴建，它的范围愈来愈狭小，最终围住了“赤色”首都。这次战役所消耗的成本大得无法估量；而生命的损失，特别是农民和非战斗人员的损失，则更骇人听闻。至于红军，他们在过去曾顶住了无数次的围剿讨伐，此番却未能坚守住自己的阵地。

然而，如果说“第五次战役”的目的旨在彻底消灭中国红军，那么，就不能说它是成功的。红军被赶出了他们占据并守卫了五年以上的根据地，但他们的军队并未遭到破坏。他们通过一次赢得各国军事专家一致赞美的大转移，逃出铁链，进入了湖南，并开始了那场现已载人史册的著名“长征”——总有一天，这次大进军的全部曲折经历将会被讲述，它是一次无与伦比的传奇经历。从福建边境到遥远的西北，途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和甘肃诸省，这支总数不到十万人的军队整整挺进了七千多英里。他们不停地且战且走，并不曾真正停下来喘口气，而是突破了到处都有拦截他

们的敌方军队的占领区。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够保持领导机能的完善，有严明的纪律(尽管他们失去了一半的人)。到 1935 年秋，他们的先遣部队才抵达陕西北部，并在那里与自 1933 年以来一直占据着这一带的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会师。

值得我们重视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次挺进西北所采用的政治战略。早在 1932 年，设在江西的苏维埃政府就公开对日本宣战。当她处在南方偏远的山区时，做出这一姿态看似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一旦开始了这场伟大而艰苦的征程，则这一姿态就有新的含义了。撤出江西，从他们苦心经营了多年，正在向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迈进的地区撤出来，无疑是一次退却，而且也不难证明这次退却是灾难性的。然而凭借其杰出的野战战术，这次撤退成为他们最有说服力的一次教学实例，证明了红军是有军事优势和战斗力的。不仅如此，通过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这次北上运动又变成了一次奔赴抗日前线的坚决行动。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个宣言，建议创立一支抗日同盟军，建立“国防政府”。本来是一次混乱不堪的大溃败，就这样一变，成了一次胜利大进军。中国西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对日本的政策来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自从满洲和热河为其所征服之后，日本军事渗透的方向一直是在朝着向内蒙古方向发展。它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想通过外蒙或新疆在西北和与苏联有任何可能的联系的地区之间，插进一个楔子。将西北置于其控制之下，就能够确保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并在与苏联一旦发生战事的情况下，有效地维护其交通运输线路的安全。对此只消看一下地图，便会一目了然；由所谓蒙古“游击队”在 1936 年对绥远所发动的入侵(这次入侵提出“蒙古独立”的口号，受到了居住在“满洲国”被强拉入伍的中国农民伪军的支持)，则只不过是这种总战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对历史学家来说，日本政策的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的一贯性。尽管日本国内政府的更迭会对其既定政策的实施速度产生某种影响，但日本军国主义者“大陆政策”的基本要求则是一成不变的。在完成了对满洲的占领之后，对华北和蒙古的有效占领便是其下

一步骤。1936 年夏，有一份非常耐人寻味的文件在中国广为流传，这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松村谦三报告”。该报告详细讨论了上述所有问题。如同著名的“田中奏折”传出后的情况一样，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和无法证实，然而它是那样地接近于日本政策的现实，以至看上去几乎完全出自真人实事。该报告提出，要采用间接手法继续执行“满蒙政策”，例如在蒙古人中间搞“独立运动”，要在中国的军阀中鼓励搞强权政治。该报告有一特点尤其值得重视，这就是它将其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来到陕北的红军上，给其冠以“帝国的主要敌人”这一显赫的头衔。当中国的所有官方舆论工具都在竭尽全力大肆贬低共产党在陕西、甘肃和宁夏所建立的新基地之重要性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因此而上当受骗。要想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继续维持“睦邻关系”，剿灭共产党已成了一个基本条件。

这一形势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早在他们向陕北的目的地挺进的时候，就为红军所预见到了。飞越四川河流，穿过西康山隘，他们一路北去，且走且战，一直来到汉族的发源地、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土高原为止。他们坚信：一旦他们来到能够打击日本的范围之内，他们就能够在民族抵抗的统一战争中，依靠全国人民作他们的后盾。看到这一危险的也不仅是日本人，而且南京政府中的那些昔日曾十分成功地避免了与日本发生战争的人物，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阻止红军与日本人或日本人在内蒙豢养的伪军发生战斗接触，南京政府采用了除与日本联合采用军事行动外的一切手段。闪耀在西北的红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935 年红军进行的“长征”，对张学良来说也是决定性的。他呆在设在武汉，深处内地的舒适的司令部里，似乎仍能听见日本侵略者所掀起的浪涛。他也和全国人民一道感受到了日本侵略渗透所激起的接连不断的震动。六月份私下签订的“何梅协定”是个奇耻大辱；张学良掌握了有关这一协定的十分精确的情报，很快便将这个臭名昭著的协议的全部条款，刊登在了西安的报纸上。对他过去曾公开表示坚信不疑的英明政策的怀疑情绪，开始困扰着他。当时，他在汉口曾说

道：“我们中的一些人劝我接受不抵抗政策。然而，我希望上级将会改变我的职责，从执行剿匪任务，变为积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我们在目前这种剿匪战役中做的任何牺牲，都不如在抗日战场上所做的牺牲那么值得。”此后接踵而来的是“凛哈尔危机”，当时宋哲元在日本人压力下，辞去了职务。张学良对此又一次感到异常愤慨，并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九一八(沈阳事变当天)之后，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相信哀求‘国联’和祈求别的一些和平协议，希望他们能够解救我们。当我们在事变发生之后撤出来的时候，我们曾寄希望于外来的帮助，现在这一切迷梦都已经消失了。事实很清楚，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我们只能在死亡中求得再生。政府现在就应该调集全国的所有军队去抵抗日本。”

张学良的上述言论是很有意义的。它表明：即使在去西安之前，尽管对蒋介石还保持着个人的忠诚，然而此时的张学良正在逐渐成为“中央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批评者。同年十月，命令下达了，要他率军赴西北，迎击新近抵达那里的共产党部队。当时他似乎听信了南京政府的劝告，认为“剿匪”是走向抗日的首要步骤。

刚到西安，张学良特别急于在反共战役中取得战果，因为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他已被指控为玩忽职守。他下令立刻发动进攻。然而，他的军队在连续两次的交战中均遭到惨败，这时他才从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的两个最优秀的师，101师和109师被输给了红军；两个师的师长也在战斗中分别阵亡。

这就是张学良领导的对红军的最后一场激烈的战斗。到1935年底，事实已使他清楚地认识到：靠正面进攻是无法战胜红军的，并将他的这一看法如实地反映给了南京。东北军虽然还驻扎在西北，但针对红军的挑衅行动则逐月递减。在东北军和红军的普通士兵之间，一种类似停战的局面业已形成：稍后不久，这种局面也开始从“剿匪司令部”那里得到了默认。共产党所使用的口号中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成效最大，这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士兵逐渐认识到，红军和他们一样

主张抗日；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给他们一个赴华北迎击日本的机会，而东北军正在奉命阻止他们实现这一要求。因此，对东北军来说，这句口号具有无法抵御的影响。

对少帅来说，有几件事情变得愈来愈清楚了。首先，他开始怀疑蒋介石把东北军派到西北和红军打仗的部分动机，是想要达到最终彻底瓦解东北军队伍这个目的。起先他所率领的这支 15 万余人的东北军，现在已被割裂了开来；它的炮兵被分散在各地；部分军队还留在河北，由万福麟指挥。在 1935 年最后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发生之后，张学良得不到任何兵源补充；他的军队饷金不稳定，而且在南方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从五千万美金的美国“麦棉贷款”中，他们也没有得到那么多超额的后勤供应。即便张学良当时还不觉悟，他的幕僚和青年军官也会立刻向他指出：南京一再所玩弄的，是它在过去使用过程中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战术手腕，这就是：分化、瓦解甚至彻底消灭潜在对手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很难转化为“中央政府”的亲信嫡系。

张学良也逐渐加深了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全部问题的理解。他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过去的历史；他从那些曾被红军俘虏，然后又释放回来的部下口中，了解到“苏维埃”区域内部的真情实况。同年 6 月，他会晤了红军的主要政治领导人之一——周恩来，这位后来在西安舞台上光芒四射，在促成问题解决方面也许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的杰出人物。最主要的，张学良大概是听信了他的一位叫高福源的团级指挥官。他在年初为红军所俘虏，在“苏区”逗留了几个月，然后自告奋勇积极地回去把红军的组织训练，以及他们要求建立全国抗日人民阵线的新政策报告给了张学良(以后，在这次兵变被粉碎之后，这个高福源成了南京军队进驻西安时的首批牺牲者之一)，张学良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促使中国青年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士兵们跨入共产党行列的主要因素，正是出于对南京的对日政策的强烈不满。

在共产党方面，自从公布了实行民族团结阵线的新政策以来，一

直潜伏着在静待时机。1936 年初，约三万红军武装人员曾进入山西西部，而且几乎抵达太原。然而，这次行动充其量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征讨，而并无别的目的；同时也是红军为宣传其新政策而发起的一次武装示威活动。在这次行动中，昔日的反国民党标语已为支持民族防御的标语所取代；如同其早在 1935 年就曾做过的那样，共产党的宣言完全集中在民族抵抗问题上。红军在撤出山西时，带走了大批缴获的军火；这次战役中他们基本上没有没收私人财产。1936 年 8 月 1 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了一项声明，对团结阵线问题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与此同时，东北军和红军业已达成了一项友好的合作协定，而张学良也成了后者所倡导之政策的热情支持者。我们可以看到，在双方协定中有两个核心内容，与张学良自从在满洲继承父位后便一直倡导的政策完全相符合——这就停止一切内战，统一国家以抵抗日本侵略。

第一次败于红军手下以后的几个月里，张学良所扮演的仅仅是个消极的角色。但是现在他开始变了，他开始积极投身于组织各党派结成联合阵线的工作中，积极开展救国运动。西安成了抗日宣传中心，而对于这种抗日宣传，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均要受到南京政府的严厉镇压。东北军想抗日想得发狂，于是张学良在距西安不远的王曲，设立了一个“特别军官军事训练营”，开有政治和军事战略等课程。一大批受过训的激进东北青年军官和文职官员，牢牢掌握了这支军队的中下层统治权。过了不久，从沈阳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的一部分，迁到了西安，又形成了一个爱国宣传中心。除此而外，“少帅”还从北平邀请了约二百名学生来到西安，组成了“特务团”和“政治训练学校”，由孙铭久领导。到了 1936 年秋，在西北的首府，一个影响极大的可以充分表达抗日愿望、组织抗日活动的基地已经建立起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逃不脱委员长那双警惕的眼睛。他开始感到必须严密监视西安的动静。国民党在西安的首席代表，是陕西省省长邵力子。邵是个“忠诚”的官员，完全可以信任；但他没有军事实力，仅掌握着为数不多的“特务”和“宪兵”——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秘密

机构“蓝衣社”的一个动听的别名。该组织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接受命令，对全中国所有左翼团体采取残酷镇压行动。此外，该省“绥靖专员”杨虎城拥有四万人的地方部队，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战斗力量。邵省长惊恐地注视着杨虎城和张学良的日益接近；张学良的军队已经和红军宣布停火。警报沿着电信线路从陕西首府传到了南京。

以上是十月下旬的形势概况。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飞抵西安来调查问题。“少帅”再次与他的上司当面争论他过去曾一再重复的那个问题：他的军队不愿打红军；他们叫嚷着要求命令他们开去打日本。特别是蒙古“游击队”对绥远的入侵，使南京政府有了一个实施防御反击，挺进热河的良好时机。张学良争辩道：既然他们也是爱国的中国人，并愿意调转枪口，抗击民族的侵略者，为什么不可以和红军达成协议呢？甚至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似乎还是完全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在他对军队指挥官和王曲军校学员所做的几次演讲中，仍旧坚持他关于打日本是疯子行动的论点，认为近在眼前的敌人，东北军必须予以打击的敌对分子，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

正当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透过南京政府的外交皮影戏，欢欣鼓舞地沉浸于“保卫绥远”和对日本实行“强硬化政策”的爱国热潮之中时，蒋介石却从容自得地为在西北发动一场新的反共战役而加紧做着准备。鉴于东北军显然已经不那么可靠，他开始将他们撤到一边，调进他所信赖的“中央军”。蒋介石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第一军的胡宗南将军，奉命向北挺进，开始向红军发动东北军延搁已久的武装进攻。11月初，胡宗南开始逐渐进入甘肃。

然而，即使是这些嫡系部队，在此民族危亡关头，也很不乐于执行剿杀共产党的任务。他们起先被带到北边，还当是被派去作为开赴绥远的援军。当他们明白了他们是要向西开拔而不再向北去的时候，他们的长官答应给他们发双饷。胡将军极其小心地进入到“苏维埃”区域 80 里的地方，却不曾见到过一个红军士兵。这时他便开始忘乎所以，从而陷入了在他之前许多和红军交战过的指挥官所陷人的同样圈套中。当军队开入一条无水狭窄山谷之中时，他最精锐的第十师的

两个旅，于 11 月 18 日被红军切割包围。三天之后，红军开始发起总攻，胡将军灰溜溜地败了回去。这次新战役造成了一场不幸的开始。

对于想要在其控制区内的野外战场上战胜红军的困难性，张学良是有教训的。11 月 27 日，他重新又开始恳求委员长：适逢绥远危机处于高潮之即，除非把他的军队哪怕是一部分调至抗日前线，否则他将无法控制自己的军队。蒋把这位纠缠不休的“剿匪者”请到了洛阳，但对他所提的所有问题一概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答。蒋对他说，由于会招致阎锡山的反对，要派往抗日前线的军队不能通过山西。飞机也不能派往绥远，因为气候太冷。但是张学良说，甘肃的天气还要更冷，但这却并没有阻止对那里的共产党实施空袭。然而，蒋介石再次坚持认为，共产党是国家的首要敌人(一种与日本人的意见完全一致的观点)，绝对不能阻止消灭“赤匪”的步伐。张学良在洛阳商定的唯一事情，似乎就是委员长答应很快将再次来西安一趟，接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官。

张学良回到了一个群情激昂的城市。就在绥远急切需要援军的时刻，在全国都相信援军正在被派往绥远去的时候，中国最抗日的军队却接到命令，要他们为另一个对付自己同胞的战役做好准备。西北军队的全体军官，一致双手赞同参加抗日战斗。形势日趋紧张起来。

就在这种风云莫测，抗命情绪几乎难于掩饰的情况下，蒋介石和他的随员于 12 月 4 日早晨从洛阳来到了西安。

译注：

①组合国，亦称“总体国家”，法西斯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攫取政权后，为了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巩固其统治，于 1927 年成立了由法西斯工会、企业主联合会和法西斯党代表共同组成的“组合”，宣称它是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者，是“各阶级合作”的组织。在 1933—1934 年期间，全国各经济部门建立了 20 多个“组合”，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组合会议”。1938 年改成“法西斯组合院”，解散了国会，形成高度集权统治。

(多李维诺夫(1876—1951)，苏联外交家，1930—1939 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

③1934 年 2 月，张学良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三月就职后，调原驻华北的东北军南下，围剿豫皖边区的工农红军。

## 第九章

### 仲冬兵变

西安以人们认可的“新生活”姿态欢迎委员长的到来，条条街道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名黄包车夫，都给配发了一身蓝、白色相间的外套，标有各自的姓名和号码。火车站附近的北城门上，挂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支持革命领袖蒋介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标语牌经过了此后两个月的风风雨雨，居然保存了下来，在这座“叛乱”城市最终重新被南京军队占领时，又把它整治一新，用来欢迎南京军队。

通往蒋介石预定驻地临潼的公路，被数百名劳工苦力修理得平平展展，以便于他的轿车行驶。在古老的华清宫庭院内，人们经过两天狂热的忙碌，给所有的木制品涂了一层油漆，使它焕发了新的生机。室内也架设了电线，安装了电灯、电话。安乐椅被从市内运来了，在杨贵妃昔日的楼阁里，为委员长备下了许多连她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过的豪华用品和家具。

蒋介石随身带着他那支经过精心挑选的 45 人卫队。为了加强卫队的力量，又从洛阳行营仔细选拔了 50 个人，组成一支部队，驻扎在华清池。住在宫内招待所的客人、生活在周围的农家，都在接到通知后的一小时之内，匆匆搬到了别处。在他的几个最亲密的助手——侍从副官钱大钧、侄子蒋孝先和其他几个人的陪同下，蒋介石移驻进

这座寺院式旅馆。

至于其他的人，包括他的一些最优秀的将军和最受信赖的顾问在内的其他随从人员，则被安置到了“西京招待所”。这是该市唯一的现代化旅馆，当时住在该旅馆的还有来自“满洲”的著名骑兵统帅马占山将军。他曾诱使日本人在“满洲国政府”中给他安排了一个部长职位，然后带走两百万美元，继续投入“义勇军”的工作中去。因其坦率直言而引起天津日本人关注的东北军指挥官于学忠此时也在这里，他早些时候于《何梅协定》签署之后，被蒋介石下令调往甘肃。

在随后几天的座谈中，双方的分歧变得日趋明显。蒋介石现在只有一个想法，这就是继续进行新的反共战役。少帅和他的助手，包括陕西的杨虎城将军、甘肃的于学忠将军等人，则力主停止打共产党，开赴前线打日本。这是一个陈旧的争论话题，就这个话题委员长和少帅已经持续争论了不下一年。蒋介石坚持认为：国家统一的重要性要超过任何形式的抗日行动。在他的心目中国家的统一对他来说，首要的就是对“赤色军队”的强行镇压。张学良则极力辩解道：红军现在准备与南京政府合作抗日，这些“匪”是根本不可能在一次战役中被镇压下去的。正因为如此，与他们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全国抵抗的统一阵线则更为可取。

不难看出，上面所谈到的纯粹是选择某种政策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这种事情都会在公众中引起争论，直至家喻户晓，人人参加，才会通过舆论界的彻底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然而中国并非是一个民主国家。即便是在国民党官僚统治下的仁义“训导”时期，也不会放松到允许各阶层人都来公开讨论国家问题的程度。参加这种讨论的一方——官方——的观点，人们已经听得够多了，许多人都已经听腻了，人家怎么说，就怎么相信：共产党是靠谋杀和抢劫为生的非人的妖魔鬼怪，他们是中国统一的死敌；在积极的对外政策得以实施之前，一定要将他们斩草除根。张学良则认为，完成统一，除了损失巨大，并使内战绵绵无期的办法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他这种观点至少是很符合情理的。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可能在南京公开提出的

问题。

在此时此刻，也正如事态所早已表明的，许多人还真诚地相信：中央政府在准备实行积极抵抗政策，甚至还要在绥远发起反击。而张学良和他的朋友们对此认识得更为透彻。他们看到，在绥远的中央军三个师集结在该省东南边境一线，远离其所应到达的前线阵地，但要用于调过头来对付红军，则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他们看到，数不清的食品、武器、弹药和汽油在往西北聚集，摆放在西安以西的陇海铁路线上。他们更清楚的是，尽管每天日本飞机都在轰炸中国军队和村庄，被派到绥远的却没有哪怕是一架南京政府的飞机。然而现在，随着委员长的到来，他们看到 80 架南京最新式的轰炸机——由为保卫国家的爱国者募捐捐助起来的“生日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随时准备发动一场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进攻。

已经没有丝毫的怀疑了。蒋介石到西安来，并不是想要讨论他们的请求。他之所以来这里，是要亲临监督使反共战役得以开始。

在这个时候，把这样一种政策公布出来，任何一个熟悉东北军情绪的人，都会认识到它所存在的危险。毫无疑问，蒋介石肯定在这方面判断严重失误，他过低估计了在西北地区他自己的军队中间对发动反共新战役的反抗情绪。当然，他也知道是存在着一些反对派，但在他的心目中，他认为他完全可以控制局势。所以，他总是仔细避免集体会面东北军指挥官，只是对他们做个别谈话，力图使他们同意他的观点。下面是他得到的一些回答：“蒋委员长，俺娘被日本人杀了；俺的俩兄妹惨死在满洲……”“俺爸被日本人用刺刀挑了，尸首在村外一直还没掩埋呢。”“委员长，我们必须服从您的命令，直到今天也没变样。但我们决不想再和自己的同胞打仗了。我们一定要打回自己的老家去，那里呼唤着我们，也需要我们。”对每个指挥官蒋介石都重复着同样的回答：“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打日本的程度；你们的首要职责，就是消灭红军。”这些谈话均以失败告终。

所有爆发危机的因素在陕西的首府都已经形成了。而且再次——

如同近年在中国所频频出现的那样——事情的触发点是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12月9日，星期三，是一年前北平学生运动的周年纪念日。那是为抗议日本在华北五省精心策划发动“自治运动”而爆发的一次成功的运动。就在这一天，在西安有来自东北大学和各中学的数千名学生，一大早便游行穿过街道，请求向绥远派遣援兵。学生们未能见到张“少帅”，便前往省政府所在地，邵力子省长要他们无须担心国民党的爱国诚意，并告诫他们要服从校规校纪。他们拜访了绥靖专员杨虎城，依然一无所得。在西安市内受到挫折后，他们决计游行到临潼，面见委员长本人。

得知这一情况后，地方政府官员慌了，竭力想劝阻他们不要这么做。警戒在一所学校外面的警察奉其局长马志超之命(马志超也是直接听省长邵力子指挥的)，对游行队伍开了火，重伤了两名中学学生。这一行动更进一步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情绪，大约四千多学生强行通过东门，准备步行到临潼请求清算这一罪行。这使形势开始变得严重了起来，因为在中国，只要敢对示威游行的学生开枪，肯定要引起动乱。一听说发生了射击学生事件的消息，张学良立即驱车追赶游行队伍，就在昔日古长安的帝王与其部下将相经常惜别的那座跨越“渭河”的著名桥梁——灞桥之上，拦住了学生。在这里，他面对这群情绪激动的学生们发表了演讲，请求他们返回市内去。对于他们的请求，他将在一周内(他许诺道)给以满意的答复。

人们心潮澎湃、情绪激昂，特别是年轻一些的东北军军官。就在次日——星期四——西北方面的军事指挥官和蒋介石的随从军官举行了联席会议。与共产党的战争必须进行下去，南京方面的人对此寸步不让。要是张少帅及其军队不愿合作，就要把他们调往南方去。这位与“匪”友好相处的“剿匪者”的差使，业已由委员长最宠信的支持者之一蒋鼎文将军所正式取代。据说，重新发动反共战役的新命令将于12月12日在西安公布，事情已经不存在丝毫的回旋余地了。

这是兵变的前夕，对此甚至蒋介石都似乎有所察觉。星期五这天，他命令配备一辆专列，为他次日的离去做好准备。发动反共战役的新

军令也将与此同时下达到部队。不过他已经不可能乘上这辆专列了。

就在星期五夜间稍晚一些的时候，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和青年“激进派”的一些文职官员。出席这次午夜秘密会议的 13 个人做出决定：抢在反共新战役发动之前，先发制人，逮捕蒋介石及其所有随员。

“少帅”严令要把蒋介石活着捉回来，这项棘手任务被交由他的年轻警卫队长孙铭久执行。孙铭久指挥着东北军的特务营，该营包括部分最近来到西安的北平学生。杨虎城的一个与此相类似的特务营被派去包围西京招待所和市内的其他重要据点。整个兵变在一两个小时内便策划完毕，然而却具有经过相当深思熟虑才能提出的效果——事实上，那些青年军官把全部心思一直用在现在这个时刻上。总攻发动的时间就定在即将到来的早晨六点整。

12 月 12 日，星期六清晨，曙光尚未破晓，西安的许多人被持续不断的激烈的锣声惊醒，随之而来的是从市内各处传来的枪声。由于招待所的房子建在内院后方，易于被隔开，因而在两三点钟时便被包围了。早晨六点钟，杨虎城的部队冲进去逮捕了蒋的随员。住在旅馆客房里的外国人看到门窗被子弹射落和恶狠狠的士兵突然破门而入，吓得惊慌失措；在楼梯平台上也有子弹飞舞；楼梯上鲜血流淌。然而令人感到惊奇的还是它的圆满结束——不曾出现过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而且除了微不足道的伤亡外，蒋介石的全体随员均被俘获。人们在流传着一些关于蒋介石手下第一流的将军们在被捕时的表现，不是说他们怎么怎么勇敢，而是说他们如何如何胆小怕死。在中国，好在这类事人们都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了，所以很快便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与此同时，该市的重要据点——国民党总部，铁路与电报局，以及特务中心(即“蓝衣社”秘密机构的“老巢”，连同里面的文件和无线电台)都被包围并占领；“公安局”——这是为警察站起的一个冠冕堂皇的中国名称，也被包围了起来；省长邵力子被抓获，他的妻子——

——一位前共产党员——在试图促成他逃跑时伤了手指：在机场那边，南京开来的所有轰炸机均被缴获；受命看管住飞机，使其无法起飞的陕西军队，只知道用刺刀扎捅飞机的油箱，再无任何良策。最后还是——一位南京的驾驶员提了个较好的办法，拿开内燃机火花塞，才解决了问题。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只有委员长的特务做了一点抵抗，但也未能持续多久。两小时之内，西安便牢牢控制在了兵变者手中。

然而，这一切行动的核心关键，则是抓获委员长。此时此刻，临潼的情况到底怎样呢？

一开完 13 位谋反元凶的午夜秘会，张学良的那位卫队队长便径直来到三天前张学良曾对着大批愤怒的学生发表谈话的那座横跨渭河的著名桥梁——灞桥之上。从东北军特务营挑出来的二百名战士，正在此等着他。孙铭久简明扼要地向他们讲述了包围蒋介石行营的行动计划——这是一次不合适的谋反行动，但他们却欣然接受了，他们静静地登上卡车，向临潼开去。

东北军早已占据了华清宫的后山头，这时开在前面的第一辆卡车突然不顾一切地朝着通往寺院的那条柳荫大道冲了上去。在门口值班的有三个哨兵，他们向卡车发出喝问，接着开火，然而很快便无声无息了。东北军战士拿下了第一重院子，蒋介石的大部分卫兵还在沉睡，突如其来的袭击使他们猝不及防。由于处境不利，他们基本上大都没怎么抵抗便被消灭了。

头道门的战斗结束之后，孙铭久带着他的部下迅速来到蒋介石下塌的内院。他们打破门窗玻璃向里看，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第一间屋子里空无一人，在蒋介石睡眠的第二间屋子里，他们发现了胡乱丢弃的睡衣、鞋子、制服和一顶帽子——但却见不到委员长。蒋介石已经逃走了。

通过寺院围墙的旁门只有一个，这个门在后院，直通骊山山脉那裸露的山坡。听到第一声警报之后，蒋介石肯定立即忙不迭地穿过这道后门，或翻墙逃到了山上。东北军沿山散开四处搜寻。

此时在寺院的下方，围绕着莲花池，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着。在第一批被俘的南京军官中，有一个是蒋介石的侄子，臭名昭著的“蓝衣社”头子蒋孝先。当东北军战士认出是他时，立刻将他就地处决了。寺院围墙内有近百名精选出来的政府军卫兵，但他们士气低落，没人指挥，也无路可退。他们还有六挺机关枪，也没把这些机关枪投入战斗，如果他们毅然决然地把这些机关枪掌握在手的话，完全有可能把进攻部队阻挡几小时，但没人真的决心抵抗。在蒋介石逃离出去之后，抵抗在他们看来似乎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在其投降之前，蒋介石卫队的伤亡人数还不到 20 个。

回头再看西安。在少帅的指挥部，电话机周围簇拥着一群情绪激动的官员。市内的一切都进展顺利，但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委员长的命运。早晨八点左右，到这时人们的精神早已经高度紧张，从临潼打来一个电话。寺院已被占领，但蒋介石本人却逃了出去。刹那间仿佛出现了一片惊恐。

与此同时，孙铭久和他的部下正翻过冰封雪冻的岩石，趁着朦胧的晨光由山下向山上搜去。骊山的小路四通八达，对各条小路进行的搜索均毫无结果。在条件如此困难的区域内，要说蒋介石会走多远，显然是不可能的。到了最后，搜索者们试探着往寺庙东边的一条山谷找去，这条山谷连小路都没有，只有裸露在外的山石和深深的积雪。此后不久，从山腰便传来了喊声，说是有了新发现。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在往山坡下方移动的时候，为搜捕者们所发现。他的主人距此也不会太远。

通往这个峡谷的中途，有一块暴露出来的巨石悬挂在一块石板岩上。如同这座历史悠久的山脉的每个其他地点一样，这个地方也有其历史意义，它以被称作“虎攀石”或“虎石”而闻名。也正是在这里，藏身在山隙石缝间的蒋介石(注)终于被发现了。他穿的睡衣上只罩了件浅色中国式长袍，赤裸的手脚也在昏天黑地逃窜时被刺破挂伤。寒冷和过度疲劳使他浑身颤抖不已，贴着潮湿的岩石缩做一团。交火射击的枪声此刻也许依然回响在他的耳旁。

孙铭久以他的正式头衔，称呼他为“委员长”。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一称呼本身就是莫大的讽刺，可是在孙铭久的话语里并不含有丝毫讽刺意味。然而蒋介石的回答则像是一个绝望者的回答。

“如果你是我的同志，”他声音嘶哑地说，“现在就把我开枪打死算了。”

“我们决不对您开枪！”这位年轻的将领神态自若地说道。“我们只要求您领导我们的国家抗击日本。到那时我们将第一个为我们的委员长而欢呼。”随同的东北军战士一致喊出了他们同意的呼声。

但蒋介石依然赖在那块石头上不走，费力地说：“把张帅叫来，然后我才下去。”

“张帅不在这里，”孙铭久答道。“军队在市内发生了叛乱，我们到这里来保护您。”

这段话编的并不算天衣无缝，但看来却使这位委员长大松了一口气。他请求来匹马把他驮下山，因为他的脚伤在流血，并被冻得发紫。

“这里没有马，”孙铭久说。“但我可以把你背下山去。”于是他在蒋介石脚下的雪地上跪了下来。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面，它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传奇故事。略微迟疑了一下之后，委员长接受了这番善意之举，表情痛苦地爬到了这位青年军官的背上。后者犹如一名现代圣·克里斯托弗斯<sup>①</sup>，神态庄严地驮着他往山坡下走去，直到一名侍卫拿着蒋的鞋子赶来。归途的其他时间，蒋介石在众人的簇拥下徒步而行。

华清宫此时完全安静了下来。大约在九点钟，西安方面急切期待的这则消息方通过电话传了回去。张学良司令部里持续了数小时的紧张气氛才变得缓和了。兵变取得了成功。

蒋介石被俘后，表示希望能返回他在寺院里的居室。但他被告知说，这些屋子在战斗时已遭到毁坏，如果他住在市内，就会感到更舒

适和安全一些。最后这一点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离开他的警卫，这位军事独裁者的生命就会变得一钱不值。

这一小批人下山之后，在公路上乘坐上汽车。蒋介石表现得格外克制，甚至拒绝别人好心给他披上件大衣。他好像没心思和人谈话。与此相反，孙铭久却非常想和他聊几句。

“过去的事过去了，”孙铭久说。“从今往后，一定要为中国制定一种新政策。”

“我坚信，”委员长冷冷答道，“你们的张帅关于中国已经有了一条绝好的政策。”

“目前正处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孙铭久开始反击，“我们希望委员长能接受人民的请求。”

“我一直在准备考虑张帅的请求。”

“中国的一项最紧迫的任务，”孙铭久继续说，“就是要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正是西北人民的一致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反而下令攻打红军呢？”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打日本。”蒋恼怒地说。

“但东北军所要求的是您尽可能快地打日本，因为他们的家园被敌人强占了，而全中国人民都在为他们的损失而感到痛心。”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开始强硬起来。“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没有错。”

“既然你代表中国人民，你为什么不抵抗日本，这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要是你不按他们的意愿行事，你又怎么能够声称自己代表他们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一种大概蒋介石多年来从未听到的逻辑推理。他本来还可以使用对付国民党政客的那套狡辩术与之抗辩，但在这里却全然用不上。直到这个时候，他大概感觉到他多少接触到

一点实际情况。

“我是革命者，”他大声宣布道。“我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即使你们把我投入监狱，我的精神也决不会屈服于他人。”

说完这句话，他便一言不发了。

在那些过于自负而不肯接受失败的人中间，也总有某些令人敬佩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在他这种过于自负中，人们才看穿了蒋介石的弱点：他丝毫听不得批评，根本听不进去广大同胞的一致意见。谁要敢于当面告诉墨索里尼真理，他就有可能难免遭到绑架。但蒋介石不是法西斯独裁者(虽然也许有人一度曾乐于把他塑造成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本人对此可能也并非不情愿)。他凭借精心着意使自己超然于党派之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并经常为其行动负责而维持了自己的权势地位，直至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他从来没有失去过在幕后对许多傀儡人物的多方有效控制。只是当他在西安处于无能为力状态的那段短时期里，他才有点惊愕地了解到关于他的支持者们的许多事情。

对于张学良的行动，也只能用这样一种理由来解释：舍此再无其他办法能够把他的处境昭示于国人面前。到现在为止不难看出，此次兵变没有夹杂他的丝毫复仇动机。这是因为，在震天价响的枪声消失之前，再往骊山上多丢一两具尸体，实在太容易了。蒋介石在西北的敌人就够他受的了；在中国还有许多对在上海、武汉和广州大屠杀念念不忘的人。他们会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那天早上孙铭久在虎攀石边得到的那个机会。但暗杀并不是西安事变的终极目的，像张学良(他曾经试过那种暗杀手段)这样的人大概也明白，暗杀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对于像孙铭久这样的一些更为年轻气盛的人来说，则理解不了。西安兵变是一次武装示威行动，因为除此而外，采取其他形式的任何抗议，都难于奏效。不仅如此，它还试图导致国家政策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如果这种转变是任何一个普通人所能做到的话，那当然很好)则完全系于作为中国统一的领袖蒋介石一个人身上。反正不管

怎么说，采取这个行动!的确要冒很大的危险。但蒋介石的死却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是用任何报复行动都无法自圆其说的。

临近午时，委员长被带到了“新城”内为他准备的新住处。在西安的帝王时代，这里曾是前唐朝宫殿的所在地，现在则是“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古城堡。蒋介石神情极其沮丧地请求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会儿。“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他一再对孙铭久说，“但现在请你离开我，我们毕竟今天才初次见面。”稍后不久，“少帅”来拜访他这位非同寻常的俘虏。他毕恭毕敬地走进屋来，鞠着大躬，满口在西方人听起来稀奇古怪的中国式道歉话，为他的客人所受的各种各样的痛苦与不安而道歉。

注：委员长的名字：“介石”意思是：介于两块石头之间。

译注：

①圣·克里斯托弗斯，基督教的旅行守护神。据传说是一个身長12英尺的巨人，曾背着耶稣变成的小孩涉过一条大河。

## 第十章

### 西安的阶下囚

陷阱已封盖，蒋介石就在里边。西安人对这一消息所持的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态度。蒋介石的被捕的确是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但总的看来，事情进展得还算很顺利。每个人都在猜测：下一步将会出现什么结局？

西安城内实行了全天的军事管制。店铺上了门板；银行关上大门；整个早晨的商业活动均陷于停滞状态。但到了下午，人们又开始在街上游荡，尽管每个人随时都会被叫住并受到士兵的盘查。基本上没发生过抢劫活动，而且只是在一阵恐慌后，再没有感到惊恐了。

从当时在该市的外国人所提出的夸大其词的报告中，当时的局势被说成是一片恐怖。在这种恐怖气氛中，没有哪个人敢于涉足户外，没有哪个外国人能够免于遭侵袭。而为这些庸人自扰的故事所提出的唯一可能存在的事实根据，则是那天清晨一大早发生的一起悲剧性事件：当时一位年轻的德国牙医温斯·海伯特<sup>①</sup>不听朋友们的劝告离家外出，冒险来到大街上。他一点不懂汉语。当他在一个十字路口被喝令返回去的时候，他听不明白，便径直走进了射击线。他身中三发机关枪子弹，被抬回家里，很快便死在了家中。这是一起最为不幸的偶然事件，西北方面的统帅们对此深表遗憾，同时也为某些人编造关于西安的排外情绪，外国居民的处境危险之类的无稽之谈提供了口实。如果说外国人在西安还有什么危险，那么，唯一处境危险的就将是日本人。所幸的是，没有一个日本人在西安。在西京招待所，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像日本人的中国房客，在其真实国籍还没有被弄清楚之前，脸上便挨了一枪。一些外国人——特别是那些正巧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外国人——曾遇到过一些麻烦，但一般说来都不曾受到严重侵扰。

对于那些研读人类个性冲突史的人来说，西安兵变中最引人注目的，看来就数发生在张学良身上的变化。这个一直以学生对良师的态度对待蒋介石的张学良，竟敢逮捕他的“老大哥”，并对他实行(用专为这次事件创造的有趣词语来说)“兵谏”，本身就够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了。仅此一举，“少帅”便以一个成熟而果敢的人物形象首次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正如许多过去与他有过接触，对他比较了解的人所知道的那样，他一直具有某些理想主义倾向。但如果说他的理想主义竟会促使他发生如此迅速的转变，采取这样一种革命行动，却似乎不大可能。若非西安事变前几个月的形势变化，这次行动本来就不可能发生。

但随着 12 月 12 日兵变的顺利完成，他的真正困难开始出现了。最坏的情况是，西安被孤立了起来。对于张学良来说，他肯定明白，他的行为会受到误解，无法对外界做出应有的解释。他对此有一个最明显的事例，这就是他在俘获委员长后发出的第一份通电。这份通电

在中国的报刊上从未被全文转载过，也没有任何一名外国记者能够把它发往国外。如果仅只是由于对这份宣言的严格审查，才使我们不得领略它的全貌，那么，把它的全文在这里复述一遍，还是必要的。这份宣言采用张学良那情真意切的语调，阐述了这次行动所隐含的真实动机。

由于这是一份致“全国的通电”，所以呈送给了“民国政府的中央执委会”，各省当局及所有报社和学校。

电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突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人民，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活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活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輿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之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1936年12月12日于西安

在这份宣言上署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和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指挥官，但后来又加上了蒋鼎文、陈诚及蒋介石的几位最知名的将军的名字，邵力子等几位此时失去自由的文官代表当然也不会被放过<sup>②</sup>。利用这些人所共知从内心深处对宣言充满敌意的头面人物的名字，是最大的战术性错误。这么做骗不了任何人，反倒使得那些本来对其运动纲领给予好评的各界人士，对“少帅”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张学良是个拙劣的战术家，在许多人眼里看重的是那一长串人物的签名，而不是他的整个电文。

在中国，所有宣言都偏爱采用一种异常动人的语调。但在这份文件中，无疑充分表达出了张学良其人的实感真情。最后以“八点纲领”而闻名的那八项请求，既是进步也是民主的。它的第一条当然要告诉人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公开决裂，并进行了近十年的内战之后，就要走向和解了。它的第七条特别提到了孙中山遗嘱中所谆谆告诫的那段话，即中国要和一切准备平等对待她的友好国家进行合作。至于其他条款，要求有更广泛的政治自由是为全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力量所长期渴望的，尽管他们的这些要求多年来不曾被如此坦率而富于戏剧性地表达出来过。

蒋介石在手，西北方面就算抓住了一张必胜王牌。南京宣布这种

行为完全违背了宪法程序，‘固然倒也不错，但正如张学良最清楚不过的，在南京根本没有什么宪法程序可言。一开始的这些日子，是他一个最好的机会：他要人们不必为委员长的安全担心，并努力唤起全国其他地方对“八点纲领”最大限度的支持。然而事实表明，他在这两个方面所付出的努力都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一传开，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无数骇人听闻、令人恐慌的谣言随之而来，几乎没人愿意听取“少帅”及其同僚们的真诚辩解。当然，澄清事实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与“叛匪”取得直接联系。但这正是南京所拒绝考虑的。于是，这件事被撇给了委员长的澳籍顾问、张学良的密友 W·H·端纳先生<sup>③</sup>，是他于事变后的星期一迈出了通往西安的第一步。在使他本人对作为俘虏的蒋介石的安全及个人的舒适生活感到放心之后，端纳先生向南京拍发了他的报告。随后张学良也再次电告政府，邀请负有全权的任何官方代表到西安来，讨论按照“八点纲领”，沿着由它所制定的方针路线改变国家政策的全部有关问题。如果政府能做出令人满意的保证，不针对西北发动内战，张学良现在就准备释放委员长。

然而，南京没有向西安派遣一个人。由此看来，除了战争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解决的途径。

当时的军事形势也相当复杂。12月13日，驻扎在甘肃省会兰州的东北军，按照前一天在西安发生的事变的样子，背离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这次行动使该省的军事力量落入于学忠(他于事变后不久便飞回兰州)及其助手周从政(译音)手中。三周前在甘肃惨败于红军之手、被迫向东南方面撤退的南京将军胡宗南，发现自己与他所统率的第一军被孤立于天水附近，处境很不利。在陕北还有别的南京部队，由高桂滋和高双成统领，但红军能够看管住他们。如果南京方面准备发动任何有效攻击，就必须从潼关沿陇海铁路前进。显然，南京方面对西北发动战争，绝不是件轻而易举或微不足道的事。

当南京透出要对西北实行报复和发动内战的气息时，它竭力不让

张学良有申辩自己立场的机会。然而在西安，群众大会每天都在街头和公园召开，庆贺西北的新型政治自由。12月16日，在“革命公园”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少帅”和杨虎城用传统方式，就逮捕和扣押委员长问题“申诉了理由”。在这次会议上，张学良非常详尽地阐述了他自己的处境。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从个人观点出发，我和蒋将军过去一直私交很好，我们的严重分歧集中在他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政策上。这几年我经常给他写信并多次谈话，促请他放弃他所执着追求的违反民意的政策，他对我的所有恳求都置之不理。

最近，他在上海逮捕并监禁了七位‘救国会’领袖。……这些人大部分我连认识都不认识，但我之所以反对逮捕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与我相同。我对他说：‘你对待人民的爱国运动之残酷程度，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什么两样。’他回答说：‘这只是你的个人看法。我就是政府，我这么做，就是革命。’

我现在把这些都摆出来，同胞们，你们评评，这么回答像不像话！由于蒋将军拒绝让我们调转自己的枪口打击敌人，反而要把它留着打自己的同胞，我迫不得已才同杨虎城将军和西北的全体人民领袖采取了12月12日的革命行动。我这么做，不是为自己争得什么，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相反，我希望和我的全体战友们立刻上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要把中国人做政治演讲时的那种慷慨激昂的言词翻译成外国人的常用语言，是相当困难的。中国的政治演讲充满感情，比喻精当，往往使人回想起拉马丁④式的慷慨激昂的雄辩，而不是像现代的政治家那样言词谨小慎微，或笨嘴拙舌者的日内瓦式会谈。纵观张学良西安兵变后几天来的演讲和声明，尽管天真质朴——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方使他的恳切之辞溢于言表。一个老练的外交家也可以摘引这样的警句来赢得听众的注意。但张学良并非外交家，他的演讲、书信和广播稿，于新年前夕便在西安出了合订本，所创造的纪录是令人吃惊的。如果这些东西也公布给了全中国人民，那么，人们对西安事变所做出的最初评定便完全有可能会截然不同。

在舒适的现代化住宅里(自事变后第一天他便被安顿在这里)被强制隐居期间,蒋介石并不缺少来访的客人。少帅每天都来和他谈话;杨虎城和其他军事领袖也常来,时而极力劝解,时而激烈争论,与他讨论中国的命运问题。蒋介石对所有劝说的第一个反应——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是一味发脾气。然而,有一天来了一位举止沉着冷静,不同以往的访问者,对于处在囚禁状态的这位委员长来说,此人的神态并不陌生。一见到这个人,便勾起他对昔日的回忆,大概他“做梦都怕见到他们”。

让我们追溯到十年前,从孙中山未曾能够活着见到的“大革命”开始谈起吧。当时年轻有为的行政官员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在俄国顾问的帮助下为培训“国民革命军”而开办的一所军事训练学校——“黄埔军校”的校长,开始出名。黄埔的军事教官,后来又当上蒋介石嫡系第二十一师指挥官的,是一位叫作叶剑英的 22 岁的青年人。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已成为这位野心勃勃的校长眼中刺、肉中钉的,则是一位刚从法国和德国留学归来的年青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1927 年——当时在总司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队伍,已经占领了南京。上海——这个中国的心脏和各帝国主义者在远东的焦点——依然掌握在反动军阀手里,受到了外国巡洋舰上大炮的保护。为了解决上海问题,周恩来被派去组织一次暴动。在最初的几个月内,近百万工人发起了一次总罢工。‘罢工受到了镇压,但革命仍在继续。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赵世炎、顾顺昌(译音)、罗亦农——在培训了纠察队和干部之后,武装了一支 300 人的工人敢死队。3 月 21 日,他们又举行了一次总罢工,使上海的所有工厂都陷于关闭。在力量对比众寡极为悬殊的不利情况下,他们占领了军械库,从而使得这座中国人的城市终

于落回到起义者手中,五千名工人被武装了起来。几天之后,当蒋介石率领着革命军赶到时,却发现这场战斗已经打赢了。

后来的结局世人都已知晓：它已被纳入一本最新出版的当代革命小说之中(往)。蒋介石已与上海金融界，以及外国企业家握手言欢，在一个月之内，工人武装统统被解除，然后便开始了大屠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右翼和左派(也包括共产党在内)因出现裂缝，发展为刀兵相见。

他的五千名革命同伴，和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最亲密朋友们，死于对上海起义的镇压之中。与此同时，被列入首批逮捕和死刑名单上的周恩来，在其黄埔军校的老朋友帮助下逃到了武汉。从那时起，他的个人命运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命运。后来的每一次起义，都有他的身影：在南昌，他出现在朱德组建第一支红军的行列里；在汕头，共产党最后一次占据了一座海港城市，他参加了。在这一切活动中最勇敢最冒险的，是他参加了“广州公社”。在“广州公社”，他再度和叶剑英走到了一起。“公社”失败之后，叶剑英不久便逃到了莫斯科，并在那里待了两年。到 1931 年，他俩顺利抵达江西和福建的“苏维埃”区域，从此便一直留在红军里。

此时在西安，当 they 与蒋介石再次相会时，彼此并不陌生。周恩来是红军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头上的标价是八万块大洋。叶剑英担任着红军东路军的参谋总长。这是一次有趣的重逢。

那么，共产党人究竟要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何种角色呢？与众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与蒋介石的被俘事件没有任何牵连。在西北红军和张学良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良好的工作协定。但率先提出发动 12 月 12 日事变的人，则是“少帅”和他身边的东北“激进派”小组成员。那晚参加策划举行兵变会议的人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设在陕北保安的“中国苏维埃”总部，对这一计划毫不知情，直到他们怀着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获悉委员长的被捕。他们渴望能够扭转形势，为自己谋利，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个机会，并没有让他们期待多久。

事变发生后，少帅立即派出一架飞机，到北边接运“中国苏维埃

政府”的代表团到西安。在这座“叛乱”的首府里，他们应邀参加了正式谈判，参加了新权力机构的组织工作。此时一个名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新权力机构，在这里已经建立了起来。抵达西安的这支未带红军一兵一卒的小小的共产党代表团，将要——正如事实所证实的——对西北运动的全过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代表团成员包括——博古——戴着眼镜，面容严肃，说话慢声细语的——一位前共产党总书记和它的最卓越的理论家周恩来、叶剑英，以及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人。在他们中间，周恩来，这位红军的政治委员和蒋介石从前的助手，在此后几周内所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

中国共产党对这次起义所持的正式立场，12月19日，由设在保安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发布的一项通电中作了表达。在这份通电中，他们表示坚信：“西安领袖们的行动完全发源于爱国忠诚和热心，因而热切希望能够迅速制定出一个立刻抗日的国策来。”他们在通电中建议：在南京召开和平会议，国内各党派均应参加，并以潼关为界，在南京和西安的军队之间划分停火线。正如当时所提出来的为数甚少的几个明智建议那样，它当然并未得到任何考虑。

南京不仅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命令他的军队冲进潼关，并派飞机轰炸了几个城镇。一队政府的飞机吼叫着低飞掠过西安的屋顶。对“少帅”的这位俘虏来说，飞机发动机的声响也并不能使他多么安心。除了在临潼山腰间度过的那几个小时外，蒋介石感到最难受的时刻，大概就算是处在囚禁之中，这时候他——也像西安的其他人一样——静等着挨第一次空袭。

据说，叛乱者中有不少人(特别是有许多共产党人)想要把这位

委员长提交公审，由群众投票判处他死刑。如果说谁最有理由主张采取这种行动，那么，他肯定就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然而事实上，自一开始，共产党就成了最坚定的“和平党”，而周恩来则是力主释放蒋介石的最成功的倡导人。正如共产党一开始便承认的那样，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政策是什么，而且坚持这种政策，为此而享有荣誉是

当之无愧的。在西北，尤其是在东北军左翼中间，有不少赞同处死蒋介石的团体和个人，但只要蒋介石还被关押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他们就处在松散和无能为力的状态。

究竟蒋介石是如何打发他的囚禁时光的，人们不得而知。在其获释后，他发表了一份记述他在 14 天拘禁生活中的私人日记。不过坦率地说，这篇日记只是出于官方大肆渲染其事的需要，而不能被认为是经过仔细核实的。按他自己的记载，他费了好长的时间阅读圣经——这是一种消磨时光的习惯方式，并不是他别出心裁。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客人来访和会谈之余，他有充足的时间反省自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发展着的形势也完全值得他深思。

本章是文献记录性的，因此不妨在这里摘引一下张学良于 12 月 19 日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弗雷泽的一份秘密电报作为结束语。至于那份电报，当然被南京的审查机构扣压了下来，耽搁了好几周都未送到收件人手中。这份电文表现了西安方面对国外报刊关于西安事变最初发表的编辑部评论文章所做出的典型反应，再次显示了深受隔绝孤立之苦的“叛匪”所面临的极端不利处境：

我读了《泰晤士报》就扣押委员长一事以社论的形式对我进行指责的那篇措辞激烈、幸而是错误的申述文字。我也明白，由于各界对导致这一扣押事件产生的客观环境或真正原因缺乏了解，因而这种指责将会广泛流传开来。我一直不想为我扣留过任何人而做辩护，当然，特别是对于像委员长这样身居显位的人，我也不会为自己辩解。因此，我唯一感到深为遗憾的，就是当时那种特殊环境。这种特殊环境，直到此刻，我都不愿意谈及，正是它迫使我不得不采取解决措施。

就这件事而言，我们并不像《泰晤士报》所指责的那样，含有什么“个人愿望或掠夺野心”，或“竭力谋取更好的讨价本钱”；或在扣押委员长行动后面隐藏着某种个人动机。为此而努力的动因并不复杂，因为我们确信：中国的国策应该切切实实地得到修改，应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国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终止那场使中国数以百万

计的生命、钱财蒙受无法估量的损失，把整个国家卷入进去而无以自拔的无休无止的内战，以及不断追剿那些所谓的“匪”。而这些所谓的“匪”无论其政见如何，毕竟还是中国人，就是再坏，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对自己国家的存亡构成威胁。

我受到了指责，也并不想逃避所应负的责任。但我不是中央政府，因此也不能够表明这个国家该不该进行战争……但最最重要的，是我想亲眼看到中国的武装力量被用于抗击敌国的侵略，而不是被用于对付中国人。面对日本的侵略，我们国家的军队不曾向前移动一步，然而就在入侵的敌人尚停留在我们的国土里，我们却可以看到，这支军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被调来打我们……

我们渴望受到委员长的领导，也不想在任何情况下削弱他的权力……由于那些令人遗憾的措施的发展变化，从而导致扣押他事件的突然发生。在此情况下，也既不会危及他的生命安全，也不会导致罢免他的职务，或对其地位有任何妨碍。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依然是我们的委员长……他滞留时间的延长，并非我们的意愿。

上星期一晚上，我拍了份电报，欢迎来自南京的任何人，来这里听取委员长的意见，同他一道商议建立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防内战的进一步蔓延，……自此以后，他也和我们一样，眼巴巴地期待南京方面要人的抵达，处理有关问题，从而使委员长能够返回首都，重新行使自己的职责。这么久还未见有人来，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要是有人早些天来，他也许几天前就已回到了南京。

总之，他在等待。他受到了尊敬，无烦无忧。端纳先生与他一起住在一所现代化住宅里，不为任何人所干扰。一旦他真的要返回南京，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有可能举行一次公正合理的审判，就准备和他一起面对全国人民，接受人民的审判。在听取了全部事实之后，如果人民裁决我做错了，那么，我情愿接受应得的任何惩罚，即使被判处死刑也毫无怨言。

张学良启

或者相信其中的每句话，或者一句也不相信，外交电文总要带有一定的保留。那些熟悉中国事务的人们，对于公开发表的声明，早已学会不看其字面的意思。但这份电报中所提到的事实，却切切实实就是那样的。在中国，每一项交易都要涉及金钱因素，因为金钱在这里是衡量一个人忠诚的尺度。但张学良有的是钱，他无须为获得更多的金钱而挑起战争。他要以蒋介石来换取的赎金——一言以蔽之——但在这方面他却没有任何东西可担保的——就是为中国求得一项新的政策。

译注：

①温斯·海伯特，德国犹太人，毕业于柏林大学，法共党员。30年代被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后经朋友介绍来到中国，参加了史沫特莱、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汉斯、希伯等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1936年夏，经宋庆龄、史沫特莱举荐，到西安以开设牙科诊所为掩护，在刘鼎同志安排下，成立了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为陕北红区输送了大批医药通讯等器材。西安事变那天凌晨，城内枪声四起，海伯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匆匆赶至西京招待所，欲找史沫特莱问个究竟，不幸被戒严军队误伤死亡。张、杨二将军闻此十分痛惜，分别委托刘鼎和王炳南料理后事，并于12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发了讣告。海伯特遗体于12月21日安葬在小南门外公墓中。——引自1986年第十期《西安今古》，存才文。

②在电文后列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激流(带·者为蒋介石的随员或蒋系在西安的官员)。一般认为，在该宣言后添上蒋系文武官员，纯属画蛇添足，不利于宣言的传播。

③威廉·亨利·端纳(1875—1946)，澳大利亚新闻记者，1902年以悉尼《每日电讯报》通讯员身份来远东，后任香港《德匡报》“The

China mail'’ 记者。辛亥革命时任

孙中山私人顾问。1911—1919 年任上海《远东时报》月刊编辑，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1920 年任北洋政府顾问。1928 年北洋政府垮台后，为张学良聘为私人顾问。1934 年转任蒋介石顾问。西安事变发生后，数度奔波于南京和西安之间，在促进事变和平解决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后为宋美龄所不容，愤而辞职。后死于上海。

④拉马丁(1790—1869)，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和诗人。

注：系指法国作家马尔罗所著的《人类之命运》一书，1934 年在纽约出版，有英文版。

## 第十一章

### 调解人

在这次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南京方面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当蒋介石在西安他的那间“囚室”里一边研读着他的《圣经》，一面与循循善诱的周恩来进行着谈判时，这场民族危机就开始在首都政界那错综复杂的某些阴暗角落里，闪现出一线光明。

来自西安的最初消息，对国民党的官僚们产生了极强烈的震动。南京方面的人士平素更习惯于清谈，而不惯于采取行动。虽然，在这个政府中也不乏若干能员(而不在政府中当官的能员则要多得多)，但他们中几乎没几个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行政权力。颇为典型的是，在起初召开的那几次可算得上是讨论应急措施的会议里，大量的时间都花费在争论议事日程和维护各自的“面子”上。直到最后，现任财政部长，一位留学美国带来某种民主主义情操的自由派人士孔祥熙博士，才被指定坐在了委员长的位子上，作为行政院的时代院长。

孔博士在南京政府中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因为他是属于“宋家

王朝”的成员。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家族体系，一度完全左右着中国的内部政治。他娶了宋霭龄，在各自都有一番惊人婚历的非凡三姊妹当中，大家公认她是最精明、最务实的一位。三姊妹中最小的宋美龄，成了委员长的夫人，业已愈来愈多地出现在中国公共生活的前线。她的机敏与通晓西方习俗，对那位一句外语也不懂的政府首脑给予的支持是无法估量的。在另一方面，宋庆龄，这位孙中山的遗孀，这些年来则一直处于隐居状态，并与其家族脱离了联系。偶尔(例如在上海大罢工期间，当救国委员会的领袖被逮捕时)，因其同情左派分子而被迫隐居时，孙中山夫人也始终如一地忠于她丈夫的理想，坚持维护着国民党左派的某些传统。她是中国革命中最使人难以忘怀的形象，以她的美丽和大无畏精神鼓舞启迪着年轻中国的所有进步力量。

不过孔博士一坐上新交椅，便似乎暂时忘却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种论调被不厌其详地提起，这就是宣扬南京政府虽然处于一个独裁者统治之下，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此时国民党官员所最关切的，似乎就是要使世人确信：没有蒋介石，他们也同样能够继续把工作开展得更好。孔博士通过电台发表了长篇演讲，明确表示不同武装叛乱者有任何接触，与共匪也不能达成任何停战协议。并向全国人民做出保证：一定要维护政府的尊严，即使这意味着要凭借武力消灭“叛乱者”(此时委员长和他手下的一些最能干的军事人员也与他们在一起)也在所不惜。尽管这种“精诚团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似乎也不难看出，南京实际上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至于此中缘由，也不难找到。

指派不同的人物充任各部门的负责人，而这些人的资历一般都似乎还能够胜任其职，但却不可能容许他们自身拥有任何非常强有力的或富于挑战性的思想观念，这正是蒋介石一贯采用的统治手腕。凡涉及重大的决策，最后的决定权总保留在蒋介石自己的手里。不难看出，这种政治体制显然有利于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统治，而对于整个国家则完全不利。尽管如此，它依然勉勉强强地发挥着作用。毫无疑问，外国列强近年来之所以对南京政府表现出日益增加的信赖和信任，这在

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对蒋介石才干和实力的信任。

但即使在那些心怀不满的官僚们的内心深处，也将会滋生勃勃野心，而且生活在南京这座忧郁而杂乱无章的首都里，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众所周知的派系和小团体。这些派系在中国都是很知名的，只不过一般普通人不大可能知其内情罢了，除此而外，各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相互妥协、结盟也在频繁地发生着变化，使得即便那些中国政治的研究者们也会对此茫然不知所措，如坠迷宫。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采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西安的反叛期间甚为流行)，用“亲日”和“反日”来区分那些派系，对说明问题也许更为方便一些。

这里需要对这些派系作一些说明。一般而言，任何中国人，甚至政治家，在中国这个风波迭起的历史阶段，通常大都会被看作是“反日”派。但在实际上，这一措辞目前理应被用于那些赞同对日本侵略采取积极抵抗政策，赞同至少在中国的某些显而易见的不满情绪未获得补偿之前，对日本实行不合作政策的政治领导人。在此名义下，聚集的有一些国外最熟悉的中国名人，他们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孙中山博士之子)、王宠惠及其他一些人，其名字通常被与那些称之为“欧美派”的派别联系在一起。他们大都是一些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人物，带有进步思想，并对民主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和法国感情友好。所不幸的是，在西安危机发生期间，“欧美派”不那么得势，只有两个成员——孔博士和孙科——还有政府职位。但还有其他的派别组织，其性质属于自由派或社会民主派，只要能够获得机会，也会支持与他们相一致的总方针路线。

在另一方面(由于这里确实存在着有效的差别)的某些人，主要由一批军人组成。他们的权力是在蒋介石的直接庇护下获得的。对于这批人的政治力量，眼下还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在绝对忠于委员长的口号掩护下，显得默默无闻。与其他派别界限最明确的是人们所熟知的

“黄埔系”，或称之为“军校派”，因为他们全仗“国民军”时期的军官们的支持。而在 1936 年 12 月，这伙人又恰巧处在特别强有力的

的位置上。

当时在这些人中的那些被视之为“亲日派”的人物里，有几位与委员长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物也可以被列入其中。他们包括像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多年来一直担任反共战役的主要组织工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外交部长张群；运输部长张公权；军委会成员熊式辉等人。就这些人单个而言，他们中没一个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但他们拧成一股，代表的是一种鲜明的政策倾向：宁愿与日本合作，而不愿抵抗日本，并对中国共产党及建立联合阵线这一切合实际的观点怀有刻骨仇视心理。据中国许多地方的人们(不仅是西北地区)推测，处心积虑地想要利用西安局势，通过干掉蒋介石，进行抢班夺权来为自己谋利的，正是以何应钦为首的这伙人。

身为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被安排负责迅速组建一支对付西安叛乱的“讨伐军”。而且也正是他，向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冒牌罗伯斯庇尔<sup>①</sup>发出了邀请电，要他立刻从欧洲返回中国。汪精卫是这么一个人，即使在中国，他在政治上的投机记录也是出类拔萃的，以其与日本关系密切而为人们听熟知。他从欧洲通过海底电缆拍回了一份加急响应电，在临动身之前，还挤出时间与希特勒进行了会晤。随着蒋介石的被排除在外，这位副总理看到了这样一个天赐良机：领导一个以“黄埔系”军人系统为基础，并受到“反共协定”缔结国有力支持的政府。一听到汪精卫正要回国的消息，西安的领袖们毫不迟延地通知给了他们的那位囚犯，而对蒋介石来说，这则消息无疑会令他感到不快。他们俩是一对老冤家，在中国他俩毫无共存的余地。

蒋介石本人在南京的那些派别中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保持着超然于“党派政治”之外的姿态。既乐于在南京各派别之间相周旋，也高兴从中挑拨离间坐收渔利，以适应其总战略的需要。不管怎么说，在西安事变前的几个月里，他与军方人物的关系无疑达到了最密切的程度。而像冯玉祥、孙科这些人们所熟悉的人物，因为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并赞同与苏联结盟以对付日本人，自从 11 月在上海的大逮捕和发动新的反击浪潮以来，则受到了猜疑。不仅如此，另外有迹象表明，

秘密组织“蓝衣社”(“Lan I shih”),在中国的公开场合谈论这个组织是非常不合适的,然而它作为一个半法西斯主义的团体,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狂热地反共,而且以前直接听命于委员长,已存在多年了)正在逐渐变得谁也无法控制。人们普遍认为,于1936年10月遇刺的湖北省省长杨永泰②,便是“蓝衣社”的一个牺牲品。杨永泰也曾是蒋介石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之一,显然,蒋介石是不可能会赞同处死他的——虽然他对于一年前发生的谋杀汪精卫企图,可能不会像这次这么感到恼怒。

总而言之,对当时的情况可以这么认为,在其被俘于西安期间,这位委员长所唯一不敢完全确定的,就是在南京究竟有哪些人才是他的真朋友。在12月12日之后,情况在这一问题上的发展变化,必然使他从内心深处为之一震,感受颇深。

南京断然拒绝与西安进行任何谈判,并调兵前去攻打叛乱者。甚至连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也乘坐着一辆豪华的私人小轿车前往陕西。他来此的目的是想要通过与冯钦哉的会谈,用贿赂从西北阵营里打开一个缺口,买通这位不履行协议者。但对于蒋介石的命运,南京方面似乎完全无动于衷。

兵变不久,西安以东就开始爆发了敌对行动。时断时续的军事行动持续了好几天。南京飞机沿陇海线轰炸了好几个城镇,一中队轰炸机编队掠过了西安城。但反叛者们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他们只是埋头做着保卫西安的准备工作。

12月18日,委员长的得力助手蒋鼎文将军,被从西安释放出来,带着一封他的上司给何应钦的亲笔信飞到了南京。在这封信里,蒋介石预计他将在一周内返回首都,而在此期间,他要求能够暂停敌对行动,特别是轰炸。

在其关于西安危机的手记中,蒋夫人以极其生动的语调,描述了在那段令人紧张慌乱而忙碌的日子里,笼罩在南京军界里的气氛。她几乎是在单枪匹马地与被她描述为“萦绕在部分高级军官头脑中的一

种可怕欲念进行着搏斗。因为这些人认定，他们意识到自己坚定不移的职责就是开动军事机器，并立即征讨进袭西安”。身为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已接管了空军。洛阳是河南的重要军事中心，也是对陕西首府西安发动袭击的良好基地，也为其所控制。似乎只是由于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和蒋夫人及其密友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对西安的空袭未能发生。

由于南京的战争贩子们不愿听到任何一句劝阻他们克制的话，甚至指控端纳先生“站在张学良一边”，肆意歪曲篡改他发自陕西的那些报告，尽管其中所列举的事实是完全可信的。基于同样的不妥协精神，他们起初曾拒不接受蒋鼎文将军带回的委员长的亲笔信。他们阻挠蒋介石夫人飞往西安(她还是在听到端纳所传来的消息后才产生这个念头的)，并采用同样的手法，企图阻止她的兄长宋子文先生(前财政部长，也是南京政府治下最有才能的财政专家之一)响应张学良所发出的邀请。宋子文最后借口仅以私人身份去西安，靠谋略挫败了官方的反对，于 12 月 19 日飞离了南京。

两天后，宋子文和端纳双双回到南京，带来了和平解决事变和迅速释放委员长的一切希望。针对这一情况，蒋夫人一点不愿再等，坚持要陪他俩于 12 月 22 日重返西安。

宋子文成功地从南京方面的军事当局那里争取到三天以上的停战保证，而在这三天里，为释放委员长而进行的激烈谈判，在西安紧张地进行。蒋夫人和她的兄长非常清楚首都当时的情绪，也深知主战派把事情交由他们去办所潜在的危险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他们这几位秘密谈判者中，没有一个是南京政府的官方人士。他们所可能做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也许只不过是出于某种个人的本能，不可能提交给中央政府。但宋子文和蒋夫人的个人影响——更不用说委员长自己了——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在那几天里，最有趣的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恐怕要算是南京方面的官方态度了。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丝毫无助于委员长的

释放和确保其人身安全。他们为那些祈求抓住机会进行谈判的人设置了一切人为的障碍。而这些人之所以祈求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委员长的亲戚朋友，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些普通公民，只不过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对国家的命运来说是存亡攸关的。倘若蒋夫人稍微有点不那么果断，照此看来，1936—1937年仲冬的中国完全有可能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所毁灭——一个能够博得全国支持的中国领袖的死亡，并由此而引起的内战爆发，其可能产生的唯一实际结果，只能是出现一场大灾难。在这里对少数几个能在这种时候保持清醒头脑的人说几句赞美的话还是合适的，因为在当时，很多人的表现都实在不怎么样。

作为委员长在西安获释前最后三天的实况记载，蒋夫人自己所说的故事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是由一位与所发生的事情关系极为密切的人所讲述的。不过，其着重强调的是个人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已经知道，张学良几乎从一开始就准备释放委员长，并陪送其返回南京，条件是只要他能够令人信服地担保不再打内战。蒋夫人描述了“汉卿”即张学良当时的处境，说他本人对贸然逮捕蒋介石而感到悔恨万分，拼命恳求他的同伙们同意释放委员长。仅凭这段描述，也许还不足以公正地评价当时存在于西安各不同派别之间的实际合作程度。但她的记述中有一点是重要的，按蒋夫人自己的说法就是，西安的领袖们“在任何时候都从未提出过要金钱或增加权力和提高地位的问题”。

对于大多数外界观察家来说，蒋介石的被释放是个巨大的谜。在他们看来，似乎西北方面的领袖们之所以有这种转变，只是由于得到了巨额赎金的缘故。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蒋夫人关于“少帅”见她时那幅羞惭不已的样子，以及关于他建议要把委员长偷偷送出西安的记述，才是最不可信的。在她的记载中，蒋介石本人所起的作用纯粹是消极被动的。至于其他的人，除张学良而外，穷智竭虑所想到的，只是如何保住他自己的脑袋。当然实际的情况决不会完全是这样的。

在当时，有一点可以认为是公认的看法。扣押蒋介石既非是出自

于个人野心的冲动，也不是私人冤仇使之然。它是一次政治行动，想借此影响到中国政策的转变，而在西北针对红军重新进行的一次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战役，则促使了它的爆发。由“叛乱者们”所倡导的政策，从“八点纲领”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对于他们所提出的改变政策的建议，委员长哪怕只消在原则上同意，无论从哪方面说，就没有理由再把他扣起来，从而冒“以内战结束内战”的危险。

让我们不妨暂时考虑一下西安方面对释放蒋介石所做的解释。委员长及其来西安探望他的亲友们一致同意，对少帅主张的“八点纲领”将给以适当的考虑。在此之后，由于南京方面黥武主义军人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从而使内战爆发的危险变得日益临近。而避免战端重开的最好办法，就是迅速释放蒋介石及其随员，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控制南京战争机器运转的人。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忠诚无私，同时也是为了显示他已认识到自己对国家所负的责任，张学良执意要把他先前的这位俘虏陪送到南京。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简单得就像是童话里的故事，然而却是整个事件的真实写照。对此，只消作一些稍微现实一点的分析，对于产生这种高尚行为的部分原因，便会有所认识了。

没有人(至少那些熟知其为人的人)会相信，经过在西安的囚禁生涯，蒋介石会真的“洗心革面”。但作为一个明智的人，他还是服理的，并会重视舆论的力量——特别是在当时对其政治地位能产生致命影响的情况下。

从周恩来那里，从这个根据过去的经验使他不能不对之敬重的人那里，蒋介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南京政府展开全面合作，以换取他的某些保证。他们愿意改变其军队的名称，愿意使在西北的“苏维埃区”成为中华民国内部的一个“特区”，并承诺不继续土地和社会革命运动，直到抗日阵线得以实施。这是一种极其光明磊落的和平统一姿态，它是由中国社会中一部分坚忍不拔，一直不受他约束的人提出来的。

蒋夫人在她关于西安的最后几天记载里唯一的一处关于共产党的叙述是头等重要的。她写道：“我们自始至终从未从‘赤党’那里听到一句威胁性言词。与外界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使我们确信，他们无意扣押住委员长不放。反之，他们倒更乐于尽快放了他。”她的记述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共产党把它的全部影响力，都转用在了迅速和平解决问题上。周恩来是位非常有说服力的发言人，认为正是由于他的那些建议才对蒋介石产生了某种影响，这是对事态顺利发展的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釋。即便从单纯的观点来看，委员长也会这样来推论的：与红军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较之于继续对他们进行代价极高的战役，不仅对他本人来说要减少不少麻烦，而且对政府而言也要划算得多，因为继续进行那场代价极高的战役显然已经变得愈来愈不得人心了(他在西安的处境是会不时地向他提醒记住这一点的)。

“少帅”不停地向他灌输人们所熟知的那套要求停止内战，建立起有效抗日组织的主张，因为他并不打算用威胁手段来促使主张的实现。西安的极端主义分子们可能会支持对蒋介石进行公审，由群众对他进行判决，但他们却得不到这样做的机会。当张学良发现共产党也赞同释放蒋介石的时候，他似乎感到自己可以放手行动了。然而毫无疑问，只有在与所有的助手们磋商之后，他才会采取行动。

毋庸置疑，对释放蒋介石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南京方面的态度，以及亲法西斯主义者、亲日派插手于中国政治权力的危险，这是蒋介石本人也不会不认真考虑的。因为这些被称之为“叛匪”的人警告他，需要提防的正是那些现在正在搞阴谋要毁掉他的人。张学良保护他，不使西安的极端主义分子得逞；共产党则全力说服别人支持释放他的主张。唯有在南京，在这个他原本期望找到他最忠实支持者的地方，有那么一批人，他们显然决定要发动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必然要以牺牲他和他的随员们的性命为代价。当他听到南京飞机吼叫着掠过头顶时，蒋介石必定明白了，他所面临的更大危险来自何应钦和他的轰炸机，而不是西安的那些逮捕他的人。

没有一个人——除那些希望从蒋介石的死亡中捞点什么的人而

外——真的想要内战。如果爆发了大规模内战，这正符合日本人的利益。南京的军人小团体就会趁机抢班夺权，而日本人则会在华北为所欲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内战，这无疑是所有真正的爱国者们的利益之所在。唯有寡廉鲜耻的若干败类——这只是一小撮窃据重要位置的人——才热衷于制造战争。这就是一个独夫陷入险境后出现的局势，这种局势是不会不在他身上发生一定作用的。

就张学良而言，他可能原来指望从中国的其他地区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公开支持。如果出现了严重的交战局面，华北和西南的其他军阀无疑会出面调停，而其中也有某些人会站在西北方面一边。但到那会儿，大错可能业已铸成。如果蒋介石一旦被拉下舞台，再要想完成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都将是困难的。张学良似乎认准了这个道理，不值得冒这个危险；他的这个抉择无疑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作为一次抗日运动而开始的这场运动，在客观上却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迎合了日本的最大愿望——继续使中国处于分裂状态。

西安的许多赞同最终释放蒋介石的人，要求先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公开保证，或签订协议，然后才能放他走。能否得到这个保证，是很值得怀疑的。蒋介石是个很傲慢的人，无论如何，这种要求只能使他陷入尴尬境地，而且显然也会激怒日本人。在中国所能够干成的所有事情都是通过间接手段完成的：蒋夫人、宋子文等委员长的调解人，他们要比用强迫的手段搞到手的任何文件有价值得多。

圣诞节快到了，“宋氏停战”也已满期。空袭西安的危险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在增大，恳求释放委员长的呼声也日益强烈了。那天一大早，由于“圣诞老人”友好地出现(正像她所说的那样)，蒋夫人在谈论和平问题时显得比过去更为雄辩。而叛乱者中感情最脆弱的张学良，则是她的那些乞求言词的主要对象。他的侠肝义胆在经受考验：他要为委员长的生命安全负责，到今天为止，他一直保护他不受敌对分子侵犯，但他却无法保护他免遭他自己的国防部长的炸弹空袭，或避开受到威胁的普通群众的愤怒情绪。

由于知道他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因而少帅似乎是独自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当天下午，他老早就给杨虎城挂了个电话，向他这位闻言大吃一惊的同伙说，他本人准备立刻用飞机把委员长送回到洛阳。必须给杨一个简短的通知，因为“杨匪”有股倔强劲儿，不通知的话，将来是不会宽容他的。但杨虎城显然还是同意了他的安排，因为舍此而外的其他任何办法，都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实际上，即便是到机场这一段路途，也有一定的危险性。那天下午，有消息说绥远地区中国防御部队的司令傅作义将军，要乘飞机抵达西安，因而在飞机场聚集了许许多多前来迎接的人。

临近下午四点钟，有两辆小卧车飞速穿过机场大门，经过静候傅作义的人群，一直开到停机坪上。当一些人觉察到他们认出的那个蜷缩在头辆车后排座位上的消瘦人影，正是面容苍白、留着黑八字胡的委员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一阵小声的嘀咕声从人群中传来：这不会是真的。要是这消息传到那些发誓决不让蒋介石活着出西安的青年军官耳朵里，在这座陕西首府肯定会激起更多的暴乱。但小卧车径直开到了少帅那架巨大的波音飞机近旁，从而使离别行动做得尽可能地快。

在记载蒋介石离开的“官方”记录里，提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欢送仪式。也就是在这个仪式上，委员长表情严肃地斥责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并针对他们犯上作乱的罪恶行为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训导词。这篇演讲由蒋夫人以速记的形式抄写了下采，长达好几页。在中国的中学里，它已成为供学生们研习的一篇范文。

然而，要想弄明白究竟在何处、何时蒋介石曾发表过这样一篇演讲，这是困难的。依据对现场的最详细记载，蒋介石并没有做过临别的逗留。据说，当他们一起来到飞机旁时，蒋介石起初不敢进去，认为会把他用飞机拉到“苏区”。但“少帅”先他之前登了上去，于是他没有再谦让，也没有乘机再训导什么道德真谛。

不过，讲述委员长临别赠言的报告倒也有一个，经过了多方的证

实，语气也要简捷实在得多。他从飞机上对杨虎城和陪送他的官员们说道：“过去我们双方都犯过错误。我的错误我坦率地承认。从‘双十二’到今天为止，我在这里当囚犯，发生内战的责任要由你们负。从现在起如再发生内战，责任就是我的。我决不想中国再有内战了。”

圣诞节下午四点刚过，巨大的波音飞机载着奔向安全地带的委员长，和前途未卜的“少帅”离开西安，向洛阳飞去。因为释放自己俘虏的张学良认为，唯有由他亲自陪着他去登门服罪，工作才算最后做完。而西安的朋友们，甚至连蒋介石(表面上如此)也都劝他说，他最后的这个举动毫无必要。在南京等待他的只会有危险，而不会是别的。

但张学良身上还带有某种浪漫色彩，这使他对自己所创造的这种引人注目的行为颇为欣然。他的宏伟计划(这真正来源于其个性)自然是要借此证明，他在西安事变中并没有心怀贰意，从而打消别人的疑心。这是一种科利奥兰纳斯式姿态<sup>⑧</sup>，而现在却无法保证他即将落入同样的命运。

从飞机上，蒋介石开始把自己的诺言付诸行动。他下令陕西境内的“中央军”撤退到潼关以东，越过“叛乱”省份的边界。当天傍晚天擦黑之前，军队已经撤离华山，东行了廿华里。来自南京的挑战看来已经过去。

第二天，刚过中午，蒋介石的飞机便在南京机场着陆成群的人吵吵嚷嚷地奔上前去迎接他的归来；全国都为这种愉快的结局而欢庆。这位委员长似乎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得人心。

两小时之后，另一架飞机载着张学良和宋子文在同一个机场着陆。没有一个前来迎接的人。

译注：

①罗伯斯庇尔(1759—1794)，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革命民主派最重要的领袖，革命政府的实际首脑，在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过程中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在革命胜利后，他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

最终失去人民的支持，于“热月政变”后被捕处死。

②杨永泰(1880—1936)，广东茂名人，字畅卿。历任国会议员、广东省长等职，为政学系首领之一。北伐战争期间，投靠蒋介石，任总司令部参议。1933年，任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为蒋制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策纲领，并与黄郛、张群等形成新政学系。1935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6年被CC系暗杀。

③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亦泽科里奥拉努斯，中世纪罗马贵族。公元前492年左右，罗马发生饥馑，他以停止出售粮食为手段，要求平民放弃保民官的职位，受到保民官的控告，遂率奥尔斯奇人进攻罗马。后在其妻子和老母的涕泪央求下从罗马城前撤退，又为奥尔斯奇人所不容，被置于死地；莎士比亚据希腊传记作家蒲鲁塔克为此而写的传记著有剧本《科利奥纳斯》。

## 第十二章

### 西安内幕

西安宾馆是在一片水泥荒漠中建起的一个臃肿而其貌不扬的建筑物，而在西方的都市里，这类宾馆都装备着最现代化的豪华设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大门口停放着的那溜小汽车，当时有许多东北军指挥官就住在这座旅馆里，并不因先前下榻于此处的那批官员们的不幸命运而使情绪受到损伤。这里是西安一所时髦的现代化聚会地点。

我的到来就像是第一只报春的燕子，给它带来了生意复苏的吉利信息。显然，宾馆的那位上海公司的职员对西北的单调生活已经愈来愈厌倦。他欣喜若狂地上来和我打招呼，尽管看上去有点不大真诚。

“先生，您是坐飞机来的吧？”

“不，”我矢口否认。“乘黄包车、毛驴和军用卡车。”不难看出，他对我所说的一点也不相信，但还是给我安排了个房间，并怀着歉意说，自12月10日以来就再也没有看到外国报纸了。

宾馆里笼罩着一层阴森气氛。后面的屋子总在召开会议；军官们进进出出，总带着紧迫而决断的神情，而在中国，这种情况人们通常是不和穿制服的军人们相联系的。即使那些舒舒服服地仰面坐在大门门的安乐椅上晃悠的司机，也神秘地留意着周围的动静。每个进入休息室的人，都要被置于卫兵、便衣警察和监视便衣警察的暗探们的严格审视之下。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非常紧张。

来后的第一天早晨，我与苗剑秋、应德田和孙铭九——“西安的三个火枪手”去访问临潼——蒋介石的被俘现场。苗剑秋来时穿了身“中山服”，看上去很高兴，他似乎找到了大量要做的工作。对当前的形势，我感到他和应德田的情绪有点过于乐观。

我打听到，自西安事变发生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到达过西安。这就把唐来这里的可能性排除掉了，我原估计他会在此等我的。自从蒋介石被释放以后，有一些外国人离开了该市，但尚未有人进来过。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与外界的联系很快就会恢复。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都可悲地失望了。

这时应德田出人意料地问：“你知道还行另外一位外国记者——一位美国妇女，史沫特莱女士在这里吗？”

“什么——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他点了点头。“她就住在这家旅店。”

这儿倒有一条闻所未闻的消息。在中国，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一个人们最熟悉的外国人名字。在北平我所熟悉的那些中国学生中间，这个名字几乎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因为在中国的青年人中间，这位《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的红军挺进》<sup>①</sup>的作者，大概比起除高尔基之外的任何外国作家，拥有的热情读者都要多。

不言而喻，作为自 1927 年以来公开把自己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中的最光彩夺目和最能够坦率直言的人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革命运动暴风雨中的海燕。她在来华外国人中的名声——他们中甚至没几个曾见到过她——却都能为她那好斗而不知疲倦的个性提供例证。在各通商口岸，她被视为鲍罗廷②的法定继承者。她曾与孙中山夫人在一起工作，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她为了进行某种危险得多的社会联系而打的幌子。对于她的私生活，刻薄的上海人会编造出许多有声有色的笑话，一个有着一个印度丈夫的知名妇女本身在中国就是个很好的笑料。认真看待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就够糟糕的了，而站在他们一边，反对压迫者则是更不能容忍的。

我 11 月份在上海的时候，适逢杨树浦纱厂工人大罢工。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涌上街头，日本报纸大声叫嚷道：“美国间谍史沫特莱躲在大罢工的幕后。”我明白这是胡说八道。因为当时我曾设法会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发现她并不在上海。她却在西安，在华清池的温泉旁，一边养病，一边忙着写另外一本关于红军的书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我突然意识到——对她在这里的出现会有另外的解释，这种解释我很快便找到了。

我只是从她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从那本由一名妇女写的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垒)中了解到她。从美国大陆那辽阔的背景——矿业城的野蛮的贫困，西南部的群山和高台地，从小城镇和大都市那富于变化的生活场景中——她走了出来，到了欧洲，在德国渡过了几年，在柏林大学教书。她先是为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吸引，因受此牵连，她在美国的监狱里被关押了好几个星期。而与此同时，她对东方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无论从出身还是阶级意识上看，她都是一个革命者，具有在其生涯中为谋求自立和受教育而拼搏出来的一切倔强本性。她肯定会到中国来，到这个除俄国之外，世界最伟大的革命运动正好受到最残酷镇压的地方来，这一点是必然的。

她终于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特约记者(在该报原先还比较倾

向自由的时候)，来到了上海。在中国，她不仅终于找到了足以吸引她投入全部精力的工作，而且发现这些工作比印度民族主义者那蒙昧不清、错综复杂的革命意识完全有意义得多。她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混沌不清、印象主义的，但热情而带点片面性，为一方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实际上是首次把在中国进行的社会各阶层的斗争实况，介绍给了广阔的国际社会。她有一个集体英雄——中国红军，她还掌握着极出色的写作素材。不管批评家们怎么认为，她终归使朱德、贺龙、毛泽东，这些她所钟爱的红军指战员们，成为杜塞道夫、底特律等城市工人心目中的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

我在一张名片上潦草地写道：“我认得您在上海的一些朋友。”交由茶房送了过去，心中对会受到怎样的接待一时还吃不准。我在旅馆的休息室里等着，感觉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审视目光。

一个大约四十开外的女人跨着大步，顺走廊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我的名片。她个头不高，体格健壮，有着饱经风霜的棕色面容，留着短发，眼神特别的机敏、灵活、坦率。

“贝特兰先生吗？”这声音听上去很刺耳，似乎含有敌意。她穿着红色的羊毛衫，褐色裙，脚上穿着很厚的粗革厚底皮鞋。

“是我”，我说。“你不认得我，但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些你所熟悉的人。”我道出他们的名子。

“不错，”艾格尼丝说。“那么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这是我早就想要问她的问题：但我还是解释说，我出于一种本能的好奇心理，想开明白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想就此写点东西。我和几家英国报纸有点联系，我补充说。

“什么报纸？”艾格尼丝追问道。我提到了《先驱报》和——我啜嚅了一会儿——《泰晤士报》。

“伦敦的《泰晤士报》对华一点不友好。”她的嘴像个陷阱一样猛地关住了。“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据我所知，你没准是个英国间谍。”

这真使人没法再说下去。“我是和一个东北人一块儿来的。”我说。

“你愿意见他不？我们正打算和孙铭久一道去临潼看看。”

孙铭久这个三周前还无人知晓的名字，显然对她产生了更有利的影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似乎很想见见这位俘虏蒋介石的人物，不过她对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在西安还认识别的人吗？”她问。

我瞎吹了一通，并提到了在张学良的西安日报里工作的那位年轻编辑<sup>⑤</sup>。所幸的是，她见到过他。

“对，我认得他。他是你的朋友吗？”

“我们过去在北平曾同住在一个房间。他会告诉你我不是间谍。”

“好，”艾格尼丝坚决地说。“我问问他。”

这就是我俩结识的开始。自我洗刷掉我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任何罪恶联系之后，这种关系发展得很快。但我很快便发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当地颇有名气。对于在西安的外国人来说(大多数是传教士)，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她在一个月前来到西安，就是为了发动一场革命。然而对于她曾安安静静地住在临潼，一边养病，一边专心著书的这些事实，却一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只是当蒋介石的到来搅乱了她那田园诗般的隐居生活时，她才搬进了城，在这座宾馆租了个房间。正是在这里，12月12日早晨杨虎城的军队闯进了她的房间——像里面住的其他客人一样——她失去了钱财和贵重的东西。即使在她身上发生了这种事件，也被说成是有意玩弄的某种高明的骗人把戏。因为传教士们坚信，在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有共产党插手，而共产党要做的任何事情，这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竟会不知道，在他们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了。由于他们对西安所发生的事件真相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这使他们可以信口雌黄，而他们也不曾放过一切可乘之机。

打从一开始，艾格尼丝就喜欢上了孙铭久，因为他象征着“直接行动”。我们乘坐两辆汽车向临潼出发。天气晴好，碧空如洗，西安12月份的气候实际上要比北平暖和得多。在蒋介石被释放后的这几

天里，这里的一切都多少带着点喜庆气氛。一度看来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似乎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了。

在临潼城外，一些飞行员正在忙着整理一架小飞机。这架飞机停在距华清宫不远处的空地中间，显得非常醒目。飞机上的巨大漆字表明，这是由北平市政当局捐献给委员长的生日飞机。它于“双十二”早晨极其熟练地采用“三点迫降法”在此着陆，显然是企图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把蒋介石抢救走，但立即为东北军所俘获<sup>⑦</sup>。现在它与其他南京飞机一道，正要被送还南京。

我彻底考察了华清宫，孙铭久给我们指示了那个令人难忘的早晨事变发生的现场。我们爬上了冰封雪冻的那面山坡，蒋介石开始就是从这里逃往山上，结果在“老虎石”后面这个荒凉的避难所里遭擒(就是在这个地点，有着树碑立传痼癖的中国人，已开始兴建一个亭子，在那块石头的正面刻上公开加以颂扬——也许并非没有预见性——的说明文字，“正是从这里，我们的救国运动开始了新生”)。苗剑秋的情绪处于最高兴奋点，他坚持要与他的两位朋友在昔日蒋介石的卧室外照张相。他正在从对那天的追忆里获取最大限度的喜悦感。

然后，他出去在著名的骊山温泉洗了个澡。中国流传最广的美人杨贵妃，用她所钟爱的大理石板在这里凿了个浴坑。我一直在同张学良的一位表弟<sup>⑧</sup>用法语谈话，此人曾在法国凡尔赛学习过航空。他快活地戴着那顶帽檐压在一只眼睛上的便帽，说起西北的前景便兴致勃勃，叫人直管放心。“不过张副司令(这位聪明的统帅)根本不应该到南京去，这么做毫无必要，而且对他来说也实在太危险。”

苗剑秋洗罢澡回来，显得满面春风，他非常喜欢临潼。“我在被放逐时曾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月，”他告诉我说，“少帅说他再也不想见到我，因为我看上去像个日本人。因此我在温泉休了一个月的假。”似乎他在西安所度过了的大部分时间里，或者是受到高度的宠爱，或者被放逐不用。他把西安城上的一座塔楼指点给我，说他就在那里被关押了好几个星期。我能理解他的那些有点过于狂妄的计划，这些计

划如果不顾情况允许与否便盲目提出，就会不受欢迎。但由于他有一股子抗日热情，因而在“少帅”看来，这足以抵偿他的盲动。

这三个策划了逮捕那位“独夫”计划的东北人都还很年轻，而且他们对此都感到非常自豪。“你知道，”应德田对我悄悄说，仿佛一提起这事就犯了泄密罪似的。“在开头的那三天，蒋介石唯一的一次露出了笑容，竟是在我们把他的假牙还给他的时候！”苗剑秋和应德田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孙铭久是个武夫，两年前在汉口时他还只不过是张学良身边的一个不成熟的青年军官。但他们都具有热诚无私的品质，这种杰出的品质无疑对他们的年轻司令产生了影响。而我也能充分认识到，他们对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分量。正如在以后几周内所显示出来的，他们所不愿见到的，就是随着蒋介石的被释放，所出现的那些无休止的谈判，以及中国式交易中斤斤计较那些琐碎问题这样令人烦恼的插曲。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带着几分洋洋得意的神气驱车回到西安。无论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局面，他们都做好了迎接的准备。我想起在武汉政府垮台之后，精疲力竭的鲍罗廷在回俄国时对这些中国人所下的那段尖酸刻薄的评语：“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切都好！”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他对军国主义思想和传统的中国官僚主义体制在许多热情的年轻指挥官身上所产生的致命的影响，见得够多了。发动中国革命的是中国的年轻人，而率先牺牲的也总是他们。但青年人也能从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自从 1931 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既造就了一批现实主义者，也培养出了革命党人。

在西安，即使委员长被释放之后，也还有相当多的新闻消息，而我所焦虑的就是如何把一些消息传播出去。但当时的新闻审查制度——一种由西北当局和南京都在实行的双重新闻审查制度——则是反复无常，变化不定的。但过了不久，这个问题便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新闻审查制度就像一个把我们裹得严严实实的幕帐，顿时被打开了。

在此阶段，我深知官方人士的陈述要比个人的感觉印象更会受到

重视。我一到达西安，就一直设法采访杨虎城，因为自“少帅”离开西安后，西北地区的总司令实际上就是这位陕西将军。艾格尼丝认识他的一位在德国留过学的秘书，他是一位看上去老是睡眠不足的年轻人，但他那宁静的外表却蕴含着一股不知疲倦，永远生机勃勃的精神⑨。他设法给我们与这位地方军阀安排了一次约会。

杨虎城的司令部设在一个被叫做“新城”的地方，这是西安城内的一座有城墙环绕的巨大城堡。“新城”这个名称并不那么贴切，因为这个地方早先曾是唐朝的宫殿，一度还是皇帝“禁城”的所在地，而后一直不曾有过变迁。除了不时建于其上的现代机关枪工事外，对于那些炎阳下巍然高耸的城墙来说，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早先的唐代建筑物已荡然无存，我们在一所舒适的房间里等着这位“叛乱”司令的接见。这所屋子里的家具都是中国式的，而使人真正感到舒坦的却还是因为有安乐椅。

“杨匪”，他通常还是被这么称呼，既有好名声，也有坏名声。他以前的经历是人所共知的，像许多其他的中国将领，像满洲的“老师”张作霖一样，他起初也是作为一名地方首领，凭借自己的精神力量和坚毅的个性，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直到最终获得官方的承认。而老式的中国政治轮盘，也总会给揭竿而起的年轻军阀们带来成功的机会。在 1926 年，当北方的将军们联合起来抵抗来自南方的国民军挺进时，杨虎城正好控制着西安。他宣布赞成国民革命，并在刘镇华军队的持续围攻下，坚守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直至最后为冯玉祥所解救。这就是杨虎城禀性的最显著特征(就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英国指挥官一样)，在他据守该市期间，居民中有三万五千人死于饥荒。

困围困而坚贞不屈的英雄业绩使他赢得了杨虎城——“城中之虎”的美名，然而在全陕西，在这个他的名声不容忽视的地方，人们只知道他的那个不那么显赫的小名“杨久娃”(我们发现许多陕西农民只认得他的这个名字，而不知道还有其他称呼)。南京所封的“陕西绥靖专员”这个官衔更增加了他的气势，因而他一从日本访问归来，便

在自己的故乡省份建立了牢固的统治。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削弱土匪队伍，而在他当政的那个时期，在贫困的打击下，西北地区的土匪多如牛毛。杨虎城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他认识自己省内最大的土匪头子，于是邀请其中的五个人到他的衙门赴宴，在宴会前便将他们射杀在院当中。

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双十二”运动中，把自己的命运与张学良紧紧拴在了一起。如果让他独行其是，蒋介石还能否再见到南京，可就难说了。在许多人看来，张、杨的合作是不可思议的。众所周知，这只“陕西虎”并不欢迎东北军进入他的势力范围。然而，当他认识到这些“剿匪者”无意侵占他在该省的个人权益之后，便毫不踌躇地对张学良所倡导的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政策表示同情。据说这位陕西将军坚决主张抗日，猛烈抨击南京的“投降政策”。也许他厌倦了平淡无奇的生活，曾想参加那年秋天的广西——广东运动，但受到“少帅”劝阻，要他静待时机。现在他是这个叛乱省份的“新军委会”的副主席，也是“抗日联军”的代总指挥，我们急切渴望及早见到这位北方莽汉。

那位说德语的秘书回到屋里，带来了一位体格高大健壮的汉子，只穿了身朴素的蓝工作服，没有佩戴表示级别的任何证章。“杨老虎”一点儿不拘礼仪，摆手示意我们入座，然后带着点木然的神情等着我们发问。当我们用德语提问，通过他的秘书转述时，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和蔼态度，几乎是亲切的语调回答我们的问题：这与他那斗牛士般的体魄和被说得可怕的名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有这种感觉，他说话之所以这么和蔼可亲，是因为如不这么节制，他就会吼叫起来。我们首先问道，以逮捕委员长为开端的这场富于戏剧性的事件的目的和意义。杨虎城用当地报纸常见的那种措辞回答道：“我们强烈恳求蒋介石将军在关于内战和抵抗日本这类重大问题上，尊重并采纳人民的意见。为了阻止内战的进一步蔓延，为了团结全国的一切力量抵抗我们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被迫对他采用了强制性的劝说手段。我们在西北的运动与整个国际和平阵线紧密相关。”

我问：“西北的这场运动和李宗仁、白崇禧最近在西南搞的所谓‘抗日运动’有何不同？”

“我们不能用权威的口吻代表西南说话，对于任何真正的抗日情绪，我们理所当然的给予最大限度的同情。但西南运动的纲领不清楚——它并未阐明如何实现其运动目的。我们的纲领则很完善：它集中体现在张少帅宣布的八项基本原则中，这项计划中的部分内容，现在也已经得到了贯彻实行。

就某些外国报刊对西安发生的反叛行为产生原因提出的那些极其矛盾的评论文章，我们接着提出了看法。其中叫骂最凶的是莫斯科的报道，它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日本人的阴谋，而汪精卫则是其主要代理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杨虎城的话(我猜测)不便被发表出来，但他最不伤人的评语，译过来就是：“我们从来看不起像汪精卫这样的小人。”至于东京的报道，则把这一切都说成是由莫斯科和第三国际策划搞的，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加重了语气：“不，这不是事实。说莫斯科或第三国际幕后策划了我们的这场运动，是完全低估了我们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自身价值。但我们也深切感到，苏联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对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自发进行的民主运动寄予同情。”

“怎样才能说明它是民主运动呢？”我问。

“首先，它表达了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害的满洲和华北的广大人民的意志。我们的许多要求是基本的民主要求，是为了确保人民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在西安这一带，我们已经释放了政治犯，我们宣布人民有集会和爱国结社的自由。我们相信，为了使我们团结一致，保卫自己的国家，充分的政治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我感到，我们正开始摆脱礼节性拜访时说的那些老套话，因为“民主”这个词，在中国还是个富于刺激性的字眼。我追问道：“你使用了‘统一阵线’的口号，那么，什么是它的具体含义呢？”

“抵抗日本侵略已经成为团结中国人民的一种信念。”这位陕西军阀言词铿锵有力起来。“我们的看法就是，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

机，一切党派利益都必须退居其后，都必须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阵线。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日前在中国它完全能够得到实现。”

“但中国真的强大到足以与日本打仗了吗？”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许称得上是在今日中国能够被问及的唯一最受关切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抛出的主要论据，总是说中国太弱，不足以在军事上抵抗日本。中国只有等到有了一支较为强大的空军，一支装备较为精良的国家军队之后，才能够谈得上抗日。正是这种论点，“决定了南京政府在一切危急时刻的外交政策；也正是这种观点，被反复宣扬，以至十之八九的人都真的相信了它。

针对同一问题，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今年夏天接受一位冒险进入“红区”访问的美国记者<sup>⑧</sup>采访时，用同样确信无疑的强调语气做了回答。毛泽东认为，中国真正能够与日本抗争的唯有一种战法，就是扩大尽可能广阔的战线，开展一场持续不断的抗日游击战，而对于这个战法，他现在和过去一样，一直就是准备着的。毋庸置疑，中国红军顶住了占绝对优势军队的镇压，这一纪录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这种战术的可能性：既然东北义勇军采用这一战术能把日本占领军搞得手忙脚乱，那么，如果全中国都处于武装暴动之中，结局又将如何呢？

我想知道有着真正战将业绩的杨虎城将军，会怎样解答这个问题。但他的回答更令人惊奇，因为他用的是心理学观点，而不是战略论据。

“谁能用抽象的理论回答这个问题呢？中国的力量不在于新式飞机或坦克——这些东西日本和中国都有，而且日本总是更多。但我们的真正力量就是我们懂得必须打日本的道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而是要面对‘必须’，迫不得已。一旦我们心中存有这种必须战斗的愿望，我们就能打下去。”

“这才是真正的回答！”这番话一翻译过来，艾格尼丝便热烈地

说。我也基本同意如下的看法：毫无疑问，中央政府过去政策的失误之处，就在于无视存在于大多数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这种积极抵抗愿望。我们对这位“杨匪”产生了新的敬意，他看上去似乎能够说到做到，而他本身就是个宁折不弯，至死不后退的人。

我们又问及从西安释放委员长的情况，并得到预期的回答：“长期以来，蒋委员长不懂得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见和要求，因为他总跟‘亲日派’分子交往。我们利用在西安这个机会，与他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说服他改变了政策，接受了我们的基本原则观点，然后我们便无条件地释放了他。”这句话听来过于简单，但并非毫无意义。

我们问到西北的军队是否都赞同释放委员长，杨虎城否认了这种看法，但(我觉得)有点勉强。他似乎认为当时的形势非常有利。“我们相信委员长的正直诚实，只要他改组了南京政府，与‘亲日派’脱离关系，他就会成为我们真正的抗日领袖。”

这时谈话已告一段落，我们便起身告辞。“但是，请记住，”杨虎城突然情绪热烈地补充道：“这次西安‘事变’并非偶然，也不仅仅是两个将军的行动。它是西北全体将士的一致请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

“我们的这次行动，并不夹杂任何个人仇恨。我们只想要进行抗日战争，并结束内战。我们没说过一句反对蒋介石将军的话，我们尤其希望能够与他并肩抗击敌人。我们的要求十分简单，这就是，对内和平，对外誓死抵抗民族侵略！”

“喂，你觉得杨虎城怎样？”我们离开后，我问艾格尼丝。只见她双眉紧锁，凝神思虑，但却不像是不同意。

“我不喜欢他那嗓门儿。但他也许还行——他本人曾是个贫苦农民。”她对有无产阶级背景的人总要留点情面。“总而言之，我并不认为我应该过于相信这个人。”

这次采访本身不错，要是发现有人相信这一事实就更好了。我发了一封电报。这也是我通过无线电路从西安发出去的最后信息。此后不久，全面封锁便开始了。

译注：

①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0——1950)，美国记者、作家。生于密苏里州北部一个村子的贫农家庭。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被捕入狱六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八年。在此期间，积极投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1929年初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与鲁迅关系密切，曾协助宋庆龄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外国报刊撰文报道江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及中国社会改革实况，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她的作品在国外反响很大，诚如贝特兰在本书中所说的那样：“不管批评家们怎样认为，她终归使朱德、毛泽东、贺龙这些她所钟爱的红军指战员们，成为杜塞道夫，底特律工人们心目中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人。”

②鲍罗廷(1884—1952)，苏联人，1923年9月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及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努力促进国共合作。1925年在广州为国民政府最高政治顾问。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回苏联，从事外文出版工作，曾任《莫斯科新闻》主编。

③这本书大概就是1938年出版的《中国的反攻：一个美国妇女同八路军在一起》。

④这是史沫特莱记述自己早年生活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出版于1928年。

⑤系指《西京日报》，事变后改名为《解放日报》。

⑥指张兆麟，时任《解放日报》主编。

⑦事变发生前，张学良曾密令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六旅同时行动，黄将张学良的电报交给了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祝即调兵抢占潼关，

并派一架教练机试图到临潼救蒋。该机于上午 10 时在华清池前降落，当即被扣留。

⑧指张学文，当时任东北军 105 师 9 团团长。

⑨即王炳南同志。

⑩杨虎城将军小名长久，乡人称之为久娃——见米哲沉所著《杨虎城将军传》。

⑪指埃德加·斯诺。

## 第十三章

### 宣传

我发现我那位当编辑的朋友在地下室的一间随着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而颤动的办公室里，一群年轻助手包围着他。他们把蓝学生服甩到一旁，只穿了件衬衫在紧张地工作着。在中国的办公室里，我还从未见到过这种活动场面。我所见到的办公室，通常都是设在一个宁静的地方，穿长衫的职员一边品着茶，一边用毛笔写写画画，摆出一幅悠然自得，彬彬有礼的神态。

张向我们打着招呼，一丝笑容浮现在他典型的宽大而憨厚的东北人脸上。’“噢，老贝！这下子你可来到叛乱者中间了。你就不怕丢了命？”

“我就豁出去了，”我答道。“那么你呢？”

几个月前，我在北平认识他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但人们都认为他将来定会成为一名前途无量的新闻记者的。在学生运动中，他表现得很突出。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只是由于一伙女学生(她们非常爱戴他)的生拉硬拽，才扯着他的腿把他从警察手里抢救了出来，使他免于被捕。他是个东北人，早先来自沈阳，离开大学后，张学良安排

他在新创办的《西京日报》当编辑。这份报纸是作为西北运动的喉舌而创办起来的。

此番在西安重逢，我再度为他的突然成熟而感到震惊。这种迅速成熟在这些为了投身于一种责任重大的工作岗位，而抛却大学校园的那种有点令人伤感的生活环境的中国学生中间，是经常出现的。张一直是个勇于负责的人，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便成了一名极为称职的编辑，和一位非常严肃的公职人员。

“你看见了吧，我们的确很忙，”他对我说。“干这项工作要经常加班。我印发自己的报纸，因为眼下我在宣传委员会工作。敌方针对我们西安方面的情况撒了那么多的谎，而我们却无法有效地反驳他们。这些你都见到了吧？”

他递给我一卷上海英文报纸的剪报。为首的一份报纸宣称：按最保守的估计，张学良以八千万美元的身价释放了委员长，这笔钱有一半由中国银行的行长宋子文带到了西安，其余部分被储存到了国外，放在少帅近期将去访问的地方。即使在日本人看来，这也称得上是篇精彩的报道。

他继续忧伤地说：“你听说过东北军士兵采用什么手段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了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警察局长马先生现在已经回到了南京。”他叹了口气，然后又高兴地说道：“但我希望你能发出一些关于西安的真实报道。

“我将尽力而为。不过老有新闻审查——他们把我对杨虎城的采访删去了三分之一。此外，邮寄也很不可靠。”

张若有所思地说：“最好是通过无线电广播。你知道，他们无法审查这个。我们有一套固定韵英语新闻广播节目。”

“他们可能会施放信号干扰，”我说。“不过这是直接传播消息的唯一途径。谁在主持播音工作？”

“我开始试着用一个中国人讲英语，但别人很难听懂。这时，史

沫特莱女士自愿提出帮助我们。她现在每晚都在做着这项工作。”

“声音能传播出去吗？”

张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地说：“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蓄意干扰破坏便是其一。但有时在上海也能收听到。”他看出了我的一个问题。“要是你想接触外国报纸，这倒是一条途径。你瞧，我正好负责编制广播节目。”

“这事我要跟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说一声，”我说。“此外，我希望你能让我看点这些英文报纸。”

他给我了一大捆。这些报纸都是他从没收了所有入境邮件的当地审查机构那里挑选出来的。由于这一安排，艾格尼丝和我在西安成了能够尽情享用英文报纸的唯一外国人。这实在令人不敢相信。这些报纸通常是一周多以前的旧报，但这没关系——我们很快便习惯了。我们所读到的那些有关西安所发生的事件的报道，着实令我们惊诧不已。它使我们看到了世上竟然还有如此至为新鲜活泼和富有高度想像力的新闻学杰作。

当天上午我在返回旅馆途中，遇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肩挎一只急救箱，正要到街上去。

“你想不想去探望那些获释的政治犯？”她招呼我道。“我正打算顺便去看看那些妇女。”

“当然要去。”我一边说着，一边快步跟上她。要跟上史沫特莱的步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她走起路来就像红军。她带了个翻译——一位在孙铭久手下做救亡工作的年轻北京学生。这是一个看上去很滑稽的年轻人，因为他在爱国热情的冲动下剪光了头发，而这幅神态又与其身份不相称。不仅如此，为了表达他做“自我牺牲”的愿望，在这样的隆冬季节里，他除了一身薄棉制服外，什么也没穿(因为他说，英勇的抗日战士现在每人只有一件毛毯，他不想穿得比他们更舒服)。这么做的结果，使他经常感冒。他却暗自为此而感到高兴，把

这视为是他做出了自我牺牲的标志。

有许许多多关于这些“爱国学生”的荒唐行为。但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由于他们的生活极其贫困，大学生活是能够找到工作和谋生的唯一机会，这种行为却始终是纯真的。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宁可不要这种大学生活——尽管这也是他们的唯一生活出路——而要的是——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要爱他们的国家。我不知道给我当翻译的那位姓刘的可爱朋友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也许他已经参加了红军，在那里他们是会教他照顾好自己身体的。

我们所经过的街道上，挤满了士兵、运输车辆以及通常的那些熙熙攘攘的市民。偶尔也遇到过穿着鲜艳的丝绸服装，茫然失神的面容上擦着厚粉的唱歌姑娘外出散早步。西安很久以来就是个军事重镇，贸易十分兴旺。在教会学校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刘，只要一碰上从那些涂脂抹粉的妇女那里大着胆子瞥来的目光，便羞怯得像个受了惊的小马驹一样，直往我们的另一边躲藏。

在一座过去曾是官方和国民党某个机构的大建筑物里，我们找到了女囚。她们中有四十多个是女红军，是在大约一年前政府军与红军作战时被俘的。她们是来自四川、湖南和陕北的健壮农家女子，穿着棉衣裤，黑发刮落在眼皮上，使她们看上去有点像爱斯基摩人。她们散坐在楼上一间屋子的地板上，一声不吭地为士兵缝制着被褥。

她们愉快地和艾格尼丝打了招呼，因为她们对她很熟悉，并对她的医术非常信任。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需要照顾，而她们的处境也使我在刹那间对中国的狱中生活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们花了一两个小时为她们清洗伤口，包扎感染处，并毫不吝惜地使用碘酒，因为这种药物那晶黄色的斑点一般很适合她们的病情。可是当遇到那些在长征通过西康的雪山时被严重冻伤的手脚时，我们便完全无计可施了。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当时曾跟随着毛泽东。有两、三个人的病情实在太严重，我们只能请医生来看。“我去设法让他们给找一个医生来。”艾格尼丝说，我知道她是会这么做的。

“其他的政治犯怎么样了？”我问。

“已经释放了三百名男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被编入各部队。但还有一些孩子们，我也还没有去看过他们呢。”她把脸转向我们的学生同伴，只见他正带着厌恶的表情在注视着清洗女囚脏脚的全过程，而且显然急于离开。“红军孩子们的情况怎样？”

刘翻译立刻变得兴奋起来。“他们在抗日先锋队的队部里，我们现在就能去看他们。”他动作麻利地在前面带起了路。

红军娃娃，或红小鬼，在中国很有点名气。他们是这支农民队伍的情报员，受命采集情报，并常常接受输送特别重要的秘密信件的任务，因为孩子们能够通过那些成年男女会引起猜疑的地方。

我们钻进一所阴暗的小院子，发现了一批约 40 来个少年，依然穿着黑囚服，戴着黑便帽。“双十二”之后，他们全被从西安的监狱里放了出来。他们曾作为“危险的颠覆分子”而被关押在西安的监狱里，这些孩子的年龄全在 12 岁至 16 岁之间。

“你瞧南京究竟都在对什么人开火！”我们的向导，这支青年连的学生连长说。他笑微微地把我们引荐给“少年儿童先锋队”的“突击队”队长。这是个面容严肃，只有 11 岁的少年，他勇敢地挺着胸，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个英雄人物。“他在情报处工作，曾把两团政府军带给了红军。”这话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无疑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批孩子大都来自四川，是徐向前领导的红四军团的下属。他们中有的根本没有家，许多是失去土地的劳工或贫苦农民的儿子，从自己的家乡跟上了红军。还有两三个来自广西和湖南，参加过穿越七个省到达西北的长征。虽然他们的年龄那么小，但言谈举止却俨然如大人。在他们的眼光里有一种坚定的神色，这神色本身就能说明他们那用冷眼看着的苦难故事。他们是一批令人大为惊奇的少年伙伴，理所当然地也赢得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心。这些“小红鬼”的英雄业绩是她最喜闻乐见的。

“你是从哪里来的？”她问一个男孩子。这孩子尖顶帽下的那冷峻的目光咄咄逼人。

“四川。”

“你的爸爸妈妈都干什么工作？”

“他们是劳工，他们还在四川，我没有兄弟姐妹。”

“你能读书写字吗？”

“当然能，我是在红军里学会的。”

“你在红军里做些什么？”

“我在情报处工作。”

“你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参加红军呢？”

“为了我们的民族解放而战斗！”

他已经受到过教育了，最后的这句回答远非是一句口号警句。在他这个年龄，大多数孩子还只知道在街头上乱跑，或者(在中国)骑在牛背上放牛，而这些少年儿童却肩负起了成年人的责任。

他们现在被组织起来，加入了“少年儿童抗日先锋队”。除了规定的学习任务外，他们要花很多时间演唱爱国歌曲，准备在西安的初级小学里做宣传工作。这就是国民党报纸大肆宣扬的所谓“匪徒”中的一部分。在实际战斗中，他们要比正规的红军战士更令敌人害怕，因为他们全然不顾及自己的生命。而许多投降红军的政府军也承认，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些对文明战斗规则一无所知，光知道射杀的“小鬼”。

他们现在看来毫无恶意，神态严肃而庄重地给我们唱了一些他们的歌。我想起了在北平的夜晚听到的那首红军进行曲，而在西安，我们却能够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唱这首歌。

艾格尼丝为他们那单薄的衣服和没有一丝热气的住处而惊骇不已，以她特有的脾气提出请求，要求给孩子们添置新衣服和毛毯。当

我们被告知无钱给他们购置毛毯时，她寻衅惹事般地地质问道：“那要你们这些委员会是干什么吃的？这些孩子们需要受到照顾。我要求从军委会里拨出一笔专款。”

这支少年儿童的“先锋队”获得了他们的毛毯。但当我们离开时，我倒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还有那些革命运动，孩子们会像他们一样从事这样的工作，从而以危害社会的罪名遭到枪杀或终生监禁？我开始理解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中国红军的那种近乎狂热的感情。

我在西安逗留的时间够久了，也看够了“叛乱者”的那些活动，从而认识到外国舆论所描绘的那幅景象是多么的不真实。这座城市平静而井然有序，所有的社会团体依然沿着熟悉的救国路线继续前进。就我所见，除非是政府为了挽回它的面子，执意发动战争，这里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危险。

“我们一定要为这里的新闻事业做点事情，”当晚我就对艾格尼丝说。“你都播送些什么呢？”

“真理，比南京的新闻更可靠的真理。”她正言厉色地答道。“不过我不想让任何外国人听出我的声音，否则他们就会说红军在西安四处活动。他们对此已经说得够多了。”

“那好，你已经出了名，我则没有。我们俩所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设法把消息直接传送出去，而电报和邮寄都无法利用。我倒乐意广播新闻节目，或讲述我亲眼见到的那些个事情。”

“好”，艾格尼丝说，“今晚就和我一起去广播站，我们试试。”

这是我俩联合播音的开始，这次播音在中国很快便出了名。通过这件事，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西安电台是个非常紧凑的小天地，诗情画意般地坐落在市中心的一座古老宫殿的后面。由于它实际上是维持西安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因而始终警卫森严。凭着一张军事通行证。通过沙包工事和瞄准着外面广场的机关枪，我们才能够走进大门。大院内时刻都有哨兵在来回巡逻，他们在尚未辨别出来人之前发自暗中的猝然喝问，往往会使人不由得惊慌失措。

我平时总来得晚一点，因为在晚上九点以后，由于西安街道都实施了军管，根本不可能准时上班。在高耸的无线电发射塔下面，有个小小的现代化播音室，地下铺着蓝垫子和中国地毯，里面摆设得十分漂亮。我们盯着钟表，悄悄溜进用布帘子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门，这时便有一个穿长衫的仆役毕恭毕敬地献上茶来。然后，艾格尼丝便把双肘稳稳当当地往麦克风前一放，开始播音工作，而我通常则要先整理一下未完成的笔记。

在隔壁的机器房门口，有两个高大魁伟的东北军士兵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犹如钢铁卫士一般。他们的步枪上插着刺刀，目不转睛地看管着那些在严寒中忧心忡忡的技术人员。每个广播电台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气氛，然而在西安，却增加了一种革命与反革命相互斗争的恐怖感。我突然认识到了电台在任何政治运动中的至关重要性。只要XGOB(西安革命电台)继续发挥着作用，南京就无法根绝从西安传来的消息。

我们俩人把当天采访来的消息分了一下，有时也对西安及其周围乡村进行的各类活动稍加描述。我们竭力表现得客观一些，而对于所播事实是准确的这一点，也一直使我们深感满意。但艾格尼丝说话大刀阔斧，不太适合于宣读外交声明，而且特别喜欢谈论“群众”。事实上，她在这个词的发音上，“a”发得是开音节的[a:]音，而破擦音的发音则非常有力，这就使得——我对此毫不怀疑——任何一个哪怕只消和她交谈过两分钟的人，都能辨认出她的声音。相比较而言，我模仿英国

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

广播电台那流畅的语调，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受感情影响。在西

安这段时间里，我们认为自己干得相当不错。

但：XGOB 广播电台面对的是一个敌对的世界。我的朋友张兆麟，他也是广播电台的主要创办者，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像现在每晚用英语定期播送新闻消息一样，还打算安排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的新闻广播。这样的话，“西安广播公司”就真正成为国际性的了。然而不幸的是，它被视为众矢之的。南京、汉口以及其他一些更强大的电台，采用同等波长，以女妖般的声音对它实行干扰，使得它在晚上听起来令人恐怖万分。即使在西安，西安播放的节目也没有几个能够被清楚收听到。东北大学无线电专业的学生们无休止地讨论这一问题。没过多久，问题便被发现了，原来是西安电台台长(显然是一名优秀的国民党员)利用调节频率强度，暗中进行着干扰。在这些暴怒的警卫发现他的鬼把戏之前——他们对派去看管的机器一窍不通，他便被抓获了，置于严密的监押之下。但一方面有来自内部的毁坏，一方面又有南京方面从外部实施的强电子对抗，西安方面的大部分消息无法传送出去，便不足为怪了。

我们每晚都要从电台返回去，在艾格尼丝的屋子里煮咖啡。在那些晚上，形形色色的人们——新闻记者、学生、官员、士兵都在漫无目的的悠逛中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和他们谈论总的形势，或推测日本人可能要采取的方针。抛弃了大部分家庭享受的艾格尼丝，依然保留着美国人嗜好鲜美咖啡的兴趣。她非常熟练地把咖啡放到一盏酒精灯上煮，惹得我直眼馋。

一天夜里，有位穿卡机布制服的瘦高个年轻人走进屋来，还带着位朋友。他那优美的姿态，健康而黑中透红的脸颊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个红军的指挥官，曾和彭德怀在一起工作过九年，战斗在湖南广西一带，然后长途跋涉到了陕北。彭德怀是艾格尼丝所喜爱的红军领袖，她熟悉他打过的每一个战役。那位新来者惊喜地发现：在谈到某些激烈战役的情况时，这个外国人居然还知道南方的某些偏僻村庄的名字，偶尔还能插上几句她的耳闻。他们的交谈勾画出了中国红军十年来的非凡历史，听起来就像读司汤达①的小说一样生动有趣。

“是的，那次就是在湖南，矿工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拿着镐头铁棒进行战斗，我们缴获了 3000 支步枪……那片山区天气很冷，连一块平地都没有，我们只好靠在树桩上睡觉……那次撤退时，游击队顶住敌人整个军团的进攻达两个月……渡过那条河的任务很艰巨，要把印刷厂运过去，而‘白军’则整天都在发动进攻……那次战斗后，我们解除了五千敌人的武装。但我们把枪又还给了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那位同志没被用枪打死。他们把他装在木笼子里整天游街示众，他是被拷打死的……”

通过这种讲述，女格尼丝体验到了每场战斗，虽然她从不承认这一点。正是这些传奇性故事——步枪、手榴弹与飞机、炸弹和重炮在力量上的悬殊差异，在没有食盐，没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他们为了那个被完全隔绝于丛山之中的小小江西共和国的生存而斗争。而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所使用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也只有柏林训练出来的具有高度发明才干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才能够从那些最原始的材料中即兴创造出来。其中的某些故事她已经讲过了，但还有许多——在江西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长征，以及经过多年各自为战后，四支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她都不曾听说过。也许，在当代，这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传奇故事，也是最少有人知道的故事之一。

正是在那弥漫着咖啡香和纸烟雾的漫漫长夜里，我才真正认识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我的想象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性格极为活跃，而且不近情理。艾格尼丝的个性算够活跃的了，但与此同时，她却是我见到过的人中最富有人情味，最招人喜欢的一位。她的所有判断，都发自直觉或感情上的冲动：她既是这个世界最强烈的仇恨者，也会被视为是朋友们中最慷慨大度的人。真诚欢迎明枪明刀地战斗不仅造成了她的不幸，而且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来自背后的造谣中伤。对于这些，她似乎无法避免，这是因为，当一个妇女像艾格尼丝那样写出她自己的生平经历时，她就无须再刻意表白自己了。

中国革命在她的血管里流淌。她为此而生，为了这个目的，她多年只身生活在潜伏于上海阴暗的胡同弄堂里的恐怖之中，生活在这个

枪手异常便宜，唯有船夫们船上的桅杆，才能搅动苏州湾那污泥浊水的地方。她是个外国人，在这个只要有本国的巡洋舰在扬子江上做其后盾，外国人便可自行立法的国度里，她有权要求享有一个美国公民的所有特许权利。要求受到给予那些与帝国主义有牵连的许多令人可疑的冒险家们同样的保护，是她提出的唯一要求，而正是这一点，才使她幸免于她的许多朋友们无法逃避的命运。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一次她向我解释道：“中国革命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残酷的革命。多少千百万人在死去！当一次洪水或灾荒会使数百万人丧生的时候，在这个国家死人要以百万来统计，但革命依然在前进。尽管存在着背叛、酷刑拷打和失败，它的领导者却始终存在着。这里存在的那种残酷，比之于人们在俄国、奥地利，甚至德国所不得不面对的一切罪恶行径，都要更严酷。我认为它的革命甚至需要人们具有更大的勇气。”

在她来华的全部岁月里，艾格尼丝还从来没有与红军——这支她心目中战无不胜的革命旗帜在一起过。现在她终于到了西安，随着因

“双十二”事变而引起的奇妙形势，她终于获得了一个从正面进入“红区”的机会。我能看出，她迫不及待地要抓住这个机会。

当时只有一个外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到过“中国苏维埃”的首都，与那些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乡村地区广为流传的红军领袖——贺龙、彭德怀、朱德、毛泽东举行过会谈。斯诺的这次旅行发生在1936年夏天，回来带的是一名记者在中国所能搞到的最珍贵的真正“独家”新闻。我可以看出，艾格尼丝私下决定：她至少要成为进入西北“红区”的第一个外国妇女。

她期待的时间够长的了。然而归根到底，她还是没有失望，尽管她不是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时期找到红军的。

译注：

①汤达(1783—1842)，法国作家。

## 第十四章

### 新年好

元旦节，我一觉醒来，就听得大街上一片歌声。透过旅馆的铁门，只见数百名列队前进的学童手执小彩旗，迎着惨淡的阳光挥舞。铜管乐队在远处发出颤音，勾起人们对“救世军”<sup>①</sup>的阵阵追思之情。全市的人都涌上了街头，为了庆贺新年，宣布放假三天。

中国的“新年”尚未正式到来，这通常要等到二月以后，常常伴随着一场瑞雪的降临，才是真正的“春天”开始。但西安此时正在和传统观念决裂，按西方历法迎接新年的习俗受到了欢迎。在我的记忆里，那天的活动是以在机场举行阅兵式和群众大会拉开序幕的。

休息室里挤满了穿着绸大褂、别着纸玫瑰花饰和参加典礼用的红绸带的官员。我们在漫无边际的红旗下游车直奔飞机场。大街上排列着无数面国民党的旗帜。到处是一片红，富有革命特性的鲜明红色，正是中国欢庆纪念日的传统色彩。

艾格尼丝把我们周围旗帜上的口号统统抄了下来：“迎接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到来！”“谋求内部和平！枪口一致对外！”“祝愿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的胜利！”当我们经过时，孩童们挥动着手臂，一队队年轻学徒们边走边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所有公共建筑物的入口处，都树立着庆贺节日的红色装饰性“牌楼”。在市中心宏伟的钟楼四周，贴满了在“国民阵线”旗帜下的工、农、兵、学、商共同前进的大幅标语。

飞机场宛若狂欢节的现场。三排军用飞机被调来参加检阅——全是“双十二”后被扣留的南京机群中遗留下来的。好奇的市民们聚集在这些美丽而具有毁灭性作用的机器面前，它们是意大利和美国工厂的最新产品。担负守卫任务的士兵站在市民跟前，与这些看热闹的人

们又说又笑，随便交谈。军队和人民之间以往的一切隔阂都烟消云散了。

辽阔而空旷的机场展现在眼前。在冬雾之中，朦胧可见对过远处绕边缘排列的军人队伍。飞机在空中编队飞行着，在靠近检阅席边的场地上，挤在一起的人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期待着阅兵式的开始。我们发现了许多朋友，因为我们在西安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此时都来到了飞机场。

杨虎城和他的同僚们来了，他们受到鸣放礼炮的欢迎。这时一股白烟漫过机场，受阅飞机掉头往下，低飞着掠过看台中央。阅兵式正式开始了。

中国人具有显示和炫耀自己的天赋才能。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断言，大多数中国军队更适宜于接受检阅，而放在别的方面就不行。世界上最壮观的演兵场，恐怕要算是北平城外的开阔平原了，乾隆皇帝在那里曾经常检阅他的军队，并依托山形修建了城墙和瞭望塔，为演武练兵提供了场地保障。与此相类似的一种炫耀精神，在某些方面也被带进了西北方面军队在西安举行的这次新年阅兵式上。

阅兵式开始之前，杨虎城和随从军官们乘马检阅了部队。一队打着红色国民党大旗的骑兵在他们前面为先导，远远望去，只见他们走过武

装队伍，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检阅团方回到主席台上，这时号兵吹响了阅兵的进军号。从东北军和西北军抽调来的一万战士，参加了这次检阅。

首先过来的是东北军队伍，挎着步枪前进，头上的灰皮帽给他们凭添了几分野气。他们的每个连队都配有五挺机关枪和现代化的欧洲卡宾枪。接着走过来的是杨虎城的军队，这些陕西汉子的装备不怎么好，但前进的步伐却雄伟壮观。最值得一看的还是疾驰而过的东北军骑兵，他们的那种蒙古小马驹使劲喷着响鼻，鬃毛迎风飘动。军用卡车方队也开了过来，载着支在炮架上、由士兵操纵着的轻型防空炮，

跟在最后一支队伍后面。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场面，当压阵的军乐队通过时，天已过午，演完了这次检阅的最后一幕。

“您瞧，我们能够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多么强大的基地！”我的那位当编辑的朋友不由赞叹道。他带着一个红绸带，正忙着为他的报纸收集第一手报道材料。“我们有中国最优秀的骑兵，有最卓越的领导——包括红军指战员在内。蒋介石派往西北打剿共战役的所有武器装备，都被我们缴获了，只要有驾驶员，我们甚至拥有南京最新式的飞机。我们有马占山负责指挥的骑兵部队，有我们这三支军队的团结，我们就能够使日本人在内蒙古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当时在西安，这种观点迷惑住了许多人。西北实际上是牢不可破的，它是在华北开展抗日活动的天然基地。由于有三十万训练有素的军队(东北军、西北平和红军)，有设在西安和兰州等基地的物资的充分供应，它的军事行动能力是相当可观的。不幸的是，没人欢迎这种行动——尤其是南京政府，当时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业已暴露于日本铁蹄之下，海防极为脆弱。而当时形势严重的最明显标志，是日本政策的突然转变，即从过去的那种富于侵略性的政策，极不寻常地变得要真心和好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刚一传出，绥远的战斗便突告中止，从而使南京得以抓住一切时机，恬不知耻地去平息西北的动乱。日本外交使团再次察觉到，有一种最出乎他们意料、最不受欢迎的情况就要出现了——中国的军队中的一批精兵悍将，为了反对日本对华北的入侵，采取了联合行动。

阅兵式结束后，接着举行了群众大会。开会的通知是用扩音器广播的。学童和市民们环绕讲台，聚集在露天场地上。军队把武器成堆架在场地的另一端。他们现在已经散列，聚拢在人群的外围。张兆麟在讲台上给我找了个位子，从这里环视台下，只见万头攒动，旗帜如林，极目远眺，只能看见士兵们的灰色军装和帽子，而看不见面容。

大会一开始，首先对着孙中山的画像举行了例行参拜仪式。画像被放置在讲台的后面，面前供奉着水果和面饼。宣读完“遗嘱”后，

接着便深深地三鞠躬，无边无际的人海一起一伏，犹如风吹动庄稼地里的玉米秆一样。然后杨虎城以西北军事首脑的身份，发表了新年致辞。

杨“老虎”并非是演说家，他似乎已经把讲稿背熟了。他身穿将军服，戴着白手套，站在麦克风前显得不那么自在，相比之下，他骑在马背上时倒显得轻松一些。然而，就在此时，他以那强有力的嗓门开始了讲话。

“这次庆祝会与以往任何一次都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过去，我们的国家每年都因内战而陷于分裂。如今委员长已接受了人民的请求，我们将不再有内战了。爱国运动将不再受限制。国内各政党将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

在我们看来，他的话说得非常乐观，人群对他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在扩音器旁出现了一个身材修长的汉子，有点像美国的拉拉队队长，领头高呼起了口号：“抗日联军万岁!”“保卫西北革命基地!”听众的口号犹如汹涌的波涛，滚滚而来。

对于我们这些在中国早已见到过军队检阅的人来说，这次大会最使人感兴趣的，就是市民与军人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他们混合在群众堆里，一起高呼口号。此情此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讲话结束时，杨虎城指出了这一点。他对“士兵同志们”说道：“联军士兵们，你们一定要明确今天举行军事检阅的意义。以前的检阅，只是对帝王，或最高统治者来进行的。但今天你们所接受的检阅，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首长，而且也面对着全西北的人民，面对着你们在救国运动中的爱国同志们。你们自己的人民大众想要亲眼看一看，看一看你们的爱国准备和决心。”

这套措辞实在太令人熟悉了，但却引起了周围人们坚信不疑的共鸣。对于这种反应是没人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在中国，任何抗日活动都必然会得到群众的支持。我还感到，舍此而外从任何其他方向出发，要想成为一场群众运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接下来发言的，是“全中国各界救国委员会”的一位代表。他是该委员会逃脱十一月份大逮捕的唯一知名人士，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他刚准备好要正式开讲，有人被扩音器的联接线绊了一下，扩音器在扩大音量时所产生的那种讨厌的嗡嗡声，一下子变成了刺耳的尖声怪叫(不久我们便发现，这种现象在群众大会上经常发生)。但这位代表还是以街头演说家的那种优雅姿态，完成了他的演讲，非常成功地应付了这一局面。

“你觉得怎样?”此时我正努力挤过人群向我们的汽车走去。

“军队看上去相当好。杨虎城也是一位讲求实际的人——这实在山人意料。不过，实际上这一切都取决于南京方面的态度。”

当晚，挑着灯笼的游行队伍穿过西安街道，节日的气氛又持续了两天多。中央军已从陕南撤走，据说他们也开始从北部和甘肃撤离。新年期间人们的希望在迅速增长，西北沉浸在一种“小阳春”气候的喜悦之中，只是这种好时光注定不会长久。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是爱国戏剧的短暂繁荣，我从我那位可爱的刘翻译那里领略到了一切，他对这些戏剧非常入迷。这些戏剧被免费公演，或只收很少一点钱，以求唤起民众对西北方面救国纲领的关心。因此，在以后的三天里，我频频进出于西安的各剧场，而刘翻译则是我形影不离的伙伴。

一般说来，中国戏剧目前正处在过渡阶段，在其他城市里我看到的那些所谓“现代剧”，着实有点令人失望。然而在西安，在摆脱了新闻审查制度的这个短暂时期里，有些剧目不仅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而且甚至有了惊人的发展。中国人是天生的演员——他们能够在一夜之间就掌握了台词，或者，如果需要的话，能够在舞台上即兴表演。但新的和具有现代风貌的戏剧的成长，在中国却受到了包罗万象的审查制度的阻碍，而这种阻碍对年轻剧作者们的创作勇气，则是致命的打击。阻碍其发展的其他因素，还有对传统古戏的因循守旧心理，技术条件的简陋，以及公众对现代戏的冷漠——如果不是怀有敌意的话。要想为新戏找到观众是很不容易的。如若要想生存下去，它就必须涉

及到某些现行的主题。然而那些侥幸通过审查的现实主义现代剧目，一般而言，都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即使在最顺利的环境下，也会发现它很难有什么生命力。

有人采用一种经过反复推敲的暗示和象征主义的手法，为解决这一难题找到了一条出路。例如，编造某个村庄被狼占领了，以此表示中国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诸如此类情节的广泛流行——无论这么处理是多么的浅薄——都明确表明了这样一种愿望：要求舞台和电影不能回避当前的现实问题。但是，新闻审查制度的破坏性行为，也就是严格的道德规范和儒教思想(这是“新生活运动”提倡起来的)，以及政治上的软弱无力，使中国的电影几乎也像现代戏剧一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当然，也有一些用“现代”题材写出的好戏；中国的电影也有若干部很值得一看的。这些好戏好电影中的最优秀作品，俄国影响通常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戏剧的未来发展趋势，在西安事变以来的 55 天中，在西安的舞台上也许已经初现端倪。伴随着内容和形式的绝对自由处理，加之于燃烧的乐章和悟性甚高的观众，一些出人意料的效果在西安舞台上得到了。

“双十二”之后，好几支剧团被迅速组建了起来。其中有支自称为“解放剧团”的，由北平的职业演员组成，上演由像熊佛西(他最近的一些剧作，特别是有一部关于“义和团暴乱”的，也未能逃过官方的查禁)这样最知名的剧作家写的一些戏剧。该团的剧作演出效果令人赞叹，而它的演出技巧也完全是把传统的中国剧动作巧妙地移植到了现实主义的现代舞台上。但比这些专业演员演出的作品更使人感兴趣的，则是那些由学生、士兵以及诸如唱歌姑娘和“杂拌艺术家”之类更为生动活泼的人物组成的几支业余演出队，和他们精心创作的新奇作品。这些人写自己的戏本，有时由某个剧作家自己来写，有时用集体写作的办法，这很像俄国实验剧团那种由很多单位共同创作的办法。这些戏的素材，也有点与在苏联经常可见到的关于革命和内战的戏剧相类似。正如以下所列举的戏名所显示的那样，这些戏毫不隐讳其宣传性：“在火山口”；“民族团结”；“征集资金”；“在死亡线上”；

“撤出丰台”；“穷变富”；“月亮的升起”；“上海之战后”。但它们至少是活生生的戏剧，丝毫也没有对柴可夫斯基或王尔德作品的病态模拟。

我和刘翻译经常走进一个烟雾弥漫，非常拥挤的剧院。楼上的座位上，总是坐满了士兵，而前来看戏的观众则代表着社会各个阶层：从黄包车苦力到精心挽着发结、缠着裹脚的老太太。通常先有一支乐队演奏爱国乐曲，平心而论，中国的乐队演奏简直是在折磨人，但在中国的剧院里，它几乎对观众不起任何影响。和诸如在老戏中演奏的中国管弦乐之类的乐曲相比，即便是最刺耳的西方音乐，也算是柔和的了。也正是在这种声音的衬托下，看戏的观众们学会了在看戏时自由聊天。

演出开始前，一般都有一支学童合唱团演唱救国歌曲(过去 20 年的中国学生歌本，可被视为是一份最有趣的政治运动纪录)。大谈特谈每个市民的爱国责任总少不了，稍带大骂特骂那些把国土出卖给日本人的“叛徒”，然后帷幕——在中国戏台上自然也有点与众不同——一拉上去，演出便开始了。

留心一下观众的反应也是很有意思的。大部分观众都习惯于讲传统老戏，或与之非常近似的现代喜剧。“京剧”是一种介于歌剧和舞剧之间的剧目，在演出过程中人们熟悉每出戏的剧情发展，这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演出特点是且唱且舞。在看老戏时，中国的观众很少能安静下来，除非有像梅兰芳这样的名角演唱某个有名的段子。这种情况也是话剧所面临的众多困难之一；如果不能够一开始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并且牢牢抓住，那么，观众是绝不会保持安静的。

对此，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西安戏剧的演出都非常成功。帷幕刚拉起时的剧场简直像个疯人院，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嘈杂声便逐渐减弱为喃喃低语的愉快品评声。如果这是一出内容很容易便被看出的戏——例如沦落在“满洲”的中国农民的困难处境，或

某个爱国志士因亲日派官员的出卖而暴露了身份——场内观众会随着剧情的发展而陷入忘我的境地，叫好或怒斥声不时会打断演出的进行。剧场的气氛完全为人们的情绪所左右，而演员本身也不能不对这种气氛做出相应的回答；他们的自然艺术文化风格是宣传惩恶扬善，但在西安的舞台上，他们却搞得极其成功。

我不至一次看过好几出这种“团体”剧。这种剧不仅在演出风格上，而且往往在整场戏的每个细节上，都很适合观众的口味。它们被当作在农民和士兵中开展宣传工作的一部分，下放到乡下去做巡回演出；通过无线电台，这些戏被播放了出去，并被安排在露天群众大会上演出。作为鼓动群众舆论的一种手段，这些戏是极其有效的。至于这种戏的艺术价值，人们的看法则不尽相同；仅从社会和政治角度上看，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西安进行的这次戏剧实验的成功(这种成功自然已经被带到更远的地方，带进中国的“苏维埃”区域之内，戏剧在那里是深受欢迎的政治宣传工具)，对于人们评价中国戏剧的未来发展，无疑也是有意义的。

采用这种题材编演的戏剧在艺术性和创造性表达方面的潜在价值，在苏联的革命戏剧中已经显示了出来。而中国精神——或至少应当是现代中国精神——则与俄国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也许政府已经认识到，如果听任其自由发展，中国的现代创作和现代戏剧必然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近年来它才大力加强了新闻审查制度的强制实施。然而，似乎也不难看出，除非使这种审查制度有某些松动，容许人们更大胆地处理某些现实题材和放宽政治尺度，则一切艺术在中国的发展，都将会被彻底窒息。在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鲁迅的追悼会上，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同情和赞扬，与他那像政治难民般的一生相比较，简直是莫大的讽刺。可是，那些团结在鲁迅周围，为他那睿智正直和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所鼓舞的大批青年作家们，面对着令人痛心的重重困难，为建立起有生命力文学而继续奋斗着。他们的某些作品，通过翻译正在逐渐为世人所知(注)。虽然国民党已经下定决心，要清除掉他们的影响，但中国的所有优秀作家是

杀也杀不完的。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如此丰富的国家里，文学和其他的一切艺术，必然要和当今为中国的内部团结和民族独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这种斗争所取得的每一项积极成就，创作表达方式的新疆域也必将随之而得到进一步的拓宽。

正是在一次观看这些爱国戏剧时，我才第一次与西安的外国人团体有了接触。这是一次颇为奇特的邂逅相遇。

刘君和我去参加由东北大学学生在该市最大的一所中学举办的下午演出会。这是一座老式的中国建筑物，旁边是孔夫子庙的围墙。一个略带点科斯林式建筑风格的小礼堂，被改作戏台。我们来到时，正赶上一支管弦乐队在演奏，但很快便为穿着制服、轻松地用口琴吹奏俄国歌曲的学生乐队所取代。礼堂里挤满了常见的那些各式各样的观众；上空飘扬着除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的国旗。

我们所看的第一出戏(中国的戏总是一场接一场，常常持续演出整整一个下午，甚至到晚上)是根据在中国人所尽知的“丰台事件”改编的。这是 1936 年日本侵入满洲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在北平附近铁路沿线的中国驻军和日本军队发生的一次冲突事件。要是你今天经过丰台，在火车距北平大约一刻钟的地方，你会看到，车站上空飘扬的是日本国旗，而触目可见的那排整洁的建筑物，就是日本军营。在那里已经看不到一个中国军人了。

但就在 1936 年的 9 月 18 日，还有二十九路军的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临近铁路的那排极其糟糕的小楼里。那天傍晚，当一队日军参加演习归来时，在中国军营外发生了一场纠纷：一名日本军官的帽子被中国的一名普通士兵碰掉了。这自然是对他本人的人身侮辱，此外，也是对“天皇”的极大不敬。于是，日本人要求道歉，并由日本宪兵将该连连长捉了去；但中国士兵撤进了营房，准备抵抗。日本的救兵蜂拥而来。在日本人以压倒性优势兵力占领了邻屋房顶的情况下，这座不起眼的中国营房顶住了日军的彻夜围攻。发生在丰台的这场“战

斗”，当时曾引起某些骚动，因为有些头脑较为发热的日本军官，想借此机会攻占北平。这次事件第二天早晨便被平息了。当时中国军队在日本军队的机关枪监视下，排成队列，正式向日军道了歉，然后撤退到铁路以南。

整个这件事情就很适宜于进行戏剧性处理；戏里的中心人物，由那位连长担任，只是在他的部下奉命撤走之后，才被日本人释放了。他本人因“惹起事端”而被免职，由一位大概对日本人的规矩更顺从的军官所接替。从实际情况上看，这出戏事实上是对中国官方所奉行的“投降政策”的猛烈抨击。它以清晰而令人信服的语调，生动地描述了广大士兵们的“抵抗愿望”，如实反映了他们在奉命撤退时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这出戏是一个很完美的剧作，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

第二出戏更为惊心动魄。这是一个学生的作品，除了表现爱国热情外，该剧还公然咄咄逼人地提倡女权。仅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出戏已经对中国的现行审查制度构成挑战。

戏中的反面人物，照例是个叛徒，在这出戏里由一个残酷镇压爱国运动的侦探头子扮演这一角色。该剧说的是他家的人——妻子、儿子和女儿——如何密谋杀死他。这项任务首先交给了他的儿子，但他犹豫不决，犹如哈姆雷特一般。听到这一情况后，他的姐姐责骂他怯懦手软，自告奋勇毒死她的爸爸。更使人高兴的是，那位母亲也加入进来，坚持说杀死一个叛徒的神圣职责应该由她来承担。施放毒药的计划被以最巧妙的方式完成了，当侦探抱着肚子，痛苦地绕着沙发翻来滚去的时候，他的妻子交叉双臂站在那里——一个现代克泰墨斯特拉<sup>②</sup>形象——拒绝打电话叫医生。在那位受害者最后颓倒在地板上之后，这位复仇者来到脚灯下高呼：“中国的妇女们，起来呀！不要再做奴隶！解救自己，解放中华！”

从学生那里传来的喝彩声听了简直令人觉得可怕；但也能听到一些坐在后排的老成持重的市民在喊：“Puhao!(不好)，不要脸！”演员

在嘈杂声中退下场去。

正在群情激奋的当儿，我突然注意到有位身着黑色服装的中年欧洲人，正独自安详地坐在前排座位上，显然对剧情很感兴趣。我把他指给了刘君。

“是基督教徒！”刘君不假思索地说，那神色仿佛他有了个惊人的发现。“一看他的服饰就能认出来。我不是基督教徒——你呢？”

我没做明确回答。不过在这样一个充满战斗气氛的场所遇到一名传教士，倒有点像在酒商的午餐会上巧遇一名绝对不喝酒的人。出了剧场，我们在街头相遇，并接受了他的盛情相邀，去浸礼教会喝茶。

“你觉得今天的戏怎样？”我问我们的主人，这时我们已经跟着走进了与周围隔绝的教会所在地。

“实在有意思极了。我和其中的一些年轻人很熟：他们是我的查经班的学生。”他叹息着说：“只是他们眼下非常狂热。”

我们坐进炉旁的安乐椅里，海阔天空地闲片了起来。刘君在他的椅子上扭来扭去，显得有点局促不安。过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是想解小便。

“刘先生，您是基督教徒吗？”在我俩谈话的间隙，教士问他。刘君看上去憋得非常难受。要不是我在场，仅只是出于礼貌起见，他必定也会做出肯定的回答。我知道他上过教会学校，但这是他在逞能时无意中透露出来的。他最近一再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经教育明白过来的无神论者，他几乎不可能完全背叛自己的诺言。

我俩都期待着他的答复；我高兴地看着他如何表态。然而，像真正的中国人一样，他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我在圣经中寻找救国之道！”他大声说。我们的主人看来有点迷惑不解，但这种情况他以前大概也遇到过。“要是这样的话，你不钻研圣经也许反倒好些。”他对此只好这么说。刘君洋洋得意地偷偷扫了我一眼；他显然在为自己的沉着冷静而暗自庆幸。

这是我第一次在西安遇到可以结交的人。从他能来看这种戏的事实，我就已经猜到他的为人了——这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不带偏见的人。他与青年军官和学生有密切的联系，对他们的政治活动也非常宽宏大量。就像我们在开往石家庄的列车上遇到的那位美国神甫一样，他也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问题。

他对最近在西安发生的事情不曾流露出半点怨恨情绪。“我们在这里见得够多了——革命、围城以及内战。最近发生的这事儿算不了什么。我也清楚，其中有许多青年军官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事件也未必都于世无益。”

我对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很敬佩，不过我仍想从他嘴里打听到他究竟有多少皈依基督的弟子——像刘君那样的——已经不带基督教徒的味道儿了。正如人们偶尔说起的，中国人并非是不信宗教的人。但他们对待宗教也就像他们对待生活一样，是相当不在乎的。当然，他们丝毫也不会因只信仰一种宗教而排斥其他所有宗教。也许正因为如此，首批来华加入狂热的十字军传教队伍的教士们，尽管累得口干舌燥，结果还是收效甚微，毫无进展。

“再来啊，”我们分别时，这位友善的教士说。“我想您是会乐意会见我们其他一些教友的。”不过，倒是我吃不准他们是否乐意见我。

一到街上，刘君赶紧在墙拐角撒了泡尿。“我想他是个好人。”他说。“不过我可不爱喝外国茶。”

译注：

①救世军：基督教(颂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由牧师威廉·布斯于 1865 年创立于伦敦。专在下层劳动人民中宣传宗教，招收教徒，举办慈善事业。1878 年起仿效军队形式进行编制，教徒称“军兵”，教士称“军官”，1880 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

②克吕泰墨斯特拉：古希腊神话传部中特洛伊战争的英雄阿伽门

农之妻，因憎恨其夫在出征前杀其女以平息狩猎女神阿提米斯的愤怒，因而在阿伽门农胜利归来后与其情夫合谋将他死杀，后亦为其子所杀。

注：例如，参阅“活的中国”，收在由埃德加·斯诺编辑的当代中国小说集里。

## 第十五章

### 群众大会和传教士

“那个戴单眼镜的人是谁？”一天早上，我问艾格尼丝。我们住的旅馆里来了个新人物。有那么一两次我和他在走廊照过面，仿佛记到此人膀宽腰圆，甚是魁梧。

“是外国人吗？我不认识，不过我们可以到办公室去弄清他的身份。”

旅客登记本上写的是：“卡普特·斯科特，来自北平的英国大使馆。”由此看来，与外界的联系似乎已经打通了。

“他大概是来照看传教士的。”我推测道。“要不就是来侦察红军行动的，”艾格尼丝正言厉色地说。“你最好去和他谈谈。”她似乎觉得我在两方面都能搭上话。

“Chin Lai(进来)！”听到我的敲门声，传来了一个爽快的声音。然后又道：“噢，对不起——我还当是那个仆役又进来了呢。请进，还客气什么呢？”

我走进了这间烟雾腾腾的屋子，到处乱摆着地图。这位英国大使馆的助理武官透过单眼镜，好奇地凝视着我。我俩是设法冲破封锁，进入西安的仅有的两个外国人。

寒暄了几句后，我提起了大家都最急切想知道的问题：“您是乘飞机来的吗？”

“不是，是在东北军的一位将军陪同下，从潼关坐卡车来的。要是没有他，绝对通不过这段路线。”

“潼关怕有不少政府军吧？”

“到处都住满了。连个像样点儿的住处都没有，我不得不在臭气熏天的战壕里蹲了三天。我发现用这玩意儿熏熏倒还管用；你也来一支试试。”他递给我了一支山西造的土雪茄烟。“每三十支十个铜板，不过倒还能抽。”

他使我大受其害。这支为骆驼夫和老烟枪们预备的土雪茄呛得我一个劲儿地咳嗽起来。

“关于那个美国妇女，叫什么——呃——史沫特莱女士的，你听到什么没有？她多少参与了这儿的事情，是吗？”

“这个么，我不清楚。”我不知道那些传教士都告诉他了些什么，便说：“她来西安写书。我估计她是统一阵线的同情者。我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些。”

“是的，是的，当然是的，”斯科特上尉心不在焉地说。然后，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在北边的那些共产党——他们似乎正在活动。我听说进展得很顺利。”

“对这些事我真的知之甚少。”事实也正是这样，当然，我也听到过一些传闻，但红军运动得很快，也很隐蔽。“不过，您也许不知道，在这里的军事委员会里有个统一阵线。要是红军真的南下，肯定要与西安的有关人士达成某种协议。”

“嗯，不错。但传教士们对此可不大乐意。他们过去与这帮家伙交道打得够多的了。”

这可真糟了。英国使馆的助理武官，居然跑进了这个“叛乱”的堡垒，调查英国国民在此地的处境。虽说他们目前在西安似乎没有多大危险，但如果南京军队发起进攻，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一听说“共匪”正在向西安开来，当地的传教士们便精神高度紧张，恐慌不

安。从别处的传教士那里，我听到的那些关于“共匪”残暴行径的故事实在够多的了，知道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和观点。

前些年，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红军曾抓获了一位偶然落入他们手中的传教士，不仅没有嫌弃他，而且还从他那里获得了免费的医疗服务。但那些关于红军暴行的谎言——除了两个美国传教士死于安徽的那个著名事件外，都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即便是涉及到一个年轻的传教士和他的妻子悲惨死亡的那个事例，也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残杀他们的“匪徒”就是红军的正规部队。

其他一些传教士被红军俘虏的事例，结局也都各不相同。广西有一名天主教徒，曾和红军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sup>①</sup>，并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与共青团员们争论是否有神存在的问题上。他在红军中深得人心，最终死于心脏病发作。

但在最近一年里，红军宣布了一个政策上的转变：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抗日反帝斗争，他们不再反对在华的所有外国列强了。近几个月来，为了赢得外国对其统一阵线纲领的关心与支持，他们曾做出明确努力，因而在西安事变期间，“苏维埃中央政府”做出保证：红军将不再执行没收外国财产(日本除外)的政策。

关于宗教自由问题，也有了变化。在西北，红军与甘肃和宁夏的伊斯兰教徒建立了联系；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他们赢得了许多宗教狂热分子的支持，并有一些战斗力极强的伊斯兰武装加入了他们的战斗行列。在陕北，某些法国天主教堂是当地的最大地主，如若在过去，早就成了这支工农武装的天然攻击目标。然而，即便是在红军掌握着绝对军事控制权的某些地区，居然也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妥协。例如，在靖边县接近长城的一个叫“临眺梁”的村镇，法国天主教多年我还当你是会欢迎这么做的。”

他显然不这么认为。他满脑子都是什么俄国飞行员已经从新疆那边赶到西安了呀，外国间谍在西安活动呀，以及发生敌视外国居民的暴力活动呀之类的传闻。“这会儿，红军就要过来了，我知道预计将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难道你真的相信他们会信守自己的诺言吗？”

“为什么不呢？他们要想使自己的政策获得成功，就必须赢得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信任；对他们来说，针对外国人的任何骚扰，都是天下最糟糕不过的事情。俄国人与这次运动没有丝毫联系——莫斯科的新闻界早已对此给予彻底否认。”

我的这位“哥萨克”还是不相信。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运动”；所谓“运动”之说，只不过是一伙“赤色”宣传员干的事。在这伙人中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形象似乎最为突出，而以我本人作为第二号种子选手。我对“第三国际”的力量和可称之为“彼得·弗莱明②思想”(Peter Fleming mind)的流行再度感到惊奇。因为所谓“俄国讹诈者”和“赤色帝国主义”之类吓人的话，便是由此杜撰出来的。由于这些消息传自“鞑靼地区”，(经由喀什)，因此，新疆便成了一处为这个阴影所笼罩的地方。

第二天，我和艾格尼丝一道去乡下采访一个群众大会。张兆麟给我们找了辆小汽车，一大早便开到了我们住的旅馆。“你要穿得厚实一些，”他告诫我，“大会将在露天举行。”

天色灰蒙蒙的。远方的小山笼罩着雾气，空中零落地飘洒着雪花。我们驱车出西安东门，沿着通往临潼的那条熟路向前驶去。行至骊山脚下，我们迎着山脉向南拐，顺着一条河谷穿行在有着斑斑积雪的黄土崖之间。所过之处，原野一片荒凉景象，巨大的墓堆耸立在公路两旁。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作“蓝田”的乡镇。

“你估计会有多少人参加今天的大会？”我问这位朋友。

“大约 5 万人，”他漫不经心地答道。闻听此言，艾格尼丝像嗅到战斗气息的战马一样惊叫了一声。

“全都是农民吗？”

“大部分都是。”

我们已经开始在路上从他们身旁驶过。这些人中的男人们都穿着

棉袄棉裤，戴着皮帽；妇女们则身着节日服装，扎着色彩鲜艳的头巾。不时会有一队人从某个村子里出来——他们是民团或农民自卫队的成员，用红缨枪、偶尔也有步枪武装着。这是一次武装大示威，许多农民手执棍棒，或扛着锄头。小学的孩子穿着制服，举着他们的旗子骄傲地前进。

会场设在蓝田的城墙外。快到县城时，我们便认出了集合地点，在其两端各有一个大帐篷。士兵们那穿灰色制服的熟悉身影，在两个看台之间清晰可辨。蓝田驻扎的是陕西军队，他们的步枪上不仅上有刺刀，还插着五颜六色的小三角旗。越冬作物为褐色原野涂上了第一缕春色，因武装人员的涌来而突然焕发了生机。

在城内指挥部，我们与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交谈起来。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杨虎城手下的一名军官，不过，其中也有不少红军。令人沮丧的天气也无法阻挡他们。’“周围的农民都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了”，他们告诉我说。实际情况也正如他们所说的。

我们一边在炭火盆上烤冻得麻木的手指，一边阅读专为今天大会起草的“告农民书”。这是一篇开门见山、直抒情怀的文件。

我们，中国的农民，过着世界上最贫困的生活。我们终年劳苦，却不得温饱。我们住在牛棚马圈般的破屋内。

眼下，按中国旧历，新年就要到了。可是，我们中谁能有新年快乐的喜气？谁的口袋装有操办年货的钞票？

日本帝国主义天天都在侵略我们，一块块地撕裂我们的国土。它收买政府中的亲日汉奸，从而挑动中国人打中国人。我国人民时时处处受到他们的剥削压榨。我们一定要消灭日本鬼子！

自“双十二”以来，张少帅和杨将军执行民众的意愿：扣留了蒋介石，并以民众的名义提出了“八项主张”，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因此，全西北获得了新的自由。现在，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能够自己武装自己，为新的生存之路而斗争。

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幸福只能是革命斗争的最终成果。革命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因此我们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训练自己，武装自己。

不彻底消灭帝国主义，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活路。乡亲们，让我们立即组织起来，支持“八项主张”，加强国民革命的统一阵线！

我瞥了一眼艾格尼丝。可以看出，她也和我思索着同样的问题。因为，统一阵线的全部力量和不足，在这份宣言中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方能使社会革命与全国人民密切相关。

对中国的农村来说，这是它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之一，而中国还仍然是个农业国家。凡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尤其是在像陕西这样的贫困省区农民生活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份宣言所勾勒出的真实情景。可是，如果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他们会不会出于本能地直接把枪口首先对准他们更熟悉的压迫者——地主、税收员、高利贷者和粮商，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向这位政治组织者提出疑问。他的眼睛敏捷地眯缝起来。

“不错，这是个现实问题。但我们工作的全部重要性也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事实向农民表明：无论他们现在的生活有多么苦，但如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生活，他们的处境还会更糟。看看成千上万生活在满洲的农民吧！他们被强迫烧掉自己的房子，迁入‘保护村；’他们被迫铲掉自己的庄稼，为的是使‘匪徒’不能利用高粱作为掩护，而这些‘匪徒’却正是他们自己的朋友和兄弟！这就是东北军那么渴望战斗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日本侵略给他们的乡亲们带来的是何等的痛苦。我们能够借此向西北的农民说明，如果不抗日，下一步蒙受这种苦难的也许就到他们了。

但是，在进行这种抗日宣传的同时，还必须迎合中国农民要求减轻痛苦的愿望。我们必须降低租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他们明白，过去对共产党的战争使他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全中国农民都反对内战，因为内战使他们受害最大。我们的民族解放计划，也必然要

成为一个社会改革计划。民族革命一旦取得成功，社会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他几乎像是在宣读辩护辞似地完成了这番解释。我有这种感觉：他只是在做了极其艰难的努力之后，才算充分阐明了他的上述论点。不过，张君还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电话机旁传来了尖锐而异常激动的声音。士兵们从当院涌了过来：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是属于机密的。

与我们交谈的那位政治组织者回来了，有点喜形于色。“注意了！日本向南京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西北运动，以及与共产党结盟者，必须用武力予以镇压。”

“这是什么意思？”

“中央军已经重返陕西。也许，这就意味着内战——这正是日本人所梦寐以求的。不过，现在该去开会了。”

我们从旗帜招展的狭窄街道中挤出一条路，跟着这伙人从城墙下走了出来。集合的那片旷野，现在几乎涌满了人，而模糊不清的人影仍然从平原的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在这片旷野较远的一端，露天场地上正上演着一出中国戏，而远方那白雪皑皑的山丛则是它的幕景。我们能够看见身着艳服的演员身影，很有节奏地在跳着什么舞。

军号声召唤人们集合，引导着成群的人们——五万人的估计一点不过分——朝主席台靠拢。依然打着“新生活运动”旗帜的小学生们，被安置在第一排。在他们后面的是士兵。而拿着梭镖、红缨枪的民团队伍，则在会场上散布成为一个很大的半月形。接下来的是褐色面孔的汪洋大海——中国农民中的“好人杰克”<sup>③</sup>与其家人汇聚于此，其人数之多给人印象至深。妇女和儿童站在人群的边沿，一小堆儿一小堆儿地凑在一起。我从未见到如此众多的农民——夹在两道黄土梁之间的“活的中国”那怦怦跳动着的心。

在如此浩大的场面里，无论那个乡镇传令员，即便声若洪钟，也

不可能把声音从人群的这一头传到另一端，而且会场也没有安喇叭。简短的开幕词，通过喊话筒以很大的声音传了出来，此时另外的三个讲台也匆匆搭了起来，会议正式开始了。大会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不时地变换着主讲人。这次会议持续开了整整一个下午。

各方人士都讲了话——有农民、士兵、军官、政府官员、中小学教师、学生。每当有一位新的主讲人登上讲台，便有一批新的听众挤过去倾听，会场里呈现出二派乡间集市的热闹气氛；在人群的四周，同家族小组的成员聚成一堆，在露天地里吃着从临时食堂或小吃摊上买来的食品。会间休息时演出的戏剧尤其受欢迎。

在陕西南部，像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群众大会还从未举行过。普通群众在会场上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和团结，对我们也是一个启示。因为正是在这里，农民们听到讨论他们自己的问题。为支持“剿共”战役而强征稻米的问题；那些夺去了他们最后一点可怜积蓄的万恶附加税问题；某些地方官员众所周知的贪污腐化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痛斥。大会在下午临近结束之前，通过了很多决议。在会议期间，有一句口号的吼声最常出现，人群在呼喊时紧握拳头，振臂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然而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南京军队正在掉过头来对付西北：重炮沿着陇海铁路涌入潼关，坦克和飞机在洛阳集结待命。夜幕降临之前，蓝田驻军在步枪原来插彩旗的地方扎紧刺刀，向南开去。有一句新的口号回荡在他们身后——“保卫抗日革命基地！”

“要是南京胆敢发动战争，就得认真考虑武装起来的民众力量。咱就等着瞧吧！”艾格尼丝厉声说道。

蓝田大会只不过是随后几周内许多这种大会的开始。正如红军在陕北所发现的那样，陕西的贫苦农民具有许多令人信服的优秀品质。除这次之外，我再没见到过有什么会议像这次这样令人难忘，感人至深。要是享有结社自由，使他们能够拿起武装，保卫他们自己，中国农民的力量将是无法估量的。蓝田会议唯二使我们感到确信不疑的，

就是在中国人民中间，统一阵线运动已经有了一个群众基础。

那几天里，透露到西安的消息总令人不放心。随着蒋介石的被释放和少帅离开西安，中国这次危机的政治斗争中心，已经移到了南京。事实上，南京本来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只是不引人注目罢了；“双十二”事变这一戏剧性事件，正好把它带到了人们面前。在首都内部，敌对的派系争夺着权力，还没有人真正知道委员长所持的是什么立场。

因蒋介石返回而引起的表面结果——所有那些把外界搞得懵头转向的为挽回面子和给自己增光而煞费苦心安排座次之类的事情——顷刻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失去了意义。少帅受到军事法庭的当堂审问，而且，在 1936 年的最后一天，被判处十年监禁和剥夺公民权五年，不过，也完全可以把这次判决看成是仅仅走过场，因为三天之后，由于委员长的保举，行政院又对其判决提出了赦免。少帅依然被剥夺了公民权，软禁起来，“递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它的实际含意就是，把他交由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看管起来）。他在政治上已经无能为力了，这种局面也有可能就这么维持下去。

但因圣诞节放蒋而产生的一个最有趣的结果，则是发表在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④上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送到西安后，它第一次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外界的人们已经开始公正评价隐含在西安叛乱背后的真实意图了。《字林西报》多年来一直以英国保守派利益的喉舌而闻名——无论在 1926 年的“北伐”之前，还是在此以后，直至武汉政府遭到武力镇压和被取缔，以及使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它始终激烈反对“国民革命主义者”。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哪份杂志有可能对革命行动持有丝毫的同情心，更不用说还会同情对抗现行政府的一次叛乱行动了。

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分别为：“西安事变所揭露的内幕故事”（发表于 1936 年 12 月 28 日）和“南京派系利用西安事变抓权”（发表于 1937 年 1 月 6 日）。这些文章的出处并不难查找；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这个时刻，它出现在了这样一份负责任的报纸上。它清楚地阐述和

满怀同情地探讨了少帅的要求及其真实动机。尤其是第二篇文章，对人们具有某种真正的“启迪”。南京政府试图通过谈判，从而和平解决争端的失败受到剖析，并追根溯源，对那些试图利用西安危机，干掉蒋介石，把政权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危险派”人物的活动情况，也给予了生动地描述。

突然间，一次意外事件出现在他们的前面，而这在他们的心目中，恰恰正是除掉蒋介石将军的天赐良机。于是，他们撕下了伪装。他们禁止接受一切来自西安的正常消息情报和陈述、声明。他们有效地制止了政府采取常规途径，与“叛乱者”取得直接联系……对他们来说，使他们无法采取惩罚行动，轰炸西安的坏天气是个可恶的敌人。进而，他们不但被接二连三的停火安排蒙骗了过去，而且，就在他们即将得逞的时候，委员长平安抵达了洛阳。他的到来正好赶在讨伐军奉命发起进攻之前仅一个小时，抢在最后一轮的停火期限将结束，对西安的空袭即将恢复的时候——这无疑是一个要毁灭委员长与其所有随员的军事行动……。

在最近对他的一片欢呼声中，蒋介石将军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还拥有一些敢于讲真话，而从不顾忌这些真话是多么逆耳的顾问。如果他从西安吸取了教训，并至少在最初的两、三天过后便认识到，对他的危险正是直接来自南京，那么，他就会抓住这个事实，着手清洗这个“奥吉亚的牛圈”<sup>⑤</sup>……。

这对南京真是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于是，国民党的秘书长匆忙否认这种怀有恶意的空洞言论，并对“声誉如此卓著的一份报纸居然成了这类不确切报道的传声筒”而感到遗憾。但《字林西报》并不因此而悔过，继续大发着它的雷霆之音，尽管语气多少有了点缓和。这些文章的刊出也是一个最令人鼓舞的信号：它们之所以出现在英国报刊上，这并非是没有原因的。

这是因为，清洗南京的“奥吉亚牛圈”，实际上也意味着，沿着张学良在其最初宣言中所提出的路线改组政府。在中国实行新政策已

为时不远了，但能否真正实行，似乎还有赖于强大的盟邦。不管怎么说，“危险派”在南京的地位还是相当牢固的。无论蒋介石是否想要向他们发起挑战，表面看来他似乎都不打算操之过急。他隐居到自己的家乡奉化做一个月的休息，这样就把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留给了政府中的亲日派处置。东京的“陆军部”已经清楚地表明，它对中国的统一阵线政策是怎样考虑的。南京方面对此心领神会。“中央”军在潼关的集结，便拉响了警钟。

在西安内部，有关南京调集军队准备进攻的报道自然引起了慌乱。元月六日，一个由银行家和实业界人士组成的“和平代表团”前往南京，但未能让他们通过潼关。也就在同一天，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十位最高指挥官向全国发出一份通电，摘要如下：

……虎城等及下属二十余万兵士，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敌，为国家民族确尽一分对外之力量……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机，中央军队匪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举西进，计有十余师，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做挑战之形势……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这份通电发出后两天，、又有一份由两支军队的 126 位中、下级军官签署的通电，对杨虎城等的立场表示完全赞同。大意如下：

全国人民一致坚决主张抗日。张、杨的“八项主张”表达了我等欲实施这一主张的最佳途径……我们西北抗日联军官兵皆为武装战士。我们万众一心愿为保卫国家做最后牺牲。

尽管人们对电文所采用的华丽词藻不可能完全相信，而这在中国的中国的文告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电文的目的还是相当明确的。

它刚一发表，便被政府所扣压；不过；西安还是收到了不少复电。特别是西南各省的领袖，在复电中表达了对西北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全国各地的反应都反对内战；然而在南京，却有一个势力强大的派别在竭尽全力，力图使内战不可避免。至于其所执的理由呢，自然是人们早就熟悉的那一套。他们断言：全西北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红军正在威胁着和平。而对这些协同共产党采取“叛乱”行动的势力，除了镇压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解决途径。南京方面已经忍无可忍了。

蒋介石继续从奉化向政府发出辞呈，而政府则也一如既往地拒绝接受。可是，就是没人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在卖的是什么药。自从他被释放后看似有所缓和了的形势，突然间再度变得紧张起来，而且充满了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译注：

①这个传教士疑为瑞士人勃沙特。他于 1934 年 10 月在贵州被红六军俘虏，在红军中生活了 18 个月，后于 1936 年 4 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三个月后，勃沙特就这段经历写出了一部长达 288 页的回忆录——《抑制的手》在英国伦敦出版。作者当时正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有可能读过这方面的书。

②彼得·弗莱明当时是《泰晤士报》的中国特派员。1936 年曾到新疆旅行，著《鞑靼通讯》一书，译者因未见过该书，此处不便详

③好人杰克。亦称“扎克雷”，意即“乡下佬”，原为中世纪法国贵族对起义农民的蔑称，后泛指农民起义者。

④字林西报原名《华北捷报》，英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创办于 1850 年 8 月 3 日。1864 年改为《字林西报》(日报)。该报主要刊载时事新闻、商情、司法和领事等动态，是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喉舌，素有“英国官报之称”。1951 年 3 月 31 日停刊，前后 101 年，具有很大影响。

⑤奥吉亚的牛圈，源出于希腊神话。厄利斯国王奥吉亚的牛圈

30 年未曾打扫过。英雄赫克里斯筑坝截住阿尔甫斯河，弓来河水一天将牛圈冲刷干净。

## 第十六章

### 诸神各奔东西

“陕西首府落入赤党之手，”报纸的通栏大标题写道，“全西北处于恐怖之中。”我扔下报纸向旅馆的窗外眺望。不错，是有个士兵在站岗，但他在大门的掩护下显得很舒坦，抽着烟卷，充分享受着一月那明媚的阳光。我极力想在他的帽子上找到红星，或红臂章——报上这么说的——西安的所有军队都带有这个，结果白费力气。当然，他也可能是个化了装的共产党；不过，他看上去似乎并不很危险。

四个女学生走到汽车盘道近前，停靠在西安宾馆引为自豪的水泥喷泉边上，窃窃私语。这座喷泉实际上非常难看，但在姑娘们乌油油的剪发和鲜艳的蓝布衫映衬下，构成了一幅迷人的图像。在中国，一度只要看见剪发女学生，就可以当作共产党而予以枪毙(官方所描绘的“剪发女匪”曾广为流传)。然而，这几位少女像小猫咪一样羞怯，显然是费了好大劲儿才下定决心，走进了这家旅馆。如果说这也是一个阴谋的话，那么，这阴谋也是未曾经过精心策划的。

我来到休息室，只见这四位姑娘终于鼓足了勇气，进了旋转门。她们走到办公桌近前，其中的一位——比其他三个胆子更大一些的——鼓起腮帮，开始用低低的声音问旅馆职员。

“请您告诉我们，有位毛先生住在这儿吗？”

这位上海职员由于挣得了“面子”，虽然他对这里居住的每个客人都清清楚楚，但还是查阅了住宿登记表。“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个毛先生。不知他的全名怎么称呼？”

姑娘们又凑在一起低声交谈，显然对他的回答非常吃惊，有点不知所措。“这没什么，谢谢您。”代表她们问话的那位姑娘最后说，“肯定是我们找错了。”

她们失望地垂下肩膀，肩并肩地慢慢走了出去。我突然注意到，这四位姑娘都拿着签字本。

中国人是热情的签字迷。姑娘们会是……？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些女孩子们找的是什麼。在西安流传着一个谣言，而南京的新闻工具则以此为口实，编造出了他们惯于编造的那种耸人听闻的故事，说是中国最著名的“赤色”领袖，中国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在西安坐上了“革命政府”的第一把交椅。这些姑娘之所以来到该市最好的这家旅馆，是为了找到毛先生，并(如果她们能够得到的话)获得他的签字。

至少，她们比南京更信赖毛泽东，而后者曾悬赏二十五万美元要毛泽东的首级，并正在准备采取针对他的联合军事行动。不过，毛泽东不在西安——他绝对没有离开设在陕北的“赤色首都”。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倒在这儿，但一直不动声色地躲在幕后。“赤党”在西安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对一次武装行动发出普遍警告。

但“赤色威胁”——虽然如其所证实的那样，纯属幻觉，然而却是形势发展中出现的一个切实存在的因素。据说，大概在元月九号，一接到通知，就要宣布召开一次史无前例的群众大会；西安城内谣言四起，说共产党的暴动就定在那天举行。因受到威胁，当地居民几乎都要成批向外逃亡了，而“叛乱”政权的敌对分子，则竭尽全力煽风点火，制造恐慌。商店关上大门，当铺老板怀着不幸的预感，埋起了财宝。到了1月9日早晨，这座城市几乎做好了一切应变准备。

然而这天所发生的，却是统一阵线最令人信服的一次秩序井然的示威游行。根本见不到一个共产党，也没有一支红军开进西安。恰恰相反，十余万士兵和平民涌上街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它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武装示威活动。这也是在西北迄今所

见到的声势最为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

整整一个上午，大街上挤满了整队前进的男女。他们早早就开始赶往革命公园——毗邻新城城墙外的\_片荒凉的开阔地，于中午在那里集中。这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阳光几乎使人忘却了隆冬。我们一到，便从巨大的“牌楼”下挤了过去，经过一组架在坑道上的高射炮。只见木板搭成的讲台上及会场的大部分已经挤满了士兵、市民和乡下人。旗帜之多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到过的。

讲台上方，凌空飞挂着一面条幅：“西北联合抗日武装大示威”。横幅下有张巨大的海报，描绘着人们所憎恶的政治家汪精卫(他当时正匆匆忙忙地从欧洲赶回中国)和希特勒握手的形象。那位“德国元首”穿着褐色衬衣，站在一堆骷髅中间，而汪精卫则在他面前俯首贴耳，谄媚逢迎。这是德一日反共协定在中国激起的愤怒反响，而汪精卫显然是那些准备加入该协定的中国政客的象征。

参加会议的各阶层队伍，都按照武装示威的主旨行事。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支，人们拿着铁棒和木棍，学生和加入抗日先锋队的市民则挎着步枪。中、小学教师身穿制服，和他们的班级呆在一起。男教师扛着现代步枪，孩子们则拿着几乎和他们身子一样长的中国古代刀剑。艾格尼丝惊喜地发现了我们的老朋友，那些娃娃囚犯。他们现在穿着制服，雪白的棉手套别在皮带上，显得神气活现。农民自卫队也陆续赶来了。在参加会议的大批市民中间，什么武器也不带的，就拿一面小红旗。

下午一时，由大会唯一的发言者，“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位代表宣布大会正式开始。他简要指出，武装起西北民众，是自卫反击南京那些威胁要发动内战的“亲日叛徒”的一项措施。那些熟悉的口号被一再呼喊起来；尔后，军乐队奏起了进行曲。

首先跨入游行序列的是东北军的骑兵部队，战士们安然稳坐在他们的卷毛小马驹上。农民自卫队紧随其后，长长的红缨枪斜扛在肩膀上。民众团体的队伍拉在最后——有来自棉纺厂的男女工人；有武装

义勇军；有抗日“先锋队”——他们打着绣有东北沦落国土“白山黑水”的巨大丝绸横幅；有戏剧界人士、学徒、中、小学生；大学学生——每个人都拿着旗帜和标语。还有由杨虎城夫人领导的“妇女救国委员会”——它吸收了一些达官贵人的妻子。游行队伍代表了西北所有党派阶层。

“咱们直接到鼓楼去吧，”我提议。“那儿会看得更真切一些。”我们溜出人群，坐上黄包车。此时西安主要大街两旁已经挤满了等候的市民。我们登上这座凌驾于市中心的宏伟城堡的古老塔楼，顺着西大街向东眺望。只见走在前面的旗帜犹如汹涌的波涛，滚滚而来。

游行的队伍似乎无穷无尽。确切地说，参加这次示威活动的决不止十万人，而旁观的人大概只有此数的一半。在声势如此浩大、参加者如此众多而又井然有序的游行队伍面前，对武装暴乱的一切恐惧，都烟消云散了。从我们高于街道的有利位置上，能够听见游行队伍爆发出来的呼喊——“东北军万岁！”“抗日战士万岁！”其中最不同寻常的莫过于听到那些并非神昏智迷的市民们公开呼喊——“红军万岁！”自此以后，西安就不再有“恐赤症”了。

当然了，存在于教士们中间的“恐赤症”则不算在其内，红军已占领了距西安仅40里地方的消息使他们闻风丧胆。根据他们的说法，当地教会的财产已被没收，方圆数里的居民都陷入了恐怖之中。要证实这些报告的谬误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我曾想找到哪怕是一个教士受到过骚扰的实例，却毫无结果。可是，他们却把在西北的所有外国人的处境描绘成一幅最令人紧张不安的景象。那位英国大使馆的助理武官，由于他当时是外国政府在西安的唯一代表，因而也就成了所有这些谣言的特殊目标。

不过，斯科特上尉要比教士们坦率得多。

“就我所见，在西安的外国人所面临的唯一真正危险，是对该市发动的空袭。”他告诉我说。

“换言之，亦即危险来自南京，对吧？”

“你爱这么说就这么说吧。当然，教士们不信任‘赤党’；他们过去也有理由不信任他们。可是，现在西安的一切都很平静。最大的危险来自轰炸——这里没有任何真正能够预防空袭的设施——或者，一旦在前线吃了败仗，无法防止败兵在撤退时胡作非为。”

形势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当蒋介石被扣押在西安时，对他生命的主要威胁(这现在已经被报纸刊载出来了)来自他在南京的那些深受信赖的助手。在确保释放他方面，共产党是立了大功的。可是现在，共产党却遭受着谴责，说他们威胁到在西安的教士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与此同时，对于处在现场的人们说来，很清楚，要说有什么危险的话，则危险又是来自于南京的同一个处所，来自该处那些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嚷“赤色威胁”，急不可待地要把轰炸西安作为维护治安的下一个必要手段的人。

“你对这些教士怎么看？”我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对她们作为一个集体，从不抱好感。

“他们无须那么害怕红军。要是他们认识到现在红军不仅改变了政策，而且会坚持这种新政策的，情况就会好得多。在过去，红军是公开反对过教会的，他们说传教士是外国的间谍了而事实上某些教士也确实如此。但他们现在对除日本外的所有外国人，宣布执行一种新的友好政策——他们是会说到做到的。不过，我真想弄明白那些令人恐慌的报告来自哪里”。

这个来源，很快便被我们找到了。有这么一位美国教士，他与该国在南京的领事馆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由于他在西北呆得时间久了，因而被看作是分析当地政策的绝对权威人士。因此，他就成了西安外国人心目中的预言家。不知是怎么搞的，在一种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他发现，他和他的同伴们是被关押在这里，作为抵挡对这座“叛乱”首府采取轰炸行动的人质。他把这种感觉报告给了美国领事馆。

这一下，立刻在中国的外国报刊上激起了一阵喧嚣。在所有的中

国“故事”中，这一点甚为报刊主笔们所偏爱——外国人濒临绝境，而传教士则首当其冲。西安的传教士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殉道者，而且从此时此刻起，听到的唯一的话，就是：西北的外国人统统撤离。那位德国牙医的死又被重新提起，并加上了一些遭受折磨，漫无边际的虚构情节。外国列强也郑重其事地受到警告，要他们对各自国家的侨民负责。自然所谓“人质”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挖空心思、凭空想象出来的恶作剧，然而，它却出色地搞成了这个花招。全中国读者的心，此刻都悬挂在了那伙被孤零零地抛弃在西北的外国居住者的命运上。

红军在三原，在西安以北约 35 英里的这个地方。这个使传教士们闻风丧胆的事实，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身上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些天来她一直渴望来到这些人中间。对于这些人，她写得很多，但从未在正式场合见过面。现在，她实在有点等不及了。

“我打算去看看红军，”她平静地对我说。“这对我来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因为丁玲——她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刚刚对西安做过一次短暂的访问。她在南京的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最近才逃脱了国民党的看管，设法偷越封锁线，准备到陕北参加红军。眼下她正好在三原，呆在中国红军名将贺龙指挥下的第一方面军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丁玲的一位老朋友，对于丁玲来信邀请她访问红军营地和陕北“苏维埃”区域这件事，她是不会有所推辞的。

我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小型饯别宴会；在经过了近一个月的经济封锁后，西安宾馆的储存也日见稀少。艾格尼丝带着一个“红十字会”臂章；她的正式身份，是要旅行到前线做医疗救护工作。这种伪装并不难识破，不过在这个时候，外国人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活动，知道的愈少愈好。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问她。“也许还会发生战争；要是那样的话，你会被完全隔绝在北面。”

艾格尼丝毫不动摇。“要是那儿真的发生了战争，那里就正是我想要去的地方。这个机会我等了多年了，此番决不可让它错过。在此之前，我曾三度计划去江西——每次计划都落空了。这一次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再落空的。”

“这么说你也许会离开几个月？”

“我预计会是这样。我可以完成我的那本关于长征的书，同时获得我渴望已久的所有写作素材。但最重要的是，我想亲眼看看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我能够体谅她的感情。她与红军心心相印已经很久很久了；现在，她终于能够和他们在一起，一同旅行外出，亲眼观察他们的那种生活——即便按中国人的普通标准，甚至也是相当艰苦的——而这对她来说，则是预先体验一下今后在中国的生活。我真眼馋她的这个机会。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西安见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第二天一大早，她下穿笨重的马裤，上穿那件熟悉的棉毛衫，神态干净利落地离开了宾馆。她总穿那身衣服，宛若带着一面旗帜。

有各式各样的革命者。我的朋友苗剑秋，我正是和他一起来到西安的，属于人们最熟悉的那种中国类型的革命者之一——虽然他的一切行为都带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其天性而言，他是人中的谦谦君子。而使他感到像是使自己受到伤害的，则是他的国家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了一个不顾后果的阴谋者，甚至带有某种恐怖主义分子的色彩。周恩来——冷静，思维清晰，循循善诱，一位战略大师般的人物——则是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中最卓越的典型人物。他总是带着一种学者风度，这也是一个满清官吏后代的特有风度。清晰明确的思考，毫无头脑发热的年轻人那种。临时冲动，这些特有品质使他成了一名政治工作者，一名起义领袖和红军指挥员。中国革命的最优秀分子，就是这些共产党人。

可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究竟该算是哪种类型的革命者，这却绝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就辨别出来的。她自小便自谋生路，终生都是个

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孩提时期在美国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使她对整个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叛逆精神：早期的经历使她直接萌发的，就是对现行的一切陈规旧习的统统反感：反对结婚，反对家庭，反对一切妨碍她的自由发展，以及迫使她的兄弟们或沦为按日计酬的劳工，或偷牛贼，或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事情。她最初与印度民主主义者建立起联系纯属偶然，尽管也许正是她父亲血管所流淌的“红种印第安人”的血，使她对所有被压迫种族随时给予同情和支持。然而，一旦与亚洲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尤其是来到中国，她便认识到，在远东进行的这场革命所要取得的，几乎是她所要求得到的全部利益。

中国革命的理论——一种使第三国际那些最优秀的智囊都为之茫然无措，其观点仍为人们争论不休的复杂学说——对她来说并无紧要，因为她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不能够解决任何理论问题。可是，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她体验过这种斗争的滋味。因此，她带着对中国的一知半解，以一种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令人难以置信、几无可能的方式，也投身到中国工农出于本能需要而掀起的革命运动之中。她与他們有着同样的仇恨；他们都感到要反对阶级敌人——反对地主和高利贷者；反对统治阶级的官僚统治；反对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一切问题在她眼里都黑白分明：这里是革命的，她就站在这一边——对于其对立的另一面，她决无妥协的余地。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与她持有同感的人来说，这种直来直去的脾性使她经常成为一个难于相处的人。但她把自己浑身上下的全部精力，都不知疲倦地倾注到了唯一的工作上——写真理，写她所目睹的中国实际情况。一

我俩邂逅相遇，彼此生活背景和教育状况几无共同之处。艾格尼丝对知识分子怀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对她来说，那种超越一切党派利益的专题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她之所以能够宽容我，这也许是唯一的理由——无限钦佩这些普通的中国人民：上海的面粉工人、广州的缫丝女工、在旱灾、洪水和

饥饿重重打击下依然在自己的(或别人的)田地里耕耘不息的农民；以及他们所具有的那种非人或超人的吃苦耐劳精神。而且，我们也不像那些把这称之为“坚忍不拔的精神”，把中国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容忍特性颂为“天赐美德”的传教士，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受到颂扬的容忍特性，更应该归因于贫困的命运。而在这个几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种族默默忍受着的耻辱里，蕴含着的是是一种悲剧的旋律，而并非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所谓“复兴”计划，这是目前中国政府在某些乡村地区正在实施的一种计划，目的是要改善农民群众生活。其计划不完美的可悲程度，任何一个到中国乡下旅行过的人都会看得很清楚，因而就连“复兴”这个名词的本身，也成了人们的笑柄。

采用土地革命的方式，也是中国农民的一条“生活之路”。近十年来，中国工农红军在其为建立“中国苏维埃”而进行的斗争中，就沿用了这种方式。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不仅有形形色色的特殊现象阻碍了她的自由发展，而且在近年来，还有来自那个早就威胁要使它完全沦为殖民地的近邻的不断挑战。在这些危险未被排除之前，在“国民革命”完成之前，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是绝对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使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了过去的，老要求：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政党的全国阵线，以此作为西安危机的结果。如果这种统一局面能够实现，为此而付出的任何努力就不能算落空。

然而，在此时此刻也不得不承认，前景是不容乐观的。西安被完全孤立了，舆论界对“叛乱者”和“共匪”的攻击依然有增无减。除了无线电广播外，这里的消息根本无法传出去，而无线电广播的效果却是最难确定的。在所有的媒体宣传中，有一种需要“安慰”某些人的观点至为糟糕，它源于当地一些传教士对局势的过度恐慌。这些传教士对现实情况一无所知，却只有一个念头——害怕“赤色分子”。

李维城是陕西省银行的行长。他穿了件黑色绸大褂，神态愉快、安详——坐在银行后面他家的屋子里，递给我一支烟。几个小孩在室内的厚地毯上嬉耍；李先生看来是个很顾家的人。我想知道他对统一

阵线的看法。

“当然喽，我们银行界和商业界人士是完全赞成国内和平的，”他态度和蔼地说。“您知道，我们向南京派了一个代表团，请求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可是，中央军在潼关的负责人樊嵩甫将军却告诉我们的代表团，他在洛阳有两百架飞机准备轰炸西安。这些飞机是我们大家捐献的，是要他们用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抵抗日本的。令人遗憾的是，樊将军未能在绥远给它派上更好的用场。”

银行家叹了口气，轻轻弹了弹烟灰。

“现在，我们正设法借助于外国影响。对我们大家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对西北实行的封锁。既然委员长已经被释放了，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在这个时候，还有哪个爱国的中国人想制造内战呢？”

“您对与共产党的合作是怎么想的呢？”我问。“这似乎被看作是一切麻烦的根源。”

这位银行家微微之一笑：“蒋将军被释放之前，我们中有许多人对共产党深有疑虑。我们认为他们想要杀掉蒋将军，然后制造革命运动。可是，现在我们却相信，他们真的改变了自己的政策。”

“我从那些现在为红军占领的地区听到的所有报告，都说情况很好。无论在什么地方，士兵们买东西都付现钱；也不存在没收钱财或资产之类的事情。比起我们见过的许多政府军队，这要好多了。其他所有银行都给我们发来电报，焦虑不安地询问关于陕西和甘肃的情况。对此，我们只能说：我们认为没来由感到恐慌。”

他突然停顿了一下，又说：“红军向我们发出了邀请，邀请我们到北边访问他们的地区，亲眼看看他们的经济情况。我倒非常乐意去一趟；在这件事结束以后，我也许是会去的。可是，在南京方面不愿接见我们的代表，只是大谈关于轰炸西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使在南京的政府相信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实际情况呢？”

他是一位非常诚实的人，也是“救国纲领”的坚定信徒。既然陕西的银行家尚有如此感想，那么(我感到奇怪的是)传教士们对红军还有什么理由担忧呢？

西安在迅速向一个地下城市转变。黄色土壤容易挖掘，凡有后院的人家都挖了地窖。成队的士兵白天忙忙碌碌地在市场上轮流值班，修筑规模巨大的防空掩体。对这座古都地基的挖掘，在考古学上究竟有何发现，尚不为人们所知。不过，这种挖掘对于科学研究至少是会有用的。

但是外国人似乎已经忍受够了；他们不打算再冒险，力求平平安安。最后乘飞机抵达西安的人中，有一个美国使馆的武官。他一直受到这样的警告：在这个陷入极度混乱状态的城市，飞机只能逗留几分钟。因此，他对这里那一片秩序井然的平安景象惊叹不已，直言不讳地宣布道：他的政府受到了蒙蔽，大规模撤退外国人绝无必要。然而，他的这番话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从外地赶来的所有教士都集中在了西安，与那些凭空臆想出来的红军威胁相比较而言，来自空中的袭击才是真正非常危险的。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那些身居内地的外国人，也并非每天都有到上海去看一看的机会，而且还要由各自的政府出钱。于是，撤退的决定终于做出了。

但是，无法说服包租的飞机在西安多停留一段时间，以使他们的乘客登上飞机。在西安至潼关之间的陇海铁路上，有好几座桥梁塌陷了(至于它究竟是被叛乱者，还是南京飞机炸毁的，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不管从哪方面说，铁路联系是不可能沟通了)。最后，决定安排公共汽车，把这些外国人运送到那个更合他们口味的环境中去。

1月18日早晨，这支旅行车队即将从西安宾馆出发。来自该市四面八方的形形色色的欧美人，聚集在宾馆的大门口。有胡子拉碴的意大利牧师；快活的美国人；以及忧心忡忡的英国人。一群孩子扩大了他们的阵容——他们是仅有的一批似乎看上去很快乐的人。在中国

的传教士家庭规模之大，每年人口的增加数目之多使大多数游客叹为观止。从经济基础上看，这也许不难解释——通常为每个孩子都领发着一份教士补贴金。

斯科特上尉像往常一样，快活地戴着单眼镜，慎重而有效地指挥着人们的行动。这支探险队中最能夸夸其谈的是个亮着大嗓门，金发碧眼，长得活像古代北欧海盗，而实则是从洛阳来安排租用汽车事宜的探险队队员的小伙子。他也是这次旅行车队的“头头”。他的中国话说得很流利，而且脏话满口。

在这群人中间，我注意到了我们那位英国浸礼教会的朋友。他是西安拒不接受仓皇逃离安排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这里遇见他，我感到有点意外。

“你也和他们一块儿走？”我问他。

“不。我将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三、四位教友。我们要照管医院，而医院终归是需要人照管的。老实说，我并不怎么相信这种做法有什么必要——虽然我认为应当把妇女和儿童遣送出去。”

他那宁静谦逊而充满自信的语调，令人听了精神为之一振。只有极少的几名外国人，能够保持起码的头脑冷静。可是，编造“教士人质”故事的人们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急不可待地为离开此地而跳起舞来。

那位当“头头”的瑞典探险家终于亮开嗓门，吼叫了起来；几辆卡车堆放行李。这支由 75 名神情紧张，惴惴不安的欧洲人组成的团体，带着他们那些欣喜若狂的孩子，各就各位地被安置到了汽车上。随着发动机那雷鸣般的沉重吼声，这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汽车旅行队，终于驶出了宾馆大门。英国使馆的助理武官陪伴着他们，一直把他们送出叛乱者的控制区。他当天晚上又返回了西安。

第二天早上，我在不安宁的睡眠中被寝室的开门声惊醒。一个戴单眼镜的人好奇地盯着我看。

“噢——你还不快点走?要知道，这可是你免费乘飞机旅行的最后一次机会!”

“多谢了，”我疲倦地说，“但我还想待下去，这没准还倒有意思呢”。

## 第十七章

### 武装起来的西北

随着外国人的离去，西安只好听天由命了。在这个受到围困，每时每刻都预计要遭到袭击城市里，会滋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南京飞机每天早晨都从空中掠过，飞得很高。飞机发动机的嗡嗡声，机翼在冬日下的银色闪光是一个危险信号，会使人产生出一种离奇古怪的预感。

有一天，苗剑秋来旅馆找我。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过他了。他还像以往那样神秘地来来去去，总是乘坐一辆汽车，带着一个穿皮大衣的警卫。

“我打算到设在王曲的军事训练营去”，他告诉我说。“你应该和我一起去，亲自了解一下东北军思想情绪的实际状况。”

我很乐于去，因为我对坐等着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开始有点厌倦。军官训练营所在地的王曲，是东北军的政治中心，在历史上就很有名气。该营为张学良于大约一年前所建。在整个西北运动期间，它所起的作用，有点类似于 1925—1927 年“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

我们驱车出了西门，经过保卫着西安周围平原的古老唐代宝塔，然后沿着面朝“青龙山”的公路向城外驶去。渭河蜿蜒蜿蜒地穿过辽阔的河谷，远方的小山笼罩着一层朦胧的薄雾，犹如宋代风景画中若隐若现的山间暮霭一样，在峰峦之间盘旋。就在不久之前，红军越过

这些海拔五千英尺的高山，运动到这条河流的南面。在红军经过的山下丘陵地带，到处都散布着六个朝代遗留下来的墓丘和庙宇。

王曲是河边的一个小村子，距西安比我想象的要远。军校建立在梯形的黄土台阶上；大部分学员都住在黄土窑洞里。我们受到了盛大欢迎。喝过茶后，——如同就在不算太久的以前蒋介石所做过的那样——来到一个空阔的大礼堂里，会见集合好了的军官。在光线昏暗的内室里，两百名左右剃光头发的学员在我们面前整齐地排列着。其中有些人的年龄已过 40 岁了，佩带着上校军衔，但大多数是年轻一些的军官和见习指挥官。在 10 月和 11 月份那决定性的日子里，正是在这里，我的朋友苗剑秋发表过他的那篇著名的演说。

那天早上，他又要畅快淋漓地大讲一通。因此，在正式欢迎会结束之后，刘君和我带着一位学员出去散步。在这片肥沃的丘陵地里，一月的阳光融化着积雪，使人感到就像春天已经来到了。往前看，山影浮动，那梦幻般的云彩和绝壁悬崖，唯有中国的丹青妙手方能用毛笔描就。

王曲村的前面，有一个著名的“文昌庙”，所有地方长官和基层的头面人物都要来此参拜，给“文昌爷”上供，祷求官运亨通。“文昌爷”的寝殿自祭坛向外敞开着，塞满了拜神时穿的服饰和无数双微型绣花鞋。一位和善的道士领我们穿过悬挂画轴牌匾的亭阁，为其荣升而感恩戴德的官员在里面摆放着还愿的东西。在周围墙壁那无声的威严中，古老中国的本色在充分地表现着。

可是，在隔壁的院子里，却摆放着一台印刷机，过道里到处散落着宣传布告的校样。在庙前的广场上，有一个匆忙用木头搭起的讲台。

随同出来的学员告诉我们说：“昨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一个农民群众大会。这是个非常好的大会，我们决定罢免两名县城里的腐败官员。现在农民有自己的‘救国协会’，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义勇军了。”

一个新的和觉醒着的中国正在对这座庙宇那世代相传的宁静构

成挑战。一代又一代的奸官猾吏们就是在这里，以牺牲愚昧无知的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为他们的升官发财而庆贺还愿。在寺庙的库房里，已经为农民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开办了读书识字班，来自西安的大学生们每天给他们上课。寺庙的围墙外，有一所村学，传来阵阵观看抗日宣传画引起的愉快笑声。由某位深知如何恰如其分地吸引聪明孩子注意的画家所画的这些宣传画，其图案之幽默令人神往，忍俊不禁。年轻的中国在其成长中，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失地”。

回到营地吃午饭时，我们发现苗剑秋对他的演讲效果非常满意。“他们才是真正的军队领袖，”他向我透露。“东北军的高级军官都很坏——除了张少帅一个人之外，他们光知道考虑自己的财产，怎样保住自己的高位。这些年轻的军官们懂得他们的士兵想的是什么。他们要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那些老将军们都是封建人物；他们之所以拥护张学良，是因为他给他们权力和财产。但他们并不赞同他的新观点；正因为如此，在‘双十二’前的那几个月里，张少帅才来这里与我们共同生活。”

午饭之后，有人提议搞个射猎会。于是，我们又出发前往那片河谷。至于猎具，我们有中国造的军用步枪。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支——这种武器的保险机不太保险，要是滑脱就遭了。

“你准备打什么？”我问苗。

“这个嘛，打鸟，”他含含糊糊地回答。“打白鸟和黑鸟。”

他指的是老鹰和鹭鸶。在光秃秃树杈上和冰封的河流旁，这两种鸟触目可见。我一点不喜欢他射杀鹭鸶的想法；不过，我可能也不需要有所顾忌。刘君摆出一幅标准的军人姿态，下来在那些优雅的白鸟中瞄准了一只，试图来个远射。随着可怕的爆炸声，前方约五十码开外的一块大鹅卵石，被他击得粉碎。一只受惊的驴子窜出河滩，被一个激怒了的农民追赶着；士兵们爆发出轰然大笑。那群鹭鸶漫不经心地拍起翅膀，优哉游哉地扬长而去。

我正要瞄准一只老鹰射击，但撞针只管咔哒咔哒作响，就是顶不

上火。“用这种武器你们要是能打日本，那才算怪呢！”我对苗剑秋断然说。“日本子弹”，一个学员戏谑地说。看来他们是能够获得较好战果的，因为我们上到河堤上，来了一阵连发。尽管枪声响得惊天动地，但也全然无济于事。我们甚至连一只驴子也打不着。

“用这个试试，”苗说着变戏法似的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大科尔特式左轮自动手枪。

“你怎么现在也带起这玩意儿了。”

“他们说我必须带。”他叹息道：“以前，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太危险，不能带手枪。可是现在，我可能需要这玩意儿。”我拿着这件武器，只是不知他的内心在想些什么。这把“科尔特”是很管用的。

射击的枪声把一批对此感兴趣的士兵吸引到了黄土崖边缘。可是，我们很快便放弃了射击。令我大感欣慰的是，没有打到什么。我发誓，今后决不再和成伙的中国武装人员结伴外出了。我们爬上河堤，经过了一个吊在大理石板上的巨大铜钟。我的朋友用感觉灵敏的手指抚摸着它那绿锈斑斑的光滑表面。

“有谁知道它在这儿陈放了几百年呢？可是现在，我要带你看一件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这座黄土崖的顶头，有一所优雅的山村小房子。这是一个按现代中国式风格建造的出色建筑物。它不仅装饰豪华，而且能够尽情观赏周围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山景。

“这是张少帅为他个人建造的。”苗剑秋告诉我。“可是，他从来没有在里面住过。年轻的军官们对他说：‘在国家如此困难之时，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给自己搞别墅？’张少帅闻言感到非常惭愧，便搬下来和战士们一起住在了窑洞里。那就是他睡觉的地方。”他用手指着黄土崖中的一个冒着烟的洞口说道。“他住在那儿，一直和学员同吃一锅饭。”

这是王曲军训营民主精神的又一个标志，同时也显示了发生在少

帅身上的个性转变。与他过去十余年里早已习惯了那一套相比，这里的气氛有很大的不同。唯其如此，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年轻军官以及其他从“赤化区”被放回来的军官们，对他们这位易受感动的司令所能够产生的巨大影响。

因为城门关闭得很早，我们赶在日落前便返回了西安。苗辞别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他总要赴什么约会。一小时后，他回到旅馆。

我立刻感到他的心情有点兴奋。

苗总爱摆出一幅戏剧般的姿态。他用手指按住自己的鼻子，轻轻吐出一个词：“战争！”

“谈判破裂了？”

他点了点头。“我们的代表刚从奉化回来。”

奉化是蒋介石的老家。他以临时休息为借口，表面上退归故里，并带上张学良和他一起去。“我们的代表团先飞到南京，遭到何应钦的逮捕。当他们被允许赶到奉化时，委员长又不愿见他们。等了两天之后，他才告诉他们说，如果西北方面不无条件投降，政府就将于下周五中午下令发起攻击。”

现在距开战时间只有三天了。“他们见到张学良了吗？”

“没能单独会见，他被严密看管着。但他叫他们继续干下去，按他们想的最好办法去做。也不要考虑他的个人安全。”

苗深深为之而激动起来：“张少帅是多么的伟大，而蒋介石是多么的渺小——小心眼！可是他非常狡诈。”他做出一副绝望的姿态。“现在，我们不得不和南京打仗，不得不打自己的同胞，承担起另一次内战的责任。但这是唯一的出路。

“难道不可避免了吗？”看来情况还真得严重起来了。

“我想是的。”他情绪热烈地握着我的手说：“现在，你应该到前线去，采访东北军部队。我给你搞个通行证。”

“好，我明天就去。”

“再见。我们大概不会在英国重逢了——就目前情况来看。”

他悄悄走出了屋子，只听汽车吼叫着驶出了大门。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刘君找来了一位在前线东北军某团做政治工作的朋友。我们带着一张必不可少的军事通行证，一大早便出发去渭南，它是火车能够通行的最远地段。此地距“叛乱者”的前沿防线“赤水”只有几英里。

到车站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赶忙跳过栏杆，飞也似的朝即将启动的火车冲去。即便在中国，这也是我乘坐过的最拥挤的火车。车厢大致分为三个等次，普通列车里有木制座椅的三等车厢，在这里是最豪华的：“老二”和“老三”分别是邮政货车和无盖货车。但是，这也是我在旅行中乘坐过的最友好的列车之一。

就我所见，没人持有车票，而且在事实上要检查票也根本不可能。我坐在车厢地板上，周围是一群士兵和奶着孩子的农村妇女。刘君的朋友正在起劲儿地和一位当地老板谈着话，给他讲述 1935 年底北平的那次伟大的学生示威活动。这次示威当时使土肥原贤二将军的华北自治计划未能得逞。在他的周围，很快便聚集了一批听众。

人们都在读早报；报上的消息极为贫乏，因为所有外地的消息，只限于通过无线电广播能收到的那些。然而，尤其是士兵们，逐字逐句地念着报上的每一句话，恨不得把它一下子吸收进去，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报上的每一段内容。我望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城墙，凝视着陕西乡村那和平的景象：每天进行的田间劳动，在田野里早已开始了，千家万户的人们在自己的黄土窑洞里吃着早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丝毫的动乱迹象。

临潼、骊山——依然为积雪所覆盖着——进入了视界。这里能看到士兵，但 12 月 12 日早晨的鏖战遗迹，则一点也看不到。虽然这列火车在速度上未能打破纪录，但到了中午，我们还是到达了渭南。

“双十二”之后，渭南车站附近曾是南京发动的最大一次空袭的目标。我们的列车把它的乘客统统卸在了仍然笼罩着战争恐惧的站台上。车站的建筑物已化为一片废墟，然而在它那残缺不全的柱子上，却贴着抗日标语，表现出一副勇敢无畏的样子。在车站附近的铁路支线上，竖立着一排被炸得弯弯曲曲缠绕在一起的货车车厢残骸。离主干线不远，有一个巨大的炸弹坑，已部分填平，但仍裂着一张洞穴般的大嘴；在其底部，躺着一辆卡车的残骸。

车站对面，有座新建不久的大工厂——渭南棉纺厂，该厂现在已经被完全毁坏。对于 12 月 16 日降临其上空执行“爱国使命”的 30 架“生日”飞机来说，它实在是一个很容易寻找的目标。究竟是否是因为飞机驾驶员把这排整齐的暗灰色建筑物想象成了兵营，或者，它只是在寻找随便一个什么目标来轰炸一下，以应付差事，这谁也说不清楚。然而，在蒋介石被扣押后的那个星期三，在除了愈来愈近的飞机发动机吼声外，没有任何警报的情况下，男女工人们刚从工作岗位上四散奔出，便发现炸弹像雨点似地降落在他们周围，地上纷飞着机关枪子弹。在工厂的大院里，我们看见泥土中还保留着中国工人的斑斑血迹。当地官员告诉我们说，这次空袭造成了 100 多的人员伤亡，仅火车站一处，就死了 30 名工人。

在一次国内危机中，为了维护政府的尊严，居然采用如此手段，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樊将军真的像夸下海口的那样，动用在洛阳那 200 架轰炸机，对于西安来说将意味什么。渭南这家工厂的毁灭，的确是对在内战中徒劳无益地采用报复段的最好说明。它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美元的损失，要由上海的金融家担；而死去的——也还是中国人。

渭南，从我与苗剑秋乘卡车经过时那一掠而过的印象中，我记得个零乱的城镇，有一条新建不久的宽阔街道。可是往东边一走，现在才发现，它也是个有围墙的古老城市。我们所经过的街道上，就像在临近前线所见到的那样，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士兵——主要是东北军战

士——每批数以百计；军用卡车；拉着卷毛长鬃马的骑兵：马车；独轮手推车，以及挑夫和叫卖各种东西的小贩。大餐馆和小饭店的生意十分兴隆；就我们之所见，没有一个地方的军队和市民出现过任何争执——这也许是罕见的。闹市区的场面极其浩大，但却秩序井然。

在一个类似于英国的乡村集市的市场中心，一大群人聚集在一个正方形的陈望塔四周看墙报。顺着砖墙，横列着一排粗大的白字，写的是人们常见的标语：“拥护革命领袖蒋介石”（日期标明是写自“双十二”之前）。在其下方，是“双十二”后发布的那些宣言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通告。读者在专心学习的，正是后两种东西。我们走出这座古老城市的城门，开始向山地进发。

我们的目的地并不难寻觅——它是前线上的一小村庄——我们曾经一度爬到了山上的哨卡处。我们只管跟着电话线走。这些电话线绕来绕去，上到了景色如画的半山腰，翻越过寺庙的屋顶，巧妙地利用着每一棵树木和墓碑，以便腾出地面。转了两个弯，又绕过了一个石“牌楼”，电话线最后引着我们经过受到践踏的原野，来到一堆房子跟前。这些房子坐落在一个狭窄而凹陷下去的道路边缘。我们找的那个团，总部就设在这里。

在一间大炕就占据了室内一半面积的昏暗小屋里，我们见到了该团的上校团长。出于对我们的敬重，他点燃了一支蜡烛，并给我们从一个热水瓶里倒了杯温开水——里面含有一种令人恐惑的黄颜色。我们坐下来讨论形势。

这是个东北团，东北失陷前驻扎在沈阳。事变后被撤到北平，然后疲惫不堪地绕行了中国一半的省份——河南、河北、湖南、江西（它和红军在此打过仗，并懂得了真正战斗的道理）；再往后，它被调到陕北，然后又前往宁夏阻击西北的共产党军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它对被派去奉命打自己同胞的愤怒情绪与日俱增，要求打回自己老家，或至少为一个他们所支持的事业而决一死战的决心则愈来愈坚定。这个团的故事也就是整个东北军的故事，而在此过程中所激发出来的情

绪，则是导致“双十二”兵变爆发的全部背景。

团长年过 40，个子不高，显得老成持重，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心情沉痛地给我们谈起了最后那次到宁夏的远征。

“在我们全军都一心一意地要去打日本的时候，为什么叫我们继续打红军呢？”他诘问道，“自‘双十二’以来，现在情况可就好多了，红军将和我们一起抗日。我们双方现在是战友了。”

“现在的情况又怎样了呢？”我想起了苗剑秋的临别预言，便问：

“你们可能又不得不和中国人打仗。”

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中央军并不想打我们，我们也不想抗击他们。但何应钦将军和南京的某些人硬要逼迫他们发起进攻。只要蒋介石将军愿意信守诺言，就决不会再有内战发生。在中央军向我们进逼时，只发生过一些小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都对天鸣枪，而不是对准我们。”

他抿着嘴笑了笑说：“何将军每逢和我们打仗，便派飞机过来洒放传单，要我们服从自己的领袖，并说张少帅不想让我们打仗。然而，前几天，东北军的一位连长挺身站立在一面山坡上，亲自对中央军部队进行演讲。虽然他处在有效射程之内，但没人对他开枪。”

看来，这里的人们普遍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接到进击令，中央军部队不会认真打仗。但西北方面的军队对此并不过分信赖，沿着这一带的高台地边缘，他们修筑了规模巨大的防御工事，挖掘了战壕；不用重炮，休想攻占这些阵地。

团长给我们提供了沿前线采访乘坐的马匹——一种披着一身厚墩墩的冬毛，铁镫上也裹着一圈羊绒的蒙古马驹。虽然在此之前刘君还从未乘过比毛驴更可怕的东西，而且这种马快走起来有点颠簸，令人很难适应，不过，我们这支骑兵分队也的确够神气的了。

骑马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到了山上的一个前哨阵地，一个炮兵

连驻扎在这里。在邻近的一所寺庙里，我们邀请炮兵连长与我们共同渡过了一天的时光。

炮兵连长是个小伙子——孙铭久的一位朋友——强壮有力，精神饱满，在日本受过训。此外，我估计他还准是个呱呱叫的炮手。他讲话的声音冲劲十足，就像在炮战中给他的连下达命令似的。

他毫不隐讳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他表达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我以前也听到过，特别是在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中间。“重要的不是领导——不管有没有领导，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抗日计划贯彻下去。”也像其他许多人——军官和士兵都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完全凭个人的喜好谈论张学良，称他为“英明领袖”(这是一个正式称呼，而其实际含义则可能还要深刻)。不管怎么说，这位炮兵不是一个凭感情用事的人，他有着十分明确的是非观念。

“我们迟早都要打日本，”他坦率地说。“蒋将军说过他要领导我们，好，我们就跟他走。可是现在他扣留住我们的司令不放，这阻挡不住我们；即便张少帅回到西安，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打日本，同样也拦不住我们。要是不能够直接投入对日战斗，我们就要另外开辟一条途径。”

为了加强语气，他一拳砸在桌子上，狠狠啐了一口唾沫，然后提议到前沿阵地转转。

薄雾朦胧的山脉逐渐消失在暮霭之中，夕阳的余晖映照在雪坡上，借助小型望远镜，对面政府军的阵地依然隐约可见。透过瞄准着他们的炮镜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了他们正前方是一片平原，在淡淡的阳光下显得宁静而友善。平原深处，有移动着的毛驴，悠悠晃晃的马车，以及细小的人影。这些大炮会吼叫起来，毁灭这个宁静的世界吗？

要是搁在三周前，人们会说，这个问题要由蒋介石来回答。他也有确作了答复——语气既诚恳又坦率——圣诞节那天，就在西安机场，他说：“我不想中国再有内战了。”蒋将军真的忘了吗？或者就像他在被俘的那天早晨，对孙铭久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这句话之后，

便再也一言不发，装聋作哑了呢？也许，目前这个问题暂时还得由在南京的其他人来解答。或者要由在更为遥远的一个国家首都的国防部长来负责回答。

回到村子里，在该团租的一户不大的农村住宅里，给我们拨了间房子过夜。我们坐在炕上(这种用柴火烧的炕热效率利用不高，烟味尤其令人讨厌)，和更多的东北军战士进行了交谈。这批人包括一名上尉，一名团长的勤务兵和一些士兵。

那位勤务兵来自北平，说得一口流利的餐厅用英语。他过去在一家外国旅馆里当仆役，也能讲“如深”(俄语)。他摆出一副英国仆役长的神气，呈上几瓷碗茶。

上尉是个满族人，出身于旧贵族家庭。他身材颇长，容貌清秀，剃着光头，嘴巴富于情感。他说起话来可真是滔滔不绝，并伴随着敏捷而有点神经质的动作姿势。

“政府问题算是个什么问题？”他说。“在中国，人们认为我们应当在民主和独裁之间做出选择。在洛阳当我还是一名军校学生的时候，他们总以此为题目叫大家写文章：‘什么是中国政府的最佳结构？’我们全都想写赞成民主制度——在满族统治下，中国一度有一个独裁政府，人民为此大吃苦头。可是校当局却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赞美在中国实行独裁制度，赞颂蒋介石做一名独裁者。没有人敢写他心中所想的。”

他思索了片刻，突然又慷慨激昂地说了下去：“关于领袖问题，要提到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先要问：他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蒋介石声称要当一名革命领袖，可是，他还想成为一名独裁者。那么，张学良又怎么样呢？”

张学良是个年轻人，没有很深刻的政治思想。但是，从他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东北，他在建铁路中和日本人竞争；他在沈阳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兵工厂。至于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那些损失，那并不是张少帅的过错——谁都知道，

日本入侵东北各省时，张学良正病在北平的医院里。

可是，他建立了中：小学和大学，一直试图解救人民。他诚心诚意地想要和国民党共事，直到他改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为止。最后，他终于相信了全国抗日统一阵线。这样，我们才有了‘双十二’，以抗议独裁统治，抗议国民党的独裁政策。我们大家同样也都相信这种具有民主精神的统一阵线。

“就拿我现在来说吧——”他有气无力地摊开双手——“我不是国民党。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国家主义者。可是”——他那双精巧的小手一攥——“现在我们都在为我们的民族解放纲领而一起战斗。这次运动决不能像中国过去的其他运动一样，被分化，被瓦解，领导人被收买。它是一场包括所有阶级的运动，有着全体人民做其后盾。”

他的这番话，用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受到全体官兵普遍拥护的一种主张做了理智性的总结和概括。在练兵场，在战壕里，在返回西安的火车上，我和许多东北军都进行过交谈。但唯有这一次面对面的倾心交谈，才真正使我对东北军的抗日感情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

“你反日吗？”这通常是我被问道的第一句话。但我是来提问的，不是来回答问题的。而我到每个地方都要问到的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红军？则从一位饱经风霜的战士那里得到了最好的回答。他把皮帽向后推了推，表达了如下见解：

“我们和红军打了十年血仗；我们愈打，愈明白我们是兄弟。我们在中国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也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共同战斗，去夺回我们失去的领土呢？”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北方面军队的士气，无疑是第一流的。不过，他们所据守的位置——西安以东，南北长约 100 里的一道防线——却有点令人感到棘手。它的错误就在于(从军事角度看)未能及时抢占住潼关，冯钦哉的背叛使叛乱者们失去了这个地理优势。通过这个狭窄的咽喉要道，他们本来是可以据守住全西北的。

然而，如果把陕西南部的农民武装起来，组织起来，他们就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有用的后备军。此外，红军还控制着前线的两翼——其南翼位于山峦起伏地区，是适于他们那种打法的理想地点。人们感到中央军对于沿河谷的挺进，也并不太着急，因为这将把红军留在了他们的身后，随时都可对其采取行动。在军事上这是一盘死棋。

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红军的态度。

译注：

①土肥原贤二(1883—1945)，日本军事特务头子。1915—1928年充当北洋政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的助手；“九一八”事变的积极策划者。事变后一度任奉天伪市长，曾至天津挟溥仪赴东北组织伪满洲国。长城战役时任旅团长，攻掠山东等地。日本投降后被列为甲级战犯，经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处以绞刑。

## 第十八章

### 红军的挺进

艾格尼丝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原指望她能给我捎来一些有关情报，但没人到达西安。从一位中国朋友那里，我得知她还在三原，贺龙和红军第二方面军就是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彭德怀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已经运动到南面。红军事事实上已完全包围了我们；只是迄今为止，我还没见到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给我们作翻译的大学生小刘，几乎发狂似的急着要访问红军营地。像许多年轻的中国左翼分子一样，他对朱德、毛泽东和这支工农军队(根据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重点转移，它已成为“抗日人民军”)怀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敬佩之情。在西安市内，我们偶尔也遇到过身穿平民服装，或穿普通官员制服的共产党代表和红军官兵；可是，这些都不够真切实在。我们想要见到的是在野战生活中的红军。

然而，在这个时候，要想出西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汽油储备是严格配用的，要搞到一辆小汽车甚至卡车，都没有可能。各种类型的机动车辆都被征作军用。我们想到租一辆马车，不过即使在中国，这也是速度最慢和最烦人的交通工具。我们只能进行一次短途访问，因为在目前这种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我们可不想走得离西安太远。

最后，我们决定不再等待。要是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就骑自行车去寻找红军。

我们设法从旅馆借来一辆自行车——这是一种旧型号的车子，配有一个很大的透光金属车牌，上面用兰、白两种颜色(分别用英语和汉语)写着：“中国旅行社”。小刘怀着义无反顾的决心，跨了上去；他为此丢了极多极多的“面子”，但这也是为美好的事业而做出的牺牲。在群众运动委员会，我找到了另外一辆自行车，于是我俩一起从南门出发。

我们获悉，在西安西面通往甘肃的铁路沿线距西安最近的城镇咸阳，有红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他们是否还在那里，却无法肯定；不过，如果找不到这支部队，我们就打算再加把劲，到三原去见贺龙。走这么远的路，却不得不依赖如此差劲儿的交通工具，真是急死人。

我们顶着来自甘肃山区的刺骨寒风，骑着自行车穿过荒凉的旷野。我们的右侧是那条铁路，据说到它的终点站宝鸡，有一趟定点火车，只是没人知道它的开车时间，而我们也更喜欢不受公共交通工具的约束。我们经过了一些泥泞不堪的破烂村庄，连点可供应的茶水都没有——这的确是中国的贫困标志。在大路上骑车走了约两小时之后，我们又来到了河边。过了这条河，便是咸阳的城墙了。

进入咸阳市内，我们直奔学生宣传总部，小刘在那里有一些北平的老朋友。在一座新建商业大楼的一个独间里，我们找到了他们。这座大楼的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室内大部分空间都为架板桌所占据。宣传队员们白天就在这些架板桌上工作，晚上就躺在上面休息。我们向

他们打听红军。

我们这才得知，在咸阳根本没有红军部队。可是，再往北走三十里，有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队伍驻扎在周围的农村。要找到他们，可不大容易；他们确切地址，现在还说不准。不过，在东边的某个地方，还驻有一支红军的宣传队。学生们给我们提供了一名向导，帮着我们去寻找。

吃罢饭，我们重新出发——现在已经是下午了——我们从咸阳东城门动身启程。距城门前不远，有一个交叉道口，通往宝鸡的铁路在此经过咸阳车站。车站的建筑物后面，有一个大酒厂，显然还在上着班。黄土地上的一座座坟墓的尖顶在阳光的照耀下，泛出金辉。

我们刚骑了没几分钟，小刘突然大叫起来：“看哪！”激动得差点儿从自行车上摔下去。“那是红军！”

在平面交叉道口的道路中间，散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两、三个农民，一两个看上去像铁路工人的人。除此而外，还有三名士兵，似乎正在与其他人谈论着什么。

他们挎着陈旧的步枪，神态悠闲自在。他们穿得是中国士兵的那种普通兰色棉制服，总的看来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不过，他们的帽子是黑色的，棱角很突出；在帽子的正前面，镶嵌的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国民党徽，而是一枚红色五角星。

这就是中国红军的士兵。他们是拿着从政府军手里缴获的步枪，挎着中国红军兵工厂制造的炸弹和手榴弹的农民战士。他们所在的这支军队曾纵横驰骋于中国大地，为工农苏维埃政权而征战不息。在12个省份里，这些农民战士已成了传奇性的人物；即使在那些对他们毫无偏见的外国学者眼里，他们也是创造了历史的人。

我们停下车来，向他们询问大部队的驻地。那几位红军战士仍坐在那里，显得无动于衷；他们的眼光里含着审视，但又非不友善。其中的一位朝前面的黄土崖方向挥了挥手，说：“在那儿。”我们兴高采

烈地告别了他们，继续赶路。看到一个外国人——当时在这些地区还可是，我们找不到一个人能告诉我们红军到底在哪里，直到我们完全绝望，只好又重新回到交叉道口。这时，那三个士兵已经不见了，但其中的一个农民还留在那里。他先前曾怀着浓厚的兴趣倾听了我们的友好交谈，目睹我们的友好相遇，最后终于答应把我们领到他们的驻地。他这么做，并不要一分钱。我开始真正认识到了红军强大的一个秘密：似乎可以这么说，只要有可能，中国的乡下人总会给予他们以保护和帮助，而这些对其他任何军队则从不给予。

我们直抄田间小道，绕过酒厂的围墙。天已傍晚，暮霭从河滩升起。突然间——也摸不清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两个带枪的人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他们是从酒厂的围墙阴影中跑出来的。其中有一个15岁的男孩，背着支用一根粗糙的带子挎在肩上的毛瑟手枪，脚上穿着麻鞋。我们被正式护送到了红军驻地。

紧靠黄土崖，有一个凌乱的由黄土小茅舍组成的小村庄。村庄周围有道寨墙，孩子们在外面玩耍，而老人们则在户外抽着晚饭后的一袋烟。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宁静；一走进寨墙，我们的向导便与村民们不住地打招呼。

“你们怕红军吗？”与我们一起来的那位学生宣传家问一伙小孩。回答他的是轰然大笑。老人们捻着胡须摇头晃脑地说：“红军是咱农民的军队；它是中国人民的军队。”由此看来，宣传队的工作并没有白费时间。

在寨墙之内，有一支约40人的军队住在两家不大的宅子里。我们受到这支部队的指挥者，一位身穿黑制服、约摸30出头的年轻政委的欢迎。在这支队伍中，他的年龄算是最大的了；我统计了一下，其他人的平均年龄大约是17岁。

这些年轻人像一群小学生一样把我围坐在中间。他们都携有重武器，比我见到过的任何政府军都要重些。他们中大多数人身上最干净的东西，便是自己的左轮手枪，而且全都显得生气勃勃，目光坚毅镇

定，使你一下子便可把他们从与其同龄的中国其他军队的人员中辨别出来。一个用长带子吊着一棵巨大的手榴弹，一走一磕碰的 14 岁小男孩给我们献上茶，自始至终为他第一次见到我这个外国人那稀奇的外貌而笑个不停。

红军在其新兵身上所做的工作，成就是相当了不起的。所有与中国红军接触过的人(也包括近几个月访问过他们的几位美国记者)都注意到：这些年轻人一戴上红五星，个性便立刻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些平均年龄大都在 20 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红军队伍里存在着一种愉快、友谊和无所畏惧的气氛；不仅如此，这支队伍还体现着力量和自信，而这在用旧家庭传统培养出来的青年人中间，是不常见的。伴随着这种精神风貌的，便是行为举止的坦率与开放。而令人奇怪的是，这恰好正是西方人的特点；在他们看来，红军战士所充分表现出来的，似乎就是全部人的个性。

这支部队隶属于徐海东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彭德怀的部下和第一方面军那些久经沙场老兵相比，他们还有点“嫩”。不过，这些年轻人也大都在红军中渡过了五六年，许多人一开始就是“红小鬼”。在那些由农民群众组成的队伍里，这支部队很有代表性，因为在他们中间，既没有学生，也没有知识分子，只有他们的领导是个城市工人。这又是它的一种特殊的构成方式：即在那些稍微后进的农民子弟中间，由产业工人来领导他们。

我被介绍成为一名来自英国的外国记者。“那好”，政委说：“你可以给我们谈欧洲政治。”我对这个问题几乎毫无准备，然而却贸然说道，我乐于回答有关欧洲的问题。他们显然渴望了解外界消息。

屋里挤满了年轻战士，毫无拘束地进进出出。我和小刘一块儿坐在炕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纷至沓来。

西班牙最近有什么消息？英国和法国对法西斯主义的武装干涉出面调停了吗？英国会不会加入“法——苏条约”？美国的劳工运动情况如何？英国人民听没听说过中国的统一战线？

他们所提问题涉及范围之广，国际政治知识之丰富，使我们闻之而大为惊异。这些战士都是来自河南、四川和湖南的农民。他们中有一两位曾当过学徒；他们的领导曾是汉口的一名铁路工人。在红军队伍里，他们全都学会了识字，其中的大部分人还能够写东西。他们在这里所学到的——这也是最感人至深的——便是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仅只是世界所面临问题的一部分。

在这个问题上，东北军把打日本说成是“神圣职责”，也想知道像英、美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民族独立斗争所持的态度。但红军战士们则怀有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远见卓识——无论这种见解是多么的不完善——看到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我并不想把中国的红军理想化；我与他们的初次接触时间非常短暂，给我留下的也只是最初步的印象。可是我知道，就是在黄土崖下那座微不足道的小村庄里，我与一群按任何西方标准都会被视为没受过教育的农民战士，就世界政治问题展开了富于才智的讨论。而与我在其他地区许多所谓“学术中心”所进行的讨论相比较而言，我与他们的讨论知识性要更强一些。至于其中原因，是不难推测的。

当天晚上，政委要给我们办个特别宴会，他还保留着传统的好客观念。尽管我们极力反对，村民们还是把面和蔬菜等礼物，自愿送了进来。于是，我们几乎还没等弄明白，便被邀请坐到一个摆满乡村美食的桌前。为了表达对我们的敬重，桌上还摆着核桃和糖果。当政委很庄重地把我们让到一个小饭桌旁落座时，我注意到，他也和其他那些或聚集在炕上，或围绕在屋那头的一只大铁锅旁的战士一样，吃的只是杂粮面、稀饭和麦饼。他给我们散了纸烟——“前门”，这在中国农村是一种奢侈牌号的烟——可是他自己却不抽。我的那位十足的英雄崇拜者小刘，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红军的礼物对他来说是异常珍贵的。

吃罢晚饭，该轮到我們提问了。我听过他们驻西安的发言人阐述共产党新政策的要点，然而，我还想通过实地考察，当面弄清楚宣传队所起的作用。

“对你们所遇到的乡下人，你们都讲些什么呢？光讲西安事变的‘八点纲领’够吗？”

“不，这当然不够。”这位年轻的政委答道。“不过，八点纲领是沿着民主路线迈进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真正实行民主的条件，目前在中国尚不存在。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只有使人民得到某些权力和保障，这种统一战线才能够建立起来。在西北领袖们签发的提案建议中，包括有政治自由的条款。但是，我们还必须帮助中国的农民，改善中国工、农群众的生活条件。”

“既然你们放弃了过去那种没收地主土地、区分阶级的政策，那么，怎样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我们必须降低租税。然后，我们将没收那些不肯帮助我们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亲日叛徒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人民和抗日战士。我们要求在全中国实行义务教育。这些事情，在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辖区内就可以做到，因此，在全‘民国’的范围内，国民党政府也是能够做到的。”

“噢，我明白了。那么，你们的现行政策和过去政策的根本区别，是否可以确切地表述在这一点上——即你们现在抨击的重点放在日本帝国主义，以及顺从和支持他们的中国人身上，而不是一切帝国主义和地主了呢？”

“是的，这是为适应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而采取的策略性转变。我们要与南京政府中的一切真正抗日分子实行合作，我们准备做出许多让步，以建立起这种抗日统一战线。诚如您所知，中国苏维埃政府已经做出保证：给予一切信教者充分的宗教自由。除了日本外，我们保证保护一切来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及贸易往来。我们赞同与一切准备平等对待我国的友好国家结盟。”

这番话是对我们已熟悉的那种政策的更具体说明。对于这种变化，在西安的共产党发言人曾对我解释为是一种战术上的变化，而非政策

性转变——他用的原话就是：“利用敌人在政策上的矛盾”。但这究竟有多大的成功把握，现在还很难预见。

“您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我问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如果西北危机的和平解决无望，你们会和南京再次开战吗？”

“如果仗非打不可，红军当然要支持西北方面。可是在目前，我们非常渴望能够避免内战。正是在这一点上，红军的政策有别于东北军中所谓‘左派’青年军官的政策。他们坚持除非张学良回到西安，否则就要同南京打仗。中国如果现在发生了内战，就正好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我们强烈支持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他说得非常直率，然而我可以想象到，要是我的那些东北朋友知道了他们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和平”的态度的话，将会是多么的愤怒。还在想着武装抵抗，编织着“自我牺牲”计划的小刘，看来对其中的某些道理感到非常茫然。我自己对这一新战术也不很明白；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含有机会主义的味道，令人不由起疑。不过，现在还不能急于下结论。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红军开往陕西南部，是一次和平的进军，而不是战争行动。例如，这支宣传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与各阶层人民的友好关系，并打下一个牢固的信任基础，以此作为与南京实现任何和解可能的前奏。部队占用过的农家住宅，都被打扫得一千二净；穷家寒舍里那些引以为珍的小摆饰，也都在原处未动。来自三原和其他同样为红军所占领的地区的报告，情况也都如此。

然而就是这些人，他们被说成是乡村地区的洗劫者，在其身后，留下的是燃烧着的村庄和洗劫一空的寺庙。即便这样，根据中国新闻界的详细报道，还要说青年农民正在被红军强拉入伍，妇女则被“共妻”，任“共匪”玩乐。那些传教士的撤离——如果仅只是为其撤离辩护还则罢了——早在他们平安抵达上海之前，一幅“共匪”在西北实行“赤色恐怖”的可怕图景，便被描绘了出来。当然，也有一些与此相反的报道，因为那些真正遇见过红军的难民，把他们说成是在中

国见到过的纪律最严明、最守秩序的一支军队。不过，这种辩解却只能使人们把红军想象得更加可怕。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返回西安。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那座可爱的村庄。然而，不管怎么说，我最强烈的求知欲毕竟得到了满足；小刘处于心醉神迷的状态。他和红军共度了一个晚上。

临近中午，西安城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正沿着宽敞的大道向前疾驰的时候，突然听见了飞机发动机的吼声。西安上空有几架飞机驶过，其中有一架刚刚掠过我们的头顶，可以看见机翼上的白色国民党徽。

是等待已久的空袭终于降临了吗？可是，西安城内并没有防空的枪炮声。飞机猛地一下子俯冲了下来，几乎贴近屋顶，然后又险象丛生地拉了上去。这是在做特技飞行，简直有点像是在玩命；我从未见过如此鲁莽的飞行表演。

机场的停机坪外停着几架飞机。我们看到时，其中的两架已经升空。我注意到，飞机驾驶员穿的是国民党的空军制服。

“这是‘敢死队’在训练”，小刘俏皮地说。看到我流露出茫然不解的神色，他给我作了解释。

原来，有一批南京方面的飞行员，“双十二”后被西北方面与飞机一起扣押在西安。现在，他们被强迫参加一次空袭预演。不过，为了防止飞行员驾机直接逃跑到洛阳，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便组织了一批东北大学生，其任务就是坐在飞行员身后，用手枪对准他们的脑袋监视其行动。飞行员们报复他们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用忽上忽下的特技飞行整治他们。大多数“敢死队”员先前从未乘坐过飞机，现在他们在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半个小时里，体验着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对这些坐在巨大的双翼飞机里的毫无经验的“卫士”，我突然萌发了一股强烈的同情。他们神情紧张的坐在飞机里，随着发动机的吼

叫翻上腾下，俯冲螺旋。后来我听别人说，他们中有好几个在回到地面后，便昏死了过去，不得不送进医院。他们无疑也应算是献身革命的无名英雄。

1月28日，西北举行了庆祝“上海之战”的周年纪念日活动。1932年的这一天，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领导下，出人意料地抵抗了日本。在革命公园召开了群众大会，主持人据说是马占山将军。这位身材瘦长而结实的骑兵统帅，作为在满洲继续进行抵抗的唯一中国领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获得了世界声誉。就像东北人称呼他的那样，“双枪马”据信有超人的感觉辨别力；据说，他只消察看一下马蹄的印迹，或嗅一下羊粪蛋的气味，便能说出另一支军队离他有多远的距离。他无疑是位英明的统帅，作为“嫩江英雄”，他在中国人民中也享有巨大的声誉。

在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欢呼声中，马占山在讲台上出现了。可是，在公开场合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他，显得冷静而工于心计，委派了一名年轻代表替他发言。我们在“少先队”里的一位年轻朋友“红小鬼”，成了这次会议的明星。他对着话筒足足讲了20分钟，谈论“反对卖国贼”的问题。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这实在难得。在他之后发言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民，他热情洋溢地演说了5分钟，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最后还用年迈沙哑的嗓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呼声，把帽子甩向空中。他的演讲，使群情为之一振。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众运动的高潮已开始消退。这次会议的气氛就不如以前那么高昂。要明白其中道理，也并不太难。

这是因为，西北已经分裂成了好几个阵营。人们感到，由于领导阶层的思想混乱，使群众感到无所适从。根据收集到的点滴事例，我对形势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不同小组、不同派别之间的秘密协商已经进行好长一段时间了。洽谈的细节，是无法搞到的，但协商的总趋向则十分明显。东北军中的“激进派”——这一派包括孙铭久和我的朋友苗剑秋之类的“青年

军官”——是极左派；在当时他们要求立即使张学良回到西安，以此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总而言之，他们只想着行动；如果南京方面不答应他们的要求，采取某些积极的抗日行动，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急不可待地要为此而战斗。目前，以年轻军官和大部分普通官兵为一方，以部分年纪较大、较为保守的高级指挥官为另一方，出现了真正的分裂。

杨虎城一直坚决要求按照比南京政府准备提供的条件更有利的条件解决问题；如果必要的话，他准备为谋求更好的条件而战斗。他的动机不那么明确——可能也不够真诚——较之于那些东北战士来说，因为他们几乎可以无所顾忌地干下去。可是，由于人们都普遍感到，先前存在于西北所有党派之间的合作关系在走向破裂，杨虎城也开始为自己谋出路。对外，他依然扮演着“叛乱者”首领的角色，尽管当时对他愈来愈普遍使用的一个词是“顽固派”。这种称呼倒是有点适合杨“匪”个性的，他感到在某些方面对他不公平。在此情况下，他要找一个泄愤的目标，还不是很困难的。

最后，红军的立场变得愈来愈清楚了。这是一种异常引人注目的“和平路线”。对此，制造了 12 月的叛乱，甘冒自身瓦解的危险而阻止了另一次反共战役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部下，双方现在都倾向于指责红军，说他们利用形势为自己谋利。

在整个西安事变中，共产党的政策很值得仔细研究，因为它使一件最无法预料，也许是 1937 年远东意义最深远的政治事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关系破裂了十年之后，“重续良缘”成为了可能。

现在回想起来，事情还是很清楚的。因为在西北的所有不同派别中间，唯有共产党持有条理清晰的行动方针和谈判方案。逮捕蒋介石的消息刚一透露给他们，他们便认识到形势对他们来说出现了这种可能性：借此“重返南京”，或者，选用一句措辞不那么得当的句子：“回到一九二七年”。因此，周恩来立即火速赶到西安；因此，他与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还是基于这个原因，他采用了一种无懈

可击、完全合乎逻辑的手段(但这对许多东北左倾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很难接受的)，强烈要求释放蒋介石。然而，有人却把他在西安所做的一切说成是谋取“一己私利”；认为只是由于采取突然和出其不意的手段逮捕了蒋介石，才使得他的那些行动有可能进行。

自此往后，当威胁到西北的战争使得形势日趋恶化，而杨虎城的不妥协和东北军“少壮派”军官的狂热，又似乎使日益恶化的形势有可能迅速转化为一场产重冲突的时候，共产党的代表依然坚持和平路线，即使牺牲眼前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和军事行动所能够获得的收获相比，他们更重视抓住现在这个机会。这使他们得以把潜存于蒋介石身后的国内进步和自由派人士，重新聚集在他们周围。这是一场关于未来的赌博——尤其重要的是，它是一场以蒋介石的窘境为赌注的赌博，而这场赌博的结局，则因西安的危机而大白于天下。只要蒋介石在政治上还不得不依靠那些所谓“抗日分子”，则抗日统一阵线的形成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西安最后那几天形势错综复杂，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这种政策的后果，便是把共产党和红军一下子推到了西北各派别的右翼。虽然从现在看来，红军的政策显然十分光明磊落，可是在当时，它却被严重地误解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预定于2月15日在南京召开，红军尤为渴望把他们的统一阵线主张当作议案，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从而得到适当的考虑。与此同时，他们反对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尤其是爆发全面的敌对行动。

在一月最后那段时间里，西安的人们时时处处都可以感觉到，“叛乱者”内部因政策歧见和利益不同而发生的冲突。博古和红军领导曾花费很多时间，耐心地向东北军“少壮派”解释他们的政策，但并无明显的效果。共产党的新路线在首次经受着考验；尽管对红军来说，妥协还只是在试验阶段的陌生武器，但他们依然不惜做出自己的努力，力求约束他们那些更为急躁、更难控制的同伙们。最后，他们的忠告终于取得了成功。然而，还没等他们庆贺成功，整个阵营内部的分裂便演化成为公开的暴乱了。

## 第十九章

### 直接行动

大变革之月，二月来到了。然而在西安，世事似乎还像往常那样地永恒不变。我们获得的所有消息，都靠无线电广播。每到深夜，我们便收听欧洲电台的短波节目。

马德里——“这座欧洲自由力量的最后防线”——一时常濒于失陷，但却并没有失陷。在俄国对卡尔拉狄克①的审判艰难而又缓慢地走向它的必然结局②——无论把频率调到 12 个电台中的哪个波段，无论是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还是海参崴，翻来覆去播送的总是关于托洛斯基和恐怖主义的那一套故事。法国的人民阵线③、英国的联合阵线、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阵线——不知怎么搞的，像突然凝固，无法转动了的新闻胶片一样，造成了一段悬念。这些日子在欧洲，有谁能看到马德里之外的形势呢？

澳大利亚，悉尼广播电台——“在几个人的掩护下，哈蒙德打了一个节奏明快的突破球；他们在奔跑……”板球似乎已经吸引了整个“澳新大陆”人们的注意力。香港广播电台——“本岛新的防御费用自然将意味着，使本地纳税人增加一笔数目可观的经济负担……”看来，不列颠也在远东武装了起来；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东京电台——“内阁危机在持续；鉴于军方的反对，议会的解散显然势在必行④……”又是日本的内部危机；这种现象还会持续多久呢？远东舞台上的所有这些熟悉的场面，几乎都在给人以宽慰。南京电台——“中国政府决定为美国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⑤的遇难者善意捐助二十万美元……”这几乎使人感到是莫大的讽刺；因为在四川，已经有数百万中国农民在冬天的饥荒中面临饿死的危险。“绥远前线的中国边防军司令傅作义将军，讲述面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强敌，他的军队的英雄事迹……五百名装备极差，只有轻武器的中国士兵，击溃了数

千名配有重武器的侵略者……”从女播音员那迷人的音调中，人们能够理解这种喜悦的心情；可是，她为什么对“国家的保卫者”仅只能使用步枪来对付坦克和大炮而如此激动呢？难道中国的士兵真得需要使用如此劣势的装备，来刺激他们的英雄主义吗？南京政府既有坦克飞机，也有大炮，可是所有这些东西，似乎都要用于压制和封锁西北方面提出的那个不合时宜的建议：也就是说，最好把用来对付西北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分配给在绥远进行抗战的人们。

在西安以东不到 40 英里的地方，双方军队隔着一条浅浅的河谷，相互对峙着。他们都准备好要进行战斗，可是，他们战斗又为的是什么呢？对于政府军来说，当然是奉命镇压一次叛乱。而反对进一步打剿共内战的西北军队，则似乎是在地方军阀的教唆下，对南京政府进行着挑战。如果战端开启，发动战争的责任当然不应该是他们。可是，没几个人是会因此而称赞他们的。

绝对没人真想要战争。至于杨虎城，如果他认为红军会支持他的话，也许会强行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可是，他知道红军并不想打仗。无论如何，这种僵持局面是不会再持续下去了；总有一方不得不做出让步。

据说，有一个解决方案事实上业已即将达成。西北方面的三支军队——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部队——将撤出西安，保持密切联系，而以兰州而不是陕西首府为其基地<sup>⑥</sup>。这不是一次体面的撤退，但是，这至少可以避免做出打内战的可怕选择。

小刘神情极其沮丧地跑来看我。“要是东北军开往甘肃，到时候我就得跟他们去了。兰州那地方既没水，也没食物。我们可怎么生活呢？”

为了使他快活起来，我建议去看场电影；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许这是他能够看到的最后一场电影了。西安有唯一一部外国片子，因而在主要影院里被反复地演来演去。这部影片相当切合实际，它是华莱士·比里的“万岁城”，很受观众欢迎。不过，我们已经看过了

两遍。我建议去看一部中国片子。

不幸的是，我们一头撞进了“新生活运动”的宣传网里。我们看到的这部片子，是一部家庭纪实剧。它表现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长，他的儿子们忘记了做子女的基本责任，留恋城市里的那种富于刺激的生活，而不愿回到乡下老家去。从影片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的主要灾难，是音乐酒吧和不文明的行为。影片的最后是合家团聚，那位孙子准备当一名政府官员，而不是皓首穷经的老学究，使老人能够在满意中死去。我注意到，群众对这部片子没有任何热情的表示；尽管它制作的还算可以，但正如它竭力想要灌输的那种伦理道德一样，其内容距现代中国的现实过于遥远。

影片演完后，小刘叹了口气道：“这样的片子谁也骗不了。我的父亲就像影片中的那样是一位官员——他高兴让我完成学业，然后找一门好亲事。当得知我离开大学，跑到西安后，他非常生气——他说我是不孝之子。可是，要是所有的儿女们都只知按自己父辈们的愿望行事，怎么能够建设新中国呢？”

“你给你父亲写过信吗？”我问。

“没有。要是我回到家里，”他痛苦地说，好像看透了一切似的，

“我只能变成像影片中的那个儿子。我要去兰州，和东北战士在一起；或者，如果我能找到地方的话，我还可以参加红军军校。比起当个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品茶的小官吏，这终归要好些。”

我们下榻的这座旅馆几乎完全被抛弃了。旅馆经理，一位短小精悍的上海人，生活在北方蛮子中间，经常处于恐慌中。如果军队中再出现任何动乱，他感到他和那些南方籍雇员很可能成为袭击的目标。作为一名优秀的国民党员，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过去几周在西北实行的强制性措施的厌恶感。由于要照看旅馆，他不得被迫留在工作岗位上。不过，一旦这些事“全完了”，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将毫不迟疑地立刻搬回到大城市。生活在西安，太富于刺激性了，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旅馆在损失着钱财；铁路在损失着钱财；每个人都在损失着钱财；对我来说，这种形势似乎包含着某种希望。工商界巨头们可能会竭尽全力给政府施加压力，从而打破对西安的封锁。

“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呢？”经理忧伤地说：“我听说军队正从前线撤下来。后来又听说，有一些人不愿撤退。有人说杨虎城将和东北军打起来。要是战斗在西安内部打起来，我们这些人和东西可怎么办呀？”

可是，也有许多迹象表明，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统辖区在甘肃，并且除张学良而外，大概算得上是东北将领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于学忠将军，已乘飞机抵达西安，呆在杨虎城的司令部里。2月2日早晨，西北救国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这份宣言既强烈反对内战，也声明不赞同在解决问题时任何一方为求得特殊利益而做的任何努力。这份宣言的出现，被看作是协议事实上已经达成的初步声明。

然而，就是在这一天，突然发生了一段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我外出打探消息，可是没一个熟人在家。苗君一去不返杳无音信。报社的办公室像是几乎被遗弃了。甚至小刘也无影无踪。街头上呈现出一种异常的紧张气氛；每隔两家，就有一家店铺上了门，因为凭借着对危险的某种不可思议的预感，而这种预感有时竟会一下子传遍一个中国城市，店铺的老板们似乎暗中被警告道：麻烦事就要降临了。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参谋总部新城之外，岗哨比以往增加了一倍。中午时分，金灿灿的阳光普照在灰色的屋顶瓦檐上。

在一家回民餐馆里，我独自一个吃了一顿煮羊肉和芝麻饼。正在这时，街上的嘈杂声突然愈来愈大，然后又静了下去。从南边的鼓楼附近，传来了沉闷的枪声。平时，西安经常可以听到兵营里传来实弹射击的枪声；可是，在这个方向并没有兵营。市内发生了什么事？

没人知道。大概是在打仗吧，服务员冷漠地说。当我来到街上的时候，一切都很平静；周围几乎没有行人，只是黄包车还像往常那样

在等待着顾客。

黄包车夫通常像大人物那样消息非常灵通；可是，从这位把我一直拉回到旅馆的陕西壮汉那里，我却什么也打听不到。“城门已经被关上了，”他说。对此几乎可以这么认为：或者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或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北平有一次关城门是由于学生的示威游行。不过，我记得枪声来自城南。

一进旅馆，经理便欣喜若狂地向我问候：“唉呀，贝特兰先生，您的归来真使我高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你听说了吗？”

我没听说；他也没有，其他的人也都没有。我徒劳地在电话机旁守候了半个多小时。除了听其自然、静等消息外，绝对无计可施。一切头绪都被彻底搞乱了，所以，要再安定下来，显然要花费一些时间。当天傍晚，谣言四起，说是自于学忠以下的好几位领导人，都被枪杀了；尽管如此，似乎还没人知道究竟是谁搞得射击事件，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陪伴着我上床就寝，比往日稍早。这是我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反正迟早会有人来的。

我这样考虑着：世间的一切生物  
只能够繁茂一个极短的时期，  
而这座大舞台上的全部演出，  
没有不受到星象的默化潜移；  
我看见：人类像植物一样增多，  
一样被头上的天空所鼓舞，所叱责；  
在青春朝气中雀跃，过极峰而下坡，  
坚持他们勇敢的品格到湮没——  
于是，无常的世界就发出奇教……⑦

小刘突然闯进屋来，他异常兴奋：“我一定要跟你说说！”他喊道。

“好，”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下午发生了什么事？”他恐惧地朝门口扫了一眼。过了一会儿，他戏剧性地宣布道：“我们把王以哲和何柱国给毙了！”

“你们毙了他们。你们是指你们的‘先锋队’吗？”

他点了点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你现在还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是西北的叛徒——要把我们出卖给南京，孙铭久说一定要毙了他们。”

我陷入了沉思。王以哲是东北军的一位高级军官，他被认为是反动派，反对年轻军官的“激进派”小组。不过，我一直听说他是真正抗日的。何柱国是另一回事，他是东北军骑兵的总指挥，但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算不上是东北军里的人。他过去一直是蒋介石的人，而且在共产党与东北军相互停战之后，他几乎是西北唯一继续和红军打仗的将军。我知道何在东北军中很不得人心，他肯定私下和南京进行着谈判。

“枪毙王以哲的理由是什么？”我问。

可是小刘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还只是个大孩子，显然还不知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他崇拜孙铭久这位东北青少年先锋队的年轻统帅，愿意追随他无论到哪里。可是，眼下这次行动将向何处发展，现在还看不出来。

“现在我必须和特务营一起离开，”他神情紧张地说，“在东北军中将要出现分裂，我们也不知道杨虎城有什么打算。”

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在门口还有另外一名见习军官在等着他。

“再见，我的朋友。我们将到北边设法加入红军。不过，他们现在也许不愿接受我们。但除此而外再没地方可去了。”

“再见，tungchih(同志)，祝你走运！”

他对我惨然一笑，匆匆消失在夜色之中。我能够理解这些惊慌失措的学生们眼下的困难处境：他们在变幻无常的最后这几天里，完全处于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他们曾听到过共产党的领袖详细解释关于“支持中国的统一领袖蒋介石”这一崭新的学说。可是，对于这些毫无经验的左倾分子们来说，实在转不过这个弯。所通过的那些协商解决方案都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他们要求采取行动；但是相反，一连几个星期没有任何动静，最后竟来了个其前景无法预卜的反其道而行。对于孙铭久，我知道他是反对撤退的；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就是怀有一种企图，企图借此阻止“投降”南京。它将产生何种影响，尚有待观察。

第二天，我终于设法和张兆麟取得了联系，他肯定掌握着最新消息。一看到他那张宽阔而有点茫然的面孔，便使我感到莫大安慰。

“你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吗？是不是东北左倾分子兵变了？”

他不由得苦笑了。“这是你的那三位朋友：孙铭久、应德田和苗剑秋干的事。他们总想着要发动一场革命。”他给我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2月2日早晨，曾策划了逮捕蒋介石事件的同一批“青年军官”小组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考虑当前的形势。他们认为，即将实行的和解是一次背叛，并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年老的指挥官。这些人——他们断言——光知道为自己着想。他们获悉了他们上司中某些人“变节行为”的确切情报，而且，在下级军官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之间，还有一段旧仇，后者在满洲曾有过那么一段不光彩的纪录。就在东北军整个都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某些高级军官居然为自己聚集了数目相当可观的私产，这是很不幸的。

王以哲似乎早有一种发生不测的预感。就在不久前，他举办过一次午餐会，当时客人们不理解他因何神情过于紧张，直到最后他才说：“你们没见咱这里刚好十三个人吗？这不就是说我们中要有一个人必死吗？”。自此以后，他一直隐居在鼓楼附近的家中。孙铭久和他的特

务营开完紧急会议后，便来到了这里。他们破门而入，制服了卫兵，然后把这位将军击毙在床上。

可是，这只是个开头。王以哲的副手宋学礼将军，被捉住关押了起来，搜捕还在进行着；交通处长蒋斌，此人大家都知道，曾多次延误了“少帅”通电的发出，凡经他手的电报都受到严重阻挠，这次也被抓了起来。在菊花园，有一个很别致的旅馆，很多人都说那地方不怎么干净。东北军参谋部的另一位老资格军官就在此寄居着。这就是徐方上校。他们在他的屋子里发现了无线电设备，于是，他也被列入了“叛徒”名单。这三个人，没费多少劲便被带到了东门口，对着城墙站着，全给枪毙了。

然而，这次兵变的主要矛头是对准何柱国的，这些东北人毫不隐讳对他的强烈不满。何在新城之内杨虎城的司令部里。孙铭久及其同伙是有进入新城的正常权力的；现在，他们利用这个权力，成功地包围了杨虎城的住处，因为他们知道何柱国就在这里。这位被吓得要死的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只要任何一位“东北先锋队”的成员设法瞄准他，他的末日便算到了，因而死死揪住杨虎城的衣襟不放——在这伙兵变者面前，他几乎是唯一的安全屏障。孙铭久他们多次企图把杨虎城引诱到电话机旁，大门口，或者任何一个能够使可怜巴巴的何柱国无法在其身后躲避的地方。可是杨虎城毫不妥协，最终还是挫败了这些叛乱者。在意识到这么做对这些人也很危险时，他便信守了要帮助他们逃走的诺言。

“这么说，何柱国逃掉了”。

张点了点头。“杨虎城救了他。”他浓眉紧蹙：“这真使人不可思议——杨虎城保护了他。而且他已发布了逮捕孙铭久、应德田等人的通缉令。然而，又是他放跑了他们。”

“你的意思是说——他鼓动起了这次兵变，以便保护蒋介石的人，借此邀功请赏？”

“也许是这样。一切都很复杂。我知道孙铭久心地正直——这伙

人一直反对和解，除非张少帅回来。可是，也许是杨虎城利用了他们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周恩来知不知道这次兵变？”

“我不清楚。共产党是极力反对任何这类行动的。还有些人说，这次兵变也针对的是他们，因此他们都躲了起来。我完全相信他们与这件事毫无牵连。”

无论其结局如何，这次兵变使东北军左翼完全陷于解体。反对和解的人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事实上，西北方面的军队已经开始从前线撤退。为阻止撤退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努力，也终于失败了。

2月4日，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合发表了一份“和平宣言”。宣言回顾了最近在西北发生的事变经过，提出了三点建议：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必须恢复张学良的公民权；东北军和西北军按中央制定的计划撤退；群众运动和“救国委员会”的活动，南京政府必须予以保护和支持。这是第一次由西安当局正式发表的承认和解的宣言，而且也达成了协议。西安市内的疏散和改组工作，将在一周之内完成。2月4日，西北这次的暴动终于不那么体面地草草收了场。从12月12日到2月4日。总共是55天，由于中国人一般都喜欢双重数，因而，这次运动在西安立刻被命名为“五五暴动”。

然而，在2月2日极左分子兵变后的三天时间里，西安还是处在一片恐慌之中。王以哲统辖下的军队据说发动了叛乱，并威胁到杨虎城的军队；由于其他几个团的东北军离开了这座城市，因而一遇到紧急情况，事实上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控制局面。自从12月12日以来，西安城内的人们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慌和不安。戒严令被再次颁布执行。每过九点钟，大街上便空无一人。

最后和解方案的条款一直没有公布，可是，通过各个官方渠道，我能够把总协议的基本条款汇列出来。东北军，这支西北最大而有独自特点的军队，要撤退到甘肃；眼下它正退往甘肃边境附近的一座城镇——平凉。于学忠担任行动的直接指挥。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将移驻

渭河北岸。西安的撤退一经完成，代表南京“军事委员会”的顾祝同将军，就将率军移驻西安，担任临时指挥。红军将退回到在该省北部自己的地盘上去；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红军和南京政府之间已经缔结了事实上的协定。他们作为政府常备军中的一部分，从此将受到南京的支持。统一阵线的全部主张，在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全会上，将被提交讨论；与此同时，西北的救国运动将受到当局的保护和支持。

上述这些东西，除了涉及红军的那部分外，没有什么特别激动人心的内容，充其量这不过是一个“善意谅解”，其作用超不过一张临时停战协定。而此时此刻真正使我关切的，则是我在西安的几位朋友们的命运。

要找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西北方面的军队刚开始撤退，在那“55天”中存在于西安的许多组织，便立即解体了。从他先前工作的一家报社升任西安最大报纸主编的张兆麟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国民党官员卷土重来，他就会自动地为其所取代。当时曾为“抗日联合会”工作过的几乎每个人，现在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但是，这不仅仅是他们会失去工作的问题。他们不可避免地将会遭到报复。因为西北当局释放了的所有“蓝衣社”党徒和秘密警察，正等着和他们算老账。如果说西安的“赤色恐怖”只是神话的话，那么，“白色恐怖”却是切切实实地存在着的。在西安形势开始逆转的这个时期里，与救国会组织和宣传机构活动有牵连的几乎每个人，没过几天(特别是夜里)便统统转入了地下。往西安北边去，受欢迎的避难所是三原；红军虽然已从这里撤走了，杨虎城的大部分军队却集中在该城。从三原那里，有一条通往陕北“红区”的自由大道。

在最后几天里，大多数流亡者都肯定把自己隐蔽了起来。学生们成群结队地一走了之，其中有许多人投入“红军军校”和“红军政治训练学校”。因为没有一个人敢担保确信，南京会信守所谓的和解条件。在新的临时行政机构建立起来之前，该市不存在任何名副其实的

政府管理机关。在 2 月初的这几天里，西安很难给人留下任何印象；西北方面军队的撤退的确秩序良好，但其余的人则四处逃命，如鸟兽散。

西安的夜晚一片紧张忙碌。撤除武装警卫的一些场所，遭到持勃朗宁手枪的便衣警察的突袭。一些人乘机乱报私仇。市内的某些住宅在遭受洗劫，但却没有人前去制止。因为杨虎城的卫队还没有离开新城——在整个西安，几乎只有这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中国的传统新年就要来临，要是在往常，商店和澡堂的顾客会昼夜不断，生意异常兴隆。可是现在，一过晚上九点，便没人愿冒险来到大街上。外面到处游荡着的枪手实在太多了。

艾格尼丝在北边和红军在一起；细想起来，我觉得她在那儿其实倒还好些。小刘和他的朋友已经过了边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认识的其他人都随身带着武器，在同一个地方决不过两个晚上，周恩来还在该市，但没人知道他的地方。

一天夜里，我突然从一声噩梦中惊醒。

我的屋子向来都不很昏暗，因为街灯透过旅馆的汽车盘道，可以直接照射进来。时间已经是凌晨 3 点了，微风无力地拂动着窗帘。由于旅馆采用的是隐蔽集中供热系统，待达到热度的最大值时，一般都很晚了，所以我总是开着窗户睡觉。

可是，现在却很冷，我发现自己在打哆嗦。

在睡梦中，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幽暗的楼下走去。楼梯的底层，有一盏孤灯，一扇通向黑暗的门。我下到了最后一级台阶，然后停了一会儿——梦中的这段时间觉得特别长——对面是敞开着的门道。

就在此刻(或是在我醒了的那一刹那?)，我觉得身后有低声说话的声音，十分清晰，直到现在，我好像还能听见有谁在说：“你的三个朋友，苗剑秋、孙铭久和应德田，死啦!他们是在今晚被枪毙的。”

这究竟是有人趁夜色给我捎的口信，还是我过度紧张的神经造成

的错觉，似乎都无关紧要；我模模糊糊地相信了这个事实。近一周来，我成了这座旅馆里的唯一客人。每天夜里，全体职员都不知藏到哪个隐蔽点去了，叫都叫不应。谁要闯进我的屋子，实在太容易了。

我来到窗口，向外眺望。凄凉冷落的水泥汽车盘道向外延伸，最后被紧闭着的大铁门挡住了视线。夜空遥远而凄冷；甚至星星都似乎被冻僵了。这座城市并没有沉寂下来，沿着空旷的大街，传来机动车急驰的声响。向北望去，城墙上方亮着一束光线(那个地方不用说正是铁路)，传来锤打钢铁制品的丁当声。轮换工作的人们正在上着夜班。

我突然做出决定：现在是我离开西安的时候了。我关上窗户，第一次给寝室的门落了锁。

译注：

①卡尔·拉狄克(1885—19397)，苏共中央委员，在“肃反运动中”与皮达科夫等 17 人被指控犯有策划恐怖活动，从事间谍活动等罪名，于 1937 年 1 月 23—30 日遭到公审，其中 15 人被判处死刑。

②此时正值苏联以追查基洛夫被害事件而开始的“肃反运动”处于最高潮，全国上下都在抓“恐怖主义”反党分子。继 1936 年 1 月和 8 月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的两次审判之后，拉狄克等为首的 17 人于 1937 年 1 月受到审判，同年 3 月又公开审判了以原中央委员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 23 人“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苏联当时的舆论中充满了这类消息。

③法国人民阵线——由法国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等党派组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1935 年建立，1936 年 5 月在议会选举中获胜；6 月组成依靠人民阵线支持的第一个内阁。1938 年“慕尼黑”协议签订后，人民阵线内部开始走向分裂，最终于二次世界大战前陷于瓦解。

④1937 年 1 月 23 日日本广田内阁倒台，2 月 2 日成立了由林銑

十郎为首的内阁。

⑤1937年1—2月，美国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发生洪水，造成巨大破坏，九百多人丧生，五十万户住房被淹。

⑥当时南京方面提出供选择的有甲、乙两种方案：甲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乙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调往安徽，十七路军仍留陕西西部。最初西北方面都倾向于同意甲案。

⑦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五首，该诗后面的几句为：……使你青春焕发地站在我跟前，

挥霍的时间却串通腐朽来逞强，

要变你青春的白天为晦暗的夜晚；

为了爱你，我要跟时间决斗，

把你接上比青春更永久的枝头。

——据屠岸新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

## 第二十章

### 国民阵线

第二天，首批南京军队抵达西安。

他们进城时乘坐的两辆大型军用卡车，径直驶到西安宾馆近前，卸下了几位军官。我们的视觉对原先军队穿得那身蓝灰色服装才开始逐渐习惯，紧接着来的这批穿咔叽布制服的人，倒令人感到新奇而陌生。就连那些配有防雨篷布和软座的卡车，也凑热闹似的与原来那些

载着戴皮帽的东北军，在大街上到处乱窜的破烂敞篷货车进行着比较。

然而，封锁终于打破了。旅馆经理站在台阶上，面含喜色高兴得直搓手；荒废已久的休息室，也意识到了新生活的来临。数周来在寂寞中闷闷不乐的职员们，也重新把头发梳理得光光亮亮，摆出职业上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派头。

“火车什么时候重新开通？”

唯有这一次他对你的提问什么也没有查阅。“第一班快车今天午夜发出。车票已经卖超——售票处的门都关上了。不过，他们会留有少量票。你想今夜离开吗？”

“好，来张到北平的二等卧铺票。”

我走出旅馆，来到现在我已相当熟悉的西安大街上——这条尘土飞扬的大路经过新城的白色大门，然后是宽阔的西大街。我经过《西京民报》的办事处，我的朋友过去就在这里工作。陈翰伯还留在那里，可是印刷机却闲着。出版暂时中断，等待新的主管机构验收。

“中央军已经来了，我今夜也要离开。”陈翰伯点着头慢吞吞地说；他那明亮的黑眼珠显得非常忧伤。

“张兆麟哪儿去了？”

“你想见他？”

“要是能安排一下的话，我想大家可以办个聚餐会。他能来吗？”

我们商定了一个聚会地点。这家报社的办事处就像一座被遗弃了的矿井口，显得忧思重重。编辑部的职员，’或者就叫编辑部的残留人员，满腹忧伤地围坐在火炉旁，就像“空虚的人”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靠在一起，

满脑子稻草哟！

当我们一块儿窃窃私语时哟，

乏味无聊的话儿

是平凡而无意义的……

我注意到，他们中有一个人把脚翘到炉子上，正在读列宁的著作。

“你最好把这些东西收起来，‘蓝衣社’就要来了。”

“他们昨夜就在这儿。现在我们有几个人在站着岗。”

“不过，还是读‘三民主义’安全些。”

他们都把各自仅有的那点东西打点停当，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在中国，所有胆敢涉足政治的记者，都生活在危险之中；他们要是明智，最好还是随时打点好自己的行装。

“报纸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它还属于张学良，是吧？”

“张学良是囚犯。我们原想把这些印刷机搬到兰州，可是来不及了，顾祝同明天就到，他不喜欢记者。他屠杀过许多新闻记者。”比起由此而引起人们联想的实际情况，他的这番话说得更平淡，更轻松。突然，我想起了我的那个萦绕于心的问题。

“你听没听到过孙铭久、苗剑秋和有关他们那伙人的事情？”

“我们都没得到他们的消息，”他慢条斯理地说。“不过，我今早听到谣传说……”

“快说下去。”

“……在咸阳，他们受到了王以哲的人袭击，全都被杀了。也许这是真的。”

“昨夜？”

“是的，是昨天夜里。”

这一阵儿的谣言实在太多了，可是，这一个也许是有其事。任

何事情都可能真得发生，因为西北的整个这场运动正在解体。在南京军队面前退却也许是个策略问题，然而，它却从内部被搞得分崩离析。

“你们对和解怎么看？”我问这几位东北青年。“它真的是一次投降吗？”

其中一位耸了耸肩，说道：“是这样——否则就要内战。就目前而言，不管采取什么步骤都比打内战强。只要南京信守协议，我们就得到了某些有意义的东西。”

“那么，东北军呢？”

他压低声音说：“他们对这种解决方式并不满意。当最后一批东北军撤离时，他们说：这是又一次‘九一八事件’。他们中有许多人非常痛恨红军。”

这些我能够理解，仅从表面上看，东北军是这场交易中的损失最大者。红军通过与南京的讲和，不仅什么也没有失去，而且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如果这次是按他们的条件讲和的话。

我按原计划继续在市內到处转悠。店铺敞开大门，准备欢度新年，少数街道上挤满了人。周围还有一些杨虎城的军队，但他们都已不带武器。

国民党党部的外面，是一片乱哄哄的景象。一长串马车满载着报纸和办公设备，正准备离开。这座建筑物过去是“群众运动委员会”办公的地方，在西北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也是最使人感兴趣的组织活动中心之一。过去他们还在这里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总是挤满了学生，编发着那些无穷无尽的宣言、海报以及从各县区归来汇报工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它曾是革命活动的繁华场所；现在呢，我估计，“新生活运动”将确保它那宁静的统治地位，昔日的官员们也将重新恢复其边上班、边打吨的浑浑噩噩状态。

宽阔的大街显得比以前更加空旷开阔。我意识到，这是由于昔日漫延于整个街道每个街口的横幅标语和旗帜，全都消失了。我来到鼓

楼，只见工人们正在那些巨大的绿色海报上忙碌着。这些海报贴在四周墙壁的石基座上。张学良最初提出的“八点纲领”也在这里，用巨大的白字刻写在上面：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全面政治自由！可是现在呢，我留神注意到，这些字迹正在被用国民党的蓝颜色所涂盖。他们的行动可真是不失时机。

那些熟悉的海报全都从墙上消失了。我百无聊赖地瞎猜测：这是是否接到了什么命令，或者是西安的市民们，由于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为了不再出现新的风暴，才要采取措施把一切有牵连的痕迹彻底消除。不过，可以确切地说，这座城市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受到征服、历经磨炼的外表。我信步来到了无线电台；原来的那些工作人员正在放着留声机唱片。一切都彻底崩溃了。

“您瞧，中国的事情总是这么结束的，”那位教士说。

“一种良好的传统中国式妥协。”我感到情绪特别低落，不想跟他争辩；况且，他显然也说对了。

这次茶话会颇有点像个样子，因为在座的六位，包括了自大撤退后仍留在西安的全部六名外国人。我是在到浸礼教会寻找我的朋友时，无意中偶然遇到他们在一起座谈的。我还有点担心会不会由于我的突然插入而扫了他们的兴。

“这些年轻人是诚挚的，”那位发言的教士继续说。“可是，一切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该怎么办呢？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金钱交易罢了——是大批的金钱在将军们中不时易主而已。而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人民才会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

他会见过 23 位叛乱的领导，应该说他对所谈及的问题是了解的。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住得时间愈久，就变得愈像中国人那样，遇事能够容忍。在我想来，对于任何一传教士来说，要想长期保持他

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观念，是很不容易的；而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肯定非常困难。

我环顾在座的这几位(碰巧，又全是英国人)。他们为了一个许多人都感到不可理解的目的，选择了在外国度过其一生。他们中有三位，奉献给自己信仰的是劳碌一生的苍苍白发；他们是在西安从事教会工作的人中最优秀的人，或者，至少也是最虔诚的。这是因为，在危险当头的情况下，坚守了自己工作岗位的，只有他们。可是，我觉得他们中只有一个人——还不是最年轻的——似乎对过去八周来在西北一直非常富于戏剧性，从而引起争议的那些问题有一点真知灼见，我转向了他。

“那么你对这一切有何高见？”

他仔细斟酌了一下，答道：“对于行使暴力，当然了，我感到遗憾。可是，这么做也带来了许多美好的东西。例如，我们就了解到了某些有关共产党的情况，而这些以前根本无法知道。我和周恩来进行过交谈，当时的气氛就像现在你我交谈一样平静。从他那里，我得到了一种印象：他们是真诚的，而这对我来说，要比无论什么宣言都更有意义。我认为蒋介石在西安也学习到了很多——很多他应该明白的道理。毫无疑问，中国实现真正统一的前景，今天的条件要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要更为有利。”

我感到，他的这番表白不是盲目乐观。“你喜欢周恩来？”

“非常喜欢。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中国人之一。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他带点激动地补充说：“对共产党在西北的行动，我们的某些教友居然散布了一些毫无根据、最能使人恐慌的谣言故事，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幸。这些故事不是从事实出发，完全出于一种最恶劣的偏见。他们应该被公开否认，因为它一点也不利于我们在这里的工作。”

最后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毋庸置疑，这是指少数教士所做的夸张性报告；这些报告描绘了一幅“赤化西安”的情景，从而导致

对在该市的外国人的安全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庸人自扰式的行动。我感到不解的是，教士们这种态度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持续下去？那些坚持下来的教士们对于那些未能坚持下来的，有多少成分是真正出于自发的义愤？不过，人们普遍同意：共产党总的看来是“行得端，走得正”。周恩来是当今获取成功的英雄。只需对教士过去对中国红军平时所持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态度有个起码的了解，便会意识到这种认识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了。

事实上，在中国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有了改变这一点，是从西安事变中可能取得的(说早已经取得尚为时过早)一项显而易见的成果；例如，光是人们觉得他们能够使内战得以避免这一点，就使人们普遍松了一口气——如果剿共战役不中止，将会出现何种结局呢？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对该国传统军事思想为害最烈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轻信那种能平息战乱，恢复秩序的势力。当南京政府的权威，通过采用各种计谋取得一个又一个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从而不断扩展到中部和南方各省时，在该国的大多数外国人，也就转变了态度，坚决地亲南京。尤其是自从委员长改信基督教、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来，传教士们毫无例外地全都成了蒋介石的热情支持者。他使他们成了既得利益者，因为基督教终于在中国达到了一个荣耀的位置。

凭借着某种奇怪的心理学花招(这是任何生活在中国，依靠官方新闻媒介精心编造的报道来获取消息来源的人最容易下意识地相信的一种花招)，现在剿共战役已不能再被看作是“内战”了。因此，贴上一个“共匪”的标签，这才是真正的精明。在中国，匪也和穷人一样，是随处可见的，因而剿匪也就必然成了一个有效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一种正常职能。但是十年来对红军发动的战役所损失的生命数目之巨大——尽管中国农民的生命价值是那么低廉，在任何一个有真正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早就会激起社会舆论的愤慨。共产党绝不是“匪”；就其作风而言，早期江西的红军比起把蒋介石推向执政地位的那支军队，似乎更有权力把自己称为“国民革命军”。

这是一种纯理论的观点。可是，任何一位对中国的民族独立斗争怀有同情心的人，也只能对“剿匪”战役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深感遗憾。十年来，共产党一直是南京政府的主要内政问题，除了把他们斩尽杀绝，绝对不容许有其他的任何解决方式。然而，这种斩尽杀绝的政策，实际上不仅代价很大，而且也没多少效果。尽管“第五次剿共战役”摧毁了共产党在江西和福建费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主要根据地，红军也只不过是改换了一下他们的阵地。处在运动状态中的红军，比起被铁壁合围在他们山区的要塞里，对南京的危险可能要大得多。随着他们跨越半个中国那坚忍不拔的脚步，土地革命的风云在他们身后蓬勃兴起；

而他们在 1936 年占据的最后位置，则还远不能使南京政府感到放心。

那些并没有竭力反对在西安事变期间与红军达成临时协议的人——他们代表着中国最有勇气，最讲究自由的力量——常常以红军处于“削弱状态”为口实来缓和争议。他们坚持认为，残留在西北的只不过是一些被连续不断的战斗和强行军所拖垮、毫无斗志的乌合之众，且孤立于一块贫困不堪的区域内，因而在军事上不堪一击。他们争辩道，在这种情况下，赐给这些处境艰难的亡命之徒们一点和解姿态，只消把赦免他们当作一种施舍，就算是南京政府方面做了一件令人满意的事。

可是，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况。中国西北红军所占据的，实际上是一片范围较大，比较独特的区域——虽然较为贫穷和人口相对稀少——与他们过去占领过的任何地方相比较而言。由于他们可以退回到几乎无法攻破的甘肃山区据点，因此，这里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区；而对于像他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将来说，粮食问题也绝对不成其为什么严重的困难。不仅如此，那里还有取之不尽而异常珍贵的生活必需品——食盐，它的缺乏曾使遭受封锁的江西“苏区”处境极端不利。

西北红军的实力(处于常备和武装精良的军人,以有别于民兵),据外国某观察家估计,约十万人左右,首次置于一个统一领导之下,包括其几乎所有经验丰富的领袖——毛泽东、朱德、林彪、贺龙、萧克、徐海东以及其余这些名字几乎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多年来第一次取得了全面协作。从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境的根据地出发,他们可以挥师向北,向西,从而与新疆、外蒙建立起联系,开辟与外部世界的通道,而这自广东汕头失陷后,他们从未取得过。在许多有资格的评论家看来,无论是防御,还是未来的潜在军事行动能力,在1936年,中国的红军比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强大一些。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也由于政策的改变而大为加强,而这种政策的转变自1936年开始以来,已经生效。建立统一战线,对付那个几乎无可辩驳地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主要敌人的国家,这一主张使他们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支持。正如出席1936年8月召开的“太平洋学会”<sup>①</sup>尤塞米蒂<sup>②</sup>会议的一位代表所说的:日本的侵略正在使共产党成为中国的‘优秀公民’。昔日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反共的势力,现在也开始陷于瓦解。

这两种观点——中国红军完了,以及他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强有力,富于挑战性的战略位置上,要想对付他们,必须设计出新的战术——都开始出现在由周恩来参加的西安谈判桌上。可是,共产党绝对不是在对他们完全不利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不像南京——只要他们能够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他们可不在乎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首先由周恩来亲自向蒋介石提出,其后又提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建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提议一年前可能就已初现端倪),是一个正式的妥协方案。当然,双方对于究竟能做多大程度上的相互妥协,无疑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只要愿意,南京就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说是共产主义已经为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共产党方面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必要的妥协,以解决国家日益深化的危机问题。

在蒋介石被捕获的时候,“叛军”方面可供考虑的有两种可能——这时的叛军,随着红军的加入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联合体。第一种

可能是采取断然的军事行动。他们可以抢占潼关，加强这一要塞的防御力量；在西北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人民政府”，公然反抗南京；并向西南和华北的地方军阀(他们出于各自的原因也都反对南京)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实现其所提出的彻底改组南京政府，开放救国运动等项主张。这就是为像孙铭久这样的左倾分子所推崇的行动方针，一度也为共产党所支持。如果采用了这一方针，导致爆发比实际上发生过的更大规模的敌对行动，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释放蒋介石是一张牌，这张牌总能够在方便的时候加以利用，以带动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双方重归于好。而且在政治自由方面，大概也会实有所获。至于它是否会导致同日本的战争，这就说不准了。

由于种种因素，这个机会还是失掉了：占据潼关失败了，与各省建立联系也遭到了困难；而且从事变一开始，西北方面内部就对运动的目的发生了意见分歧。在一种行动方针被放弃的情况下，妥协——同时也释放蒋介石——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南京的情况演变得颇为奇特：由于一帮实权人物迫不及待地企图利用形势，为自己谋取利益，使得蒋介石夫人和宋子文的调解工作变得尤为及时。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他们似乎比其他任何一方都更为迅速地充分估量了这一形势的前景——早已改变航向，避开“分裂主义分子”在西北建立“人民政府”的设想，表现出支持通过调解解决问题，释放蒋介石，和以南京作为国民阵线起点的强烈愿望。一经认准了这条路线，在变化莫测、争吵不休的以后几周里，他们就不再偏离这一点；最后他们还能够——站在许多心怀不满的反对派的反对面前——劝告西安当局接受他们的政策。因此，公开的破裂得以避免，而且在对某些大人物最敏感的尊严问题多少可以令其容忍的情况下，南京给予一切方便，支持国民阵线的正式成立。只要谋求真正政治团结的实质性内容能够得到保障，那么，解决这一极端复杂局势的光辉成就和荣誉，就赋予了委员长和蒋介石夫人(这也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南京到底有没有良好的信誉来保证呢？为了谋求最终的和解，西北联军放弃了战略位置，而这些地方在未来再也不可能重新回

到他们手中了。蒋介石也不会重蹈覆辙。

至于红军方面，他们虽然成功地在南京获得了立脚点，但代价则是失去了他们的西北盟友。对此，人们大概都很明白，在西安临近和解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联合工作几乎完全破裂了。东北军自己内部也陷于分裂；自从王以哲死后，高级军官们惶惶不可终日，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杨虎城打算自谋生路；他看来像是个最大的输家，直到南京把他的全部人马全部收买了去。充当“保皇派”这个自己也不熟悉的角色红军，正在试图以比上海金融家更高的调门，赞美着蒋介石。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十年来不间断地和他打仗这一事实的本身，细想起来都像是一场演得非常逼真的戏。

在我们晚上相会的那个餐馆外面，南京士兵正好当街挂起了一面新的横幅标语。白布上写得黑字几乎尚未干呢。

“上面写着什么？”我问。

张兆麟戴了顶压扁了的礼帽，做了一个鬼脸，念到：“打倒共匪！与共党勾结者死路一条！”这是汪精卫之流常说的，对国民阵线来说绝非好兆头。

这是一次奇特的最后一次宴会。就在这家餐馆的内室(我们也是才搞清楚)，后门居然直通厕所。南京军队的司令顾祝同定于明天到达；而且他们还告诉我，“虎城”的私邸——该市最富丽堂皇的住宅——正在被安排作为顾祝同的司令部所在地。杨本人也像一切知趣的人一样，呆在新城之内。所有“新生活运动”的标语也再次重返各家店铺的门口。由此看来，西安似乎要按照老传统，准备过中国人的新年，而国民党的天蓝色也将成为最时髦的色彩。

起初，大家的话说得都很谨慎，因为每个人心里好像都搁着点事。对于在西北的许多人来说，现在依然是一个心情焦虑的时期；或迟或早，逮捕乃至可能出现的大屠杀，不可避免地会随之而来。这就是搞政治的风险。一想起这些，谁也没心思饮宴作乐了。

“也许结局不会那么糟，”我提出。“去年在广东，他们仅仅调换了全体文职官员的工作，驱逐了旧党派。我并不认为还有谁想在西安搞什么另外的暴力行动。此外，西安市内只有一个团的中央军。”

“早已两个师了。”有人反驳道，“你没见他们在外面张贴的标语。”

“这也许只是做样子罢了。”(这话说对了；事实上，这些反共标语并未悬挂多久)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祝贺新年呢？至少，我们期待着新年好运的降临。”

我们要来了黄酒，为张少帅——还在奉化被囚禁着——的身体健康干杯。几杯热酒下肚，谈话的气氛立时松弛了下来。

“你们应当首先为蒋介石干杯，”张兆麟坚持道。“你们难道不知道，统一战线嘛，蒋介石现在是我们的领袖了。”

他说得对，于是我们故意大喊大叫着干了这一杯。“最好还应该为红军而干一杯，”一个忧郁的声音传来。“很快就没有一个红军了——即使在特区，也只有更多的政府军。”

“但红军是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武装的，对吧？”

“这个，眼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他们似乎奉命取消自己，以解除蒋介石的烦恼。

“不对！”有人怒气冲冲提出抗议。“红军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武装，或者他们的‘苏维埃’组织。他们可以改变名称，使南京满意。但这只是一种战术——统一战线总战略下的一种战术。”

“多么笨拙的战略！这种战略使他们充其量只能维持到蒋介石把他们再度孤立起来，并把东北军调离西北！”

“不对，”蒋介石真的变了。他变得更民主……”

我们重新回到以前那种夹杂着争论和吵闹的亲切气氛中。这种气氛我在北平时曾是那样的熟悉。现在即使这么谈一下，也令人感到快慰。再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就会更清楚了解到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然而，在聚会结束之前，我们还要为一件事来干这最后一杯酒。我们祝愿道：

“为了中国的统一!为了国民阵线!”

眼前的情景很富于浪漫色彩，宪兵在窗外来回走动，侍者在屏风后频频往来。

“也为了我们再次相会，干杯!”

我的包裹在旅馆已打点停当；从这里到火车站仅需一刻钟。旅馆的经理(也已换上了另一位，因为他能够安安生生地躺在床上睡着觉)，与我殷切话别。他对不能亲自送我到车站表示了歉意。

“我现在实在太忙了。您瞧，这儿一切还都是乱七八糟的。许多客人明天就要来了。”他颇为不愿地咳嗽着说：“您在这儿过得还舒服，对吧?”

“非常舒服，多谢了。我过得很痛快，再见。”

从西安的城墙下面走了出去，再次回首远望；发电厂里灯火通明。为一团巨大的阴影所笼罩的古城墙上，已看不见枪炮。城门上空，在一束探照灯光柱的映照下，可以看见迎风招展的国民党的国旗。

译注：

①太平洋学会 1925 年 7 月由美国一些工商业者和资产阶级学者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成立，目的是“通过会议讨论和长期调查工作对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进行科学研究”。它以学术团体的姿态出现；在经济上，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钢铁公司等垄断资本的资助，会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日本、荷兰、新西兰、英国、美国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曾出版《太平洋事务》、《远东文摘》等刊物。1961 年解散。

②尤塞米提，美国加利福尼亚中东部的自然山谷风景区，1936

年太平洋学会在此召开年会。

③中央军进入西安后，大小特务弹冠相庆，在大街上粉刷反共标语，企图用高压手段对付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周恩来同志见此挺身而出，亲自到“西安行营”严词质问顾祝同，迫使其不得不下令取消反动标语，特务们的嚣张气焰亦有所收敛。

附

## 社团及人物表

(按原著翻译)

蓝衣社，国民党的秘密半法西斯恐怖主义组织。

鲍罗廷，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俄国顾问。

张君，作者的朋友，时任“少帅”在西安主办的报纸编辑(即张兆麟——译注)。

张群，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亲日的”军校系(黄埔系)成员。

张学良(少帅)，“老师”张作霖之子，日本侵占前为东北地方军阀；东北军首领。

张公权(即著名银行家张嘉傲——译者)，南京政府交通部长，黄埔系中的亲日分子。

张作霖(老师)，张学良之父，满洲军阀，后被谋杀。

常荫槐，前东北交通部长，为少帅所暗杀。

赵世炎，周恩来在上海被捕时的共产党同志。

陈君，西安某报的记者(即陈翰伯同志——译注)。

陈诚，委员长的助手之一，曾被迫参加签署了少帅的“八项纲领”。

陈济棠，广东省的军人暴君；在西南叛乱中为蒋介石所收买。

钱大钧，蒋介石的主要助手，随其来西安。

蒋孝先，委员长的侄子，臭名昭著的“蓝衣社”头子，在西安被杀。

蒋介石，中央(南京)政府的委员长，国民党领袖。

蒋斌，东北军交通处长，在 1937 年“二·二”事变中被杀。

蒋鼎文，委员长所信赖的助手；取代“少帅”作华北的“剿匪者”，事变后携委员长信被放回南京。

秦，北平市市长(即秦德纯——译注)

周从政(译音)，于学忠的副官，东北军的抗日指挥员。

周恩来，红军军委副主席；第一方面军政委；黄埔军校前政治部主任；1927 年在上海被捕；“广州公社”的领导人；共产党派往西安“叛乱者”中去的代表。

朱德，南昌起义的领袖，红军司令。

樊嵩甫，潼关对付西安“叛乱”的南京军队指挥官。

冯钦哉，陕西地方统治者，未支持西安“反叛”。

冯玉祥(基督将军)，支持南京主张抗日的军事家。

傅作义，绥远国防军内蒙抗日部队司令。

韩麟春，张少帅的同事，是他使少帅染上了鸦片瘾。

何柱国，东北军骑兵指挥，亲南京；2 月 2 日逃过了谋杀。

贺龙，红军第二方面军司令。

何应钦，南京国防部长；黄埔系“亲日派”成员；1935 年 6 月与日本签署了秘密的“何梅协定”。

小虎，侦探王队长的儿子。

肖克，红军指挥员。

西北军，杨虎城统率下的军队。协同东北军扣留了委员长。

熊佛西，中国当代剧作家。

熊式辉，南京军委会和黄埔系亲日派成员。

中国的第一幕——四蛋事变秘阁

徐方，东北军上校，在二二事变中被杀。

徐海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兵团司令。

胡宗南，第一军(南京)军长；为红军所败。

高福源，为红军所俘的东北军将领；是他向少帅面陈了红军的政策。

高桂滋，驻扎在陕北的南京将领。

高双成，驻扎在陕北的南京将领。

顾祝同，南京将军，1937年2月为南京军委派遣接管西安(顾当时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译注)。

顾顺昌(译音)，周恩来1927年在上海被捕时的共产党同志，(后叛变被周恩来同志批准处决——译注)。

孔祥熙，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委员长不在时被指定为行政院代院长；宋霭龄的丈夫；主张抗日的“欧美派”领袖。

郭松龄，改组东北军的首批将领之一；少帅早期的朋友。

国民党，政党。其右翼控制了中央(南京)政府。

老贝，作者的中国名字。

李某，作者前往西安途中的仆役。

李宗仁，广西的军事首领，1936年西南叛乱的领袖之一。

李渭城，陕西省银行经理。

刘，西安学生；作者的翻译；抗日先锋队成员。

刘镇华，1926 年反对国民革命的将领。

罗亦民，1927 年于上海被捕时是周恩来的共产党同志。

鲁迅，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南京政府的政治受害者。

马占山(双枪马)，东北军骑兵统率；齐齐哈尔的保卫者；在满洲对日本实施抵抗的唯一领导人。

马志超，南京政府的西安警察局长。

毛泽东，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统帅。

梅兰芳，著名旦角演员。

苗剑秋(苗疯子)，少帅的前秘书，西安的“三个火枪手”之一，化名周，引导作者到西安。

白崇禧，广西的统治者；蒋介石的前参谋总长；1936 年西南叛乱的领袖。

彭德怀，红军一方面军总指挥。

博古，中国共产党前书记；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团中任职。

邵力子，陕西省省长，国民党在西安的总代表。

宋霭龄，孔祥熙之妻；与其兄长、姊妹及其丈夫共同组成“宋氏王朝”。

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国民党左派精神的继承者；“全中国各界救国委员会”的领袖之一。

宋美龄，蒋介石夫人；三姊妹中最小的一个；活跃在南京政府。

宋子文，南京政府前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行长；主张抗日的“欧美派”成员。

宋学礼，王以哲的副官，二月兵变中为东北先锋队所杀。

孙科，孙中山之子，主张抗日的“欧美派”成员。

孙铭久，在西安的东北军特务团团长，抗日学生会(先锋队)负责人；“西安的三个火枪手”之一；二月兵变的指挥。

孙中山，“中国革命之父”；国民党的创始人。

宋哲元，1937年7月在日本进攻北平时弃城而逃的将领。

唐玉麟，热河的“保卫者”；臭名昭著的腐败将领。

丁玲，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与红军在一起。

蔡廷锴，1932年上海保卫战时十九路军总指挥。

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

段琪瑞，统治过华北的前“皖”系政府首脑。

东北军，为少帅领导，自满洲逃出，强烈反日。

万福麟，满洲将领，原在少帅军中。

王侦探队长，守卫禹门口，小虎之父。

汪精卫，中国前总理，原来与基督将军冯玉祥，模范省长阎锡山“三人政权”成员之一，反对国民革命，亲日派。

王宠惠，南京政府成员，主张抗日的欧美派。

王以哲，东北军将领，1937年二月为抗日先锋队所杀。

杨虎城，西北军司令；陕西省部分地区统治者；陕西绥靖公署专员；抗日联军代司令；西安事变中少帅的同谋者。

杨贵妃，唐代著名美人。

杨宇庭(东北第一人)，老帅的参谋长，与日本人合谋搞满洲独立，被少帅为报父仇所杀。

杨永泰，河北省长，1936年10月据传为蓝衣社所杀。

叶剑英，东路红军参谋长，曾任蒋介石 21 师师长，黄埔军校教官。

阎锡山，山西省“模范省长”，在西安与南京的事变中取中间路线。

应德田，少帅秘书。

于学忠，东北军将领，驻甘肃的司令。

于右任，南京政府元老。

世凯，1912—1916 年中国的总统。

## 译后记

1936 年 12 月 12 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其特有的方式突然爆发了。

事变的消息刚一传出，南京当局便在亲日派分子的操纵下，立即对西安实行了全面封锁，并调兵遣将，全力组织“讨伐军”，抢占潼关，进逼渭、华一线，企图用武力将这次事变镇压下去。一时间，西北上空战云密布，交通为之隔绝，电讯因之中断，事变的真情无法达于外界，而南京当局则开动一切舆论工具，肆意歪曲事变真相。形势异常微妙、复杂，大部分国人顿时陷入无可适从之中。

然而，就在此时此刻，却有一位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外国记者，凭着特有的新闻敏感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以非凡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不畏艰险，辗转千里，历经坎坷，终于来到西安，成为事变后唯一进入西安，且逗留时间最长的外国记者，为揭示西安事变的真相，传播真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就是当时的英国记者，新西兰人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教授，1910年8月11日出生于奥克兰一个牧师家庭；1932年在新西兰大学附属奥克兰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36年初，他荣获牛津大学罗兹远东研究奖学金，来华在燕京大学进修中文和研究远东政治，并兼任英国数家报纸的驻华特约记者。在燕大期间，他和黄华、张兆麟等爱国学生领袖曾同居一室，与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斯诺夫妇结成了密友。在中国的耳闻目睹，使他对政府的腐败和人民大众的贫困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各阶层群众为反对外来侵略，反抗黑暗统治而掀起的民主斗争深为同情。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贝特兰参加了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一二”抗日大示威，于当晚便获悉了事变的消息。他立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斯诺夫妇，极其渴望能够去实地考察一番。三天之后，因在蒋介石访问西安时，在王曲军校大会上公开大肆抨击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而被迫逃亡在外的东北军少壮派领袖之一苗剑秋，秘密拜访了斯诺夫妇，想请斯诺陪同他一道返回西安。由于斯诺当时刚从延安访问归来，正在忙于写作《西行漫记》一书，无暇脱身，其夫人海伦·斯诺便提议由贝特兰替代。但苗剑秋对贝特兰并不了解，感到不大放心，坚持要海伦·斯诺为他“担保”(注)。只是在后来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中，他俩才逐渐加深了解；结成了患难之交。

贝特兰的西安之行光途中就走了11天。大约从12月16日下午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直到12月27日方抵达。是时蒋介石已于两天前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去。一路上，苗剑秋给他详细讲述了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全部经历，从而使他对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因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而到西安后的当晚与参与策划并直接参加扣蒋行动的另外两个东北军少壮派核心人物——张学良的秘书长应德田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久的彻夜长谈，则使他对事变的全部经过有了充分的了解。从而认识到，他原先认为的“随着放蒋，一切都算完结了”的想法“现在看来是多么的错误”。因而确信，“这次运动必将继续下去”。“一个汹涌壮阔的民族运动势将横扫全中国。”

贝特兰在西安共逗留了 43 天。在此期间，他抓紧时间实地考察了事变发生的各个现场，广泛采访了与事变有关的各阶层人士。西安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使贝特兰兴奋不已，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西安以后的历次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到处做演讲，发表演说，参加对事变的宣传工作，并与史沫特莱一道，主持了西安电台的对外广播。他的这些做法，引起了英国驻华使馆和某些外国社团人士的强烈不满，个别教士甚至对他当面发布“禁令”。1 月中旬后，局势日趋紧张，在个别反动教士的煽动下，外国人纷纷逃离西安，英、美等国使馆也派人来安排撤离事宜。但贝特兰毫不动摇，依然我行我素，直到南京部队全面接管西安的前一天卅月 7 日才决定乘午夜的第一班列车离去。在受到严密封锁，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物质生活条件极差的西安度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这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各方面都相当优越的外国青年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

然而，贝特兰对西安事变的最大贡献，则是他把此行的全部所见所闻，结合自己的研究分析，以超常的速度写了出来，这就是 1937 年 7 月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中国的危机》一书。抗战爆发后，他又为此书重写了序言，于次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改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的故事》，也就是现在这个译本。完成本书写作后，作者曾到日本进行短期考察。七七事变刚一爆发，他便于一周内返回北平，于同年 10 月来到延安，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采访。而后，他又东渡黄河，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采访了一年多时间，写了《华北前线》一书(初版于 1939 年；美国版为“不可征服的人——在华北战斗农民中间一年的惊险生活日记”)。国民党迁都重庆后，他被任命为英国使馆新闻专员。此间他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任秘书，曾在香港等地为中国抗战筹集医药等物资援助。日本入侵香港时，他自愿入伍，成为后备役炮手，为日军所俘，在日本战俘营中被关了四年多时间，身心蒙受极大摧残。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战争阴影》一书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新一中友协的创始人和赞助者，先后于 1957、1962、1978、1986 年四度访华，著有《重返中国》、《在今日中国的年轻旅行者》等书和大量文章，忠实报道了中

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

我对作者的认识，首先是从《毛选》中收集的那篇著名谈话中了解到的。1985 年秋，我在安危老师那里见到有这么一部记述西安事变的书，立刻便被它那精彩的内容吸引住了，决计把它翻译过来。但这对像我这样一个仅自学过几年外语的青年来说，的确是件相当艰巨的工作。然而，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三易其稿，又承蒙西北大学卢匡老师仔细校阅了全文，安危老师察看了部分内容，才形成了现在的样子。尽管如此，有失准确，有待正译之处仍在所难免。我由衷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了解情况的师友们不吝指教。这是因为，对于这样一部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纪实性著作，任何一位从事翻译的人，都应当本着科学的态度，努力表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来。而这又恰巧是本人的第一部正式译作，它对于我今后在翻译事业上的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译书的这段时间，正是我所经办的“陕西翻译事务所”处境极为艰难的时候。陕西省译协和翻译事务所的谢天麟、李庚年、贺明贞、乔健、张少黎等同志曾给予我支持，减轻了我的心理负担。我的父亲牛敏生先生和西安微电机厂的秦世荣同志帮我清抄了全部书稿；陕西省地方志编辑室的史春龙老师为本书的封面和封底提供了照片；责任编辑崔茂盛和西安新闻书屋的金华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发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尤为难得的是，在本书即将付印前夕，年近 80 的作者从新西兰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和中译本序，进一步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在此，我向他们深表谢意。

牛玉林

1988 年 10 月

注：参见《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第 226 页(海伦·斯诺著，安

危、杜夏译，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